

毛泽东与国学

毛泽东对国学的研究与应用，融汇贯通，推陈出新，成为其治国理政的治世智慧。毛泽东对国学的研究与应用，融汇贯通，推陈出新，成为其治国理政的治世智慧。毛泽东对国学的研究与应用，融汇贯通，推陈出新，成为其治国理政的治世智慧。

只識意言弓射去雕
俱往矣盡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国学/李京波编著.--北京:西苑出版

社,2011.6

ISBN 978-7-5151-0053-1

I.①毛...II.①李...III.①毛泽东思想—国学—研

究 IV.①A8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5663 号

毛泽东与国学

著者 李京波

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邮政编码：100143

电话：010-88624971 传真：010-88637120

网址 www.xycbs.comE-mail:xycbs8@126.com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25.25

版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51-0053-1

定价 39.80 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公元 1976 年 9 月 9 日，一位伟大的历史巨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生前，他曾借用司马迁的话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一天，当他辞世的时候，山河变色，中国哭泣；大地动容，世界悲痛。虽说任何人迟早都得离开这个世界，可不同的是，他的离去，让中国，让世界，让所有的人，不论是衷心爱戴他的人民，还是被他打倒过的敌人，都发自肺腑地承认——人类失去了一位历史巨人。

但是，在他离去之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并没有就此停滞。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更加壮丽的变化……从此后，中国人民逐渐从相对落后、封闭的世界中脱颖而出，投身到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30 余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变化，在我们的祖国日益繁荣强盛，人民日益安居乐业的同时，人们开始享受生活的富足带给自己的欢乐，开始体验伴随着这种富足而来的幸福……

1949 年，那个划时代的巨人曾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半个世纪之后，此刻的中国人民真正地走向世界，融合于世界，屹立于世界……而越是此刻，人们便越发地，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逝去的伟人，开始想到他创造的这个天地，打下的这个江山。还有，他的伟大！

这个伟大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一个注定要震惊世界的名字！

毛泽东——一个注定要震惊世界的巨人！

毛泽东，无论何时何地何代的人们缅怀起他的时候都无法不为之动容，为之敬仰，为之崇拜……伟人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就在于他超乎寻常的“伟大”和“英明”，正是这种凡人无与伦比的伟大和英明，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以及无数个时代之后的人们回望历史的时候，都会从心底里流露出由衷的自豪——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中华民族因为有秦皇汉武，因为有唐宗宋祖，因为有成吉思汗而令人自豪……但是，所有的拥有都不如一个毛泽东的出现！

中国因为有毛泽东而骄傲！

中国的历史因为有毛泽东而值得骄傲！

去过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的人们，都有个惊奇的发现，那就是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为一身的这位领袖人物居住的办公间以及卧室内堆满了许许多多的古本线装书，尤其是在他卧室的那张与普通的双人床无异的睡床上，一半是他的栖身之地，另一半则摆满了这样的书籍，堆起来有一尺多高。毛泽东的一生，有过三位夫人——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但最终陪伴在他身边的则是这些他研读了一辈子的经史子籍。培根说：书籍是人类永远的朋友。看来，与书籍为伍至少不像与人为伍那样，让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劳神费心。就一个伟大人物而言，有女人陪伴的日子是美丽的，但越美丽的东西，仿佛越难以长久；有书籍陪伴的日子是孤寂的，但是，越是孤寂的时日，越延绵流长。时世就是这么纷扰，就是这么不如意，但是，释然一点看去，这不就是最本质的世界，本质的人生吗？由此，一个伟大人物便变得栩栩如生，变得和我们格外亲近，让我们觉得他早已走下神坛，和我们血脉相连，即便辞世多年，仍让我们无法不被他伟大的力量和魅力震撼、折服。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同时，又是诗人、书法家和学问大师。他的文人和诗人气质与他政治家、战略家的气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内涵、魅力和风采。而要研究毛泽东的才识，包括他的诗词、书法艺术、文化思想、学术水平和文人、诗人的气质特点，不将其首先视之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而只是用对一般文人（而毛主席恰恰不是一般的文人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多方面的超乎常人的极高修养和素质）及文人作品的分析方法去诠释他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将眼睛狭隘地盯在一些诸如诗词研究中，如《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这样“情丝恨缕”、“儿女情长”的作品上，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客观地描述和反映出那个不凡且伟大

的毛泽东。毕竟，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诗人、政治家诗人、军事家诗人，而且他首先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不把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定位放在第一位，也就无法准确、全面地诠释他作品中那种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信念和情怀。

任何的学问和学术都不是单纯的，再浓荫蔽日的大树也必须根置于大地。纯粹的、完全的、空中楼阁的学术是没有的，当历史的记录者们无法也不可能存在于一个纯粹的、完全的、空中楼阁般的环境时，他们对历史所做的记录也就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尤其是这种烙印无法不是指权势阶层的某种需要和好恶的时候。《史记》如此，《汉书》如此，《资治通鉴》也如此。因此，从事本书的写作就不可能不以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为出发点，不可能脱离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不过，也恰是这种态度和方法，让我们更加坚信毛泽东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基，而这位伟大人物在此一领域内的成就与贡献究竟如何，相信看过此书的读者会有一个自己的评判。

目 录

第一章 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	1
第一节 六年孔夫子	1
第二节 自是伟大之器	11
第三节 学问筑基在一师	18
第四节 探求为学之道	20
第五节 以国学常识为最急	24
第六节 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	28
第二章 毛泽东主要思想土壤——国学	30
第一节 何为国学？何为大师？	30
第二节 国学大师的成就与标准	36
第三节 毛泽东的国学成就	57
第三章 大师中的大师	69
第一节 充满大师品质的文化思想	69
第二节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观	75
第三节 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领袖风度	85
第四章 毛泽东国学活动简历	105
第一节 学富五车的学问大家	105
第二节 国学信仰之毛泽东与《经史百家杂钞》	110
第三节 激扬文字解析二十四史	113
第四节 毛泽东解析五大名著	123
第五节 毛泽东最爱不释手的古籍《资治通鉴》	148
第六节 “老”“庄”两部必读的奇书	150
第七节 毛泽东与奇书《何典》	156
第八节 毛泽东的《周易》研究	159
第九节 毛泽东与庾信的《枯树赋》	162
第十节 毛泽东解析《六祖坛经》	166
第五章 传统国学文化造就出的军事家	168
第一节 独领风骚的军事思想	168

第二节 《孙子兵法》孕育出毛泽东军事理论.....	176
第六章 与国学大师的学术交往.....	182
第一节 故友诗友，以学为友.....	183
第二节 尊重学人更尊重学术.....	191
第三节 毛泽东的学术知音范文澜.....	201
第四节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学术往来.....	209
第七章 炉火纯青的楹联艺术.....	221
第八章 原创性诗人与诗论家.....	234
第一节 伟大的诗论家.....	234
第二节 诗言志.....	242
第三节 诗要用形象思维.....	246
第四节 诗的意境之论.....	251
第五节 天章云锦织豪情.....	253
第六节 气雄万古的诗词.....	259
第七节 以诗词论历史.....	263
第九章 臻于化境的语言艺术大师.....	270
第十章 经天纬地的哲学伟人.....	298
第一节 开拓哲学新天地.....	298
第二节 评价与扬弃中国传统哲学.....	306
第三节 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	310
第四节 从治学态度到思想路线.....	314
第五节 超凡脱俗的思想大师.....	318
第六节 客观深入地解析孔夫子.....	325
第十一章 书起千年之落.....	330
第一节 孕育书法大家的时代.....	330
第二节 渊博的学识与书法艺术.....	332
第三节 当代书法之新体——毛体.....	337
第四节 力的风骨美.....	344
第五节 空前绝后的题词泰斗.....	348

第六节 行草书圣毛泽东	354
第十二章 国学伟人之修性	359
第一节 典型的浪漫文人气质	359
第二节 伟人的率性是一种伟大	362
第三节 一个在路上的理想主义者	366
第四节 意境高玄的人格魅力	371

第一章 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

第一节 六年孔夫子

进入 21 世纪，国学变得日渐时髦起来。从民间稚子的私塾教授，到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办的人满为患的国学研修班，一种表象的兴盛将国学这一曾被踏上一万只脚，并让它永世不得翻身的“四旧”从惨境中拯救出来。蓬头稚子们穿起汉服，捧起《三字经》，之乎者也的模样颇有点旧梦重温的感觉。一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延续千年的景象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前尘往事，唏嘘嗟叹，这就是历史——一个人类书写的，也由人类创造的历史。

上世纪的“文革”时期，国学曾被当做“封资修”残酷地对待，然而，毛泽东本人却恰恰是从小就受到国学的熏陶，在国学的灌输和陶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必然又偶然，偶然又必然的发展脉络恰恰说明了国学的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伟大。面对这种力量，一种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千锤百炼般磨砺、淘换出来的力量，最终的现实也只能是，或者说必然是——我们给予其应有的敬仰和尊崇，毕竟，那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受之无穷的遗产。

说到毛泽东的国学修养，我们不妨先从他幼年开始接受的国学教育说起。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循着这位先贤伟人的足迹对其有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同时，也便于对其具有的深厚博大的国学修养有个心服口服的认可。

毛泽东是个伟人，这不仅表现在他有超乎常人的头脑、气质和修为，更与他童年时期曾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分不开，恰是因为有了这一丰厚的国学基础，才奠定了毛泽东在此一领域的领袖地位。

中国是个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国家，中华民族能维系几千年，而延绵不息，无疑是其传统文化教育产生的巨大力量。《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见古人的明智。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而要实现这一宗旨，必须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相对完美的修为。从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弟子规》便不难看出，通篇所言，皆为为人处世的要义。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他的八舅文玉钦读过几年儒家经典，颇有文才，在家里开设蒙馆，教文家子侄们读书。当时，毛泽东只有几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后，他就只能独自玩耍。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小表兄们带着他到学堂里去玩。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这样有天赋，文玉钦很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数十年后，当年常带着毛泽东上学的表兄文南松对从师其家父门下的这段童蒙生活仍记忆犹新。老先生曾对后辈回忆说，那时父亲对毛泽东的期望值很高，望子成龙之心也太切，有时甚至忘了表弟还是个小孩，常常教一些超出幼儿年龄范围的东西。如教毛泽东和他读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千字文》和《六言杂字》，还讲授过被鲁迅先生曾经称之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等。

文玉钦正如文南松所回忆的那样，文玉钦是一位正统思想观念颇为浓厚的旧文化人，他打破常规培养教育外甥的最初愿望，自然是要把毛泽东引向“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之路。但是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那便是通过这种教育途径，使毛泽东获得了对于一般的农家稚童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知识启蒙，最大限度地开掘了智力。

后来，在8岁的时候，毛泽东回到韶山，入读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塾师是一位叫邹春培的先生。邹先生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同辈，所以毛泽东称他“春培阿公”。毛泽东聪明好学，邹先生自然喜爱，并很快就发现这个学生的确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不好管教。当他第一次背书时，就依旧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一丝不动。邹先生责问道，为什么不跟大家一样站着背书？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闲聊时，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他，毛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吧。邹先生却摇头感叹地说：你的孩子很聪明，他只要读几遍就能记住。一年夏天，邹先生要外出，给学生们布置了背书的作业。待他回来后，却见私塾内空无一人。过了很久，学生们才一个个水淋淋地回来了。邹先生知道这一定是毛泽

东带头游泳去了。不过，这次邹先生没有体罚他，而是想了一个“对对子”的办法来处罚他，这无疑比简单的体罚或背书要难得多。

邹先生出了个“濯足”，而毛泽东则不假思索，就顺口应对“修身”。邹先生见没有难住毛泽东，就出了个比较古怪的词汇：“牛皮菜”，并对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回答我。”谁知毛泽东略微思考了一会儿，便脱口而出了“马齿苋”一词。邹先生听罢，不住赞叹：“马齿苋对牛皮菜，马和牛相对，对得好！好！”如此，邹春培不得不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才思敏捷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当毛泽东得知邹春培已经谢世，他十分怀念，曾三次给邹春培的儿子邹普勋写信致以问候。1951年9月，他还邀请邹普勋进京，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的情景时，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邹春培感到自己已教不了毛泽东了，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这样，在南岸私塾就学两年后，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来到离家两里外的关公桥私塾。关公桥私塾的塾师毛咏生是一个更显苍老，更古板的老学究，且是很多学生眼里有名的“恶先生”，他常因毛泽东的别具一格以及他刨根问底的学习方式而懊恼。在那里大约半年后，他就辞退了让他颇感无奈的毛泽东。

翌年春，毛泽东又就读于桥头湾私塾，师从周少希，也就在此时，毛泽东开始临帖，练习书法，初习欧（阳询）字，后习钱（南园）体，并开始大量阅读《精忠传》《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1906年秋天，毛泽东又转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是毛泽东的族兄毛宇居。因离家较远，所以寄宿就读。

从桥头湾到井湾里这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不仅阅读了《尚书》《周易》《礼记》，还阅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其中的《左传》为他后来的军事思想提供了大量的战例和依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读过经书，

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一年多读私塾的事。

毛泽东的聪明才智自幼便超凡脱俗，在井湾里，还发生过一次和南岸私塾近似的事情。有一天先生毛宇居有事外出，毛泽东背着书包爬到后山上去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回来的毛宇居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却说：“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

“放肆！”面对着面前这个小大人一样的孩子，面对着他敢于顶撞先生的一种无所畏惧的胆识和那副常有理的模样，身为先生的毛宇居竟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了。惹了事的毛泽东一看先生充满愠怒的面孔，立刻变得乖巧起来，他忙说：“那你叫我背书好了。”面对这样一个古怪精灵的聪明孩子，毛宇居又气又爱。他知道背书是难不倒毛泽东的，便心生一计，指着院子中的天井，说：“我要你赞井。”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赞出了这样一首诗：“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围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同学们听了都拍手叫好。据当时的同学刘授洪、郭梓材回忆，毛泽东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做，他做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做”。

1907年夏，毛泽东离开了井湾里私塾，停学在家务农，但是在以后，他与毛宇居的关系一直没断。1919年10月，毛泽东母亲病逝，毛宇居协助料理后事，毛泽东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母文》长诗和两副灵联。其祭文一直被毛宇居收藏着，保存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毛宇居将他交给了政府。该文后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上。这是现知毛泽东所写古典诗词中最长的一首诗。

1921年和1925年，毛泽东两次回乡，均去拜访毛宇居，并将家里的私事托付给他。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各地考察农民运动时再次回到家乡，毛宇居率全家父老在毛震公祠召开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1907至1909年夏的两年时间里，尽管辍学回家务农的毛泽东白天做农活，帮父亲记账、算账，但晚上，他仍坚持看书并常读书至深夜。那些“四书五经”类的东西早已读熟，《三国》《水浒》《说唐》之类的书也都快翻破了。韶山冲的读书人并不多，其家中的藏书也并不丰富，这些人家的藏书差不多都让毛泽东借来读光了。他什么书都看，连《毛氏族谱》、和尚的经书都借来看。村子里的书不够他读的，他就跑到相邻的村子，相邻的村子的书读过了，他就跑到外婆家去借。他每次去向舅舅、表兄们借书，来回要走约40里崎岖山路，中间还要翻过一座很高的山。可就是这样，他仍然不辞辛苦，乐此不疲。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毛泽东借书有个好习惯，就是有借有还，且非常守时。这也让他自小养成了爱护图书，信守承诺的好习惯。他第一次去向表兄借书时，表兄文咏昌说：“俗话说，老虎借猪，秀才借书。我们表兄弟也要来个君子协定，每次借书有借条，还书有便笺。”毛泽东笑着答应了，并一直恪守诺言，按君子协定执行。

10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曾向表兄还书的一张便条：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毛泽东后来在长沙读书期间，由于有违父亲的意愿被父亲断绝了资助，他因此陷入“经济危机”。他无钱买书，便只得借书。1916年1月28日，他写信给萧子升，谈的就是借书的事：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

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

第二天，他又写信说：

《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

随后，毛泽东还与萧子升谈了一通借书、读书之道。萧子升准备送一些书给他，他不愿意接受。他在2月29日的信中说：

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本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

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室，进入北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然是他获得读物的重要途径。如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北京图书馆旧址靠近中南海，毛泽东常请身边的人到那里去借书，这引起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注意。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第一号就办给了毛泽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建国至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处借阅各类图书2000多种计5000余册。

少年毛泽东所借阅的书中，有两本书对他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一本是《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他看了这本小册子，对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忧虑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第一次有了政治意识，开始想到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二十多年后，他同斯诺谈话，还提到自己读这本小册子的感受，甚至还记得它开头的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还有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形成完整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最具震撼力和影响力的一本巨著，也是郑观应维新思想的集中体现。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其中包含丰富的宪法思想、国际法思想和刑事法思想。该书“专纪时务”，纵论中外形势，比较中西得失，从而得出结论：要取法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多方面进行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蔡元培评价该书说：“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蔡元培年谱》）《盛世危言》刊行后，有人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命总署印 2000 部分发各省有司。据说此书共刻印了 10 多万册，这一“畅销”的数字，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好读书、勤读书使少年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心灵越来越飞向一片广袤的新天地。他的父亲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实在不明白那些“邪书”上都说了些什么，让儿子这么痴迷。正是由于《盛世危言》这本书的阅读以及它带来的影响，毛泽东产生了恢复学业、继续读书的强烈愿望。但是，一门心思惦记子承父业，在家务农，过小业主一般日子的父亲毛顺生却对此表示反对，以致毛泽东常为此和父亲怄气。就在这个时候，毛家面对的一件诉讼公案，给毛泽东带来了意外的机会。

1909 年的秋天，为了一小块柴山，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和别人打起了官司，官司打到了湘潭县衙。对方本没有多少胜算，但他有一个女婿在省里抚台衙门当差，官虽不大，却精通律法。在县知事的大堂上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以致被告变成原告，没理变成有理。毛泽东的父亲花了几十块大银，却把官司打输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毛顺生十分窝火，他下决心让儿子恢复学业，要他跟着刚从城里回来不久的一位“法科生”，去学习朝廷的“王法”。

毛泽东觉得很幸运，没想到自己争来争去的读书机会，此刻竟轻易地来到了。高兴之余，他立即打点起书箱来到了乌龟井私塾。对于

毛泽东“重进学堂”的这段史实，在《毛泽东年谱》中作过如是记载：“（1909年）秋，复学，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就读，塾师毛岱钟（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毛岱钟是一个对毛泽东影响非常大的人，当时正值青年，且接受的是新式学堂教育，思想比较激进，对封建末代王朝法度紊乱、官场腐败的社会丑恶现象颇为不满。因之很不得志，甚至连“饭碗”也谋不到，不得不回到家乡。自从儿子从长沙回乡之后，毛简臣见他整天无所事事、愁眉不展，便要毛岱钟暂时到私塾和他一同教书，一来可借此混混日子，二来也不致荒废学业。

毛岱钟毕竟是一位具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他思想活跃，一改旧时私塾死读古书的传统格局，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在私塾讲解大清帝国的法律条例，传授衙门诉讼的诀窍。他的这一举动，在闭塞落后，不知“王法”为何物的韶山冲自然是一件稀奇的事，乡民们虽说对此褒贬不一，但还是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学习，指望将来能借此精通律例，踏上仕途，兴盛家邦；万一不成，至少可以学成“刀笔”，靠为人打官司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毛泽东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在乌龟井，成为毛岱钟门下弟子的毛泽东怀着好奇的心情，生平第一次听老师讲授起了神圣的“王法”，开始接受了平生第一次的关于“法”的启蒙教育。那一堂课在毛泽东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无疑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第一次正规地接受法律教育，也是他一生中头一次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授法律课。拿今天的尺度衡量，毛岱钟所授的知识无疑是浅显而有历史局限性的。或许在当初，谁也不会料想到，这段学习经历在日后毛泽东的一生中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毛岱钟先生——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失业的法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冲破历史樊篱，敢为私塾教育之天下先，打破私立学校教材教法的固有传统，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法制启蒙教育，才使之粗知了一些法律常识，在他稚嫩

的心田里萌发了依法治国的幼芽，开始懂得了依靠法律武器建设国家、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而在于自此以后“法制”二字在他的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在后来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法律思想”。以其为指导思想，他亲手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和建国初期起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等一系列法律，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关于1909年秋至第二年夏复学后这一年的读书情况，毛泽东曾回忆说：“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过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在东茅塘私塾，毛泽东主要攻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这期间他还在毛麓钟的辅导下阅读了《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经史古籍。毫无疑问，这些书不仅使毛泽东懂得了许多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著者的学问、德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都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愈到晚年，其阅读史书的兴趣愈加浓厚。

私塾读书的最大特点是“背”。凡教师点教的书，都得背，从背几句、背章节、背部分到背整本，从头至尾，背诵如流，方如此，才换读新的书。这种“硬背”，对于年幼的蒙童，确系一大苦差；但背得多了，记得牢了，能使人受益终生。毛泽东讲话、写文章，常说古论今，历史典故、诗文辞赋或脱口而出，或信手拈来。生动风趣，妙语联珠。如果不是书读得多，记住的也多，胸藏万卷，学富五车，是无法如此

运用自如的。那些读书甚少，腹内贮墨甚微，写文章而欲“临时抱佛脚”地寻几句之乎者也的古诗文或三五历史掌故以便“风雅”一下的人，是万万做不到的。也许因此之故，毛泽东垂暮之年曾对一位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说，文科教师应会背诵，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吧。

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

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他对枯燥难懂的经书、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实在不感兴趣。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传统国学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尤其是那些经纶满腹，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塾师们，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

六年私塾后的毛泽东，古诗文的基本功已非常扎实，诗文写作也相当有水平了。这期间，他在最后一位塾师毛麓钟的指导下写过诗，也填过词。现在还能看到他当时创作的两首诗，其一为《咏指甲花》：

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
万草披日出，惟婢傲火天。
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
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指甲花”就是凤仙花，因将其花捣碎，加明矾少许可用以染指甲，当地人就叫它“指甲花”。毛泽东慧眼独具，于极为普通平凡的凤仙花中看出其有异于菊与莲的象征性品格，睹物赋诗，借花言志，表现出一种傲视严酷环境的人格意志。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一首五言古风，诗才远非一般。

还有一首诗，题名《耕田乐》：

耕田乐，天天有事做。
近冲一墩田，近水再墩望。
多年副产积满仓。
农事毕，读书甚馨香。
坐待时机自主张。

这首诗写于他在家务农之时，具歌谣风格，表现了毛泽东此时的生活状况与心理，朴实纯真，于不经意中透出功力。总之，六年私塾，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为毛泽东的国学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自是伟大之器

从私塾中走出来的毛泽东并未直接上中学。他本人及其他相关人士都没有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予以说明，这可能因为先读小学，然后上中学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毛泽东的文学水平即使与当时的中学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时的新式学堂还开设了算学（即数学）、格物（即物理）等，而这些毛泽东都没有接触过，因此有补足之必要。这样，毛泽东从私塾中出来就上了东山高等小学堂。

东山书院始建于 1895 年。校训曰：“公诚勤俭”，制以黑底金字匾悬于正厅。两旁在柱上有楹联一副：“公毕方将私治，师严然后道尊”。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是按照现代学校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的。当时课程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体育、图画、音乐等。教学方法强调主导和主体、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做到了循循善诱，生动活泼。

东山高等小学堂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有一批像李元甫、龚翼鹏、肖岳英、沈春龙这样思想进步、慧眼独具的教师。李元甫热心教育事业，积极倡导新学，而且慧眼识珠。龚翼鹏治校严谨，教学勤奋，在他担任堂长时期，学生成绩优良，受到了湖南省提学使司的嘉奖。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东山高等小学堂以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教学内容新颖逐渐闻名遐迩，继而吸引了一大批追求真理

的热血青年。毛泽东因是湘潭人，本不属学校招生范围，但他久闻其名，极想来校求学。报考时，考试就是写篇文章，题目叫《言志》，由国文教师谭咏春监考，要求在一个上午当场完卷。毛泽东挥毫濡墨，一气呵成，不到一顿饭工夫就交了卷。谭咏春接过卷子，只见一笔欧体小楷工整娟秀，甚见功底；披阅文章，不禁叫好起来。文章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笔势豪纵，情洽理达，其忧患之思，报国之志，甚为感人。他急忙去找校长，请他看文章。李元甫一看，立即大加赞赏，说：“东山学堂取了一位建国材！”随后，毛泽东被破格录取。后来李元甫又支持毛泽东去长沙报考中学堂。

毛泽东进东山学堂不久，便以写得一手好文章而闻名全校。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被抄贴在学堂的“揭示栏”里，让全校同学欣赏借鉴，有些学生还将文章抄下，背诵。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青年人当努力奋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国文课教师谭咏春在文稿上激情地批曰：“似视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他说这所学校里的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

在东山小学就读时，毛泽东曾改写过一首《咏蛙》诗，足见其少年大志，诗曰：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七言绝句蕴涵着丰富的哲思，可以说它是少年毛泽东伟人情怀的绝妙写照。一个旷世伟人的远大抱负看似不经意地表现于小小的青蛙身上，为我们留下了理趣兼备、生动传神、遐想丰富的空间。诗人用轻松而充满情趣的笔墨，通过一只小小的青蛙，却表现了感人心魄的英雄情怀和壮怀激烈的宏大抱负，小中见大，举重若轻。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贴切，丝毫看不出“故作惊人之笔”的做作。把青

蛙赋予“虎”的气质，这种联想确是神来之笔。把其他“虫儿”作为陪衬的对象，合乎青蛙的活动规律，但却让青蛙的“万虫之王”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陡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叹。诗言志，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感叹，这样的想象和胸襟实在非伟人不足以彰显。

不过，毛泽东在东山只读了一学期，但就是这一学期，他的人生观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脑海中蕴含的那种救亡图存的思想意识更强烈、更自觉、更为深刻得多了。尽管他的文章受到师生们的赞扬、推许，他也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才华，但他似乎从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一个文学家，一个诗人，而总是感到冥冥中有另一种力量在召唤自己，让自己的志向变得更加高远，宏大。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种改天换地的新面貌。毛泽东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一方面他为表示自己的政见参加了革命军，另一方面，他又决心利用省会这个学术文化中心，修学储能。但在当兵不到半年后，囿于形势的变幻，他便退出了军队。随后，他一连报考了几个学校，都不太满意。最后于1912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著名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毛泽东进入全省高等中学校，被编入普通一班。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虽然十分欢迎这位成绩第一的佼佼者，但同时也不敢相信这位穿着土气，来自湘潭农村的年轻人居然能在投考中写出高中魁元的文章。符校长决定再行面试。于是他毛泽东叫到校长室，问他家住哪里，在哪些学校、哪些先生手下读过书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并时有惊人之语。符定一高兴之余又取出纸笔叫毛泽东作文。毛泽东神情从容，挥笔自如，很快交了卷。符定一看过心中大喜，认定毛泽东将来必成大器，决定好好栽培。

虽然毛泽东在全省高等中学校也只读了半年，却留下了一篇为人称道的好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在此，我们不妨拜读一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言，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尽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尽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拏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噉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这的确是一篇弥足珍贵的好文章！

之所以说它珍贵，不仅在于它让人们从中窥见尚不满 19 岁的毛泽东当年思想认识所达到的水平和古汉语驾驭的能力，还在于它是毛泽东此前的所有作文中唯一存世的一篇。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资治通鉴》和《纲鉴易知录》中均有叙述。大意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革新，为了取信于民，在秦都城南门竖一木桩，并昭示若有人能将木桩移到城北门，赏赐黄金十两。但是谁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随之又宣布：谁将木桩移至北门，赏黄金五十两。果然有人试着将木桩移走，也果然立即给予赏金，以示秦王重信誉，朝廷推行新法，将如徙木赏金一样说到做到。《商鞅徙木立信论》，便是就此史实进行评议的一篇文章。

当时全省高等中学校的国文教师深为这篇文章所倾倒，对全文密加圈点以示激赏，并在题上用浓墨重笔写下“传观”二字。全文不过 600 字，这位先生却写了 6 则眉批、1 则尾批，计 150 字。这些批语是——

眉批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赅入古”，“精理名言，古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侯，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议论潇洒，积理宏富”。

尾批曰：“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这位被毛泽东的文采和气势惊诧了的国文教师并非等闲之辈，此君姓柳名潜，湖南湘阴县人氏，为清光绪年间秀才。他于古文慧眼独具，平日不轻易称许学生习作，而对毛泽东这篇文章，其倾心赞美之情溢于笔端。柳潜对毛泽东的批语，既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章的精彩之处，又由文及人，点评了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和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柳潜对毛泽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的诚挚鼓励和殷切希望后来在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中一一得到了应验，这充分证明了柳潜是一位杰出的、成功的教育家，他敏锐地发现了学生毛泽东的个性和特长，并加以正确鼓励和引导，从而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柳潜不愧是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的第一人。

虽然学校将毛泽东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毛泽东却并不满意这所学校刻板的校规，而其有限的课程也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柳先生爱才心切，有意栽培，便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该书起伏羲，下至明亡，写到清以前，与被誉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和“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资治通鉴》相比，从时限上自有其一日之长。可以说，近五千年来，在神州大地上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书中均有详细记载。毛泽东读后收获极大，便感到在校读书还不如自学。半年之后，他毅然从湖南全省高级中学退学，每日步行数里，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省立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并订有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它的楼上是藏书库，楼下是阅览室。这里有花园，院子里还有养鱼池。当时由于图书馆开办不久，而且距市中心较远，因而每天来这里阅览的人并不多，所以环境也比较清静。毛泽东初到图书馆时，看到书籍报刊琳琅满目，其中有许多书报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不免又惊又喜。于是他每天早去晚归，虽路途往返六七里，仍风雨无阻。图书馆的管理员师傅深为这位衣着朴素，学习异常刻苦的青年人所感动，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位管理员后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自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来得最早，已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时，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赶他，他就不走。他一看书就着迷，不提醒他，是记不起回家的。

毛泽东在许多年以后还对他的老同学周世钊说：那时候，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子，初尝菜味，就拼命大口大口地吃一样。

在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什么书都想找来读，像中国的古籍经、史、子、集，外国的俄、美、英、法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并穿插读了一些诗歌、小说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著名典籍等等。不过在这里，他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阅读了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著作。其中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等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启蒙思想家的代表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的眼界就大为开阔了，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思想极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新境界——“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后来，他对周世钊如是说。

在这半年读书生活中，还要特别提到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图。当时，在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堪輿大地图》，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每天走到那里，总是认真地看了又看，严肃地想了又想。因此，直到40年以后，即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几个正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毛泽东时，他还能十分清楚地回忆起当年看世界地图的动人情形。他曾回忆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还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了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从这段自述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这个时候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的思想状况如何？以及思想水平究竟达到了一种什么境界？这实在是一种宽广的胸怀，伟岸的

身姿，也只有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伟岸的身姿中，才能孕育出伟大的理想，坚定的决心，恢弘的气度，尤其是这一切仅仅面对的是一个不足 20 岁的年轻人时。

第三节 学问筑基在一师

在省立图书馆的那段自学时期，对毛泽东的一生而言的确是一段“极有价值”的日子。不过，后来他实在有些难以为继，原因不仅因为父亲不支持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读书生活而拒付生活费，而且湘乡会馆也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所占，让他失去了一个潜心修读的好场所。因此，又是半年之后，也就是在 1913 年春天的时候，毛泽东又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翌年，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自此，到 1918 年暑期，毛泽东在一师度过了他青年读书生涯中最有意义的学生生活。也就是在一师，毛泽东从一个本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郎逐渐变化为一个具有革命品质的革命者，并沿着这种革命者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着，最终成为一个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惊天动地的革命领袖，成为一个“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风流人物，一个光耀青史的世界伟人。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位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去的湘江，隔江相望，则是风景优美的岳麓山。值得提及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址是设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的“城南书院”旧址上的。“城南书院”原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地方，它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江相望。朱、张讲学最盛的时候，来听讲学的多达几千人，所以这里曾经是南宋理学的重要高等学府之一。

辛亥革命后，尤其在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曾颁布了一系列具有革新意义的教育法令和规章制度，湖南第一师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一师的第一任校长孔昭绶是留日的学生，思想也比较进步，也确实贯彻和执行了较为进步的教育方针。为了贯彻民主主义的进步教育方针，孔昭绶还先后聘请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一大

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和品德高尚的好教员。在毛泽东入学前后，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了第一师范，像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瓚、何叔衡、周世钊、萧子璋、萧子升等等。此外，第一师范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整齐宽大的校舍。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应该说确实是一所比较好的学校。这样，就为毛泽东在这里进一步求学、深造和成长，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

毛泽东进一师，直到 1918 年暑假毕业，在一师生活了足足五年半。对在一师这五年半的学习生活，毛泽东有过几次归纳性的评说。一次是 1936 年对斯诺讲：“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另一次是 1949 年 10 月，他对周世钊等一师的老同学们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毛泽东的这个归纳是极有分寸也是甚为谦虚的。事实上，他在一师所获得的进步与提高，远比归纳的要丰富、全面、深刻得多，所打下的也是日后成为历史伟人的基础。

毛泽东在一师的几年，正值 20 至 25 岁这一人生接近于成熟的年龄段。他当时曾说：“学问之成否以二十五岁为断。”又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在一师，一方面是在籍学生，对学校开设的社会科学的诸课程，听课、作业都非常认真；一方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坚持独立自学。“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 20 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著名学者李锐引了《马克思传》中的这些话之后，又道：“青年时期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包括时代、社会、学校家庭和师友，这两个人（马克思和毛泽东）是很难类比的（当然，马克思的条件要优越得多），但作为划时代的伟大先驱者，他们在当学生时就已具备着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的学习精神，则是非常相似的。”

后来，在毛泽东等人的带动及各种社会与学校因素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第一师范曾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进步人士。像新民学会的会员，大部分都是一师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师的进步师生被捕杀的约在百人左右。1938年长沙大火时，一师的校舍全部被焚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这所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学校，上世纪50年代，在原来的校址按原来的规模、样式予以重建。

毛泽东对一师是很有感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地为一师题写校名，并题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等闻名遐迩的题词。

自1913年春至1918年夏的这五年半的时间内，毛泽东在一师求学。自1920年秋至1921年冬的又一年半的时间，他开始在一师的附属小学担任主事，也就是校长。并兼任师范部22班的国文教员，作为掩护他革命活动事业的社会职业。这就是说，毛泽东曾和一师有过7年多的密切关系，也恰恰是这7年打下了他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最终不仅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成为一位大气磅礴的国学大师。

第四节 探求为学之道

所有的国学大师都是为学治学的领袖人物，在这点上，毛泽东也不例外。在湖南一师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其国学修养和治学成就上，这个人就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和文字学家黎锦熙。

黎锦熙字劭西，是毛泽东的同乡。毛泽东只比黎先生小3岁，又是同乡，所以他们当时关系十分亲密，虽属师生，实为挚友。毛泽东很尊敬这位年轻有为的老师，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他求教的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从读书方法、研究学术到谈立身处世之道，议论时事政治，以及纵论改造国家社会和治理天下大计，几乎无所不包。而黎先生也是竭尽所能，倾囊相授。比如谈到如何治学的问题，

说到所谓的“学乌乎求”？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在学校目前污浊腐败的情况下，怎么求学问呢？似乎只有隐身深山幽泉，潜读古籍，以建基础；仿效康有为、梁启超，然后下山涉新。但是“劭西不谓然”，并认为这是先后倒置。他认为：“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即是说，学问的基础不是先古后新，而是相反：先通后专，先新后旧。因此政治家、事功家的学问，更加重要。那次晤谈中，毛泽东还问到做学问的下手功夫。于是黎锦熙又说到国文、历史、地理、报章杂志、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等，这些都是系统的通识，都是君子的为学善生之道。黎锦熙特别告诫青年毛泽东“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要；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黎锦熙还具体向毛泽东推荐斯宾塞《群学肄言·缮性篇》。这本书毛泽东在省图书馆自修时曾读过，但在黎锦熙推荐之后，他再次读过，不禁大为赞赏，“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毛泽东这次重读《群学肄言》的最大收获就是把扩大知识面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直到数年以后的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时仍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

黎锦熙、毛泽东当年关于“通识”“弘通广大”一类话题，实际上就是大学的通才教育。用今日大学教育改革的话说，就是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素质教育。在这点上，毛泽东等先辈比我们要明白得早，也明白得多。

全国解放后，黎锦熙常向亲友说：毛主席当年在一师求学时就表现出不平凡的胸襟，经常谈论的内容：一是历史人物，如唐宗宋祖，乃至拿破仑、伊藤博文等；二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谈吐之间常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事实上，毛泽东的那种气概在一些小事上也可窥一斑：知道毛泽东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黎锦熙在生活上也

时时处处关心毛泽东。他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曾创办《湖南公报》《公言》等刊物，宣传民治思想。黎锦熙便常请毛泽东等学生帮助抄写稿件，给付一定的酬劳。几十年后，黎锦熙曾欣慰地说过：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助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代为润色；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叫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黎锦熙说的这位伟大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任职，使这对挚友被迫分离。当年11月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信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则“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给予毛泽东极高评价。

在与黎锦熙相交中，毛泽东得益最多、探讨最频的当数学习与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指：首先，必须重视知识的积累。他明白，如果不持之以恒，长年累月地积累知识，就不可能有雄厚的学问基础。基础不厚，就不能成就宏大的事业。对于知识的积累，他比喻说：河水所以能奔流，原因在于水流充盈；做学问如果没有厚实的基础，就不可能精深而通达。把学问建立在浅薄的基础上，就犹如浅水只能载小舟一样，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此外，对于知识要善于归纳。如地理知识包罗万象，教育、风俗、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尽在其中。如果泛泛地研究地理，不知将其知识分门别类有所归纳，这样无系统的学习，头脑中的地理知识就会一塌糊涂，没有用处。积累知识不仅要多，而且要融汇贯通。他写道：“诚能殚精研思，穷高极远，贯天人以为学，罗古今以为资，譬如采木邓林，伐石南山……”此外，积累知识还必须终生不辍，持之以恒，要有“日日行、不怕千万里”的决心，又要有不怕吃苦的意志力。“咬得苦菜根，百事皆可为”，这是青年毛泽东做人做学问的座右铭。

在毛泽东仔细研读了黎锦熙向他推荐的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后，对于自己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学习的偏颇深感懊悔。斯宾塞尔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这时，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他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认识转变时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昔吾好独矗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过去很多人，包括一些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这一思想转变，因而认为毛泽东早年就不注重自然科学的学习，这是没有全面考查其认识发展过程而得出的片面结论。实际上毛泽东在黎锦熙等人的帮助下，又通过阅读《群学肄言》等书已经认识到只有掌握数理化生物等科学才能克服为学简陋，方法直观，基础不厚的毛病。1919年11月罗学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于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毛泽东认为这正切中了自己治学的缺点，因此他把罗来信中的“柏格森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的科学的根底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力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三句话抽出来作为信的提要，要求新民学会会员在治学时共同注意。在给罗学瓚的回信中，他表示一定要加强自然科学相关各门科学的研究。青年毛泽东在治学中给自己提出不断拓宽知识面的要求，同时早在哲学、历史、文学等专门领域中深入进去，这就为他深刻理解和革新中国文化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以国学常识为最急

在一师，毛泽东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宋元明清思想家的主要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诗文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许多重要省志、县志，他都认真地阅读和研究。在这个时期，除了必要的上课之外，毛泽东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都用来研读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典籍上。1915年6月，毛泽东在致湘生的信中十分赞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治学方法。他说：“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字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里说得很清楚，毛泽东是把攻读中国的传统古籍同将来能否成为“救国奇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是否懂得或精通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将来能否成为“救国奇杰”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和精通“国学”，并一度曾打算离开学校，寻找一个“深山幽泉”之地，来专门攻读古籍，“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后来，毛泽东虽然在黎锦熙先生的劝告下，放弃了这个想法，留在学校继续读书，但他仍然认为“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翌年2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这样写道：“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从这张书单中，我们可看到毛泽东当年攻读古籍的宏伟规划，同时也直接感受到了毛泽东要精通“国学”的坚定决心。

在一师，毛泽东的国文造诣有了一种跨越式的提高，而在这方面对毛泽东帮助最大的当数其国文教师袁仲谦了。1936年夏，当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

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袁大胡子”，就是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的袁仲谦先生。因为他满脸长着又粗又密又乱的胡子，所以学生们称他为“袁大胡子”。

“袁大胡子”字吉六，湖南新化人。他父亲是秀才，自幼随父攻读经书，才华出众。他是清光绪二十三年的举人。精通古典文学和古文字学，又擅长诗词，精通书法。他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强调要有“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雄伟气概，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他常对学生说，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从1914年起，袁先生担任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课，直至该班毕业。这就是说，袁先生一直教了毛泽东五年半国文，由此可以想到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袁先生对毛泽东十分喜爱和器重，除在课堂上精心讲解、耐心指导，还常把毛泽东叫到自己的书房进行单独谈话。由于受梁启超的影响，毛泽东喜欢写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先生说梁启超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认为写文章学梁启超是走错了门径，并嘲笑说这不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要求毛泽东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他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无论议论、辩驳或抒情，都极为绝妙。袁先生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来学习韩愈，文章和学问必将大有长进。为此，毛泽东遵照袁先生的指点，特意跑到旧书店买了一部宝庆版的《韩昌黎诗文全集》。一篇一篇地认真阅读和钻研。从词汇、句子、章节到文章的内容、意义和技巧，他都精心钻研和仔细体会，直到融会贯通为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反复默诵或朗读。通过这样艰苦的学习和长期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毛泽东都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背得十分流利。袁先生看到毛泽东攻读韩文很有成绩，写文章也大有进步，夸奖毛泽东的文章“大有孔融的笔意”，并常常批给同学们“传观”。

由于袁先生的辛勤教诲，毛泽东的国文和书法都有很大进步，尤其由于学习韩愈文章的影响，他的文章写得更加气势磅礴和议论纵横。至今，我们从《毛泽东选集》里，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到结构布局，随处都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子。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就出自韩愈的《送穷文》。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说韩愈的《伯夷颂》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建及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又提到《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一定要用几十年时间把贫穷送走。在这些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韩愈对毛泽东的深远影响。至于韩愈对毛泽东整个文章风格的影响，那就更大了。后来，毛泽东在诗词和书法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显然也和袁先生的正确指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对袁先生也非常敬重。1950年，当袁的老同事王季范写信告知毛泽东，袁的遗孀生活困难时，毛主席即去信湖南省主席王首道：“请省府酌予接济”。使袁夫人得以安度晚年。1953年毛泽东亲笔为袁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为袁重修了坟墓。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时，席间还不禁追忆起这位大胡子老师。章、郭说“此老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1980年，袁吉六的儿子袁愈栖组成五字对联“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刻于墓旁石柱上，以志纪念。

在读书包括读古文方面，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的徐特立先生。

徐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针对一般人读书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甚至囫圇吞枣的毛病，提出：“我认为读书只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

本，不但能记得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毛泽东非常欣赏徐先生的这种治学主张和读书方法，很注意把读书、思考和批注结合起来。徐先生向来注重实践，主张读书要“学以致用”，所以他常说：“实际第一，书本第二。”就是说，他主张书本要与实际相结合，读书要与实践相结合。徐先生的这种治学主张，对毛泽东及其同学们的影响也很大。

毛泽东博览百家的传统文化修养，奠定了他极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这一点，世所公认。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源泉中，国学是一大，并且是极为重要的来源。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李锐说过这样一段中肯的话：“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这无疑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传统国学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这种思想土壤，对于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都发生过或者指导性的，或者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向全党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而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及国学大师无疑是学习和实践这一文化的极好榜样。恰是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华夏民族的莘莘学子只有具备和掌握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才能登高望远，光耀世界，而这也是毛泽东所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以及国学大师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六节 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

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之前，毛泽东首先是一介书生，正是因为他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深厚的文字功力，让他投入到缔造新中国，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革命活动之初，首先是从文字工作开始的，这种文字工作一方面展示了他积蓄已久的国学功底，另一方面也为他理想和信念的实现提供了“号角”和“匕首”的实践机会。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以新民学会为阵地，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湘江评论》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创刊宣言。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湘江评论》仿效北京《每周评论》形式，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一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很短的杂文）、“新文艺”等栏目。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道取的方法，多数畏缩的说话，于今一切都要改观”。他指出《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在《宣言》结尾充满激情地放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评论》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显然，这表明毛泽东把宣传最新思潮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湘江评论》一诞生，就充溢着敢于向一切反动落后势力挑战的无畏气魄，文笔明快、泼辣、生动，带一股破竹之势。它抨击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政策，揭露它们虽然高唱“平等主义”“民族自决”，实际上干的却都是侵略与分赃活动；它批判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指出“中国的四万万，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

认有真理”，这正是中国黑暗腐朽的根源所在，是必须用新时代的大潮彻底冲荡净尽的。它疾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张扬个性，扫除一切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认为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撰文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视其为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认为只要实现了农民、工人、学生、教员、妇女……各界的大联合、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就都能得到实现，“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每周1张4开，出版后极受欢迎，并很快引起全国其他报刊的注意。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之一《每周评论》赞扬它眼光远大，议论痛快，是“观念的重要文字”；《晨报》称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介绍它“著述选材，皆及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长沙《大公报》也评它“提倡新文化最力”。毛泽东在该报发表了41篇文章。重要文章有《〈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不久，军阀张敬尧便派军警查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被邀接着主编了湖南湘雅医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主编《新湖南》后，毛泽东通过刷新办刊宗旨和亲自撰文，大大加强了《新湖南》的革命性，这一点从《新湖南》第一期与第七期的办刊宗旨就可看出。

第一期发刊词提出的办刊宗旨是：一、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使国人知所取从”；二、改造家族制；三、“提倡男女平权生活独立”；四、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分利坐食；五、“提倡平民教育”六、灌输卫生知识。创刊号宣传了编者们的改革社会的主张，即“新湖南以新中国”的理想。第七期登出的刷新宣言为：“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

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见《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毛泽东在《新湖南》上每期都刊有自己执笔的政论文，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使读者们受到极大的政治启发和思想教育。如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不仅使读者感到内容与形式较以前迥然不同，而且实实在在地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在介绍当时湖南进步刊物时，特别指出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毛泽东主编《新湖南》，提高了刊物的声望，对他本人而言，编辑医科学校的刊物则是个理想的“掩护”场所，既可避免当局的怀疑，又为他提供了一块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主张的阵地。

《新湖南》在出至第11期时遭到了同《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被张敬尧军阀政府查封。尽管《新湖南》在毛泽东主编后只发行了短短几期，但已为它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扩大了湘江在全国的影响，为当时的湖南大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震撼和鞭笞了当时的军阀政府，有力地配合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30年后，新中国建立，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初名便叫《新湖南报》（现称湖南日报），并请毛泽东题写了报名。

第二章 毛泽东主要思想土壤——国学

第一节 何为国学？何为大师？

“国学”之名，就严格的时间意义讲，应起于20世纪的民国初年。当时，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时，国学指的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是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还有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章太炎曾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大学、中学的课程中，现代语言意义上的中文成为国文，汉语称为国语，所谓“国”也就自然是指本国，所谓“国学”也即指中国学术之意了。

年轻时代，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一封信里曾这样写道：“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在毛泽东眼里，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大体说来，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包含的学问。

国学在西方一般译为汉学，现在多译为中国学。

在国学的定义上，胡适先生对国学做的定义与毛泽东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国学二字作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而且胡适先生还对国学作了如下细致的分类：即将国学分为哲理、礼教、史地、语言文字、文章、艺术等六类。

胡适认为：凡属于思想一方面的，皆为哲理。中国人对于天有极端的信仰，迨后知识渐开，知道天不足以支配一切，于是不以天为神灵之天，而以天为道理之天，验之于天，即验之于人也。所谓天视是我民视，天听是我民听，是其不言天天者，在儒家为荀子，在法家为商子。关于此类，代表书籍有：《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二十二子》《宋儒学案》《明儒学案》《清学案小识》等。

二为礼教，礼者，礼制。教者含伦理而兼政治者也。哲理属于思想一方面，礼教属于实行一方面，二者不可或缺，实际上礼教乃是国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此类典籍如：《周礼》《仪礼》《礼记》《荀子》《二十四史·礼志》，历代礼教变迁大致可明。

其三为史地，历史地理本为两类，但是研究历史者，宜借证于舆地，研究舆地者，断不可脱离历史，故合为一类。研究历史者，如欲知治乱兴衰之迹，须读《资治通鉴》及后编《明鉴》书；因此等书对于此点，极为注意，但体系编年，不易融会贯穿；更读《九朝纪事本末》，则一事之起讫，可以了然矣。如欲明典章制度，须读九通，若患太多，只读三通考，亦足以识典章制度之大概。至一朝之典章制度，

于各史之书志中求之，亦可得也。又如刘知几之《史通》，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二书关于史法，亦为研究史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四曰文字类。语言文字，自来未有另立一类者，清朝以前，附于经学，近人或归人文学，但此学确有独立一类之价值。此类可分为三：一曰形，二曰声，三曰义。关于形之部，可读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关于声之部，可读《广韵》、顾炎武之《音学五书》、江氏永之《古音标准》及《音学辨微》。关于义之部，可读戴氏震之《方言疏证》、郝氏懿行之《尔雅义疏》、王氏念孙之《广雅疏证》等。

第五为文章。文章为讲学问之工具，可以发表自己之意思，而纪世界之事物者也。可分为三种：一曰有韵者，二曰无韵而优美者，三曰切实用者。关于有韵者，当读《诗经》《后汉书》《淮南子》《文选》等。关于无韵而优美者，当读《左传》《史记》《新五代史》、唐宋八家集等。关于切实用者，当读《礼记》《前汉书》《荀子》《管子》，陆宣公、陈同甫、顾亭林、包慎伯集等。以上三种，第三种最为有用。盖复杂之事，以简括之语纪之，幽深之理，以浅显之语明之，最为文章之能事。第三种文章，即有此种趋向者也。

最后一类是艺术。艺术如医、算、雕刻、书、画等是。医算无须研究，雕刻不甚发达，唯书画在中国艺术界中，颇有重要之价值。若欲知历代书画变迁之大概，则《佩文斋书画谱》可参考也。不过，由于胡先生是以中西合法对传统国学进行分类的，所以其分类较之前朝对学问的分类全面与合理，是一种进步，但是他把国学限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而“别于外国输入之学问”，这无疑未突破旧有定义之藩篱。

和其他许多概念一样，国学也是要经历一个内涵与外延的变化过程，包括其意义由含混到清晰的逐渐确定的过程，这是概念发展的一般趋势。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出现了对国学的不同理解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而不应该是否定和反对。那么迄今人们对国学的认识有哪些发展呢？已故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曾认为：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

还应该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是属于国学的范围的。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大转变，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也是短期的学术思想活跃。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曲折道路，如此看来，这近一个世纪的学术演变，实在是有其价值所在的。

近代以来，特别是 19 世纪末以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柳亚子等一大批先行者，以勇于怀疑的精神和犀利的批判态度，动摇了传统经学、理学、史学、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融合以道、法、释诸家学说而形成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禁锢，开始了用新的概念、新架构、新的方法来对中国古代经学、诸子学、玄学、佛学、理学、史学、文学进行清理、研究，使之得到新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给中国新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注入了极为强大的内在活力。这一切算不算中国的国学，算不算中国国学新的发展，算不算赋予了中国国学以新的生命？反观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除去继承性一面之外，更重要的，恰恰是发展批判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吸收外来文化资源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的精神。思想方面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学，文学方面从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传奇、小说，没有积极而自觉的扬弃，就没有这一切。古代如此，近代现代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什么到了 20 世纪，就非得要将新文化的创造，包括传统文化资料的重新清理、扬弃，摒之于国学大门之外呢？基于此，现在一种日渐成熟的观点认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现代中国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国学，就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就是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传统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

史、子、集四部。经部为六经、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不过，以上所述也并不完善，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便可看出，尽管国学大师的内涵在确定上还有着并不精致的地方，但一个基本事实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即：“国学大师”，必须对流布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字典籍、思想文化和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感悟，从而达到真正博通、精研、自由出入的境界，并在此一领域有高度的原创性成果；其次，他必须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他必须有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比如：

一、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中心，以道、释学说为辅。如果是儒学大师，可以称为国学大师；但单纯是道家方面，或者佛学方面，就不好这样称。比如佛学家，就是佛学家，也不要贸称“国学家”。不然，中国国学家最多的地方就变成佛学院和寺庙了。

二、历史方面，研究方法基本上已中西一同，如果不是思想大家，比如只是史学方面的了解，那么称史学大师就可以了，不必套个国学大师的帽子。

三、不仅有考据、释义、精研的能力，还须懂得应用，有开一家之先河的原创能力。

四、国学大师不仅在其学术范畴之内，同时还应该在中国传统诗词、书法艺术方面即便不具有领袖能力也必须具备大家风范，其作品具有浓厚的传世价值。

至此，“国学”的概念也就清晰，甚至简单了。所谓国学也即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統知识诱发的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总称，而所谓“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而诸学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依傍，以致集大成者，当为国学大师。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国学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停留在某一个一成不变的历史阶段上。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面对先人的文化遗产及其要义时，既应有相应的敬畏之心，也应有“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观念，而这些也是我们对国学概念的基本看法，那种死抱着前人的教条性的东西不放，并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心态，本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唯心史观。

以上，我们从概念上厘清了国学及其大师的含义，继而，我们就可以从已被公认的那些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们的学术成就及毛泽东的学术成就之间进行的展示、比较和分析，来看看毛泽东是具备了怎样深厚和博大精深的国学修养的一位大师级伟人。

第二节 国学大师的成就与标准

前些年，中国人民大学和一些网站曾举办过一个“国学大师评选”，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广大网友从 50 位候选人中评出了“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按票数排列，他们分别是：王国维、钱锺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客观、严谨地说来，这十位大师其中大部分就其国学成就而言并非臻于完美。用上文提及的国学大师的标准衡量也存有偏颇和不足之处，尽管这样一些不足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其国学大师的名头。不过，也许正如此，才让我们切实感到他们实实在在的存在，就像毛泽东走下神坛一样。因此我们不妨暂以这十位大师为例，并从其“国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及历史评价的角度，找到成为国学大师的相应标准。

一座崔嵬的楼阁——王国维

在国学的大师级人物中，王国维可谓首屈一指。出生于 1877 年的王国维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也是国学的奠基人物。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 岁他到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公余之际，又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由此结识了主持人罗振玉。

1901 年王国维由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留学。病归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1906 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眷随后来成为他的儿女亲家的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居世。其时，他一直专注于研究甲骨文、金文、汉简等。

1916 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他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 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换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过了同时代学者的。

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最突出贡献，是在甲骨文的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开始对甲骨文做为史料研究，他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17年，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及《续考》，被誉为甲骨文发现 19 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标志着甲骨文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

1925 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王国维的一生，不汲汲于名利，而孜孜于学术。他既继承了中西两种文化遗产，又把中国严谨踏实的乾嘉学风和西方缜密科学的先进方法结合起来。他学贯中西，见识广博，在学业上是所向披靡的雄狮，可是在政治上却是迷入歧途的羔羊。1927 年 6 月，这位学术巨子在其 50 岁人生，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 字，给生者留下种种疑团，演绎出 20 世纪最有争议、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案”。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驰骋文史哲诸学数十载，是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其传世之作达 60 余种，批校的古籍逾 200 种。时人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以他特有的浪漫的语汇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

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评价：著名学者，杰出的哲学、古文字、古器物、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

钱锺书——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家

辈份和年岁最小的钱锺书能荣登国学大师排行榜的第二名，未尝不占其作为一个当代人，被大众相对熟知的便宜。如此，也可见大众在选择标准上的相对偏狭与世俗。不过，钱锺书的“才子”的名号是世所公认的。这种名号甚至因为掺入了某种戏说性的成分，衍生出几分谐趣。据说，“锺书”的名字就是因为1911年钱锺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父亲因此为他取名“锺书”，意即“钟情于书”而来。

钱锺书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文学士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干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极少发表作品。

1955年翻译德国海涅的《精印本〈堂·吉珂德〉引言》，并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成立，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任组员。“文革”爆发后，钱锺书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并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6年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

1979年钱锺书的《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

钱锺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被誉为“文化昆仑”。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钱锺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评价：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革命先驱梁启超的国学成就

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873—1929）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而当时的梁启超仅有26岁。

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时，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这期间，他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

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洋洋 1000 余万字。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

梁启超是“中华民族”这一名词的创立者。作为文化名人的梁启超的产生是中国悠久历史和民族文化发展和发达的产物。时代需要出现杰出的文化名人，梁启超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完美地肩负了历史的重任，成为新旧时代交替中的骄子。梁启超之于中国人就像伏尔泰、卢梭之于法国。

梁启超一生以政治家始，以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终，这固然未必是其本愿，但是从他一生都注重学术思想的巨大社会功能，从其唯心主义的思想立场及其文化淑世主义的人文理念等方面来考察，这期间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梁启超做人做学问有其根本的且一以贯之的根本命意，这就是他提出的人格主义理想以及其融贯儒佛、打通中西学问而形成的宇宙情怀，在这个根本意旨之上，梁启超卓然自成一家，并形成了其自别于他人，且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术人格品性。

评价：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作为教育家的国学大师——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浙江绍兴人。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年间举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在中国现代史上，蔡元培不仅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革命家，而且由于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力倡导和推进现代教育，其理论建树和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深刻影响了我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进程，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现代教育之父。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1917 年 1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推行办学思想和管理制度改革。他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认为，大学应当学术自由，科学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科学人才。因此，他打破门户之见，主张“以造诣为主，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根据这一办学原则，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张叙伦、梁漱溟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同时也聘请了古经文学家刘师培、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任教。

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在北大自由讨论，尤其是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使北大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学术中心、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地，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历史贡献。

大学教育的功能在于“服务社会”。蔡元培认为：“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而从良好的教育到培养出良好的个人乃至建设成良好的社会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努力，所以他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志

为将来。”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看到北大学生存在不少陋习，于是“推广进德会”，“助成书法研究会”，“助成《新潮》杂志”等，以改良学生陋习，从而养成他们研究学问、服务社会的习惯。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学生出国留学，并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如周恩来、蔡和森、聂荣臻、邓小平等，都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回国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蔡元培非常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 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940 年 3 月 5 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发唁电，云：“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

蔡元培是 20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开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评价：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术成就

章太炎名炳麟，号太炎。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他的学生鲁迅说过，老师是学

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1900年严复至上海，章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其文章至为欣赏，赞其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作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非常之清狂。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脑羞成怒，咬牙切齿。但由于章太炎名气太大，声望太高，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1897年章太炎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于是出现了鲁迅描绘的一幕：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他被北京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不过，章太炎虽是个囚犯，钱倒是随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牛气的时光。

袁死后，章太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2年东三省沦陷，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

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此计的倾向性且不论，从策略角度看，的确高明。首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时宜。从国民党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此时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则国民党不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中共的交战而削弱。但那时的当局者恐怕敌视共产党不亚于日寇，章太炎此计终未见听。不过这一次不听，局势很快就发展到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利。到1935年，章太炎观察到：“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谋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这一分析，实将国民党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尴尬局面说得透彻无比。太炎以为，虽然第四策“差可苟延祚运”，但也只能是“姑经营以待末路”。后来，国民党果然退入西南“守险穷山”，其结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说是“姑经营以待末路”。抗战后虽也复出，几年内即不得不退出大陆，“转进”台湾。则章太炎当初的预见，实不亚于诸葛孔明之隆中对。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

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另外值得提及的一点是，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徒。章太炎的弟子中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曹聚仁……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无不在中国文化史册上熠熠闪光，他们全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也可见他一代宗师的功劳。

评价：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毛泽东的准老师胡适的学术成就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胡适 5 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 9 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 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 年夏赴美留学，曾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 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语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学术事业。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 1902 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经典的经典性著作。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1936 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

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很仰慕，与胡适有不少交往，也受到他的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胡适在文章中也曾称毛泽东是他“从前的学生”。但抗日战争后，胡适在纽约曾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当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之际，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并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讲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都没有听。几年后——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在广播中将胡适列为战犯。或许，这就是历史。不过，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闻之，笑拒了。如此，胡适也就从统战名单中被除去了。

胡适的政治理想是希望英美式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实现。因此，他的学术和生平也更多的容纳进了一些学术之外的东西。抗战时期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限制，其学术上未能更

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如人意。

在胡适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的学术研究几乎触及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每一个领域。终其一生，胡适不失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位杰出的启蒙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等众多领域内都发挥过继往开来的转折作用。当然，胡适学术思想的全面性，并不等于说他在这些学术领域都有高度的造诣。事实上，即使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领域中的大部分学术成就，也很快就被取代了。早在上世纪30年代金岳霖便坦率指出，胡适研治中国哲学史既不免于根据一种哲学主张的成见，“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所长，因而在兼论中西学说时，每多流于牵强附会”。后来，更有台湾学者李敖指责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四十多年来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可以说，几乎胡适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提出异议，但正因为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也说明了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所占据的枢纽地位，而且还诚如格里德所试图表明的，胡适的学术研究不仅在“兴盛的年代是惊人的、富有创造性和强烈挑战性的”，甚至是“永久性地给人们换上了现在用以研究这些专题的观点”。

评价：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县人。出身名门。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后因足疾辍学回国。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寅恪回到国内。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

亚古文字、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陈寅恪，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极力向校方举荐他：“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后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后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这期间，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柳如是别传》计80余万字，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

由于腿骨骨折，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被造反派要求抬出去批斗。一位叫刘节的教授默默走上了批斗台。刘节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造反派暴打刘节，问他感受如何。刘节答：“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1969年5月，陈寅恪被迫接受“口头交代”，但没有“过关”，因为他的交代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他被不断逼问，直到不能讲话。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同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史学大家，有“教授的教授”美誉。旧体诗亦卓然大家，有《诗存》问世。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评价：杰出的文史学泰斗和学界大师，历史学家。

国学大师鲁迅的学术成就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他是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称“文教思革”。

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文，力图以此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1918至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1926年因支持北京学生运动被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当年10月

到达上海。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此后的十年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病逝于上海。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杰出的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学观及现代派的调和者。他以俯瞰超拔的目光、人类文明的目光关照灾难深重的民族，以欧化的艺术改造传统，他在适度照顾中国读者的同时显示自己思想与美学的先锋性。

鲁迅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鲁迅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的作品对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精神被后人称为中华民族魂，他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毛泽东曾用“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干将”等词语高度评价鲁迅。

评价：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国学大师郭沫若的学术成就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笔名沫若（因家乡有“沫水”和“若水”两河得名）；四川乐山人；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

1914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1918年写出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同年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发起组织救国团体，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3月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殷契粹编》等。很多著作在学术界引起震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期间作《石鼓文研究》等。“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6部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及杂文《甲申三百年祭》。另外，郭沫若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著作，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屠场》《战争与和平》《华伦斯太》《赫曼与窦绿苔》《隋唐燕乐调研究》（日）、《美术考古发现史》、（德）等译著。

新中国成立后，仍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学术著作《奴隶制时代》《屈原赋

今译》《管子集校》等。郭沫若一生学富五车，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统一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翻译家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

哲学家冯友兰的国学成就

如果说，像康有为、胡适等人多少都下了一点考据功夫的活，那么被公认为国学大师的冯友兰、熊十力及贺麟等却未涉足于此，他们都主要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哲学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学术成就。这里仅以冯友兰为例来看一下冯先生的学术行年简谱。

1895年冯友兰出生在河南唐河县祁仪镇有名的书香门第，祖父善诗文，父亲是进士，伯父和叔父都是秀才。冯友兰自幼刻苦，文思敏捷。1913年他到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开始对逻辑学课程产生了兴趣，1915年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后来的哲学系）。从此，哲学成为他终生研究的事业。在北大的求学岁月里，他窥见了中国学问和西方文化的新天地。

1919年11月他前往美国学习哲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系统地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是年秋回国后，写成《一种人生观》，随后又写成《人生哲学》一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相结合。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部著作确定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

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抗战爆发后，冯友兰随清华大学南迁，几经辗转后到了昆明，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联大期间，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 1939 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及此书所由作也。”充分展现了冯氏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

1946 年 8 月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当时有许多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但一年后冯友兰却执意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9 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 年底，南京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来北平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去台湾，冯友兰坚决不走，他的态度给清华同仁以很大的影响，众多教授都留了下来。接着，校务委员会推举冯友兰为主席，处理善后事宜。在他的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期间，《南渡集》编成。英文《中国哲学简史》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1949 年解放军接管清华，冯友兰任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翌年 8 月，哲学界批判新理学，冯友兰开始自我批判。第二年 9 月他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获得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后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55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被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所成立后，又受聘为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文革”初期，冯友兰多次

受到批斗。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 500 万言。上世纪 80 年代初，已是 80 岁高龄的冯友兰开始撰写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历时十余年，后来靠口述，别人笔录，以坚韧顽强的毅力在 1990 年 7 月全部完成了这部七卷本的巨著。书稿写完几个月后，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的老人就告别了人世。

主要成就及历史评价：

由冯先生的生平可以看出，冯友兰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主要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可称其为哲学史家。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奠定了他成为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的地位。但也恰是冯先生的这种多是哲学性的学术，以致我们今天除了鲜见的“国学大师”称谓外，世人给予其的评价多是：哲学家，哲学史家。

事实上，即便是在哲学方面，冯先生虽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冯先生前半生，由于受其唯心思想所囿，其方法自然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而难以达到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准确且正确的批判与继承的程度。虽然后来冯友兰致力于弘扬辩证法及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但终未达到更超越性的境界。而就这一领域而言，毛泽东则不然，由于他具有深厚的哲学常识和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他在早年接触西方哲学及马列主义之后，很快就能够接受并加以运用，加上他对马列主义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大师。这样，

不仅使他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加以正确的继承和发扬，也使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人所共知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等。总之，撇开其他方面不说，即使在哲学方面，毛泽东所取得的成就至少不在冯友兰先生之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成绩更大一些。至于熊十力、贺麟等则与冯友兰相似。与这些国学大师比较起来，毛泽东即使在他们擅长的领域，至少也能与之媲美。

评价：哲学家、哲学史家。

第三节 毛泽东的国学成就

有比较才有鉴别。

从上述十位大众基本公认的国学大师来看，梁启超、章太炎、郭沫若更多的是革命性大于学术性；蔡元培、胡适更多的是教育性大于学术性；鲁迅、钱锺书更多的是文学性大于学术性；冯友兰充其量是个哲学家，而真正或者说专注于以“义理、考据和辞章”等学问见长者，不过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罢了。

倘若说革命能量大于学术能量，或兼及学术就可以算作国学大师，毛泽东不是吗？

倘若说教育能量大于学术能量，或兼及学术就可以算作国学大师，毛泽东不是吗？

倘若说文学能量大于学术能量，或兼及学术就可以算作国学大师，毛泽东不是吗？

倘若说哲学能量大于学术能量，或兼及学术就可以算作国学大师，毛泽东不是吗？

……

如此，梁启超、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是以革命性闻名于世的，为什么他们热衷革命之余却依旧能赢得国学大师的美誉？

蔡元培、胡适这样的国学大师，对中国教育，以及思想领域的贡献远比学术本身更大，为什么热衷教育之余却依旧能赢得国学大师的美誉？

鲁迅、钱锺书这样的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远比学术本身更大，同样，为什么他们热衷文学之余却依旧能赢得国学大师的美誉？

冯友兰这样的人物跨越的充其量也就是哲学和历史领域，换言之，他为什么就能在热衷哲学、历史之余依旧能赢得国学大师的美誉？

……

如果是讲革命性，毛泽东不是天下第一吗？

如果说讲思想性，毛泽东的思想性不是亘古未有，空前绝后吗？

如果说讲教育性，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教育的论述还少吗？

如果讲写文章，那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独步天下的文章中那些脍炙人口的通讯、杂文、诗词，甚至论文……还不够吗？

如果讲哲学，谁能否认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存在以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呢？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可以和任何一位哲学大家的经典媲美的吗？

如果讲“义理、考据和辞章”等，毛泽东气势恢弘的《二十四史点评》《资治通鉴评点》以及古籍阅读中诸多充满哲理、思辨和修正能力的评点、解析、考据，还不足以说明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掌握之丰富，之深厚，之透彻；博通能力之强大，精研能力之深厚，出入之自由吗？换言之，如果将“义理、考据和辞章”作为纯粹的学术行为，并成为衡量国学大师的标准，这种说法本身就有点矫情，因为所谓的国学大师标准中如果仅仅是以此项为标准，或者为主要标准，现有的大师们恐怕一多半将榜上无缘。何况，倘若此项标准很主要的话，那么将罗振宇和康有为剔除在外又很无理。毕竟，这两人是早于王国维开创中国考据、典章的前辈。没有罗振宇，王国维是不可能成为后来的大师的。

事实上，说到国学大师，很多人对鲁迅是否具此称谓颇有异议，反对者认为，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研究一定要深要透，要成为专家，“鲁迅不但没有做到这点，还推行白话文毁灭文言，怎么能算是国学大师呢？”“鲁迅应该说是文学大师。鲁迅在国学上倡导少读甚至不读古书，

而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比较推崇。而在国学方面，有很多人的造诣和贡献都要比鲁迅大。”

支持者则列出了鲁迅应为“国学大师”的四点理由：第一，鲁迅是真正的国学研究大家，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达到经典的高度。比如其《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小说通史，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始终影响着后学；第二，鲁迅开创了将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文学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第三，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有重要成果，他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就非常严谨、规范，已具有现代古籍整理的特点；第四，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其深远，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在这里，前者和后者的评判标准其实并未完全等同。前者侧重的是学术，后者侧重的不仅是学术，而更在乎精神和思想层面上的因素，这也正是我们在国学大师的内涵构建上必须厘清的问题，而类似的问题在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身上都存在。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存在，让国学大师的称号无法拘囿于单纯的学术，无法不以精神和思想性的元素为参照标准。

再比如，我们不否认胡适在“兴盛的时代是惊人的、富有创造性和强烈挑战性的”，甚至是“永久性地给人们换上了现在用以研究这些专题的观点”。但是，所谓总结既往与开拓未来的转折作用，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正契合于科学史专家库恩对其独创的“典范”的描述。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典范”，而且这个“典范”约略具有了库恩所说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地说，具体的研究成果则起了“示范”的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以致胡适的学术成就确实起到了转变人们研究方法和观念的“范式”的作用。但即使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是超人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它在各个方面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在封建社会是孔子的思想占统治

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取孔子思想而代之，这一观念及至思维方式等“范式”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改变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这本身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等，而这种改变与毛泽东思想中所阐述的理论是一致的，这又促进了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引起的“范式”的转变。因此，在这方面相对于毛泽东来说，胡适也是逊色的。至于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根本就无需去说，因为在这些领域，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更是无可争议的。

通过以上的对照、比较和基本的分析后，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仅仅从我们对毛泽东这一领袖人物渊博的学识、聪慧的才智、睿智的思想的日常感觉来说，毛泽东似乎并不逊色他人。

毛泽东，贵为领袖，伟业丰功；高为人师，千古未有。为民族翻身操劳了一辈子，读书治学辛苦了一辈子。生时，全心全意为人民，不屑于任何头衔美誉；逝后，其国学大师之称号，实为后人一种敬仰的方式。乐与不乐，皆可为。何况，越世人，越坊间，越百姓，毛泽东越与其同乐呢？

毛泽东之才艺

●毛泽东的书法：笔走狂飙，浩气飞扬。书中情，字中景，人间绝笔，自成一家，后世界“粉丝”无数。

●毛泽东的诗词：其情，其景，其意，其流露出的高远的思想品质，博大的襟怀；其洋溢着的健康的人格魅力，酣畅的气势，就连他的敌人也“咬牙切齿”地佩服。

●毛泽东的文章：既气势如虹又小桥流水，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如春风，如醉酒，酣畅淋漓，雷霆万钧。一篇文章退雄兵十万，亘古未有。

●毛泽东的语言：直抒胸臆，形象生动，言简意丰，雅俗谐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飞禽走兽，五谷杂粮，妇孺老幼，王侯将相，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毛泽东之成果

●毛泽东的哲学——老子之后，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懂得辩证法的人，并把辩证法思想娴熟地运用于军事斗争、思想斗争、自然斗争、阶级斗争等。《矛盾论》《实践论》等为证。

●毛泽东的兵法——刁钻古怪：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密林伏击战、空中拼刺刀战，战战诡异。

目空一切——什么蒋介石、日本兵、美国佬、印度大叔、苏联大哥都是纸老虎。

成则王侯败则寇，八百万国军弹指之间灰飞烟灭；谁越牛越跟谁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兵法艺术已入化境。

●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可作为，甚至无法不作为今后国学发展的文艺理论基础；可作为，甚至无法不作为指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可作为，甚至无法不作为文学艺术界、新闻教育界、体育科技界，甚至卫生宗教界等一切界别遵循和参照的标准。

●毛泽东的其他……

观前十位国学大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虽都是国学大师，也仅能代表某一方面的成就，都不能代表国学发展的方向，都不具备统领国学的领袖能力。只有毛泽东能够代表国学的方向，只有毛泽东能够推动国学的发展，只有毛泽东能够带动国学的昌盛，只有毛泽东具有那种率土为王的领袖风采。

既然毛泽东不仅不逊色于他人，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风骚独领，鳌头独占，那么，毛泽东有什么理由不位列国学大师，不在此一领域赢得人们的敬重、尊崇和怀念呢？

其实，即便没有这种对照和比较，毛泽东与生俱来、从小养成的国学修养以及对这种修养的热衷，让他从形式上就无法摆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大师的形象。试问，现代也好，当代也罢，有多少位官员像毛泽东那样热衷于传统国学经典？热衷于这种经典的收藏、阅读、钻研、考据、评点、解析，甚至实践？有哪一个官员有毛泽东那样深厚的国学修养，敢于、善于和那些国学大师对论、研讨、交锋？尽管

中国的某些官员们，身后的书柜中总是附庸风雅地整齐摆放着从未打开过的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甚至各式各样的国学经典。

别的尚且不提，仅以一部《二十四史》为例，3249卷，洋洋4000万字，读下来就是件不容易的事，何况将全书给予了精研、考据、点评呢？纵观中国学界，有几人通读过《二十四史》，并有能力给予评注呢？古往今来，现代中国，当代中国，毛泽东是第一人，恐怕也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伟人还不该是国学领域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吗？

退而言之，通读《二十四史》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读出思想，读出规律，吸收精华，求得发展和创新，敢于解析，善于解析，有能力给予解析，并解析得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的又有几人？

剑光照空天自碧

以史为例，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可谓了如指掌，得心应手。其运用之妙，其哲思之深，其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皆世所罕见。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其实，他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他的史学理论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对史学的点评，已成为国学宝库中的极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据说《二十四史》通读不止一遍，学界仅为此便传为美谈。他的学术的最高成就也不过就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一个通读《二十四史》不止一遍的国学大家，衍生出来的也不过就是个50余万字的白话通史，便被学术界推崇为毋庸置疑的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甚至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可见其威望及地位。

那么，同样通读了《二十四史》，同样开前人之先河，并因了他的博学 and 真知灼见，给予了 50 多万字的点评，世人评价其为“一份十分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怎么就不能被视为毛泽东在国学方面的学术成就？怎么就不能将毛泽东视之为史学研究方面的大家？怎么就不能印证其“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的能力？怎么就不能因其奠定毛泽东“国学大师”的地位呢？

难道，仅仅因为毛泽东是个大政治家？

倘若讲政治因素，梁启超不是政治人物，章太炎不是政治人物，蔡元培不是政治人物，鲁迅不是政治人物吗？

倘若因了毛泽东的光环太伟大，以致在学术领域都展现了他“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的气势，以致遮蔽了中国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的光辉，那么他的同样伟大的学术能力和成就，仅仅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的狭隘和酸葡萄心理就会被淡化，就会被阉割，就会混灭吗？世人皆可无声，世人皆可不在。但，毛泽东不可无声，毛泽东也不能无声，毛泽东必将永存……即便是在学术领域。

毫无疑问，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承认毛泽东的国学成就，其动机更多的还是受困于一种传统文化人偏狭的自卑心理，以及在政治人物面前总是鬼使神差地矮三分的心理使然。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让中国文人、学者千百年来总是屈从在强权统治的威权下，有意无意地养成一种阿 Q 心理。以一种表象的自尊满足骨里的羸弱心理。正是在这样一种扭曲的心理下，他们常给自己身处的环境划定为他人，包括所谓的政客莫入的一亩三分地，以示自己的高洁。这就正如一种看似纯净的同学聚会，张罗聚会的一定不是当官的，但最后排座次时坐在前头的一定是当官的一样。中国文化人，或者学者们上千年养成的奴才基因，越到当代，色素越浓。以致浓到了在政治人物面前不得不以一种排他的方式谢绝入内的程度。可悲的是，当他们兴高采烈地感受这样或那样的待遇和荣誉，包括以一种激动的心情抚摸着这样那样的证书和国家特殊津贴，以至抑

制不住热泪盈眶时，那证书的资质和津贴的数目无不是那些被他们谢绝入内的政客们颁发的。

当代中国人推崇陈寅恪，并为其显赫的家世津津乐道。可陈寅恪的家世辉煌的顶峰，也不过是那个昏庸的慈禧太后老太太手下的一个打工仔。

但客观是无法改变的。存在，永远是真理。毛泽东要是在国学领域不具备那种笑傲江湖的能力，谁生拉硬扯又能将他死靠呢？一言蔽之，这还是因为他终究的伟大呀！一个千百年来才横空出世的圣人、智者，他本就具备那种天马行空、风骚独领的气魄呀！如此，我们又有什么不服、不甘、想不开的呢？

客观就是客观，你不能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就否定他当时是中国的领袖，不能因为林彪的叛国就不认可他曾经的打江山的功劳，更不能因为陈寅恪不信仰马列主义就否定他国学成就的存在。毛泽东、周恩来能因为陈寅恪不信仰马列主义仍给予恭敬的善待，我们却因为毛泽东一个大政治家的身份而不能承认他国学大师的能力，不会在这一方面都证明我们比他老人家的笨拙和无能吧？

倘若是政治家就一定不能是国学大师，是国学大师就一定不能是政治家；倘若作为国学大师的思维方式真的必须要求他单纯到不能有倾向性的信仰，净化到“学术不自由，毋宁死尔”的地步，倘若如此，王国维、章太炎、胡适、鲁迅、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等哪一个没有倾向性？

王国维作为晚清遗老，忍受清朝的覆灭，以致不止一次地甘愿为其寻死觅活；

梁启超、章太炎为了推翻清朝统治不惜冒杀头之危险，逃亡异国他乡；

作为旧世界破坏者的鲁迅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恶痛绝，对旧世界的攻击不遗余力；

冯友兰最终放弃其新理学体系，从 50 年代起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打算撰写一部体现其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

胡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一直彰显着其明显的阶级性，一直带着有色眼镜对其阶级统治给予着坚定不移的维护。而反其道行之的郭沫若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献的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就是被很多人推崇的陈寅恪，不也是充满倾向性地坚定的声称自己不信仰马列主义吗？

事实上，完全独立的学术几乎是没有的，倘若有，王国维就不会采用投湖自尽那样的方式报效那个覆灭的晚清统治了；陈寅恪也不会为了追求学术上的非马列主义化在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面前耍小孩子脾气了。

思想很难是个纯粹的东西，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游移于真空之中，就一个学问家而言，其学问的过程中掺杂进某些个性化的、倾向性的东西很正常，完全中立的研究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既然国学大师本身可以不因某种政治家的政治形象的存在而必须被拒之门外，既然拥有国学大师称号和能力的那些人并不被要求必须具有空中楼阁般的思想，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因为毛泽东的政治家的身份苛求并一定要否认他国学大师的地位及其学术成就的存在呢？

自古而今，历史，从来都是不完整的。出于种种原因，某些真相会被史书抹去。而这种被抹去了的历史究竟有多少，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就像打扮一样，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审美观点。历史的记载，同样如此。斯大林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见其乖戾。话说的毫不羞赧，但很真实。退一步讲，历史即便不是个小姑娘，也是把双刃剑、回音壁，你怎么样书写，它就会作出怎样的回响。一部二十四史，上下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其本身也存在着阶级性，以及被统治者利用、美化的地方。其记叙者——古往今来的那些史官也不可能都如实记录，否则，都像董狐那样被砍头了。可见“书法不隐”的“董狐之笔”是难以存在的。

其实，就毛泽东而言，作为一位国学大师级人物实在没什么难的，难的是他终究成为了一个震惊世界，不朽千古的伟人。就这样一种关系而言，国学大师可以有十个，上百个，甚至不止上百个，毛泽东却

只有一个，中国有一个，世界也只有一个……如此，还用赘言吗？所有的理由不都等于赘言吗？

以上的论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此一结论：毛泽东实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级伟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或许国学大师的名号相对于毛泽东其他的荣誉、地位和名声来说有些暗淡无光，也无足轻重，因而不被人们注意和计较。但是，当这种事实的存在终于有一天昭示世人的时候，那种为人折服的力量是每一个受众都无法不接受的。不过，为了使一些对此不甚了解的人们更清楚地明白这点，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对上述结论作进一步的阐述。

事实上，毛泽东不仅以其丰富的著述树起了自己的学术丰碑（虽然毛泽东更偏重于其实用性，但我们不可否认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著作的学术性的一面），而且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以至最终建立起的新中国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文化革命，这一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文化形态，并反作用于中国的学术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曾放射过灿烂的光芒，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封建集权和专制体制下，早就失去了其前进的活力，成为一种阻滞社会进步的落后力量。在近代民族危亡时刻，它不但不能富国强兵，挽救危机，甚至让社会的发展处于一种倒退，甚至分崩离析的地步，丧失了作为一种社会的起码的社会凝聚力，丧失了作为一种国家的起码的国家能力。如果说，满清时期中国遭受列强的欺辱和瓜分还能以闭关锁国等原因找到借口的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期民族和国家面临的外敌欺辱和侵略的惨状便已经到了不进行一种革命，不改换一种制度，便不足以让中华民族找到一种希望和曙光的地步。

当然，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的生存方式的，因而是不可能全盘抛弃的，只能走一条渐进改造的道路，在引进先进文化形态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批判改造，逐步建立起一种现代形态的，充满进步力量的中国文化。而中国革命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标志的，它既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又是一场社会文化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不但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起崭新的

社会主义制度，它也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并为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建立提出了核心的思想观念。所以，新中国的建立具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第一，新中国的建立是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胜利。

在近代西方文化被引进之前，传统的封建文化在中国基本上是一统天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开始节节败退。封建统治者试图以它作为抵御外来政治文化侵入的武器，但失败了。可是，由于中国城乡中封建统治及经济势力的广泛存在，封建文化的影响在政治、思想观念等领域依然严重存在。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阻力的专制观念，保守心理，家族观念，地域观念，各种形式的奴化思想，涣散、自私的心理状态，等等，都可以从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找到其根源。新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就彻底铲除了封建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粉碎了那些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的思想观念。

第二，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提出了关于文化改革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一种社会主义的崭新文化形态逐步形成。

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思想，人人政治平等的观念，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观念，民族平等的观念，劳动光荣的思想，按劳分配的观念，集体主义的观念等等，一系列崭新的思想观念借助于政治革命的胜利和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而逐渐渗透到整个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成为中国人民的理论思想和行动指南。当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消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许多深层次的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存在。在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因素

得到继承和发扬的同时，许多消极的因素或者暂时沉寂下来，或者以新的形式隐藏起来。一旦气候适合它们就会重新滋生出来。“文革”期间，许多封建主义的毒素再次以各种形式大行其道，就是明显的例证。直至今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这一课题。

第三，作为中国革命思想结晶的无产阶级文化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革命的文化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文化形态之中。从内容上看，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它并不是马列主义原理的重复，而是对其的创造性发展，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包含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内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人民战争的理论，军事战略及战术思想，政策、策略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内容既包含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征，还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改造与继承。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是长期以来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一个方面。正确揭示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但有助于全面、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与性质，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其文化学意义的理解。

其实，仅从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说，毛泽东的学说中很多通过实践检验早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and 指导性的东西，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传世之珍。这种宏观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又岂是一种更学术性的国学概念可以周延的呢？没有中华民族的国学文化的浸淫，就不可能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人物的产生；没有对这种文化的强大的兴致和钟情，毛泽东当年也许就会像许多人一样赴法留学了。恰是这样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他底蕴中的传统文化情结。再者，从毛泽东思想通过中国革命而造成的整个社会文化改变，和以毛泽东思

想为核心的现代形态来看，毛泽东的学说已经成了国家以至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及思维方式，因此说毛泽东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国学也是无可争议的。而从毛泽东的思想所涉猎的领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即从其整个体系的博大精深来看，也是所有其他国学大师都无法可比的，如此而言，毛泽东又怎么不是当之无愧，甚至独占鳌头的一位国学大师级伟人呢？

第三章 大师中的大师

第一节 充满大师品质的文化思想

毛泽东出身平民，是个有过底层老百姓生活切身感受的领袖人物。从一个四处求学的普通青年成长为一个世界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学问、思想、信仰以及价值取向都有个逐渐清晰、逐渐明确的过程。而作为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哲人、学者等诸多身份于一身的伟人，这种多重身份的统一，让他的文化思想的形成也是始终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而这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又和他个人以及他所缔造的党的事业在战争年代的经历紧密相连。

1927年秋收起义至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甘陕会师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黄金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那些极负盛誉，影响巨大的作品，大都产生于这一时期。1936年岁末至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则是毛泽东理论逐渐成熟，并越益丰满的黄金时期。其哲学、军事、政治、文艺等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经典性的成熟之作，都写于这一时期。也正是这样一些辉煌的理论著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至于成熟，并为全党所认可、接受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些文章，同时还显示着作为文章大家的毛泽东，文章风格已炉火纯青。他的文章，准确、鲜明、生动的精美语言，善于抓本质抓要害，尖锐、独到、活泼、精警的议论，纵横捭阖、严整而富于变化的结构，大江东去浩浩千里的豪迈气势和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完全中国作风、中国气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融汇统一，形成了一种个性迥异的独特文风。他为新华社、《人民日报》撰写的评论、社论，明眼人一看，便知出自他之手。他亲自培养了许多文章高手。他的文风，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这里，先叙述“毛泽东文艺思想”创建的问题，这一思想的存在恰是他成为国学大师的一个理由，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师不具有高超的思想，而具有如此之高超思想又能笃学好古，并驾轻就熟于学术的人，不成为大师，除了一个原因——对大师的不屑外，绝没有第二个理由。

有句话说一个人——教授中的教授。

还有一句话说另一个人——大师中的大师。

前者，叫陈寅恪。

后者，叫毛泽东！

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说：“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他最后说：“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这时毛泽东已是党的领导者、红军统帅。他是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在向文学艺术工作者们讲话，第一次提出“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要求文艺“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这就表明：从这时起，毛泽东谈文艺问题，不是以一个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单纯就文学艺术的理论而谈理论的，而是以一个革命领袖的身份，从当时的革命任务对文艺的要求出发去谈文学艺术理论诸问题的。这是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938年4月，毛泽东应邀到刚成立不多日的鲁迅艺术学院，向全体师生作了一次讲话。这是毛泽东到延安后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极重要的讲话，讲了文艺理论中几个方面的重要观点，且有很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对文艺创作的指导性，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艺术的关注和对文艺理论的思考是很在意的，是相当全面而有深度的，还可以初步

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理论上的恢宏气度与独特个性。与他学生时代的文学观相比，这篇讲话有了质的飞跃，理论上的现实性、深刻性远非那种“听课笔记”所能相比。

这篇讲话分三个大的方面：

一、“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在这方面讲了三个重要观点：

- “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

- “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

-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二、“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求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三、“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流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说到艺术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时，他举了鲁迅在《毁灭》后记中说法捷耶夫身经游击战争，描写调马之术很内行的例子，还举了《红楼梦》中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的例子，并说“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他要求鲁艺的学生们“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说他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说到艺术技巧，他着重讲了掌握语言的重要性，要求鲁艺学生们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他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的诗。”

1939年鲁艺成立一周年，毛泽东给鲁艺的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二年，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在学院成立的典礼大会上讲了话，讲了艺术的作用与使命。他说，既然名为艺术，便又要好看（指艺术形式），又要好吃（指内容丰富）。他要求“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也才能尽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与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形成，许多文化人纷纷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一个新的文艺运动正蓬勃兴起。但是，也有一些从“亭子间”到延安的文学家，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工作对象——工农大众，感到很隔膜，不适应。他们愤恨蒋管区的黑暗，满怀奔向光明的热情，历尽艰辛来到延安，以为延安就是一片圣洁的乐土，当看到延安也还有落后的、不大合理现象时，就从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的偏见出发，散布牢骚不满，甚至形诸笔端，载于报刊，张贴墙头。在文艺理论上强调艺术第一，自我表现，倡导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一度造成了文艺界的思想混乱，引起的争论也较大。此外，延安文艺界还比较普遍地存在艺术创作上的教条主义、脱离工农、关门提高等不良倾向。这种状况与延安当时的严重困难，与革命环境显得极不协调。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很关注，花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找一些文学艺术家们谈话，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充分准备，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隆重开幕。会议开始，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地讲明开会的目的。他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需要解决。

5月16日，毛泽东出席文艺座谈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意见，边听边记，偶尔也很风趣地插插话。

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外边的黄土敞坪上举行的。那天，天气晴朗，到会的人非常多。毛泽东那天的讲话，一开始就将所要讲的文艺的中心问题放在当时全世界、全中国的反法西斯和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下，放在中国“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纵坐标上，放在延安文艺运动总态势的特定环境中，表明他不是从某种文艺理论教科书的定义出发去探讨文艺理论问题，而是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社会和文艺的现存关系出发来研究中国革命文艺的中心问题，来探讨革命文艺的方向、规律和功能。他以一个革命领袖的身份、政治家的眼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来研究、论述文艺问题。

那天，毛泽东很坚定地说道：“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其次，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说：一个是源和流的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这要区分清楚。但借鉴是必要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个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讲到文艺批评问题时，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结论还批评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那天，毛泽东的讲话说到大约一半，天近黄昏，只好暂时休会，毛泽东和全体出席人员合影留念。晚饭后，敞坪里支起了一个木架，挂着一盏汽灯。毛泽东在汽灯下继续讲话。结束时，大家热烈鼓掌，气氛十分热烈。出席会议的人员个个情绪饱满，都为毛泽东讲话那恢宏的气势、精深的道理、缜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以及生动鲜明的语言所震撼，所折服。许多年以后，有些同志已是垂暮之年了，回忆起这次讲话的情形时，心情仍是激动不已。

开幕会上的那次讲话称为“引言”，这一次讲话叫做“结论”。至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在中国人民革命文艺发展史上最这光辉的，这一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与成熟的经典文献，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节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观

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文化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毛泽东早期的文化观是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色，从而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建国以后，他的文化观却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说，恰恰是一种逆向选择。

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坦率地说，不仅是当时的共产党人，就是毛泽东那样的战略家都认为这种变化有点出人意料的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免对主观能动性估计得过高。很多事情急于求成，重破轻立，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念念不忘批判资产阶级，像对《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把批判资产阶级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却放松了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警惕，特别是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方面对反对个人崇拜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看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弱点，他确实想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还提出双百方针，显示出一种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的势头。然而，当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响应号召认真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他又将“双百”的口号一变而为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方针。“雹碎春红，霜凋夏绿”，1957年的百花园里顿呈一派萧条肃杀景象。

客观情况是不容置疑的，对这种客观有个清醒的、透彻的认识也是为了我们引为前车之鉴，不至于重蹈覆辙。毕竟，我们首先应该理解的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新开端，也赋予了文化建设的新开端。在建国初期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上，那样一个倾全国四分之三的国力“抗美援朝”的状况下，新中国的执政者和人民以极

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那个时期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的美好未来是充满纯洁的热望的，而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虽投身于繁忙的政务活动中，对文化方面的考虑相对于政治、经济、战事要少一些，但有着文人情怀的这位领袖人物，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时，面对着远比新民主主义文化阶段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方面更多的复杂情况，却坚持着艰难、独特性的探索。虽然那时候一个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完整成熟的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但作为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新旧文化交锋和融合的高峰过程中，仍缺乏更充分的实践经验。在探索和求真的过程中，在那种新旧文化的交错、交锋、融合、淘练，以致最终形成一种激昂向上的社会主义新形式的、新文化的进程中，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们始终做着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的文化观系统地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撰写和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了“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任务，且明确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文革”发生前，毛泽东的文化观较之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了相应的变化，并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两大任务相提并论。

- 在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化建设保持一种探索态度。他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容上应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上是民族的。

- 文化的内涵在毛泽东那里已有所扩大，已不限于观念方面。更宽泛地从文学、音乐、科学、医学、历史、教育、美术、戏曲等领域议论和评价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性、方向性更为明确。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二为”方向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 1956 年明确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把民族自尊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注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将部分精华的传统文化升华到昂扬向上的民族自信心。面对共和国成立后的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他毫不畏惧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民族自信心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得以重振。

●争取一切爱国的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文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从旧中国迈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有 200 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 5.4 亿的 0.37%。他们身上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但毕竟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执行对旧知识分子包下来政策时，针对某些人存在的不足，引导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当时，毛泽东还肯定、推广了华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先进经验。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各地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要比培养‘秀才’”，“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庞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营造宽松的学术春天

早在 1951 年，当时国内关于京剧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另一派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当年 4 月，毛泽东应中国戏曲研究院的要求，便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他主张京剧还是要，不单是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而“百家争鸣”则是毛泽东在 1953 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

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请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毛泽东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是因为当时两位受毛泽东器重的大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也有不同看法。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范文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郭和范都是中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毛泽东本人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更倾向于郭沫若一些，但他确实不好做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便认为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为好。

1956年2月，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共中央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2月19日，毛泽东批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第二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次讲话经整理补充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此，“双百”形成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方针。

“双百”方针体现的是一种自信、开放和宽容的文化心态，遵循的是符合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规律。它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向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作为执政党，要拿出比你不赞成的东西更好的文化成果来，显示自己的先进性。以政治批判方式来解决文化学术分歧，甚为不可。

“双百”的提出，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让学术界变得空前活跃起来。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1956年一年中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据初步统计有50多次，多于过去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多出，同时收到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多出戏。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为了贯彻“双百”方针，1956年底，中国作协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没有指导与领导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毫无疑问，在建国后的头 17 年里，毛泽东十分注意寻求用适当的政策、制度鼓励、督促艺术家创作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在政策层面上，特别是 1956 年提出“双百”方针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与文艺界人士频繁接触，探讨繁荣艺术的政策和方法。3 月 8 日，刘少奇与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明确表示不赞成剧团全部国营，也不赞成戏曲改革急于求成。他说：“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毛泽东、周恩来也表达了要放宽戏曲政策的意向。3 月 22 日，周恩来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他同剧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座谈，针对戏曲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周表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正当中共中央酝酿“双百”方针时，浙江排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演出，引起轰动，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

其实，建国初期 17 年间艺术创作的显著特征就是创新。这是由当时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的特殊情况决定的。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国家形态，而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确立，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意义。新国家、新体制、新政策、新思想、新任务，尤其是新蓝图，国家的、集体的、个人的新蓝图，唤起了历经苦难的无数人的，甚至是整体国人的无限憧憬和热情。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化艺术工作者们积极面对并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课题。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下，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的崭新面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所有艺术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八字方针以及后来的“双百”方针构成了艺术创新的基本政策。在艺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中，创新主体的直接的利益诉求被抑制，使命与信念成了主要的内驱力，而外部动力日趋强大，创作规划、政府号召和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社会氛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不过，

这期间，在艺术作品的评价系统中，领导、专家、工农兵构成了基本的评价主体，在很多时候，领导人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评价的原则也惟“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是，无疑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掣肘和抑制的作用。

政治伟人的文化襟怀

“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多元化，以及这种多元的普世价值。这种多元无疑是团结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情感纽带，是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态自由发展的政策依据。只要符合繁荣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这一民族的最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促进和体现社会的进步，就应该纳入先进文化的格局范围，而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甚至一棍子打死。

1957年初，中国新闻社约请上海著名的越剧演员范瑞娟写一篇文章，因文章预备在香港的《大公报》刊载，考虑到读者对象，所以规定了主题是谈谈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借此向港澳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面貌。范瑞娟很快就写了出来，起了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大公报》在发表时根据报纸特点和读者对象，将标题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

3月24日，上海的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没想到，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人对这篇又是“丈夫”又是“蜜月”的文章看不入眼，就写信到报社，认为党报不适宜登这种生活化的文章，应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还有人上纲上线，扣上许多大帽子，提到吓人的“黄色”高度。报社受到指责，范瑞娟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范瑞娟，毛泽东并不陌生。从1950到1952年的三年间，范瑞娟三次到北京演出，毛泽东都看了她演的戏，还当面称赞过她的表演有进步。听到这篇文章引发的风波，毛泽东当即表示：“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党委要给报纸一个方向，让他们按方向自己去办。搞方向就是领导，但不要干涉过多，毛病总是有的。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丈夫？你六

百万人的上海，二百封信有什么不得了？还有五百多万人没有来信嘛！可见是正确的。”当时正是电影《上甘岭》热映之时，上海、杭州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大幅的预告，大概毛泽东看了报纸，才以此为例。毛泽东的支持，不仅解脱了范瑞娟和她的丈夫陈伯鸿心头的压力，也使刊发文章的报纸从种种责难中得到了解脱。一场由“丈夫”和“蜜月”引发的风波就此结束了。

事必躬亲推动百家争鸣

治学不懂学术是不行的，作为执政者不懂学术则更不成，那样就很可能发生外行领导内行，强权管理学术，甚至一切从政治出发的专制悲剧。

毛泽东由于自小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私塾，以及一直身处于一种传统治学氛围下，自幼便养成了一种对待学术问题相对明白，相对开明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在类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双百”方针的提出，更表现在他对待学术争鸣的态度上。

事例一：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仅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于5月1日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转发时，不仅加了一个新的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文章的发表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办的，新标题是毛泽东拟定的，编者按语也是毛泽东撰写的。

李汝祺的这篇文章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不同的观点、流派，是很自然的事。但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自己的观点，压制别的观点，在苏联有过深刻的教训。遗传学领域李森科科学派对摩尔根学派的压制就是典型的例子。1948年，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对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批判，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苏联的做法很快传入了中国，在当时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也采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就因为信奉摩尔根学派而不被允许开设遗传学课程。1950年初，这种做法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当年夏天，毛泽东就对北京农业大学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的材料作了批示，认为这样的作风是不健全的，对这所大学的领导要作适当的处理。经过调查，北京农业大学最高负责人来自老解放区的乐天宇的职务被解除。并且批评了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但在当时的总的背景下，这个纠正还是一个开端，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的。“双百方针”提出后，类似的这种非学术性做法得到纠正。仍以遗传学为例，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高教部联合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一次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不同的学派和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可谓各抒己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盛会。这也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们国家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方针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巨大、效果很好的会议。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也很看重。会后不久，他就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竺可桢，向他了解青岛会议的情况。在竺可桢介绍时，还不停地插话，表示对会议的肯定，并且鼓励竺可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毛泽东把遗传学领域发生的事件上升到我国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这个简洁明快的提法，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极力推动。

事例二：周谷城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教学和研究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是位纵述古今、横论中外，著作等身的学者。1921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的毛泽东，并结成好友。“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先生到中南海游泳池一道游泳。游罢上岸后，毛泽东拿着《汉书·赵充国传》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

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周谷城理解毛泽东话里的意思，是要他参加到百家争鸣活动中去，于是，周谷城便写了很多争鸣文章。

1958年秋天，毛泽东到上海，又把周谷城请了去。他拿着一本《新建设》杂志，把周谷城拉到一间小房间里对他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回答道：“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毛泽东说：“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周谷城道：“意见虽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毛泽东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1962年末，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这篇文章提出的“无差别境界”说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在美学界引起争论。汝信、朱光潜、王子野、陆贵山、孟伟哉等许多人都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周谷城商榷。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延续了两年。许多人对时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阶级意识的“汇合”提出了质疑。其间姚文元和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1964年5月，姚文元就此问题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中，重述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

金为民、李云初看了姚文元这篇文章，寄来一篇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文章批评姚文元说：“他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质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毛泽东很重视这场讨论，他不仅看过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还看过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清样。而后他就叫中宣部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即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它的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

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

第三节 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领袖风度

毛泽东时代的学术氛围是很宽松的，尤其是在建国 17 年的日子里。或许说到这一点有些人会以“反右”反唇相讥，反右的存在及其扩大化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并不从本质上改变毛泽东那一代人对传统文化人和学者的一种根本性的尊重。对一个新诞生的，毫无执政经验的执政党来说，他们的执政过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缺乏经验。倘若那个时代有一定的参照标准，人们的自我审视以及管理能力达到如今的时代，那么，毛泽东那一代人就不会犯“文革”那样的错误了。而对一代刚刚从封建社会，抑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过来的执政者们而言，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终究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无论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扩大化，还是“文革”等，都是执政者执政危机感使然的结果。恰是这种危机感让执政者面对一些触及自己统治地位的言论和做法时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紧张过度。这种做法就当时而言，也的确有其现实性。一方面，新中国面临着包括国际国内之间敌我矛盾因素，诸如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围剿，蒋介石未曾放弃的反攻大陆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包括毛泽东等领导者自身面对和处理权力地位的认识和手段等因素。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进程中执政党国家科学管理经验的缺乏，才是最终造成“文革”那样悲剧出现的根本原因。以致一个伟大的执政党的诞生未能像它建国初期带给人们的那样，充盈着无限的美好；以致直到今天类似“文革”那样的灾难带来的影响虽时过多年仍让人谈虎色变。任何的事情，都必须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对待，一味地将“文革”这类悲剧推给毛泽东并不公正，尽管宏观上的根本决策在他，但是下面的走样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有历史发展了三十多年后，管理意识和手段都理当先进，执政环境和机制已相对科学的今天，还有“上面说一套，下面做一套，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说法了。

公正和客观地讲，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本性是真诚和善良的，尤其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国家和民族所奉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宗旨是毋庸置疑的。就毛泽东而言，尤其是他对待人民的态度和感情，直到今天仍然被世人深刻地敬仰和怀念。而在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并不认同，甚至公然声称在学术领域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敢跟毛泽东吵架，敢将共产党人拒之门外的人来说，毛泽东等领袖们为他们营造的学术空间，对他们个人所给予的尊重和礼遇，直到今天，都堪称楷模。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更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年代。

而那个时代的执政者和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领袖们和知识分子之间也有一种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具有同等地位的对话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天然般的，如出一辙的共同语言——他们都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所有的知识分子受到的都是旧时代的教育，就像他们的启蒙教育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一样，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彼此似曾相识的生长环境，让他们在后来以各种方式，各种身份相处的时候，能彼此适应，彼此沟通，彼此间多出一份互敬互谅的理解，多出一份和而不同的相知。

敬重那个将《资本论》带回中国的第一人

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的马一浮，是后人公认的“儒释哲一代宗师”。

1916年，丰子恺随李叔同（弘一）初访马一浮，时马一浮不过30多岁，李叔同谓丰子恺曰：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没有一人，生而即始读书，日览两册，过目成诵，及马先生之年纪，其所读尚不及马先生之多。这个评价很吓人，以弘一法师这样的牛人来评价另一个牛人，可想马老让人敬佩的程度了。

马一浮清末已有文名，他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圈子中影响颇大。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仍称他为“大儒”，他是将《资本论》引入中国第一人。

马一浮为人清高耿介，军阀孙传芳在自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去拜访他，马一浮拒绝接见。有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他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抗战期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住了6年，办书院，收弟子，著书立说。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排场豪华，孔祥熙派人找马一浮替他母亲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转地拒绝了。孔祥熙不死心，再派人找马一浮，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对军阀权贵深恶痛绝，但对人民群众却热情满怀。新中国成立前他潜心学术不问政治，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与支持不遗余力，写了不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雷锋精神的诗篇。1951年4月陈毅到杭州，由教育厅长刘丹陪同亲自到郭家河头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大师午休，便站到了屋檐下。过一会下起了毛毛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刘丹等人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陈毅在礼叙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过去人家掌权您老不肯出山，现在我们当家了，您老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林栖便鸟养，舆论验民欢。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能成天下务，岂容一枝安。”这首《赠陈毅副总理》的诗记叙了当时的情景。马一浮为陈毅这种“马门立雨”的礼贤下士精神和豁达爽朗的风度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特邀委员。为了给这位理学大师创造适宜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其在杭州蒋庄家中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自1949年后的18年中，马一浮虽也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变迁，但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仍然是不一样的。“一代儒宗”

马一浮在杭州西湖蒋庄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并由此不再公开倡言儒学。在这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年近70的马一浮“旧时从游，都已星散”，他仍然以隐者的心境观看世事的变迁。他在《拟采薇》中写道：“苍生多菜色，赤县皆戎衣。偶语将为禁，玄言不救饥。万夫雄可夺，一字读难希。屋壁良无地，行歌但采薇。”不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革命领导人对马一浮一直是非常敬重的。1963年，周总理还特批拨一万元人民币作为马一浮颐养天年之资，这笔巨款在当年可谓天文数字，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对马一浮的关爱。

1964年毛泽东接见和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花甲以上老人时，特地请马一浮坐在自己与周恩来之间以示敬重。感动之余，马一浮回杭后写了两副对联。一副送毛泽东，词曰：“旋乾转坤，与民更始；开物成务，示我周行。”落款为：“集《易》《诗》《汉书》《宋史》句。赠毛泽东。”一副送周恩来，词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落款为：“集《周礼》《孟子》《礼记》句。周总理鉴正。马蠲叟赠言。”因为这时马一浮两眼已失明，是瞑书，写好后感到不满意，又再恭书两副，直到满意才送出。原先他自感写得不满意的两副瞑书对联便一直留在案头。

狂不足较——毛泽东礼遇学术狂人熊十力

天性张狂、孤高自傲的熊十力当得起“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的美誉，他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儒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三人被后人称为“现代三圣”。作为现代大儒，三位先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各有个性特征。

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他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时说，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熊十力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再看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天性张狂的熊十力师从欧阳竟无学佛，却不尊经，常自称菩萨，后来却写成《新唯识论》破旧立新，气得欧阳痛骂不已。有人撰《破新唯识论》，对他进行驳斥，他马上又著《破〈破新唯识论〉》，破来破去，煞有意思。

熊十力教授学生自成一格。初入北大时，他将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据说，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

熊十力天性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而他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不过，此人又颇有些书呆子气。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住北京沙滩小院，门总关着，门上白纸一大张，纸上字几行：“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认真又啰嗦，可掬之憨态使人莞尔。

熊十力一生埋头写作，不求名利。他平生有个梦想，就是创办一个民间哲学研究所。1946年春，蒋介石令陶希圣转告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给熊十力100万元法币，给他建立哲学研究所，熊却当场退回。来说回去不好交代，他答：“这不干你的事，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是年6月，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受蒋介石委托，以探望之名再去熊府，并给他带去了一张200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大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滚！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走！”据徐回忆：“先生的大节首先表现于他的民族思想，他对国民政府的误会颇深。为蒋公馈赠200万元一事，先生深责我的鲁莽后，将此转赠流徙于四川江津的内学院，即是这种感情的反应。他对抗战一事则忠诚拥护，历艰茹苦，绝无怨言。”

据说，蒋介石 50 大寿时，由邵力子出面邀请熊十力等名人，到总统府参加祝寿大典。宴会开始时，熊十力一到庆典会场，就旁若无人的坐到筵席的正席座位上，大吃大喝起来。庆典进行中，名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到主席台，或吟诗或作画，表达对蒋介石的祝贺。当祝寿会主持人请熊十力讲演时，他大模大样地走上主席台，边摸着自己的头，边写边吟地题写了一首名为《无题》的宝塔诗：

脖子上长著个瘪葫芦
不花钱买篦梳
虬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写完这首诗后哈哈大笑，又手提裤腰带连走带跑，下了主席台，装作十分内急想要入厕的样子，直奔大门。众人听了熊十力的诗，又看着他的滑稽模样，满座哄笑。

寿星老蒋介石此时十分尴尬，他身旁的卫士见熊十力如此无礼，便欲对熊动粗，蒋却十分大度，挥手制止了卫士，只是看着熊十力走出大门，不辞而别的样子暗自苦笑。

说到蒋介石，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习惯意识中的憎恶感。作为奴役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的代表，作为一个统治中国 22 年的政治和军事强人，蒋介石的性格既有其强霸、专制和残暴的一面，有时又展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与他的表象特征不符的另类的宽容和忍耐。就拿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言，一方面，他推崇“舆论一律”，热衷于听记者、学者们的溢美和吹捧之言，另一方面又对某些尖锐批评甚至嘲弄他及其亲友的知识分子，诸如熊十力之类表现出明显的忍耐与宽容。这无疑让我们对蒋介石这一政治和军事强人的个性能有个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言及此处，不妨赘言几句。

1938年，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傅斯年又和行政院长宋子文叫上了劲，指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著文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见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至3月，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他在文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孔祥熙是蒋介石老婆宋美龄的姐夫，跟老蒋是连襟。宋子文是宋美龄的哥哥，又是老蒋的大舅子，傅斯年单枪匹马地跟这些皇亲国戚干，还把他们的马拉下了，这未尝不是抽老蒋的嘴巴。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傅斯年。不仅如此，1949年，国军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老蒋抢运文化人的名单中第一批就有傅斯年。傅斯年赴台后，老蒋还委任他做台湾大学的校长。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病在台湾逝世，蒋介石不仅为傅斯年颁布“国民政府”褒奖令，还亲临傅斯年追悼大会，并书写“国失师表”的挽联以示悼念。

与傅斯年相比，胡适对蒋介石的冒犯更加厉害。

胡适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1932年11月，那年，胡适和蒋介石曾在汉口共进晚餐。餐后，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离开了。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1948年9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

“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10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胡适毫不留情地向蒋介石提了10条意见。有些话还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蒋介石对此也只能洗耳恭听，并无狡辩。

1953年1月蒋介石设宴为回台湾讲学即将返美的胡适饯行，胡适又向蒋介石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大致内容是：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尽在不言中”也。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1956年蒋介石70岁生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负责人胡健中希望胡适写一篇为蒋介石祝寿的文章，胡适答应了。他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然后说明自己的用意：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胡适向蒋介石提了这么多尖锐得不留情面的意见，老蒋并没有计较。1948年他就币制改革向蒋的进言，“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指蒋介石）很和气地听受”（胡适日记语）。1956年他写的向蒋祝寿的文章，《中央日报》不敢登，特意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结果文章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1962年2月已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主持该院会议时骤然离世，蒋介石得知消息立即写下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27日，蒋介石又送去挽额：“智德兼隆”，并亲临吊

唁现场与胡适遗体告别。6月27日，蒋介石又颁布“国民政府”褒扬令，表彰胡适一生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蒋介石对傅斯年和胡适能够忍耐和宽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胡适、傅斯年多年与蒋介石有很好的私交，他们提意见是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不会动摇老蒋的统治；比如蒋介石有一种每天都自我反省的习惯，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种自我反省可以帮助他听取某些不同的意见。比如宋美龄是基督徒，性情比较温和，同时又热心于政治，老蒋对其言听计从，这也可以帮助蒋对某些知识分子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举动“感动”知识分子，避免矛盾的激化，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蒋介石统治大陆时，外有日寇的入侵，内有共产党的“内患”，加之派系的倾轧，政权摇摇欲坠。退居台湾后，大陆相对强大的国防力量又构成其心腹之患。为了“社会稳定”，他自然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对立面，把对巩固自己政权有用的人物努力团结到身边来。毕竟，那些随他到了台湾的人，表象上而言，都应该是些跟他比跟他的对手——共产党更显亲近的人。

坦率地说，我们过去对蒋介石的评价似有不少偏颇之处，说老蒋是个独裁者，是无疑的。事实上，蒋介石对涉嫌“赤化”的知识分子并不忍耐、宽容，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的喋血，也无法理解鲁迅被列入暗杀名单了。不过，老蒋对胡适、傅斯年等同路者的忍耐、宽容，不愿搞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确实影响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相反，在大陆，最终未能逃脱政治运动命运惩罚的许多知识分子，诸如熊十力之类，就让人难免不扼腕叹息了许多。

新旧中国更迭之际，熊十力的不少亲友或赴美国或去港台，而他却留在了大陆。1949年，经毛泽东同意，董必武和郭沫若联名电邀他北上。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前海大金丝胡同的一所小四合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

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

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但孤高自傲的熊十力即使到了北京也是个性十足。郭沫若曾安排熊十力到社科院做学术研究，熊却要求回到北京大学，申明他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观点，希望继续从事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

共产党建政初期，一些知书识礼的学问者面对改朝换代的新政体几乎只有顺势思维时，熊十力却不然。中国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话说的毫不客气。一次，熊十力曾和他的弟子杨玉清谈到，“中国哲学会要我作委员，我和他们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的！’”其个性和固执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尽管做出这样的申明，采取这样的态度，熊十力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仍受到共产党的尊重，党和国家领导没有勉强他改弦更张。有关部门还拨出专款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他也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0年，他曾致函毛泽东，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恢复三所民间学院，请中央或地方政府资助。毛泽东回函：“十力先生：四月九日长函读悉，谨致谢意。”毛泽东看似避而不答熊十力的实质问题，实则也是一种婉转而又清晰的答复。坦率地说，在当时那样的时代，作为一介学者，熊先生的某些要求的确有些“不识时务”。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难免不从更高层面的宏观角度统筹关照全国的问题，自然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不过，毛泽东是很懂得熊十力这样人的个性，懂得他的能量的。因此，毛泽东给予了熊十力足够的尊敬。熟悉中国历史，推崇唐太宗的毛泽东当然知其“其言若是，是其忠也，其言若非，是其狂也。忠不可仇，狂不足较……”的箴言。尽管熊先生的建议在当时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还无法被采纳，但毛泽东还不忘派人前往关照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经毛主席特别批准，田汉五十年代出访印度时，还特别带上熊十力的《原儒》等著作，作为学术交流之用，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毛泽东对熊十力的礼遇。

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也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年底移居上海。在上海，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他先说明，我保证“三到”（开幕、闭幕、照像），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1964年，熊十力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还因走错门，进了毛泽东的房间，被毛泽东留下聊了一阵。会议中，聆听周恩来总理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熊十力在宾馆认真研读，尤其对《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一段独有发挥，还写下了心得，请董必武转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郭沫若。他们阅后甚为称赞，毛主席还要周总理送他线装大字本《毛泽东选集》一套和一些马列著作。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触及到熊十力，在知识分子中这是很罕见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熊十力的很多著作仍然存在着对唯物论的批判，他也难免不被当做“反动复古主义”而被人远离，以致原来喜欢论学交友的很多人，逐渐登门稀少，老人不免感到孤独。他曾对杨玉清说：“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问题，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

对于自己一生之个性，之信仰，之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文革”开始后，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那些日子里，他曾感到孤独和迷茫，在无限寂寥的暮年，熊十力感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间学之青年，后顾茫茫……不过，即使如此，这位现代中国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寄望未来：“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

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

性情中人毛泽东与梁漱溟的真情碰撞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早在 1938 年 1 月梁漱溟赴延安专程拜访毛泽东时就开始了。8 年之后，即 1946 年 6 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此时他已是中国民盟总部常务委员、秘书长了。当时，日本投降已逾半年，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已从外敌入侵转为能否协商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梁漱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一些想法，但苦于无人协商，也没有什么把握。他想到了中共，想到了毛泽东，遂决定到延安一吐为快。而且，还有他关于个人的一事。

还是 1946 年 1 月，他作为民盟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历时 20 多天，通过五项协议。即：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的协议；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他预料如果这些协议得到实施，他将参加政府工作。但他的本意并不在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从政，且望退出政治，而致力于言论。他自己认为，唯此才更有利于阐明自己对中国的意见。此一想法，他曾于 1 月份给毛泽东写信，由周恩来转呈，作了说明。而毛泽东则回信说，参与现实政治和发表言论可以得兼，何须退出而后才发言。梁漱溟认为毛泽东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除在报上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作说明之外，这次还要去延安当面说明。

梁漱溟与毛泽东还有旧缘于前。1918 年和 1919 年，青年毛泽东两度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当时，梁漱溟已是北大教授，他们在杨昌济家曾多次晤面。

第二次到延安的梁漱溟依然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然而，毛泽东并未接受他的意见，末了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是中间偏左的，希望你今后继续中间偏左。”以后，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找十几位领导人，听他陈述个人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意见。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十多位中

共高级领导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听他陈述自己的见解、主张。等他洋洋洒洒说完后，唯朱德说了一句：“此或是30年以后的事吧。”其余中共领导均无一言。

至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梁漱溟于1月6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再次重申他于1946年1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表明不想从政的愿望和理由。这封信再一次反映出梁漱溟那种知识分子个性十足的独立意识，反映出他的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之间明显的距离，以及他对关于中国政治前途的另一种思考的努力。虽然毛泽东仍希望在“求大同存小异”原则的基础上团结梁漱溟，使之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建设新中国尽力，但后来的结果却与他的愿望越来越远。后来，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见于北京中南海。那时，毛泽东刚从莫斯科返京，彼此寒暄几句后，毛泽东便问：“梁先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漱溟答：“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算是中国的古训吧。”毛泽东摆摆手，笑道：“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易啊！”接着，讲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并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随后，毛泽东真诚地说：“梁先生这次到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这一问让梁漱溟多少有些为难，说不同意，怕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又违背他当时的真实思想。他考虑片刻，答道：“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一些吗？”他的回答，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毛泽东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不过，并未因此而形成僵局。毛泽东很快又转过话题，与他古今中外地扯起来。

1951年10月，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过去我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行动上有所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他在这里所指的错与对，就是对于中国社会

的认识，也就是该不该以阶级斗争求得问题的解决。这正是 1938 年他与毛泽东通宵辩论的问题。现在，他承认：“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自己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这期间，毛泽东曾问起过他的住房及生活情况，他总是表示没有困难。以后，毛泽东了解到他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住房不宽裕，又有诸多不便时，便把他安排到颐和园石舫附近的一所四合院里。随后，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梁漱溟作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我自己》的发言。不过，梁漱溟自从 1953 年 9 月 11 日在政协发言受到批判之后，便和毛泽东再无任何直接接触。而毛泽东和梁漱溟的激烈争吵也成为后世的一段憾事。

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冲突时曾表示，尽管与梁漱溟有这么大的分歧，但依然建议不要开除梁漱溟的政协委员。梁漱溟意气用事表示当不当政协委员无所谓。所以当此事告一段落，梁漱溟即致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及秘书长李维汉，请假在家敬候处理，对于各种集会均不去出席，并请政协安排机会由他当面检讨。李维汉稍后有回信，表示某些通知和请帖，全国政协照送不误，至于出席与否，随梁漱溟自己决定。至于梁漱溟自请当众检讨一层，李维汉则嘱民盟中央口头答复暂缓。

在往昔几乎所有讨论梁漱溟的文章中，无一例外张扬他敢于与毛泽东翻脸的所谓“骨气”，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仅仅经过几天时间，梁漱溟便在其儿子、友人的开导下写了份检讨，请全国政协转毛泽东。他破天荒地检讨自己的不足乃至问题，发自内心承认自己错了。他再也没有坚持什么“骨气”与“正义”，从此走上了与共产党，特别是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心同德的心路历程，所以他虽然在此后的岁月中被“冷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张扬自己而已。

梁漱溟之所以决定写那封“检讨书”，跟大儿子梁培宽的开导不无关系。面对自己充满学究味道的父亲，儿子的开导好像更切合实际。

梁培宽为乃父分析道：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行须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恐怕也有问题。几年来，你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你应该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泽东认为你有恶意，便不足怪。毛泽东不能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这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在反省与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的争论时，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错了。那么错在何处呢？梁漱溟写道：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不对。自己在1949年前不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由来已久，当中共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打败国民党，重建全国统一政权后，自己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较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做“倔犟精神”，当做“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犟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梁漱溟还认识到，他长期以来对中共只是同情其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但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加以反驳。因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也有不少人信服，因此每当有左倾朋友批评时，自己总不服气。梁漱溟承认，

这就是他 1953 年 9 月 18 日与毛泽东顶撞的思想根源。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梁漱溟当时还自认为和毛泽东相交已久，要是从当年在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家见面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难同当，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梁漱溟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泽东是缔造中国共产党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梁漱溟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泽东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泽东公开争吵，是要引起人们公愤的。因此过去从来不愿认错的梁漱溟这次彻底被制服了，心甘情愿地表示：“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从道理讲，回顾我 1953 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客观地说，梁漱溟的这些检讨是真诚的，甚至在 30 余年后，梁漱溟已是 95 岁高龄的老人，当他回想起半个世纪前，即 1938 年春天那些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泽东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情形，仍对毛泽东流露出始终如一的崇敬——“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当有人问他，能否实事求是地对 1953 年那段历史公案做一回顾时，他说了下面一些话：“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件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如此有些无可奈何的说法虽让人嗟吁，却也不失公正。事实上，作为民主党派的重要一员，梁漱溟当然是不可能做到单纯的“个人行为”和纯粹的“不参与政治”的，否则，他也就不会和毛泽东争吵的核心也逃不脱政治问题的范畴了。在那样一个新旧过渡的时期，尽管留在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给予了新中国的诞生无限的期望，但他们和那些共产党人之间无论在信仰还是信念，抑或是在国家的未来发展脉络及治理方法上都还存有这样那样的差别的。以梁漱溟而言，他们的身上还带有某种程度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念上的清高和自负。就像陶渊明一样，大儒、大智、大隐，但最后的命运却是穷困得饿死一样。这无疑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种更呈个性化的价值观念有关。从早期的伯夷叔齐到后来的熊十力、陈寅恪都有意无意地彰显了这一个性。但是，当这一个性面对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面前时，它的坚韧和执着以及这种坚韧和执着中透视出来的强劲的清高和自负，还是应该和现实做适当的调和的。也即，毕竟你面前的是个不仅仅需要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展示其威望和权力的领导者，而是一个永远需要从全面的宏观的高度观照中国，观照世界的领袖襟怀的伟人。而这种宏观高度和领袖襟怀无疑是梁漱溟、熊十力之类难以理解和承受的。这就像陈寅恪要求毛泽东给他写保证书一样，牛则牛矣，真则真也，诚也诚也，惟不可行。任何的事情离开了可行，也就失去应用的价值，显得迂腐和荒谬了。

不过，通过梁漱溟和毛泽东这一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千载难逢的伟人的另一面。伟人，终究也是人，个性和血性，甚至率性不仅仅专属于知识分子，何况是毛泽东那样一个本来就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大文人呢？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至少在阶级斗争这一观点上，梁漱溟老先生并没有错。新中国建立后，如果毛泽东的头脑中不再有那么深刻的阶级斗争意识，不再无休止地强调和大搞阶级斗争，那么中国也不会有“文革”那样的悲剧，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以及他留在世间和历史上的美名要比现在光耀得多。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终究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人的错误，还是那句该理解的话，何况他身处的还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意识的体制呢？

这桩公案发生后，梁漱溟的两位老朋友李济深、张澜深为梁漱溟的困境和前途担忧。因而二人商定联名致信毛泽东，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继则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与为人，希望毛泽东能看到梁漱溟独特的坦率、耿直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看过此信，一直没有正面答复李、张二人，但在实际行动上，即梁漱溟后来免受指责和批判上看，毛泽东明显答应了李、张的请求。此后，梁漱溟曾不断以不同方式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示好。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此后数十年间再也无缘像先前那样与毛泽东当面侃侃而谈，献计献策。他的政治地位虽然没有太大变动，但基本上已经边缘化了。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与“文革”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之后，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毛泽东在这里再次想到了梁漱溟，无疑说明，即便1953年

之后，毛与梁中断了见面长谈，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并没有忘记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充满异常明了的政治性，蕴含着多层意义，又充满着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本能中强烈的人情味。

之所以说是简历，是因为毛泽东的国学活动就本书而言，囊括任何的事例都不过是其丰富多彩的过程中凤毛麟角的一小部分，本书也只能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来论述。只要能在国学大师这一概念上给读者某种清晰的启迪和认可，也就达到了作者的目的。而作者也坚信，只要有了这种启迪和认可，它就必然能转化为坚定的信念，并为公众所熟知，所坚信。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所致开幕词中就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一讲话反映出作为一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至少从认识上讲，已较快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观上，而这一转换的过程，无疑与他作为一个政治伟人和文化大师合二为一的精神底蕴，有着必然的联系。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包括文化在内的建设，既是毛泽东的愿望和期望，也是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而，毛泽东的文化观在建国后前十七年基本上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观点，坚持了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及构建模式，保持了正确的指导方向及较健康的文化心态的。但是，恰恰由于毛泽东本人具备的政治伟人和文化大师这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所具备的独特身份及突出的作用，他的文化观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难免不产生双重的作用，这其中不仅有选择正确、创新上的积极影响，也有偏差、负面的消极影响。而社会主义进程越是向前，毛泽东没有完整实践体系的文化观越易显现出两重性或多重性，时而分别地，时而交替地或交叉地影响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局面。客观地说，就探索或走出一条相对正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道路而言，毛泽东并没有成功。建

国初期的“十七年”，他的贡献、功绩很大，但失误或过失也很大。也正是因为这些失误和过时的存在和积累，最终造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悲剧。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一个新的政党带着一种新的，但是却缺乏实践的理论，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淫的国度里，大范围、大规模地开始实践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终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一个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政党，执掌起一个近五亿人口的贫困国家，身处于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形态，又面临着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如狼似虎般的封锁、绞杀和颠覆，在文化领域中产生些不被后世理解的做法，我们还是应该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应对，尤其是应该以历史观的角度去解析当时，即便是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噩梦般的事情，倘若我们不以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看待的话，我们也是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的——毕竟，那一代领导者，尤其是毛泽东发动那一场“灾难”时，是怀抱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愿望的。再者，从时间概念上讲，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短暂一瞬。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苛求毛泽东——即便是一个伟人，在那么短的社会实践和时间内，把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非常沉重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快速完成。那要么是强人所难，要么是异想天开。

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社会环境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却尽自己在那样一种环境中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为那样一个文化环境的创造和构建，鞠躬尽瘁地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其中，大到国家文化方针的制定，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机制的建立，文化人的面对；小到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首诗词的刊登和校对……这其中，毛泽东这个伟大的政治伟人更是殚精竭虑、事必躬亲地做了本不该他这个领袖人物做的事情。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恰恰是毛泽东当初做了这些细微到极致的事情，才让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仍不免为之敬仰，为之感动；让我们今天面对“国学大师”这样一个称号时，有了无法不争取的理由。

如今的时代，爱毛泽东的人有，恨毛泽东的人也有。

但，爱毛泽东，你要了解毛泽东；不爱毛泽东，你更要了解毛泽东。

只有了解了毛泽东，你的爱才会更真挚。

只有了解了毛泽东，你的恨才不会那么无缘无故……

第四章 毛泽东国学活动简历

第一节 学富五车的学问大家

嗜书如命的毛泽东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变的大事。很难想象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哪怕是随手拾来的废纸，只要上面有文字，便能立刻吸引住他。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随便翻几页，你便会发现一个特点，几乎无信不涉及书，或送书，或要书，或谈书，几十年如一日。

●关于找书——1943年12月20日《致胡乔木》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关于借书——1964年9月9日《致××》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看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毛泽东

●关于买书——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刘鼎》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

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毛泽东

●关于读书——1959年12月30日给李讷的信

病好了没有？想你。

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修订第三版下册）。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感冒。

父亲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勤奋好学，嗜书如命，即使战争年代，他也总是想方设法弄书。而在革命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自然更有条件搜集图书，从事书籍方面的基本建设。

毛泽东寓所菊香书屋是一座18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这里触目所及几乎被书所占领。据称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就有藏书96300余册。但是，即使有了这么丰富可观的个人藏书，仍然未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学无止境的他还觉得不够，时不时地向图书馆，向一些藏书大户借阅。比如向章士钊借过《智囊》线装书，向郭沫若借过《随园诗话》等，还办了个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从藏书范围看，毛泽东的数万册藏书包括经、史、子、集线装书和中外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各种门类的主要图书，其中他最爱读的历史书籍占有较大比重。从《尚书》《春秋》《左传》《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輿纪要》《清史稿》到《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十六国春秋》《战国策》《东观汉记》等，从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考订，到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

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等，都有收藏。既有正史、野史、稗史，又有各种历史演义。另外，毛泽东还阅读过不少地理、地方志一类的书籍。如：《读史方舆纪要》《华阳国志》，以及省志、县志等。今人史著，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也是经常放在手头，随时取来选读的。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一个国学大师都是读书大师，毛泽东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汗牛充栋、才高八斗，以致博古通今、满腹经纶也就不在话下了。

广收博览，这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基本特点。1957年10月，在给秘书林克写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十分爱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但是，他也十分喜欢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1958年9月，张治中同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在行进的列车上，张治中发现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他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毛泽东不仅爱看正规的理论书籍、学术著作，有时还很爱看些闲书，如有关楹联的书、笑话，古人写的随笔、小说。他甚至还去研读宗教经典，如《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毛泽东读书就像他打仗一样，知道如何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也喜读马列、哲学。事实上，所谓博览总是相对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像一些外国文学，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名著外，毛泽东读的就比较少。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经济管理，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也读的比较少。

这里有一个书目，是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是从逢先知先生的笔记本里照录下来的，从中可见毛泽东博览群书之一斑。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集》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毛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帖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

这不是搬家，是出门时准备看的书。

全中国，全世界，政治家也好，文人学者.....尤其是国学大师也罢，谁如此？谁能如此？如此博大、如此精深？如此一以贯之、习以为常？

如此如此，如此还不够吗？

第二节 国学信仰之毛泽东与《经史百家杂钞》

其实，说到“国学”一词，早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即他在湖南一师就学的时候，就是一位对国学深为了解，颇有见地，并大为推崇的知识青年了。而这也注定了他最终成为国学大师，或者必然成为国学大师的底蕴，这从他熟读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便可找到答案。

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句话现在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独服曾文正”，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嗜读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对于曾国藩的著作，可以说毛泽东是遍读了的。在这些读过的曾氏著作中，《经史百家杂钞》是毛泽东相当钟情，甚为推崇的一部书。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囊括经、史、子、集四部精华的优秀的古文选本，是一部研习国学的入门书。毛泽东推崇这部书的意见，集中反映在前面提到的他写给同学萧子升的那封信里所云的“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中。可见，那时的毛泽东，对国学的了解和认识很清晰，也很明确——所谓“国学”，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大体说来，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包含的学问。而要弄通国学，毛泽东认为必须先从研习国学常识入手（“早通”就是先弄通的意思）；而要研习国学，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选择入门书。毛泽东提出了这种书的标准，即：在体式上，必须是包孕、萃集许多古籍的综合性书籍；在内容上，必须包括万事万物、方方面面。毛泽东做了个比喻，说这样的书，犹如支配树枝的树干、统帅士卒的将领，是有着提纲挈领的功能的。

毛泽东在论述了一番择书的重要性及择书标准之后，便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入门书的名字——《经史百家杂钞》。

《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作为选家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子，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的、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可谓已经把从古时到清代的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精华都囊括其中了。曾国藩在教

子书中推荐的一些古书，《杂钞》不仅选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了某一部类，使读者不仅便于集中阅读，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可以说，《曾国藩家书》之教子书只是零散地向子女、向世人推荐了一些国学读物，而《经史百家杂钞》则是曾国藩向世人（也包括家人）推荐的一部有系统的国学读本。

在清代曾国藩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一部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最重要的创意，是在《类纂》的三目——义理、词章、考据之外，又增加了一目——“经济”，从而根本改变了《类纂》的狭隘眼界。此所谓“经济”，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而是指“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即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类纂》来，《杂钞》的实用价值无疑是远超其上的。

毛泽东对《杂钞》的这一优点评价很高，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又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包含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曾国藩与《类纂》的编者姚鼐在编书眼光上有很大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主要是个政治家，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姚鼐则主要用的是辞章家的眼光。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杂钞》，说《杂钞》比《类纂》好，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和取舍二书。

《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由于《杂钞》的部头较大，定价较高，为了适应一

般贫寒士子的阅读要求，一些书坊还出了《杂钞》的简编本。曾国藩曾经手录这部简编本，送给友人。

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经史百家杂钞》无疑在毛泽东的国学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生过重要的作用，无疑是毛泽东的思想土壤之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细读《杂钞》，可以发现，“毛选”四卷中的那些典故，有许多就包含在《杂钞》中。由此，更可以肯定，毛泽东之所以对那些典故极为熟悉，能够信手拈来，无疑与他年轻时熟读过《杂钞》有直接关系。

怎样阅读《经史百家杂钞》这部书？毛泽东曾经从“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为目的”的角度向萧子升介绍了读此书的方法：“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简单说来，这种方法就是：先读《经史百家杂钞》中的一篇，再读此篇所在的原书，读原书时要细读若干篇，然后及于原书全体。如先读《杂钞》中的《伯夷列传》，再读《史记》中的其他若干列传，然后及于《史记》全书，如此，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当代近代史专家刘大年，曾在一次专家聚会上，边翻阅着《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边深有感触地说：历史学家学的史书不比毛泽东少，但是却无法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带着他固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审读历史。他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而注意在大量史料中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独到的精辟见解。这就是毛泽东特色的读史。刘大年先生说的“毛泽东特色的读史”这句话的确很精彩，它一语道出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史眼和哲思所在。这史眼和哲思，即是毛泽东读史超越其他读者，包括一些所谓的史学家们的识见所在。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由于后来发生的“文革”的影响，毛泽东生平中几次有影响的学术活动无非是这么几项，且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大多都是负面性的，即：1950年批判《清宫秘史》，指《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1951年5月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1953年9月发表了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谈话；1954年10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继而，全国许多报刊陆续发表文章，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以及胡适的唯心论进行了批判；1955年1月毛泽东把胡风的“意见书”公开发表，展开批判……有句话叫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事实上，这些只是毛泽东生平中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一些政策和方针性的事情。毛泽东一生戎马倥偬，时刻于政治革命与政治国事之大事外，仍不忘修史著述、潜心学术，其在中国国学研究领域所做的有益的贡献有目共睹，我们只要大致厘清就不难发现，他老人家还有着这样一处另外的世界，在这片世界中，他竟是那样地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喟其皓首穷经、慧眼识真、潜心钻研、锱铢必较不仅名副其实，而且恰如其分。

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也是个特异、奇才的人物，因此，他可以集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诗人、国学泰斗于一身，或许，也只有毛泽东有这个能耐！

第三节 激扬文字解析二十四史

毛泽东酷爱历史，娴熟历史，善于运用历史的经验分析中国的现实。而当我们展读他在二十四史上所作的札记和批注圈画时，他的超人的精勤，沉潜于史籍海洋中的致志专诚，又生动而清晰地告诉人们他是怎样一位卓尔不群的学者。

菊香书屋的藏书中有一部清朝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二十四史》，这是1952年购置的。毛泽东对这部史书圈划批注得最多，十分爱读。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二十四史》总计 3259 卷，线装 850 册，约 4000 万字，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下迄明末的长达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要想真正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来龙去脉，要想深入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要想查询和熟悉历史人物的风云事变，要想弄明白历史上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都能从中获得认识。《二十四史》中的每一篇，毛泽东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他不仅全部通读了一遍，而且重点部分，他还两遍、三遍、四遍地不断反复阅读，尤其是“纪”和“传”部分，他读得最多，说不清读了多少遍。有许多重要的“传”和“纪”，毛泽东都作了批注、圈点、标点、断句，或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有的还改了书中的错别字。许多册的封面磨破了，装订线也磨断了，画满了圈圈点点，批注得密密麻麻，可见阅读的遍数之多。他读书有个习惯，每读一遍，就在书的封面上画个圆圈。因此，这些史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的笔画的许多圆圈。还有些史册的封面上，写着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的目录。

1975 年，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很重了，连写字都很困难了，但他仍然在阅读这部《二十四史》。例如他读《晋书》时，在其中三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一九七五，八”，在五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这些笔迹的笔画虽然有些颤抖，却十分清晰，这是他逝世前亲笔写下的读史记录。这时，毛泽东不仅体弱多病，而且由于眼睛患老年性白内障开刀不久，视力极差，阅读十分吃力。医生劝他暂停读书，他根本不听，只好为他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单腿眼镜：左侧卧看书时，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卧看书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以顽强的毅力读完了以上几册《晋书》。同年，除读《晋书》外，毛泽东还热衷于《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等杂志，还提出给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在他去世的那年，他还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记录，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他去世前两周要的宋朝人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

毛泽东就是这样以顽强的毅力在阅读史书，其情其景，确实令人感动！

毛泽东不但自己阅读《二十四史》，而且还常常批给其他领导同志阅读。例如，1965年，毛泽东在读《后汉书》的《黄琼传》《李固传》时，认为很值得大家一读，便立即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各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毛泽东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其次，他认为：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

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毛泽东的谈话，以客观、科学的态度道出了《二十四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它“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讲他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角度的：一、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二、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毛泽东读史书，喜读人物传记，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不仅反复读传记正文，而且连注文也一一核阅，有时还把注中文字，提写到正文有关的地方。如《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文中写刘秀“性勤于稼穡”（句子下面，毛泽东画了圈）。刘秀“避吏新野”（兄伯升宾客杀人，刘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邓晨家中）时，值“南阳荒饥”，“因卖谷于宛”。毛泽东在这里特地把注家李贤转引自《东观记》中的“而上田独收”的一句注文，移写过来，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像这类摘出注文，以突出传主的某一特色的地方，书中并非仅见。这种考据、校勘性的工作，已完全学术化、职业化得是一个皓首穷颜的国学研究者的工作内容了，王国维、陈寅恪不过如此。

凡读过《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一书的人，都可以从书里，从点评中，从那些字里行间中了解毛泽东，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恢弘的历史感念，他的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以极其广阔的历史视野，把研究现状，研究历史与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现实的历史走向发展的三个条件，彰显历代政治得失，观察现实历史运动，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将大量浩瀚的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思人之不敢思，道人之所不及，其史识幽深致远，其见地绝唱独叹。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今天的人们可以从毛泽东评说历史里，从他的学术思维、语言逻辑、情感世界和对中国过去与现实的思考圈点里，学到知识、文化和智慧。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爱读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他批注最多的是《三国志》《晋书》《南史》《新唐书》。毛泽东读史，但对《二十四史》中的几种，或原作或其他注本，还作过比较、批写或评议。他认为：

-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 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颜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上面提到的几种史书及其解析情况，我们不妨在此作个简要介绍：
解析史记

《史记》全书有 130 卷 52 万多字。记载的时间跨度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将近三千年的历史。跟其他多记一朝一代（《南史》《北史》）的诸史相比，《史记》实际是一部通史。而且，它的写法也跟其他 23 种史书有着重要的差别：《史记》

有“秉笔直书”的特点，连班固也承认，“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此批评它实际正是它最大的优点——“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而自《汉书》以下，“为尊者讳”，不能也不敢直笔，常出现如毛泽东所说的“骗人的鬼话”“隐而不书”等“最不符合历史”的情形。

正是由于《史记》不合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标准，因此它在问世后长期被当作“谤书”看待，历两汉、魏晋南北朝，900年间“传者甚微”（《隋书·经籍志》语），惟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儿子裴驷撰成《史记集解》一书，算是填了空白。

毛泽东对《史记》客观公正的写史态度和彪炳千秋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写出来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要另当别论。

他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毛泽东对《史记》里记载的内容十分熟悉，在他的文章或讲话里，经常援引或涉及其中的史实。比如“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说项羽的。《史记》中的项羽给他的印象是“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当真，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建都徐州，位置没选好。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刘邦本是一介平民，早年名声也不太好，但他能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开一代王朝基业，名垂史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人。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都给刘邦以高度评价，认为他是“老粗出人物”“听得进不同意见”。……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解析《汉书》与《后汉书》

《汉书》的最大特点是记事系统而详尽，西汉 200 余年的历史，竟用了 80 万字加以反映，而且一帝一纪，眉目清晰。它的缺点有二：一是思想保守，二是爱用生僻的古字。《后汉书》为人所重的地方，在于它的史料价值。这跟此书一出，原先曾有的记载东汉一朝的史著均没有保存下来，因成独此一家的这种特殊状况有很大关系。就其优劣而言，思想较进步（揭露统治者的黑暗面，同情中下层人物等）、文笔较讲究，是其优胜之处；记事过简、史料不完整，又是不足之处。

“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里，《汉书》正文中，间出唐初颜师古的《汉书注》的内容，随处对正文作注释并加勘误；《后汉书》正文中，间出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后汉书注》的内容，于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多有补充。此二史采取文注合一的形式，方便了读者，也提供了新的有用资料，多为人称道。

毛泽东阅读《汉书》与《后汉书》后，对史文的评价有不统一的地方。比如，他讲后者“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读”，是说惟前面的《光武帝纪》有意思，别的“均无意思”；而又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四这一册的封面上，批了“胜于《前汉书》”的意见。这可能跟阅读的时间、感受不同有关。《后汉书》卷九十一记载了左雄、周举、黄琼三位良臣的事迹，突出了三人敢于纠正朝政之弊，替老百姓说话的高尚品质。卷九十二、卷九十三集中反映了在汉末“党锢之祸”中仗义执言的几位名士（荀淑、陈寔、李固、杜乔等）的事迹。从这三卷里，能够了解汉末政治斗争的具体情形，看出东汉所以衰亡的深刻原因。因此毛泽东说“《后汉书》写得不坏”。《后汉书》的作者范曄当初颇为自负地认为，他写得绝不逊色于《汉书》这部名噪几代的“奇作”，显然有追步前史的意愿。毛泽东也认为，《汉书》“读起来较有兴味”，总体上要比《后汉书》写得好。《后汉书》中“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也是事实，但其中确有“无意思”的篇章，又不容否认。

《汉书》好用古字，好取古义，所以音义问题成了阅读理解中的严重障碍，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后人“以意刊改”的新情况，难读以外，

又添一乱。因此，一要注意注义，二要考订刊误。唐初颜师古的《汉书注》，是人们公认的集大成权威注本。毛泽东阅读的“武英殿本”，以及后来中华书局印行的点校本，都将颜注散置于正文下，对理解原著有很大好处。毛泽东特别强调，颜注重复解释一个字一句话的做法，是为读者着想的。

由于《后汉书》求简，史料就难免不够充实，如何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就成了后人孜孜以求的努力目标。唐章怀太子李贤招集一班人所成《后汉书注》，竟达 100 卷之多，大大地充实了《后汉书》的内容。增加史料，充实内容，要比单纯注释更有价值。所以，毛泽东称赞“李贤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道理就在这里。至于刘攽，他是北宋时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学者，具体负责两汉部分，对两汉的史料相当熟悉。他所著《两汉书刊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虽未附入《后汉》内，但其主要内容反映到《资治通鉴》的汉代部分了。所以，毛泽东顺便提及“刘攽好”，就指此事。

解析《三国志注》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文笔简洁是优点，材料不足成缺点：又因陈寿修前代史，难免会涉及当朝，犯忌涉嫌之处，就得用曲笔回护之辞，所以含糊简略点，比较稳妥。于是，南朝刘宋初年，宋文帝就命史官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第一是隔代补史，不怕犯忌；第二是所见史料有多种，利用起来得心应手。他大概有意要将搜集到的有价值史料尽量充实进去，以利别人作参考。注成以后，宋文帝就十分满意，夸奖裴注“为不朽矣”。当裴松之当初可见的大量史书后世几乎不存，而独见于《三国志注》的引文时，人们更对裴松之的功绩赞不绝口。

裴松之注文，不加考订，不作音义注释，只求增加相关的史料。他征引的书目，多达 200 余种。诸凡补缺、存异、纠误、评论，都为研究三国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三国志》原书只有约 20 万字，而裴注附加的字数为 55 万字左右。所以，要想对三国史深入了解，

裴注成了不可不读的准史书。“武英殿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都将裴注与原著合在一起，文注互见，相得益彰。

毛泽东最爱读《三国志》。他对裴松之大量增加史料的做法，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肯定。他认为，像裴松之这样，“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人爱看”。这是读过《三国志》并从裴注获益的学者们的共同体会。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章炳麟就有这样的体会，谈过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引章太炎为例，赞扬他是“英豪巨眼”，说到了要害处。显然，毛泽东本人在读《三国志》时，也深深地感受到裴注的特殊魅力，所以才会那样首肯不迭。至于说裴注“后来居上”者，恐怕是从三部史书的顺序上立论的，不是从出注先后上说的。因此裴注在前，而颜注、李注在后，要借鉴也是颜师古、李贤从裴松之那里受益才对。

另外，1936年卢弼（1876—1967）撰成一部《三国志集解》，汇集前人之说，又详述己见，号为集大成之作。此书于1957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排印发行。毛泽东读《三国志》，用的就是这个本子。他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卢注引用或自添的内容，有的“有理”（如清人何焯在《陆逊传》里的评论），有的“不确”（如卢弼在《鲁肃传》里注“东城”所在）。这说明毛泽东对三国这段历史十分感兴趣，想从尽可能详细充实的注本中增长知识，而且他读得很仔细，很认真，有的地方点滴不漏，毫不马虎。

解析《内史》和《北史》

这两部史书是由唐初李延寿一人所撰，始撰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完成于显庆四年（659年），用了16年的时间。《南史》80卷，综合记载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历史；《北史》100卷，综合记载了自北魏道武帝始建国至隋亡这233年间的历史，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这六个北朝政权的历史。李延寿撰写二史之前，南朝四部及北朝四部史著均已存世。这八部史书便成为李延寿的史料来源之一，他在吸收引用的同时，对八书作了重新整理，而非照抄。此外，他又从其父亲李大师遗留给他的非官方史料中有所获

益，又独自采寻到大量“杂史”（总数约 1000 多卷）作为新的史料来源，增加了新的内容。唐以后，人们对二史的评价远过于八书，甚至认为只看李延寿的二史而不看八书，也足可以了解那段历史了。因此，二史的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从思想性上看，《南史》《北史》最突出的一点是，倾向南北统一的进步历史观。八书不论旧本还是新作，因为地限南北，彼此互贬，以己为正，将对方称作“蛮”“虏”，很难客观公正。李延寿家族世代居于北方，如果他要以北朝为正统，似乎并不奇怪，但是他明确表示“不取”这种狭隘的立场，对南北偏据政权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史料作了相应的处理。这在当时来讲，实属难得！另外，他在二史中，对南北交兵不予详载。特意剔除了南北战争中双方“夸胜讳败”的虚妄记载。这同样反映出作者倾向统一的进步思想。还有，二史对南北朝史事，直书其事，不用曲笔，不作回护。这也为人称道，为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克服了八书记载中事涉统治者形象而常见扑朔迷离措辞的弊端。

毛泽东阅读南北朝史书，主要看李延寿的二史，特别是《南史》。他对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很赞赏，认为二史写得比《旧唐书》《新唐书》都“更好些”。这是兼顾思想性和写法两个方面的赞誉之评。

解析《旧唐书》与《新唐书》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毛泽东对两部《唐书》优劣作比较的这一看法，仍然主要是从提供史料的意义上说的。《旧唐书》成于先。它虽在剪裁熔铸方面不大用功，可在保存史料方面却值得肯定。《资治通鉴》反映唐代史实，主要从《旧唐书》取材就是最好的证明。

《新唐书》成于后，领衔主修的是宋初鼎鼎有名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当然在行文措辞上是把关的大手笔。“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进新唐书表》语）这一重修后的最大特点，反映出新修之史在表、志方面有新增的史料，可在叙事方面却大加删削的面貌。《旧唐书》190 万字，《新唐书》约 140 万字。为了求简，应该交代的东

西反而交代不清楚了，大量原始史料也不能完整保留，就成了它比不上《旧唐书》的突出弱点。尽管《新唐书》有它的优胜处，可史料不充实，实乃史书大弊。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它不如《旧唐书》“写得好”。

以上介绍，就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对《二十四史》中八部史书以及相关的几种注释本评议优劣得失的具体内容。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史籍的熟悉程度，而这种熟悉倘若没有广博、深厚的国学基础，没有对这种国学基础深入透彻的理解和运用，是不可能如此评点和注释的。可见，毛泽东完全是以行家的眼光，用历史学家的扎实功底，娓娓道出个中委曲，切中肯綮，这无疑也展示了其大师风采的一个侧面。

第四节 毛泽东解析五大名著

毛泽东是研究红学的大师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由于他对《红楼梦》的一系列独具慧眼的解析和品评，又使得他堪称是一位卓越的红学家。

自清以来，中国学术中新添三门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可见红学在中国学术中的地位。对《红楼梦》一书，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它被封建卫道士贬斥为“淫书”，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很多人的极大喜爱。正如鲁迅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评论《红楼梦》，并把《红楼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并不止一次地说，看《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毛泽东还说他“至少读了五遍”，因此可以说，他的评论绝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评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几位著名将领谈起古典小说时，开玩笑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能算中国人。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

关系，中国的缺点和优点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由此可见。

尤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更是一部历史书。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自己已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时，毛泽东接着发挥道：《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他甚至说，“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由于把《红楼梦》作为历史书来读，毛泽东考察了出现这部书的时代背景。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同样是由于把《红楼梦》作为历史书来读，毛泽东对贾府的衰败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过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

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毛泽东不仅读《红楼梦》，对有关《红楼梦》的讨论文章也十分注意。1952年9月，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新建设》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此文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同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皆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毛泽东读了李、蓝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后，于10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文艺界有关同志，信中说：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这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小范围内传达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事情的性质已不单纯是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问题，而是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成了一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成了一场政治运动，讨论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而是波及到了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

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观点之所以不以为然，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这种“自传说”同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种评价与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反差是相当大的。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可见，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迥然不同。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当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从总体上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是毛泽东研究《红楼梦》的一大贡献，而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研究也的确独具新意。1994年10月《新民晚报》曾发表署名马汉的文章，披露了毛泽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本的《红楼梦》第19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尾部，曾写有这样几处批语：

“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相爱，两者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性恣性。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坐八人轿’慰之。”

“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是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在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

从这些批语不难看出，一旦进入具体人物和情节，毛泽东的艺术感觉是相当敏锐的，艺术评判也确有独到之处。

一、独具慧眼的解读与评析

毛泽东对于红学的阐述和解析及其方式、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对当今的文学批评也具有着现实的启迪与借鉴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

1. 独抒己见的心得

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经过深谋远虑的思考而敢于独抒己见地进行决策一样，在《红楼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上，毛泽东也勇于坦陈自己的心得之言。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

●毛泽东于延安时期就说过，“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话虽说得稍嫌绝对了点，但“三部小说”之论却是前无古人的首议。

●毛泽东解决问题善于抓主要矛盾，解读文学作品则强调掌握要点。《红楼梦》的要点就是第四回“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等句所讲的那个“护官符”，也可以说，此乃这部大书的一个“总纲”。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诚可视为是对《红楼梦》之本质特性的深层次的挖掘和揭示。

●与对“护官符”及“总纲”的认为相辅相成的是，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并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尽管，对一部蕴含极其丰厚的名著，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自可有不同的解读，但“阶级斗争说”实可称得上是毛泽东本人的独特之见。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而且可与世界名著媲美，从而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给予极高评价。此一识见，亦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对俞平伯对《红楼梦》一书的定位颇为不满。

●围绕着《红楼梦》，毛泽东对作者的世界观和作品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层次地探索。譬如他讲：“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并进一步分析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倾向，从而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

2. 历史性的审视

《红楼梦》是一部以宝黛的爱情纠葛为情节主线的长篇小说。但它所反映的内容却又绝非“尽是谈情说爱”的，而是有着“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文艺小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全景，告诉我们一个

崩溃着的封建社会是怎样完成它的最后的悲剧的。”也许正是从这一审视点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所以，毛泽东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

3. 比较性研究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也只有在比较中，事物之间的表征和本质才能更其充分地显露出来。毛泽东对于《红楼梦》，则不独能够进行《红楼梦》自身内部的比较、《红楼梦》与其他小说名著之间的比较，而且能够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宏观比较。如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谈到：“《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这就不仅指明了我国第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对于《红楼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且比照出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后者对于前者的超越，诚可谓识见深邃、切中肯綮。而更值得珍视的是，毛泽东眼界宏阔、贯通古今，又能够将《红楼梦》放在更其博远的范围内进行观照和评说。譬如，晚年的毛泽东在看过电影《红与黑》之后对身边工作人员小孟讲：“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毛泽东将中国的《红楼梦》同西方的《红与黑》相联系，还曾戏谑地说过这样的话：“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二、自成一家的解读方式

1. 圈点式解读

直到晚年，毛泽东的身边仍放置着1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以便对照着读。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其中，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增评补图石头记》这两种版本上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

不仅对原著，而且对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圈画得也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这些个道道、问号与圈画，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或者是毛泽东对该著的一个疑问之处，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这种说法的不赞同。他也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充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2. 批注式解读

与圈点式解读多有交叉且关系密切的是，毛泽东在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还采用了“批注式”这样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如在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写下的第一条批语：“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回又有一段批语曰：“‘抢田夺地’、‘民不安生’，是造成‘盗贼蜂起’的原因，非‘盗贼’去‘抢田夺地’。”再如，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末批云：“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起，写得很好，其价值，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一边是宁荣府，一边是小小人家。”

尽管毛泽东亲笔批注过的总计不下五六千字的那套《红楼梦》，由于历经“文革”，现已下落不明甚或不存于世，幸有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先生的手抄毛注《红楼梦》尚存，时至今日，我们仍能通过他那鞭辟入里的批注，了解到他对于《红楼梦》的独特的解读及其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

3. 要点式解读

毛泽东善于抓要点，抓主要矛盾，并善于以其高瞻远瞩的视界来分析和处理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大决策上如此，对《红楼梦》的解读同样如此。

如1946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询问儿子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战斗情况。当岸英回答说，“读过《红楼梦》，但书中的诗词不大好懂”时，毛泽东谆谆教导说：“读《红楼梦》要掌握要点。”并随口念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

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曾不止一次地发表过上述意见。如1954年4月，在去绍兴东湖的途中，和随行的秀才们海阔天空地聊起了《红楼梦》。毛泽东先声夺人，有声有色地朗诵起《红楼梦》护官符词来。诵毕，侧过身，对田家英说：“《红楼梦》我读过几遍。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护官符’是阅读《红楼梦》的一个纲。”1964年8月，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也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更加频繁。其藏书中有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刻本、平装本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且评价极高。据李锐回忆，1958年南宁会议后，他奉召到毛泽东丰泽园住所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稿，上卫生间时，看到一张方凳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线装《红楼梦》。可见毛泽东对此书颇为喜爱，不离左右。

三、以古喻今的大师风采

毛泽东精通《红楼梦》，并善于以古喻今。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也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比喻为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软弱香”，会有目的地向延安送，告诫党员要警惕“软弱香”的坏影响；还将我们的宣传比喻为带刺儿的玫瑰花，自由资产阶级不喜欢，他们只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告诫党员干部在革命中要不怕自由资产阶级带来的麻烦。1941年1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毛泽东把蒋介石集团议和的条件——“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比喻为“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名为和平实要战争”的实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评判国际政治态势时，借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

优势。1963年当时中国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防备苏联，针对有人担心美苏合作对我不利的估计，毛泽东说：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此来形容美、苏两个大国的现状。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休息期间，周恩来将载涛介绍给毛泽东：“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父。”毛泽东听到介绍同载涛握手，在问过载涛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指着身旁的周恩来，风趣地对载涛说：“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的，有什么事可以找他。”

1956年11月，毛泽东于中共八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谈到高岗反党集团时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两次引用了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要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向共产党提出批判建议，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引用《红楼梦》里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说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苦战与修整的对立统一，要讲究辩证法的。

毛泽东解析《三国演义》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就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就爱看《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毛泽东一到井冈山，立即带领部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毛泽东读书的嗜好是很

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毛泽东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和关注，同样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不是泛泛讲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和教育大家。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和做报告中常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来说明当时的实际问题。1944年10月毛泽东到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他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度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建国以后，直到60年代，毛泽东还常引用《三国演义》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用他那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独到的语言艺术，把自己置于听的人当中，平等相待，融为一体，因此，每次都能把深刻的道理用平常的言谈表达出来，收到新的效果。

1953年6月3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必须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时，毛泽东向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一段

通俗的故事，把要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的重要道理深入浅出地表达了出来。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人物，其中诸葛亮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也是毛泽东在著作和讲话中常常提到的历史人物之一。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

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三国演义》描写的许多历史故事、战例，差不多都是取材于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就是在此基础上再加工、再创造而成的。

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曾有一段评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

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 37 岁，那时诸葛亮才 30 岁，即比周瑜小 7 岁。”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两本书他晚年都读过多遍。在他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两部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把它当作一部书来读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演义”，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

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看”到了哲学、战争、政治、组织、外交、经济、人生等多个侧面。如在《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两句话中，他看到了“符合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用以阐述统一战线、党内斗争、战争与和平的转化等政治问题；在周瑜和诸葛亮引用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俗谚中，他读出了生与死、祸与福、忧患与安乐、必然与偶然的对立统一……《三国演义》是一部活的兵法、一部形象的战争史，毛泽东宣称它是自己读过的“一本军事教科书”，在指挥战斗、指导战争的 20 余年时间里，“三国智慧”时常萦绕于毛泽东的大脑。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即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毛泽东谈组织路线，论人才使用，批判论资排辈旧观念，提倡“老粗”读书自学成才，赞赏杰出人才的作为，号召“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常举《三国演义》中的例子为佐证。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能团结人，孙权敢用年轻干部挂帅，袁绍不会用将，诸葛亮用错了关羽和马谡，三国都有知识分子……这些正反经验都被毛泽东卓有成效地运用到了实践中去。《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战争小说，同时也是关注人的价值的人生小说，毛泽东臧否三国人物达 30 人：曹操的政治风度、刘备的仁德爱民、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赵云的浑身是胆……无论肯定的人物，还是否定的人物，毛泽东论及他们的人品、人格、人气等各个方面，每方面都可“以人为镜”，都给人生以启迪。

毛泽东解析《金瓶梅》

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酷爱读书，喜发议论，他曾先后5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到：“《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

《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第五次是在 1962 年。毛泽东 1962 年 8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古脑倾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乱像。把那些男男女女们的皮里阳秋来了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 16 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毛泽东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并多次评价之，全在于《金瓶梅》的写实性，它是我国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内容显然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而《金瓶梅》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唯其细

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就像明史专家吴晗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撰文指出的那样：《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毛泽东解析《水浒传》

《水浒传》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历朝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感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看这些小说时的感触，他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

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者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因此，毛泽东对斯诺谈到这些小说的时候，自然要强调：“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说《水浒》吧，在好些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反映在他后来的言行中的例子很多。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

在论述防止主观片面性时，就想到《水浒》中有唯物辩证法。《矛盾论》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

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这讲的就是《水浒》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回的那一大段。后来有人从毛泽东的这一提示中受到启发，将这“三打祝家庄”编成了京剧剧本。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中，谈到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不要害怕刺激了敌人时，《水浒》故事又被作为生动的比喻。毛泽东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时，毛泽东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拼命精神。”讲到现在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又讲到水嬉戏：“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水浒》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共产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

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劫的。毛泽东此刻引用生辰纲系一种比喻，意指不义之财。非记忆有误，认为是宋江劫了生辰纲）。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毛泽东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有着《水浒》等书“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在请人读《水浒》给他听时，曾发表过一些独特的意见。这些意见经人筛选，曾以“语录”的方式在报纸上刊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 108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同人们所熟知的他历来对《水浒》的肯定评价完全不同。于是当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评论《水浒》、斥责宋江投降派的热潮。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眼睛不好了，请人为他一读少年时代就酷爱的书，读书的人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于是谈起对书中一些人物、故事的看法，其中有的因感时而发，如“反面教材”，这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合实际的忧虑有关。由于不能亲见亲知外界的种种事实真相，发表些大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本来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奇特的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利用这些来制造谰言，兴风作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只不过是借题做文章，并不是什么要认真评价《水浒》。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只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传》的一种评论。

《水浒传》的版本，大致有三个源流。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

十回本，金圣叹评点。这三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祖本？说法很不一致。以前，人们大抵把一百卷本作祖本，除梁山聚义的故事外，还有征方腊的内容。而余象斗刻本中，征辽、征王庆、征田虎的内容，被认为是后加的。金圣叹评点本，尽管自称是得了古本，却仍被认为是“腰斩”了《水浒》。不过，近年来有人考订，以为七十回本确是祖本，以后“征四寇”的内容均系后人所加，是歪曲了这部歌颂造反英雄的小说。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毛泽东批评《水浒》写了投降派，以及宋江投降后去征方腊，则只能看作对续貂者的不满了。

毛泽东解析《西游记》

毛泽东爱读《西游记》，更喜爱孙悟空这个敢于冲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闹天宫，敢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神话人物。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书信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常常谈到孙悟空，有时候把他作为正面形象来宣扬，有时候又把他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每一次引用，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体现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故事，说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和诗词当中，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是很多的，但引用最多的或者说他最有兴趣的大概就要数这个齐天大圣了。

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泽东认为，“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这里，毛泽东无疑是把孙悟空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而1945年10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去见陈立夫，1945年10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他先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

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门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又作为正面人物来宣扬了。

《西游记》第6回中有个故事，说孙悟空有72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还能变为各种各样人。有一次，他和天上的皇帝——玉皇大帝的战将二郎神相遇，孙悟空变成一物，二郎神即变降他的一物，双方变来变去，最后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杆，结果还是被二郎神识破了：“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有好几次在讲话当中说到这个故事。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在谈到梁漱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到了6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形象和风采更是称赞不已，激情“欢呼”。1961年11月17日，写下的著名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到了1964年1月，在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借孙悟空这个人物故事，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考作了进一步的表露。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晚年不仅爱读《西游记》，而且对《西游记》的研究也非常关心。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研究西游记的专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对《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毛泽东也是一一精心研读，孜孜探求。因而，《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也成为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仅存的一部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西游记》研究专著。这部论文集，共收研究论文17篇，约13.5万字。全部文章，毛泽东都曾用心阅读过，一些篇章在阅读的时候还写下了批注，划上了密密麻麻的道道和圈圈。

卷首篇是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翻开这本论文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在张天翼文章篇首写下的“1954年，2月，人民文学”一行非常醒目的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意思是说，张天翼的这篇论文原载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标题的左边，毛泽东用黑铅笔连划了三个大圈，格外引人注目。“张天翼”三字下面还划两条横道。全文从头到尾几乎逐段逐句都划上了横道、浪线和圆圈。圈划的种种符号表明，张天翼的这篇文章，毛泽东是逐字逐句阅读的，看得很细，而且是十分用心的。张文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对张天翼的分析和看法，毛泽东似乎很有兴趣，在阅读的时候又圈又划。在谈到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评价时，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以前，还没有见过哪一家写幻想的神魔故事能写得像这么生动，这么艳异多彩，而又这么亲切，这么吸引我们的。”毛泽东似乎对这段话有同感，或者似乎对这段话比较欣赏，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每句话下面，他都用了黑铅笔划了两条横道。使人一看就知道，他读这段话时是引起一定的思维活动的，是颇有感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现实性和幻想、寓意等等”。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圈划的符号比第一部分还多，还密。在这一部分中，对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看法，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作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

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划上了一条横道。最后的一句“力量不敌而已”划了两条横道。段末还划一个大圈。对这样的专题研究论文，毛泽东都看得这样细，看得这样用心，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西游记》的浓厚兴趣和对《西游记》学术研究是多么地关注和重视。

张天翼这篇文章的后面还有一个附注，共三条，约 2000 字，是用 6 号宋体字排印的。1957 年，毛泽东已经 64 岁，对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6 号字看起来显然是很吃力了，然而，毛泽东如同读正文一样，也还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划上了道道、圈圈。字排得小了，圈划的种种符号就更显得突出了。圈圈划划，密密麻麻，满页皆是道道和圈圈。附注的第二条，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两段：“《法华经》里还写观世音菩萨有时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民间传说里就渐渐使这‘妇女身’固定下来，终于成了一个妇女。在《三教搜神大全》里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说她是一个国王的三公主，因为抗婚，父王要烧死她，而她‘色不变而志愈坚’。她被囚到冷宫里，大家苦劝，她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命斩讫。虽然写她的反抗是为了‘欲了人间事’（要出家），而且那结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于一些奇迹而得救），可是总写出了—一个非常坚决顽强的反抗到底的女性——为民间所喜爱所歌颂的性格。”“就这样，这几乎成了个传统：在民间作品出现的观世音菩萨，总往往是正面人物，而且往往是妇女。就连《西游记》——对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讽刺揶揄，可是对观音就另外一种态度，把她写得可亲近，有的地方还写得很美。”这两段文字，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一一划上了道道或浪线。第二段的末三句，每句下面除划了浪线外，每句末尾还都划了一个圈。附注是与正文有关内容密切相联的，它是对正文有关内容的进一步补充或注释。看了正文，再看附注（有的叫注释），或者把正文和附注联系在一起来看，这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读别的

书如读《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时就是这样。注释的字一般都小于正文的字，对毛泽东来说，看注释当然比看正文吃力。然而，他有时读注释比读正文还仔细，还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文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等受文章整体结构、主题内容和语言文字表述方式方法的限制，所以往往是一笔带过。要使读者知其所以然，作者往往用加注的形式，把有关的人物、事件等补充交待清楚。就如同上述的张天翼在正文第一部分内容中，只写“例如观世音菩萨”几个字，要知道观世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受许多人的欢迎，只有阅读他的附注才能有所了解。毛泽东所以爱读注释的文字，大概这就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童思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在这篇文章的篇首开头处，毛泽东也写了一行批注：“1956年2月，西南文艺”。“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还划了一条浪线。他的意思是说这篇论文原载1956年2月2号《西南文艺》杂志。文后的注“（原载‘西南文艺’一九五六年二月号）”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毛泽东也划了一条浪线，“一九五六年”几个字下面划两条横道，“二月号”三个字下面划一条横道。文前的批注与文尾划的浪线和道道，意思是一样的。标题的左上方，毛泽东还用铅笔划了三个大圈。作者“童思高”名字下划了粗粗的两条横道。非常醒目的三个大圈和两条横道，大概是表明毛泽东一定的心理意向。这部《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收入的17篇论文，毛泽东在篇前写批注和在题目上划三个大圈的只有两篇，一篇是前面说到的张天翼的文章，第二篇就是童思高的。17篇中只有两篇题目划了三个大圈，而这两篇毛泽东看得最仔细，圈划的各种符号也最多。这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重视，也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喜爱和浓厚的兴趣。对这两篇论文，毛泽东在阅读中虽然没有写什么评价和称道的话，但是阅读圈划的具体情形可以反映出这两篇论文在这部论文集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也反映出毛泽东称道这两篇论文的一种心理活动。

阅读圈划的实际表明，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篇论文，很爱读这两篇论文。毛泽东阅读这两篇论文思想上闪动的火花或受到的启示、甚至产生的某种共鸣，都渗透或凝聚在他本人圈划的各种符号当中。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划的种种符号，是他阅读过程中思维活动的轨迹，是他读书实践的记录和反映，它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实践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帮助。

童思高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在论述神魔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统治阶级的作贱人民和妖怪的害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民的大害。”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因此格外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大概是作者的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吧，所以，毛泽东读了这句之后，在“作贱人民”“妖怪的害人”九个字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后两句下面都划了浪线，句末连划了三个大圈，因为不是段末，所以划的三个大圈把后面一句话的前两个字都划进圈里了。可见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是不寻常的。

除了张天翼、童思高两篇论文外，《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萧歌、竞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这篇文章，毛泽东在阅读中也有许多的圈划。作者在谈到吴承恩与《西游记》创作的社会背景时写道：“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何况他又是个失意者呢！他在科举上很不得意。虽然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但并不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毛泽东在读这段话时，除划横道外，在“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这句话旁边还划了一个问号，它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划的唯一的——一个问号。这里作者引用的对吴承恩评价的一段话，出自《天启淮安府志》。这样评价吴承恩，是否与实际相符？大概毛泽东对此有点疑问，所以阅读时就划了一个问号。在谈到吴承恩创作时的思想感情时，作者还引了吴承恩的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延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首诗揭露了豺狼当道

的黑暗局面，表现了作者胸中的愤慨，毛泽东很爱读，每一句下面都划了浪线。接着，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吴承恩，本文作者又引了吴承恩的一首《满江红》词：“穷眼摩挲，知见过，几多兴灭，红尘内，翻翻复复，孰为豪杰？傀儡排场才一出，要知关目须听彻，纵饶君局面十分赢，须防劫！”词中，吴承恩对统治阶级的骄傲、虚伪、昏庸、愚昧，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警告。这首词的后半阙，作者嘲笑那些贪图高官厚禄、封子荫妻的士大夫们：“身渐重，头颅别，手可炙，门庭热。施安排娇面孔，冷如冰铁，尽着机关连夜使，一锹一个黄金穴，被天公赚得鬼般忙，头先雪。”吴承恩的这首《满江红》，毛泽东很喜爱，句句划上了浪线，每一句后面还划一个圈。看得出，这首词，他读得是非常认真的。在《西游记》研究的论文中引用的吴承恩的诗词，毛泽东都非常爱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具有的特殊的兴趣。

第五节 毛泽东最爱不释手的古籍《资治通鉴》

一部书被看了 17 遍，这是本什么书？这样的读者仅仅是读者么？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喜爱的另一本史书。说来很多人可能不信的是，这部书毛泽东竟然从头至尾地通读了 17 遍。

被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的《资治通鉴》，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它是北宋大学士司马光花费 19 年心血撰写成的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贯穿 1362 年历史，是堪与《史记》相媲美的又一创举。全书正文 294 卷，另有《目录》30 卷，《考异》30 卷，合计共 354 卷。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的说法。《论语》是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讨论各种问题的言论集，也是儒家的基本经典。而两册史书，一是《史记》，二是《资治通鉴》。宋英宗曾评价《史记》和《资治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为典籍之总会，册牘（指书籍，因为古代的书写在竹简上，故书籍又称为册牘）之渊林”。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和《资治通鉴》是其他史书所不能比的。这两部书的作者司马迁和司马

光，也被联称为“两司马”。“两司马”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不仅仅是两部史书，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思路，他们对历史的记述给历代统治者增益了许多治国安邦的智慧。大学者梁启超说过：“《资治通鉴》是绝好的皇帝教科书。”诚哉斯言！

毛泽东十分爱读《资治通鉴》这部史料丰富的历史名著，甚至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在丰泽园“菊香书屋”的藏书里，既有《资治通鉴》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50年代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两种版本里，都有毛泽东留下的许多圈点和批注。平时出差视察，毛泽东也将《资治通鉴》带在身边，休息睡觉时床头总放着这部书。

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接着毛泽东把标点《资治通鉴》的任务交给了吴晗。后来，他又向吴晗提起：“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觉得《历代堪舆地图》这部书正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因此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这部书加以改造，按今制绘制印刷。毛泽东便把这件事也交给吴晗来组织。同年十月，由吴晗出面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召集部分史学家，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杨守敬地图委员会，次年又成立校对小组，全书即《资治通鉴》点校本，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过：“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他正是用这种指导思想来读《资治通鉴》的。据毛泽东身旁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由此可见，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老人家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否则，毛泽东也就不会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非浅。”

《资治通鉴》中的“资治”二字隐含着提示，司马光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已经知道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仍受制于某种力量，因此编纂了这部书来“资治”。但是，“资治”毕竟只是方法，真正的历史趋势，不是方法能改变得了的。崇祯吊死在煤山，他难道没有读过《通鉴》？从长远看，历史趋势取决于人民。就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既豪迈又深刻，这才是毛的真正想法。它无疑受到了《通鉴》的影响。正因为持这种观点，毛泽东为被指责为“痞子”的湖南农民大声叫好，毛泽东奋身起来去推翻身上的三座大山，去发动民众，去农村包围城市。想想毛泽东曾对吴晗说的话，“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倒也无需不多几分嗟叹。

第六节 “老”“庄”两部必读的奇书

《老子》（又称《道德经》）和《庄子》这两部书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就读过了。毛泽东读《老子》和《庄子》，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书中的精彩段落和名句，可以信手拈来，并加以引申发挥。

撷取精髓旁征博引的《老子》

《道德经》在世界的发行量，除《圣经》外，是最大的。古今中外解“老”的著作有三千多家。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汉“文景之治”和唐“贞观之治”是用老子之道治国化天下的光辉范例。唐朝的名臣魏征是一个道士；帮助刘邦取天下后，功成名遂身退的张良，从赤松子游；丘处机万里西行劝告成吉思汗等历史故事，以及老子的哲学思想和人

格在现代社会的广泛应用，这都反映了老子学说的无穷妙用和造福于世。

上至高天，纵览广宇，小到细微，切实可行。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给《老子》曾下过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

毛泽东读《老子》，很注意吸取书中的思想精华，并在写作时引用书中的精彩观点和辩证法思想。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泽东引用的老子的这句话，见《老子》七十四章。译成白话便是：民众不怕死，奈何拿死来恐吓他们？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大意是说，人的死亡，是由“天道”掌管的，代替专管杀人的“天道”去杀人，就像代替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伤手的。联系上下文再来读毛泽东引老子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民众不怕死，你拿死来恐吓他们，是徒劳的；二是说，你一定要拿死来恐吓他们，只会适得其反，就像不是木匠的人代替木匠砍木头，是要伤手的，是要受惩罚的。由于在关键之处引用了老子的精辟语句，文章便显得更雄辩，更有气势。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道：“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2000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毛泽东引用老子的这句话见《老子》五十八章。这句话连同前后文是这样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译为白话文就是：“政治宽松，人民就淳朴；政治苛察，人民就狡狴。灾祸啊，幸福就倚傍着它；幸福啊，灾祸就藏伏

在它里面。谁能知道这种转化的终了（是祸还是福）？实在说不准。正的又转变为邪，善的又转变为恶。人们的迷惑，已经好久了。”老子认识到了祸福、正邪、善恶等对立的两方可以互相转化，但对如何探究转化的条件和根据，以及如何预测这些转化，似乎感到迷茫。毛泽东引用《老子》这一章的话，用的是雕琢璞玉的方法，即没有全文征引，而是撷取出了其中的精髓。精髓就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此句是《老子》一书中的许多闪光点之一。

《道德经》的开头，用“恒道”来指称根本规律，说它远在万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万物的母亲。（“万物之始也，万物之母也”）并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以阐明“恒道”：“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有和无相互转化，难和易相互呈现，长和短相互映衬，高和低相互促成，音和声相互应和，前和后相互跟随，事物总是这样相反相成的）。最后二字“恒也”正好照应了“恒道”。所以，根本规律乃指对立统一规律无疑。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毛泽东把列宁的哲学思想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中推向前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看法和《老子》何其相似！不过，这时他仍然更强调“斗争”，他说，“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里，他将继承自列宁的“相对”“绝对”的观点以及《老子》“绝对”“相对”的认识给予了更充分的、更深邃的、更精准的阐述。毕竟，列宁的“相对”“绝对”的区分在《老子》那里是不存在的，而《老子》也没有说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样准确、鲜明的辞句。

几年之后，毛泽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说：“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

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时候的表述和“天无已清，将恐裂；地无已宁，将恐废；神无已灵，将恐歇；谷无已盈，将恐竭；侯王无已贵高，将恐蹶”意思很相像。但是“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之类的说法亦失之武断。应该说事物都是既不纯又纯的，是不纯（多样）和纯（一体）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更在于他明确提出了“设置对立面”的思想，这是前无古人的。这个观点的提出，和毛泽东格外重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马克思、列宁都是如此）和突变是分不开的。而多少忽视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和突变正是《老子》的缺憾。

功底浓厚活学活用的《庄子》

庄子为文汪洋恣肆，其想象力之丰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少有其比。《庄子》一书，“寓真于诞，寓实于玄”，通篇以说寓言、讲故事的形式，阐发玄深的哲学思想。看似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荒诞玄远，其实思想脉络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对《庄子》一书有很透彻的研究。与人交谈，或撰写文章时，可以随时娴熟地征引书中的有关段落，借庄子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为谈话助兴，为文章增色。

年轻时代，毛泽东在《论理学原理批注》中阐发了做事必须排除干扰，集中精力，不为外人所动，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他说：“庄子曰：‘癩痿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有价值者以此。天下之事所以败，所以无价值者以此。”这里引用庄子的话，出自《达生》篇的寓言故事。意思是说，驼背老人在竹竿顶端装上胶状物粘蝉，一下就容易得手，其原因是集中注意力粘住蝉的翅膀。1917年7月，毛泽东与萧子升进行社会考察，行前查阅了《庄子》《老子》及有关县志等，考察途中行至宁乡县沩山寺，与方丈深夜讨论庄子、老子的思想要义，深刻阐述老庄思想辩证法的合理成分，使方丈对毛泽东的学识赞叹不已。

1932年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曾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当有人第一次提出，红军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不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李德以为这段话出自《老子》，其实见于《庄子·养生主》。这段话的大意是：好的庖人一年要换一次刀，因为他用刀割肉；一般的庖人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刀，因为他用刀斩骨头；我的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杀的牛有几千头了，可是刀刃还像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的一样。李德以为，毛泽东背诵的庄子的这段话跟红军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毫不相干。实际上不是不相干，而是他听不懂庄子的这段话，更领悟不了毛泽东背诵庄子这段话的用意。庄子讲了三种庖人：好的、差的、优秀的。好的庖人用刀割肉，不致太伤刀；差的庖人用刀斩骨头，很伤刀；优秀的庖人看准牛的骨节，从骨节的空隙处下刀，就不伤刀。毛泽东引用这番话，似乎是想说明：庖丁解牛，要懂得牛的解剖学；军事指挥员指挥打仗，要懂得战略、战术，要了解敌我形势，知己知彼。只是，李德听不出毛泽东的弦外之音。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上激情地说：“我们中国《庄子》上有两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就是说，凡事物在初始阶段都显得很微小，发展到后来顶点或成熟阶段，就是巨大的了。毛泽东以此来说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必然发展过程，1966年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引过他青年时代作的两句诗：“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诗中“水击三千里”，出自《庄子·逍遥游》，原文为：“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在这里毛泽东借以表达他无所畏惧，通往超前的宏伟抱负。

毛泽东在讲话、行文、书信中，引用《庄子》典故浑化无迹、贴切自然，堪称古为今用的典范。但运用《庄子》典故最多的，还是他

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在毛泽东 50 首诗词中，引用过《庄子》的达 7 首 13 处之多，可以说，对《庄子》的运用，贯穿了毛泽东诗词的全部。1918 年，毛泽东 25 岁，雄姿英发，风华正茂，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引用《庄子》典故两处：“鲲鹏击浪从兹始，我返自崖君去矣”。诗句中的“鲲鹏”“返自崖”即“自崖而返”，分别出于《庄子》的《逍遥游》与《山木》篇。全诗气魄宏大，英气夺人，表现了青年毛泽东出众才华和奋发进取的精神。1965 年毛泽东 72 岁，已进入晚年，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中，上半阙十句，竟有 5 处运用《庄子》典故。有的几乎原句引用，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等，均出自《庄子·逍遥游》。全词抑制不住冲天的气概，表现了毛泽东贯有的“性不好束缚”的本色，以及他那一生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挑战、敢于胜利的人格力量。这首词是我们目前读到的毛泽东最晚的词作。从青年到晚年，时跨半个世纪，可见《庄子》在毛泽东头脑中的深刻烙印及庄子文艺美学对他的影响。

除以上两首诗词外其他引用过《庄子》典故的诗词及诗句为：1925 年《沁园春·长沙》中的“挥斥方遒”，“鱼翔浅底”，1930 年《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等等多处，其中，《逍遥游》引用的最多，前后达 7 处，“鲲鹏”就反复引用 4 处。

《庄子》是部奇妙的书，阔大浩瀚，寄遇遥深，读《庄子》可进入到一个梦幻世界的迷宫，给人一种莫大的享受。毛泽东的书是现代百科全书，无限深奥，又无比通俗。读毛泽东的书使人昂扬奋进，勇敢地面对现实，百折不挠地创造未来，毛泽东和庄子时隔两千多年，处在不同时代，毛泽东如此娴熟地、自然地运用《庄子》的内容为现实服务，说明他对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功力与科学态度。

第七节 毛泽东与奇书《何典》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他在给儿子的信中附上过一张书单，这张书单共列 20 多种书。不仅包括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大众哲学、中国历史教程等，还包括许多大家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小说，如清人钱彩编著的《说岳全传》、晚清黄小配写的《洪秀全演义》、李宝嘉所著的《官场现形记》等。但也有一些书显得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如《子不语》《何典》等。《子不语》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至于《何典》，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共 10 回，12 万字左右。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一抹书香。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才情。《何典》的语言独树一帜，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有的甚至失之油滑，读来却饶有兴味。至于题材构思，更是匠心独运。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着欢天喜地，差点笑断肚肠根。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

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原因就与张南庄有关。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症候严重，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由此也就更见本书之神秘了。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毛泽东虽然强调以工农联盟为主，并不完全否认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作用，同时，他还认为革命或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但在许多场合又毫不掩饰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轻视。早在延安时期，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

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也有不少，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重经验、轻知识的思想倾向。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历史渊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竟产生了知识分子乃“乱世之饭桶”的怪论。《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也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熟读《何典》的毛泽东不仅不会忽略这些文字，而且可能会心一笑。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

《何典》一书是用地道的吴语方言写成的，俚语土言随处可见，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讷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

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张南庄作为一个文人，擅长运用生动的地方语言展开叙事，处处闪耀着民间的智慧。他的风格对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深刻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的确，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知晓一切风雅之奥皆出于谣谚之途，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探讨，发而为文便雅俗共赏。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一方面表现了他引经据典、恣意运用的熟练掌握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毛泽东一种文化观的体现。

第八节 毛泽东的《周易》研究

《周易》等充满智慧的中国文化经典让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具备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使他能高瞻远瞩，胸怀坦荡，历尽波折而坚韧不屈，纵横合启又睿智多变。他在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又非常重视对《周易》的研究和应用。

早在1920年时，毛泽东就与蔡和森大谈《周易》之道。1937年他就在一篇哲学批注上写下：“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这里的“乾坤”就是《周易》中的《乾》卦和《坤》卦。也是天地之卦。毛泽东要每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要谦虚、谨慎，也是源于《周易》中的《谦》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周易》的研究和应用。他在1956年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证明这个问题。他在批判党内一点论的倾向时说：“中国古人

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周易·系辞》中所讲的阴阳变化规律。

毛泽东对《周易》的研究与运用，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运用于战略决策，其应用之实效是惊人超群的。当年，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井”为深渊，“冈”为高地、空间。是否应验了“潜龙在渊”和“飞龙在天”的卦象？又如，八卦上有八个门，干西北为开门，艮东北为生门，系八门中仅有的两个吉门。毛泽东千辛万苦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选择陕北这个西北的贫瘠之地建立大本营，等于占据了干位的开门（也为天位、天门）。而东北为艮位是生门，后来又为林彪所占据。北京坎位为北方是休门，休门休养生息，故北京后来不战而易帜。开门、生门不仅是吉门，而且都是居高临下之势，开、艮两门形成了一把异常锋利的剪刀，所向无敌。这与八卦的阵法模式完全一致，恐怕不仅仅是偶然和巧合可以解释的。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带领红军到达甘南哈达铺镇，特意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拜访了当地的阿訇。阿訇向毛泽东讲了八卦的八门，并说毛泽东向生门的进军是正确的。周恩来听后高兴地挥着手大喊：“同志们，向生门前进！”不仅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还曾去山西五台山抽签算卦，虽是闲情之举，又何尝不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毛泽东易道之高深、博大呢？

在最能代表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鸿篇巨制《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了不少《周易》“讼卦”中矛盾普遍联系、阴阳生克、五行制化的理论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许多观点都非常精辟练达，是毛泽东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

《说文解字》：“讼，争也。”由“争执”引申为现代词“矛盾”。《易经》是如何对矛盾下定义的呢？其《象》曰“天与水违行”。该卦卦象是由上乾（乾为天），下坎（坎为水）组成，构成“天与水违行”之象。其卦象应是先哲对中华大地直接观感：日月星辰东出西落，直观为天

往西行；中国地形西高东低，整体水系均往东流，因此说“天与水违行”。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二者相违，岂不矛盾？

毛泽东《矛盾论》的主题是：“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法则。对待矛盾，“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易经》的“矛盾论”（《讼》卦）主题是：“讼，元吉”。元，解为原始、根本或本质，如果直译为“矛盾原始吉祥或本质吉祥”，肯定令人费解，所以必须思考它为什么会吉祥，也就是矛盾为什么会使事物吉祥。因此应译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吉祥。先哲的圣明，在于认识了自我，认识了社会，洞察了自然法则。《易经》站在人类发展的，社会进步的高度上，对矛盾这种看起来消极的事物，指出它积极的一面。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地解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每有进步都是由矛盾推进的。当事物没有矛盾时它也终止了生命。由于寒暑，古人才有了“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的房屋和衣物；由于出行难，才有了舟车代步。现代人由于能源危机，才开发太阳能、风能、地热及海水能，才去太空探索新能源。由于发展，才产生环境恶化的矛盾，解决了矛盾才能发展，这应该是对“讼，元吉”的诠释。又比如，《革》卦中的“汤武革命”、“君子虎变，小人革面”以及《未济》卦中的有关论述，无疑是启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的原动力。其实，即便是在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这样的事情上，毛泽东也不忘撷取于《易经》。“李敏”、“李讷”就出自《易经》上的“君子讷于言，敏于行”。

易经《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理论便是受此“天地之大德曰生”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深深懂得，作为一国之领袖，最大的德性就是生。他要在他治理的国度里令万物生长，特别是人的生长。因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他否定。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就业问题，毛泽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在中国所有的城镇和农村建立起了免费的医疗体制，以及合作医疗制度，使每一个平民百姓求医问药不犯愁。他让知识青年学工、学农、学兵、学商，到广阔大地去锻炼，经风雨，见世面，在农村着手机械化、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诞生只有 20 多年时间里，就发射了“两弹一星”，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铁的事实，世界因此震惊。

毛泽东一生喜研《易经》，也经常运用《易经》的智慧推陈出新，有所创造，在管理层推行“为人民服务”，在群众中倡导人帮人、人爱人，路不拾遗等良好风尚，极大地发扬了民族人文精神。他带领全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白手起家，将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第九节 毛泽东与庾信的《枯树赋》

说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之集大成者，并不为过。他的诗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融汇了南北方文风之长，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公元 513 年，庾信出生于荆州江陵的一个门阀之家。他的父亲庾肩吾，擅长于写诗。让他有了比较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以至 15 岁时他便进入萧梁宫庭，为皇子们当伴读、抄撰。萧氏兄弟，都主张文学创作跟经史分家，萧纲更以“操笔写志”“吟咏情性”相号召，反对把文章写成经典书抄或道德说教。庾信在萧纲等人并不高尚的美学理想熏染下，沿着父辈的足迹，把年轻人的热情与才华，希望与精力倾注在观察和摹写诸如宫女与春花之类的事物上。他早时写诗，“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钗朵多而讶重，鬢髻高而畏风”，很合贵族文人与宫庭仕女的口味。一时蜚声文坛，和徐陵的创作一起，被

称为“徐庾体”。他们把晋宋以来文字讲究词藻、用典，永明以降，诗赋讲究对偶、音律的风气推衍开来，艺术地统一于同一种风格之中，这就加快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律化”进程。

公元 548 年秋，反复无常的军阀侯景发动叛乱。叛军的烧杀屠掠，将一个拥有 140 余万人口的繁华都会，化为瓦砾。乱军之中，庾信也失去二子一女，连老父也逃散了。事态的激变，使他开始了认真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无疑具有了比以往更深的深度。终于，他唱出了“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的哀歌（《燕歌行》）。这预示他的创作道路，将出现一次重大转折。

据传，他出使东魏回到南方后，有人问他对北方文坛的看法。他说：只有温子升的一块石头（指《韩陵山寺碑》）还值得一提，薛道衡、卢思道略略懂一点文法，其他全是“驴鸣狗吠，不堪入耳！”一副傲慢面孔，表示着他在用南朝文坛那一套声律词采的要求来衡量北国文坛。事实上，他不仅读了温子升的那篇碑文，还全文抄录了。他并不拒绝吸收北方文化。当他初到北方时，人们以“轻艳”目之，瞧不起他。他便拿出新作《枯树赋》来给人家看。这一看不要紧，以后人们不仅不敢轻视他，还纷纷向他请教，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朝廷有什么重要文字，也让他把笔。

事实上，自从作为人质被强留魏都长安后，庾信再也未能回归南朝故土。他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由于庾信亲历侯景之乱、西魏灭梁、家破人亡、被强留于长安等多次沉重打击，内心非常痛苦。他不仅从此永别了江南，而且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他是屈事二姓，并且是在杀他“旧君”的鲜卑族政权做官，这是典型的“失节”。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家庭生活的不幸等诸多原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后的思想及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他的后期作品一改前朝诗赋轻艳奇巧的风格，多抒发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恨、人事维艰、人生多难的情怀，劲健苍凉，忧深愤激。如《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自伤遭遇，并对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转为萧瑟苍凉，为后来杜甫等所推崇。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一特色。这也正应了清朝赵翼的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庾信的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南北朝赋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也因之成为南北朝文坛的泰斗。后人评价他“集六朝之大成，导初唐之先河”。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传诵千古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是从庾信的《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脱胎而来。

关于《枯树赋》，清倪璠在题解中说：“《枯树赋》者，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1975年，江青把请人注释的《枯树赋》送进中南海。这篇注文进一步发展了倪说，在题解中把赋的立意简单地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毛泽东对上列注释，不以为然。1975年5月29日，他通过反复地阅读原文，逐段逐句地进行分析后，认为：“把树木的摇落变衰，归因于移植，是曲解了《枯树赋》的立意。”以桐为例，他说，赋中的“桐何为而半死”，是指枚乘《七发》里的“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和被人“斫斩以为琴”的能发出美音的龙门之桐。桐之半死与凋枯缘于受到急流逆波的冲荡和人为砍伐等诸多因素摧残，“不是移植问题”。另外，赋中的“若夫松子古度（大树名）”十句，原文说得很清楚：这些枝干繁茂、根系庞大、生命力极强的大树，乃是因为受到了苔菌的埋压、鸟虫的剥穿、霜露风烟的侵撼，才变衰枯死的，“和移植毫无关系”。因而“移植说”不确。

毛泽东对于《枯树赋》文意的解析，显然是他经反复吟诵、分析全篇、研究上下文的连带关系后，才作出说明的。不仅如此，他对赋中每一个词、每一个字，也是根据情理和生活知识进行审视的。比如赋文中的“比翼巢鸳”一句，毛泽东在注本中解释说：“比翼的鸳鸯在上面（树上）作巢”。他认为，此解同样不确。因为“过去只讲鸳鸯戏水现在又有了鸳鸯戏树”！所以，不可思议。他觉得这里的“鸳鸯”，“可

能是指睥（音驾，凤类）”。姑且不论此说能否成立，仅就毛泽东这种不囿于定论，推陈出新的求真意识、探索精神，就是值得称道的。

《枯树赋》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却有颇为难解之处”。前人论著，“对该赋结构及词句寓意的解释未能尽当”，今人也颇“感到此赋确有若干词句不太好理解，不容易弄清作者的真正含义”。而毛泽东解读《枯树赋》时，却能使听过他赏析的人对此赋“顿觉原感阻滞、不清的地方，完全贯通开朗”。足见毛泽东的古文字功底以及学术能力之深厚。那么，他为何能如此游刃有余呢？首先，他认为：“注解古文古诗，自然要有雄厚的基本功”；其次，读书、治学要有一种“谨严和审慎的态度”；第三，分析问题应“根据事物常理”并“拥有广博知识”；第四，读者个人生活经历的体验，同样不可或缺；最后，还“要有细察全文、综观总体的认真的精神”，切忌“以偏概全和根据一言半语，妄下结论的做法”。以上数端，对于今天从事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人来说，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迪。

毛泽东对于庾信的才思词采，十分欣赏。他曾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者，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毛泽东不仅熟读《枯树赋》，而且全赋章节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他常常想起来就吟诵该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事实上，《枯树赋》也是毛泽东诵读到最后的一首赋。

毛泽东为何爱读《枯树赋》，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他认为庾信此赋描写生动，联想丰富。他曾说，庾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进了作品，眼界宽广、思路广阔。其次，他认为庾信此赋用语夸张而形象。他说，庾信不仅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而且写出了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其二，他认为庾信此赋起结呼应，突现了立意。全赋以东晋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东晋桓温的“昔年

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作结。对此结构，毛泽东激赏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前后呼应，使赋文有一气呵成之势。既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

最后，赋中所云：“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木叶落，长（音“涨”，年老）年悲’”之语，也表达了毛泽东晚年对生命无限的热爱和留恋的迟暮之感。

第十节 毛泽东解析《六祖坛经》

儒释道相通，国学大师必有佛缘。

《六祖坛经》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佛学典籍，他时常将其带在身边，潜心研究。还能熟记慧能的身世和禅宗历史，背诵慧能等人的佛偈，称赞慧能做了“佛学革命”。让人感到领袖和禅祖似有相通的地方。

慧能，唐代僧人。我国佛教禅宗南宗的创始人，佛教历史上称禅宗六祖。

五祖命弟子作佛偈选接班人，得意门徒神秀在墙上写：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大家见此偈，没有人敢再作。慧能找人帮助写了一首佛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认定慧能“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授予法衣，但却召来了神秀的杀机，逃往韶关建立南宗，这是世人皆知的故事。

毛泽东说：慧能的一首偈，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的本性是清静的，怎么会沾上尘埃呢？慧能的偈与佛教大乘一切皆空最契合，比神秀高。

毛泽东很赞成慧能的观点：一是佛性人人皆有，二是顿悟成佛，三是简化佛教，四是把印度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批评佛教。这就是佛教的革命，动摇了佛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中国人在生活之中随时成佛。

毛泽东在 1950 年审阅文件时，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一词修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字样，说明毛泽东与慧能的相通之处。毛泽东也是历尽苦难，探索真理，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中国的概念，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的理论和语句，至今还鼓舞着中国人民和需要他的理论的人们。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自幼便受笃信佛祖的母亲的影响，一直与佛有缘。民间常说毛泽东生就一副女人的菩萨相，这或许也是他与佛有缘的一个验证吧。

毛泽东的母亲笃信佛教，但这种信奉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并没有任何改变。毛泽东和他母亲的不同在于，他有佛心，但不是迂腐的佛，不是教条的佛，而是灵活了的佛，变形了的佛，升华了的佛。他认识到，要普度众生，要博爱苍生，不能像母亲那样，必须率先除暴驱邪，铲除人间所有妖魔。让处于“地狱”中的苦难人民，见到光明。而要实现这一“大愿”，就必须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实社会中真正能拯救人类、普度众生的，是孙悟空那样的斗战佛，绝不是寺庙里那些穿着袈裟咿咿呀呀念诵经文的佛。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指导下，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终于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观音菩萨是我国佛教信徒最崇奉的菩萨，拥有的信徒最多，影响也最大。观音菩萨的特点是大慈悲，按佛教经典的原意：慈，即是“予乐”；悲，即是“拔苦”。拔除众生的痛苦，给众生以快乐，就是慈悲。能以众人苦难为苦难，这样才能成就大慈大悲，才能成就大公无私的伟大人格。众生多苦，所谓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众苦煎熬，所希求的，正是一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辅助与指导。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正是如此吗？他的一生不都是为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大行“慈悲”的举动吗？而且，他一直是“以众人苦难为苦难”的人，为救人民苦难，只提倡“为人民服务”，只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也从来不求回报。他总是尽力把资财用于穷人而不是富人，用于未来而不是眼下，用于中国而不是外

国，用于下层而不是上层，用于内容而不是形式。至于他自己，尽管拥有最高特权，却尽力简朴，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

毛泽东，领袖也！伟人也！菩萨也！

第五章 传统国学文化造就出的军事家

第一节 独领风骚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国学修养和成就还表现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在《毛泽东选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古代战略思想、战略战术、战例的引用，以及著名的军事人物、典故、术语的出现。这些融会于传统国学之中的内容诱发着毛泽东的思维，给了他领略和借鉴的机会，使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自己曾回忆：“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孙子把灵活变化视为作战用兵的最高境界，如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毛泽东则通过自己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实践，以其不拘一格、灵动至极的指挥艺术，真正实现了用兵如神的境界。当今世界如果有人问：谁是现代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党，缔造了一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开辟和领导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还由于他藐视了世界上最强霸的敌人——美国和苏联，敢于和他们硬碰硬地进行过“抗美援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战争。纵观现代抑或当代的世界级领袖人物，从列宁、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甚至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有哪一个集党的创造者、领袖、军队统帅、国家缔造者、军事指挥家、理论家，甚至诗人、哲学家、国学大师为一身呢？

作为伟人，毛泽东自有其过人之处。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的军事能力的超凡也不是天生的。他在这方面显露的独特才能，一在于他的钻研，二在于敢于实践。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在10月底，毛泽东就毅然投笔从戎，到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

队当了一名新兵。南北议和后，毛泽东以为革命结束了，因此决定继续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12年春，毛泽东婉拒了官兵们的挽留，离开军营，重新走进了校门。这段短暂的军旅生涯，使毛泽东对军队在中国的地位和在救国救民中应起的作用有了一些初步的感受。

凭着勇敢和智慧，毛泽东在以后的学生生涯中，充分运用积累的军事素质，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17年，军阀混战。长沙城内学校常被军阀部队霸占充作军营。为了保卫学生的学习权利，毛泽东组织同学拿起自制的武器，进行护学护校的斗争。同年11月，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战败，仓皇逃离长沙，其时谭军尚未赶到，城里突然成了一个无政府的世界，没有军队，也没有警察视事。毛泽东领导全校的学生自愿军，“分夜校巡、警卫非常”。11月15日，战事突然又逼近长沙，第一师范学监见情况紧急，准备组织全体同学离校，到城东的阿弥岭暂避战乱。但到集合时，却迟迟不见有人前来。原来毛泽东在大伙面前力排弃校之议，认为学校如果空虚，乱兵便会擅入打劫，离校不如护校，这样可保自身和学校无虞。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两天过后，一些零星溃兵陆续进城，踟蹰于长沙街头，他们经过第一师范门前时，见有威严的学生军布岗，便未敢擅入骚扰。毛泽东根据情况判断，眼前这情形定是前线溃军不知长沙城内虚实，不敢贸然进城。他又进一步探得还有一部分溃兵在距学校南端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不敢前进。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赶走这些又慌又累的溃兵，确保学校安全。他迅速组织100多名健壮胆大的志愿军，端着自制木枪，分兵三路潜出学校，悄悄埋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形成了对溃兵的包围之势。同时，他又去联络学校附近的警察所，让他们带枪扼守制高点妙高峰山头。当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溃军行至离伏击地不远时，他要警察放一排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爆竹，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进城了，你们快缴枪吧！”溃军立时被满山的枪声镇住了，又因不知城内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了解溃军的心态，随即派人去和溃军交涉，把

这支队伍引到第一师范学校的前坪，命令他们交出武器，又令他们全体后退。三四千人竟都遵令行事，全校同学见状又惊又喜，一齐拥来收拾枪支，堆了满满一礼堂。当晚，毛泽东安排溃军露宿于学校前坪。第二天天明，毛泽东等向商会筹集遣散溃兵所需的经费，商会怕溃军久留长沙会危害他们的利益，便捐出了一部分款项。毛泽东给溃兵每人分发四元，就地遣散了这支队伍。事后，毛泽东这种胆识和应变能力深受全校师生的赞赏。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在与人闲聊中谈及此事时笑着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军阀张敬尧部侵入长沙时，毛泽东再次从容组织广大同学护校，他建立了“警备队”，并自任队长。尽管战事频频，城内风声鹤唳，但在第一师范校园内，由于警备队工作有方，因此秩序井然，教学如常。《一师校志》曾载此事：“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固摄影以留念。”在照片下面还写着这样的话：“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

通过以上的事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一个千古一遇的军事统帅，这和他具有的丰富的军事革命斗争实践是分不开的。后来的那些著名的军事战例自不必说，就是其年轻时代所具有的军事生涯及体验也足以说明一切。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是众所周知的军事理论之父。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一书前，就已研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延安凤凰山，毛泽东在自己住处还成立了一个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的组织。参加研究会的人有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毛泽东组织的这个研究会每周开一次会。每次从晚七八点钟开始到深夜十一点多钟结束。先由该书的翻译者何思敬教授发讲义，一章一章地介绍，然后大家进行讨论，最后由毛泽东讲述自己的意见。所以在毛泽东的某些军事论著中，克氏的一些观点甚至语言是经常能见到的。如“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具有“概然性”，“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

方面”；“进攻中含有防御因素，防御中含有进攻因素，进攻可以转为防御，防御也可以转为进攻，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等等。

一百多年前，克劳塞维茨在谈到军事理论时说：“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但他又感慨地说：“统帅不是学者”，“杰出的统帅从来不是来自知识渊博的军官”。然而，毛泽东的出现却打破了克氏的这一预言。他不仅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还集诗人和哲学家、学者为一身，这使毛泽东这一领袖人物不仅有可能从长期亲身参加和指导战争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而且有条件用这些理论去指导战争实践，并在战争实践中反复检验这些理论。即通过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又指导实践，实践又丰富和发展理论，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使他的军事理论得以逐步完善，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不再是“分散的颗粒”。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对毛泽东怀着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的人，开始诋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说它过时了，不灵了，在充满信息化概念的现代战争面前落伍了。同时，他们竭力鼓吹西方军事理论的种种“先进性”，妄图取消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军队中的指导地位，而代之以西方化的那一套。其实，毛泽东军事思想崇高的世界地位，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今天。在当代，在现代条件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是最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众所周知，美国利用自己的现代化的军事能力在短时间内入侵了阿富汗、伊拉克，看去的确是件很风光的事情。但是，如今的现实却是他们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游击战的泥淖中，难以自拔。零打碎敲地死去的士兵比全面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时候还要多。一位著名的美国军界人士曾经说过这样很俏皮的一句话：“尽管图书馆的书架已被那些颂扬毛泽东是一位游击战权威的著作所压弯，但是，他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大师！”看来，此君是个明白人，只是没有在美国军界的决策层中掌握话语权罢了。

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最能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战争和军事领域的现实问题。

一般说来，每当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原有理论的内容都会分化成两个部分。那些具有长期稳定指导价值的东西，将继续发挥作用；那些仅适用于当初一时一事的个别内容，将失去现实意义。军事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即便毛泽东本人都反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字字句句照抄照搬。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的基本原则，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当代条件下依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事实反复证明，要正确看待当今世界战争和军事领域的重大问题，最靠得住的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观点。例如：现代战争的致胜因素问题。继上世纪 50—70 年代盛行核武器决定论之后，近年来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种高技术兵器决定一切的说法。其实，未来战争既有科技，尤其是高技术的对抗，也有人的因素，即人力、人心、士气、人的技能素质的对抗。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把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结合好，才能形成战斗力。我们在努力强化高技术，改善武器装备，重视加强现代武器装备，重视新的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重视空中打击兵器、电子技术的发展的同时……仍然需要强化人民战争的观念，强化人民战争的政治优势。这才是一切正义之师需要遵循的军事思想。

西方国家军事理论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比较多的是战争观、人民战争、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等方面的问题。有的还成立了研究会、学习会等学术组织；有的国家还在其军事院校中开设毛泽东军事理论课程，军官晋升时必须撰写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论文。毛泽东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成为这些国家军事家阅读的经典，甚至成为一些国家首脑人物的案头书。当然，他们的研究有的是为了寻找对付革命战争的对策。如英国巴特曼强调，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自由世界来说主要的不仅是要理解他的军事思想，而是要将这些军事思想运用于在东亚的西方军队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难题之中”。他认为，过去由于不懂得毛泽东的理论的意义导致了法国人在

印支、美国人在越南、英国人在东方遭受到相似的失败，并有可能将在今后类似的行动中继续失败。总之，这些西方国家军政界、学术理论界中对毛泽东军事观感兴趣的研究者，尽管身份不同，动机各异，但都从不同侧面证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不仅没有过时，没有被冷落和遗忘，而且是当今世界军事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对象。

真理是没有国界的，哪里需要，它就飞向哪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在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第三世界更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亚洲，越南人民曾结合自己的斗争实际运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采取破袭战、伏击战、竹尖战、地雷战等多种战法，先后战胜了拥有优势装备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国侵略者。越南的武元甲大将曾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我党领导这场抗战有着重大的贡献。自1950年以来，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军民更有条件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宝贵经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创造性地成功地运用到我国的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去。”日本的市川宗明在其《毛泽东的世界战略》一书中指出：“胡志明的军队自始至终都把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作为其战略战术的基础，并以此来发展自己。”英国的巴特曼在《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认为：“在印度支那，毛的学说使越盟找到了另外的对策，代替了他们所没有的坦克、飞机、伞兵和凝固汽油弹。”在非洲，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的自由战士运用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结合本国情况，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建立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开展游击战争，最后都取得了独立。在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曾此起彼伏，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在那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饮誉世界的拉美革命领袖格瓦拉读过西班牙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后深受启发，后来他一再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翌年，格瓦拉便来华访问。他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在毛泽东面前，格瓦拉真的像个小学生一样，充满崇敬的心情。因当时中国正在开展大跃进，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

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1965年春，格瓦拉主动放弃古巴高官职务和国籍，去刚果（利）东部指导当地的左派游击队。几个月后，他回古巴休整。第二年他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入玻利维亚丛林去展开游击战。然而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去认真发展共产党组织、发展群众组织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以最后悲壮地失败了。

现在拉美地区最活跃的左派领袖查韦斯更是一位毛泽东的崇拜者，这位充满理想的拉丁美洲世界英勇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曾说过：“我崇拜卡斯特罗和毛泽东，我喜欢读书，也读过他们的书。”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曾让查韦斯受益匪浅。查韦斯把广播电视媒体当作重要武器来亲自频繁地使用，这是革命游击战的一个重要的创举。

从1998年在委内瑞拉人民的拥护下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查韦斯就推行了名为“玻利瓦尔革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查韦斯看来，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只能造成“大多数人的贫穷”。2004年底他又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不要社会主义毋宁死！”后面一点他和毛主席的意见是相同的：“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也无法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我邀请所有委内瑞拉人民共同走上这条新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外交上，查韦斯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反抗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并以石油美元为“后盾”，对古巴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提供上百亿美元的援助。

另一个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在现实斗争中，并获得最终胜利的是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简称毛主义）的领袖普拉昌达。

普拉昌达1952年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他在高中里接触到《毛主席语录》。后来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希望用“毛主义”来改变尼泊尔和他一样的穷人的命运。1996年2月13日，普拉昌达率众到西部罗尔帕县的深山老林里，拉开了尼共（毛主义）“人

民战争”的大幕。在西部深山，他参照毛泽东模式，实行了一条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方式，他说：“在罗尔帕，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外人要想进入，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路条’。在根据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税务机构，行使‘政府’权力。此外，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和他一起战斗的士兵还能每月领到 500 尼泊尔卢比（约合 55 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而作为领导人的普拉昌达，却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短短半年，普拉昌达就发动了 5000 起小规模袭击，他旗下游击队的规模也随之壮大。但此时，尼政府仍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认为他们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恐怖分子”。但到了 2000 年，政府军才猛然发现，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控制或影响着尼泊尔的半壁江山。到了 2006 年与政府和谈前夕，除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南部平原与谷地还在政府手上，“毛派武装”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尼泊尔 80% 的地区，摧毁了农村地区的封建制度，成功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理论。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为通过合法选举方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多党民主制民主共和国奠定了基础。普拉昌达后来还曾担任尼泊尔的总理，这是普拉昌达灵活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有意思的是，普拉昌达跟毛泽东一样，喜欢研究革命的理论，而不喜欢自己带枪。他说：“别看我是‘反政府武装’领袖，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带枪支等武器。”

格瓦拉、查韦斯、普拉昌达等领袖人物的革命实践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诸如“支部建在连上”“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和十大军事原则”“统一战线策略”等等，都是既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又根据中国实际丰富的指导性理论。你按他的道理做了，革命就顺利，就胜利；你违背了他的道理做事，就事倍功半，甚至失败。

上世纪 60 年代，一位名叫冈村昭彦的日本军事记者，在访问中南美洲后写过这样一段观感：“最近我到中南美跑了一趟，行前访问了五角大楼，他们告诉我，起初，美国国务院认为，多米尼加的革命是卡斯特罗搞的，可是美军到了多米尼加才知道，多米尼加革命的精神支柱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我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中国是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多米尼加不受古巴影响，而受中国影响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多米尼加的革命部队。哪知道那里的战士一见我这张东方人的面孔，就以为我是中国人，兴奋地把我高高举起，欢呼‘毛泽东来了！中国人来了！’……”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名字以及他的军事思想在世界各地的巨大影响。

第二节 《孙子兵法》孕育出毛泽东军事理论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国学智慧结晶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兵书，自古以来便被誉为“兵学圣典”，是历代兵家必读之书。早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的笔记《讲堂录》中就有了“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等多处心得，说明他很早就已经接触了孙子和他的兵法了。事实上，毛泽东正是依仗着自身具备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的。

试举几例：

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中最经典的思想之一。其意在于把握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地理位置、内外环境等一系列战略因素，因之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决策。

“知己知彼”的思想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到学习和使用战争规律的时候，毛泽东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毛泽东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原则，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作了发挥，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他赞扬了孙子知战统一的可贵思想，把它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更深刻、更

透彻地阐释了这个命题，进而把它深化和发展成为革命战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阐明的是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和战争胜负的关系，只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把战争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揭示了战争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强调了在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上做到知行统一和知战统一。学习阶段就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战争发展客观规律的阶段；使用阶段就是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自觉运用战争规律指导战争实践的阶段。

毛泽东借助孙子“知彼知己”的思想材料，进行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军事理论创立工作，他对土地革命战争特点的分析，对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优势劣势的对比分析，对解放战争中战争进程的判断和分析，对抗美援朝战争中联合国军战略战术特点的分析，以及建国后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形成，都是以“知彼知己”为前提、为指导、为依据的。在我军历史上，毛泽东亲自参与和组织领导制定的“十六字”方针游击战战略、持久战战略、“十大军事原则”、积极防御战略……都是“知彼知己”的产物。他把“知彼知己”原则看成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和建立巩固国防的基本经验。

二、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关于集中兵力的思想。《孙子兵法·虚实篇》言：“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一也。”兵力的分合使用，体现了军事指挥艺术水平的高低。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孙子强调“以十击一”，却没有说以一胜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毛泽东吸取了孙子“以十胜一”的思想，并针对革命战争敌强己弱情况，增添了以一胜十，以少胜多的打法。他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以十当一’，这是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主张“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1936年，他又把集中兵力作为一条作战根本原则，他说：“从战略防御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集中兵力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强调“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是因

为长期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弱小军队，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获得主动。

三、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兵法·形篇》中言：“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意即打胜仗的军队是创造必胜的条件而后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恰恰相反，先盲目作战，然后企图侥幸取胜。毛泽东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在红军时期，他就要求“慎重初战”，在条件不成熟时宁可持重待机，力求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抗战期间，他强调必须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解放战争时他把这一原则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提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四、示形，动敌。孙武在论述发挥将帅才能，造成和利用有利态势时，强调通过“示形”以“动敌”；“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势篇》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意即作战前要善于用“诡道”设法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和调动敌人，以便“攻其不意，出其不备”地给敌人以突然的致命打击。

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略退却经验时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著名的“四渡赤水”就是用示形以动敌的策略，不断制造假象以迷惑和调动敌人，进而声东击西，以打击敌人，达到胜利突围的目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示形动敌”的得意之作。尾随而至的敌军“只拣到红军的几双破草鞋，而望洋兴叹”。

五、《孙子兵法》中另一经典之句“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极富辩证思维。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看似滴水不漏，实则处处不堪一击，经敌一攻便一溃千里。既然如此，

应该怎么办呢？孙子做出了回答：“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如何使人备己呢？“吾所以战之地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所与战者寡。”毛泽东在反围剿、抗战以及解放战争初期，也使用着类似的战略方针。在反围剿中，主动退却，让敌人陷入根据地处处挨打，不知我军哪来哪去，而不得不处处防备，分散兵力，最终被各个击破。抗战中，我军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在解放战争中采取运动战，主动放弃城市，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拉长敌人战线。以上均是基于“使人备己”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就要求“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抗战中，他强调“必须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后来在“十大军事原则”中，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对孙子“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思想的发展创新。孙子的意思是，胜利的军队创造胜利的条件才交战，打败仗的军队却是盲目开战，企图侥幸，难免要吃大亏。毛泽东则强调每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必须有绝对的把握。

六、孙子曾就战争情况的变化与发展问题阐述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又说：“战胜不复”，“践墨随敌”。这种审时度势，充分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而采取制胜措施的论点是符合战争一般规律的。但孙子只阐明了战争过程中战争本身情况的变化规律，而没有阐明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承认战争本身内部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且认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都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战争有时代的不同，有地域的不同，有性质的不同，有武器装备的不同等等。这些无疑都影响着战争指导规律的变化。

七、孙子认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在实战中完全用活了这个因敌制胜的原则。他还联系宋代岳飞说过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强调作战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实战中，有时必须进行战略撤退。1930年10月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总前委紧急会议上，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不能怕暂时丧失地盘，要运用井冈山的经验，“诱敌深入”，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大家虽然思想顾虑甚多，但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果然，在红军的连续退却中，使敌军三次扑空，红军却在运动中做好了集结反攻的准备。12月，红军在江西小布、黄陂一带集中，准备与蒋军决战。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2月29日一早，红一方面军埋伏于永丰县龙冈地区的黄竹岭。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上午大雾散后，敌18师师长张辉瓒引军进入红军埋伏圈。红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打到下午3时后便活捉了张辉瓒。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后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也激怒了蒋介石，马上又组织20万人进行第二次“围剿”。翌年春，毛泽东在两次反“围剿”之间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可见他对自己的战略战术充满着信心：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

这是毛泽东运用孙子军事思想，结合井冈山时期的战斗经验，发展革命军事理论并大胆进行了实战检验的成功一例。这次他把示形、动敌、因敌制胜等策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此，毛泽东的名字在苏区和红军中异常响亮。到1948年9月的辽沈大战时，人民解放军集中了100万人攻打大城市和交通线上的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几乎是敌人的一倍。这是“我专而敌分”，是典型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淮海战场上，虽然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不大，但毛泽东在1948年10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提出战役分三个阶段，

攻击目标和策略依然突出集中兵力，先吃掉徐州以东碾庄一带的黄伯韬兵团，孤立和牵制徐州的刘峙、杜聿明。他指示不惜以六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 25 师、63 师、64 师。当时解放军一个纵队便是一个军，用六七个军打 3 个师，兵力绝对是优势的了。消灭了黄伯韬后，又从西南方向赶来了黄维 12 兵团。解放军又集中兵力，示形于敌，让他们长驱千里无阻，最后让他们不死即降，一个也没跑了。

孙子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上，只是打跑便好。毛泽东扬弃之，要求务必全歼（杀伤和俘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更为科学的。孙子的伟大体现在他对战争规律的把握上，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但他没有打过多少仗，那时的战局也没有现代复杂，敌我双方投入也不可能太多。而现在双方一聚便是一两百万之众，比春秋时一国的人还多，战略武器也厉害得很。毛泽东的伟大则表现在他吸收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形成了 20 世纪中国式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在千里之外的运筹中，特别是在西柏坡时期的三次战略决战中大放智慧的光芒，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位经天纬地的战略家。

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决不仅仅是从《孙子兵法》中抄出几句，而是在批判的吸收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有自己新的发展。对于战争，他不仅认识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更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眼光认识到：“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它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对于客观条件，他不仅认识到“多算胜，少算不胜”，更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提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对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也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充分把握敌我情况的基础上，还应该充分把握战争，特别是所处的某一特殊类型的战争的规律。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的那样：“战争的规律——这是

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牛顿说过，如果说他看得远的话，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上。那么毛泽东看得远，正是因为他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肩上。

第六章 与国学大师的学术交往

治学三境，在孔子的眼里首先是“学而时习之”，第二是与志同道合者讲谈、研讨、论辩，从而加深造诣，最终使学问提升到高级阶段。《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提升的方法，就是要有“友”，有“朋”，通过同“友”“朋”的讲谈、研讨和论辩，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于是大家的学问、思想渐渐进入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兰亭集序》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毛泽东一生博学多才，交往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与其诗文唱和者有之，与其学术交流者有之，与其相互共勉者有之，与其意见相左者更有之……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具有卓尔不群的优秀品格，同时也富有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这种别具特色的人际世界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向人们展示了他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毛泽东酷爱文史、谙熟词律、热爱戏剧曲艺艺术，他与历史家、哲史学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交往频繁。私人往来、思想交流、学术切磋、合作共事、诗词唱和、艺术欣赏等等，虽然形式不一，但终其一生几乎从未中断过。当年，在平山西柏坡专门就《朱元璋传》同吴晗谈了一个晚上；围绕文艺方针问题特地去信请艾青“惠临一叙”；关于如何办好报纸，郑重向赵超构建议，应该经常到下面去接触群众；与柳亚子、郭沫若等人的诗词唱和，更是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不少光彩……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最佳诠释。

第一节 故友诗友，以学为友

柳亚子名慰高，后改名弃疾、人权，亚子是他的字。1887年生于江苏吴江，清末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与陈巢南、高天梅等创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2年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

柳亚子有两枚印章十分厉害，一枚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传》“长事爰丝，弟畜灌夫”，意为季布的弟弟季心因避祸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爰丝家里，他像待兄长一样尊敬爰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灌夫。第二方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为东汉末年才子，他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由此也可见柳亚子与毛泽东的友谊。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交往，始于1926年5月“饮茶粤海”之时。毛泽东这时正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柳亚子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爱国诗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1926年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开会期间，两人结识。柳亚子曾创办“南社”，借以宣传革命，毛泽东对此早有耳闻。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一见如故。二人“饮茗”相对，侃侃而谈，议论北伐革命形势，谈论国家前途，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柳亚子在诗中反复提到的“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饮茶”。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柳亚子因反对国民党右派，遭蒋介石通缉，被迫流亡日本。但他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注着共产党人的斗争。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秋收起义，并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时，十分兴奋，于1929年写下一首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奇。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人自注列宁为：“孙中山、毛润之。”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陵墓所在地。

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柳亚子在中国革命低潮的时候，仍然坚信毛泽东是革命的领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代伟人，和孙中山等同。柳亚子无疑是最早运用诗歌的形式来赞扬毛泽东的第一人。

1932年，中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蒋介石加紧了对中共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毛泽东领导红军，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就在这时，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的诗篇：“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这首诗对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予以热情颂扬，并对毛泽东个人寄以厚望。柳亚子以其睿智坚信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必然会赢得胜利，同时，表现了诗人的革命立场和怀念故人的真挚情谊。

毛泽东也深深怀念这位故交，但一直无法得到柳亚子的讯息。直到1937年，他在延安接到何香凝女士的来信，谈到柳亚子的情况，不禁欣喜若狂，激动地给何香凝回信说：“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了，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1941年柳亚子因反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开除党籍，不得不亡命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从香港回到桂林。是年11月，柳亚子寄诗给延安的毛泽东，诗曰：“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等句，表达了诗人深切怀念与毛泽东在广州共同饮茶，探讨国家大事的心情。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志同道合的老朋友，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特致信给柳亚子：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

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此信体现了毛泽东对他们友谊的珍重。柳亚子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立场。1945年1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他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极为不满，撰写《口号二首》指责蒋介石“顽旧可邻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表明了诗人革命到底的决心。

1945年8月28日，载着毛泽东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走下飞机后和各界人士一一握手，并发表了书面讲话，他庄严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这铿锵有力的声音震撼了每一个人，也包括前来迎接毛泽东的柳亚子。

8月30日，柳亚子来到中共机关所在地曾家岩50号与毛泽东会面。久别重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柳亚子在他的《八年回忆》中这样记道：“……我和他单独谈了一次话，觉得他这次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经过这次的谈话，便把我心中的疑团全部打破，变得非常乐观了。总之，我信任毛先生，更信任中国内部没有存在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必诉之于武力……”柳亚子崇拜毛泽东的超人智慧，以及不畏艰险亲赴重庆的胆略，但也流露出他对国民党存有幻想，对国内局势盲目乐观的一面。

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沙坪坝回访了柳亚子。10月2日，毛泽东又约柳亚子晤谈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针对柳亚子反映出来的思想，对时局、对谈判、对中国之未来向老友作了耐心而详尽的分析，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指出对蒋介石不要抱任何幻想，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用平易、简洁而又一针见血的话语娓娓道来，使柳亚子茅塞顿开。柳亚子

又一次被折服了。回家后他仍激动不已，顷刻赋诗二首，他在诗中言道：“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奏。”又说，“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腑语，胜我十年萤雪功。”诗人走出迷津的兴高采烈与万分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适时，柳亚子的夫人郑佩宜因盲肠炎住进重庆市立医院开刀，柳亚子心绪不宁。毛泽东闻讯，在百忙之中于4日致信柳亚子，询问其妻手术情况，表示慰问，并又一次把对时局的看法与柳亚子交流，对柳亚子的诗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信曰：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

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柳亚子收到信后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于10月6日“以诗代柬”，“感赋二首”呈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又致柳亚子书信一封，附信并寄旧作《沁园春·雪》词二首。

柳亚子得此词，惊喜万分，推崇备至，直呼“大作，大作！”“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诗人认

为不但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不能比之，清代的纳兰容若也望尘莫及，不由诗性大发，乃撰词次韵和之：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风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热心的柳亚子把毛泽东书赠的“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的咏雪词与自己的和作传扬出去，几经传抄，又在报上发表，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在重庆，柳亚子与毛泽东相聚的日子里，感奋不已，几乎每一次见到毛泽东或接到毛泽东的信，都要成诗一首，总共有五六首之多。同时，柳亚子还商同尹瘦石，以他炽热的爱国诗词同尹瘦石生动的历史画卷合在一起，举行一次展出。备展期间，柳亚子提出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毛泽东欣然同意。10月5日，尹瘦石专程去红岩村为毛泽东挥毫，柳亚子随后在画像上题诗。

10月25日，“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展出。柳亚子特意把他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的《七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后赋示同座诸子》写成大幅中堂，挂在大厅正中。把他的《赠毛润之老友》和《沁园春》和词写成条幅，并列两旁，把他最新的一本其中包括写有毛泽东《沁园春·雪》原词的诗稿陈列在大厅正中的桌子上，供人欣赏。在他书写大幅中堂的时候，有意把“低首擎天一柱来”，改为“低首延都一柱来”，与“重逢握手喜渝州”相映成趣。

作为文化界的翘楚人物，柳亚子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毛泽东、共产党以及他与毛泽东、共产党的情谊，这种不畏风险的勇气，也赢得了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的称赞。

1946年初，回到上海不久后的柳亚子就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激烈抨击国民党

的法西斯独裁政策。毛泽东闻讯后，于1月28日致函柳亚子：“……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使柳亚子受到极大的鼓励。由于国共关系的恶化，国民党当局不断加紧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柳亚子被迫于1947年10月离沪飞港。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任主席，柳亚子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们发表宣言，主张联合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专电致函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邀请他们北上共议建国大事。毛泽东又特意给柳亚子单发一份邀请电。柳亚子对毛泽东的亲自电召感动不已。这位63岁的老人，在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之后，看到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其兴奋之情难以形容。他在《毛泽东电召北行二月二十八日启程有作》中写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和其他民主人士到达北平。3月25日，柳亚子与各界人士前往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那天，柳亚子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同乘第一号汽车，检阅部队。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举行宴会，柳亚子应邀出席。席间，柳亚子即席赋诗四首，歌颂了解放区的新气象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其中第二首是说他与毛泽东的：“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延水麇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柳亚子与毛泽东在重庆别后3年有余，得以相聚，心情欢畅兴奋。但是过了3天，即3月28日夜，在毛泽东进城后的第三天，柳亚子就以诗代言，突然写了一首心情郁闷、满腹牢骚的七律诗。这就是有名的《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柳亚子用诗抒发了他不满足于自己当时的政治物质待遇，诗中，他自比战国孟尝君门下因失意而弹铗出走的食客，表示待解放军南征胜利后，

便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在柳亚子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李济深等6人为代表，同时，也提出希望增加何香凝、柳亚子、张文三人。但心怀不满的柳亚子写诗表示愤怒，“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柳亚子到京后虽然住在豪华饭店，脾气却越来越暴躁。最后连会议都不愿出席，干脆请了一个月的假。中央人民政府后来特意安排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休养，住在益寿堂。但柳亚子还是耐不住寂寞。一天，当管理员请示晚餐食谱时，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一怒之下还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毛泽东接到柳诗后，不是抛弃他、冷淡他，而是婉言劝解、耐心帮助。作为诗友、挚友，毛泽东采取诗词唱和的形式，给柳亚子和了一首情真意切、哲理深远、妙语连珠、脍炙人口的绝唱：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诗的前四句深情地忆及了他们之间的三次相会：“饮茶粤海”“索句渝州”和“还旧国”。广州（粤海）、重庆（渝州）、北平（旧国）的有意“袭用”。暗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忘记柳亚子等民主人士过去同情共产党人，赞助革命，为反蒋统一战线效力的革命功劳。后四句出于诤友间的相互爱护之情，委婉含蓄地批评了柳亚子的牢骚和错误思想，真诚地挽留他在北京参加建国工作，体现了毛泽东“风度元戎海水量”、爱人以德、重人才能的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怀。柳亚子先生读了毛泽东这首和诗后，深受感动。他立即又写了一首诗《次韵诗和毛主席惠诗》，诗中有两句“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劝说，愿意留京参加新中国的议政工作。

毛泽东一生为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从来不遗余力。只要是为人民做过一点有益的事情，毛泽东都铭记在心，更何况柳亚子这样的挚友。见到柳亚子的诗，毛泽东感到一阵轻松。5月1日下午，毛泽东携女儿李讷等专程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先生。柳亚子见毛泽东到来，心情非常激动，举着拳头异常兴奋地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毛泽东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那样就不好相处了。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那天，他们登船游览昆明湖时，柳亚子心生感慨地道：“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听后笑了，而后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说到这里，毛泽东话头一转，开玩笑地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柳亚子高兴地说：“我一定按着毛主席说的去做，我要尽力做一些对人民、对政府有利的工作。”

随后，柳亚子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共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翌年国庆节，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毛泽东邀请了不少民主人士及柳亚子等一同观看。当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代表向毛泽东献旗、献礼致敬时，毛泽东心情激动，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柳亚子即席一首《浣溪沙》呈献毛泽东。词曰：“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毛泽东乃步其韵奉和，写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全词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10月5日晚，柳亚子在怀仁堂观看了中央戏剧学院舞

蹈团戴爱莲主演的《和平鸽》舞剧。欣赏赞美之情悠然而生，随后填词一首：“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这首词毛泽东收到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于是兴奋之所至，挥笔写就了第二首《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曰：“颜闾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毛泽东用“最喜诗人高唱至”这种比较直白的语言，写出了对诗人柳亚子的最高评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位友人心领神会的情谊已臻于顶峰。

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词200首。著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南社纪略》，编有《南社丛刻》《苏曼殊全集》等。

1950年9月，柳亚子迁址于北长街89号。住宅为北方四合院，位于北海之南，故宫之西，中山公园之北，庭院宽敞，环境幽雅。毛泽东亲笔题此居为：“上天下地之庐”。

1951年柳亚子脑疾复发，长期医治仍不能视事，1958年6月27日因全身动脉硬化及支气管炎去世，享年72岁。对于柳亚子的辞世，毛泽东深为感慨。他失去了一个挚友，也失去了一位“高唱”的诗友。

第二节 尊重学人更尊重学术

著名的革命者、报人、律师、政论家、高官、社会名流章士钊（1881~1973）是一位与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的友人。“文革”前夕，毛泽东要谈教育，特意把这个段祺瑞政府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的年代，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却由毛泽东特别批准出版。这期间，因《柳文指要》毛泽东不仅多次批示，还就此与章士钊先生进行了多次的学术交流，包括提出很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尊重学人，更尊重学术的态度充分说明他不仅尊重学人，尊重学术，更对学术性及其规律性有着深刻的、精确的了解。1973年5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架政府

专机把 92 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

毛泽东和章士钊很早就认识。辛亥革命后，章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已闻知章士钊的大名，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也是他爱读的一种。据说，当杨昌济考虑自己的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与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朋友，他那时已认识毛泽东，就劝杨昌济促成此事。杨昌济听了章士钊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后来杨昌济在临终前也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泽东，而章士钊也认真地接受了这一推荐。

章士钊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资产阶级革命先驱。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但由于他在北洋时期曾任广东政府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高官，一些人包括章士钊之女章含之都将其视为剥削阶级。说到此，还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章含之才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章含之曾做过一段毛泽东学习英文的教师。有一次，在读完英文等待一同用晚餐前，毛泽东问章含之：“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加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他对于我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听完此话，又考问章含之：“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章含之列举了鲁迅文章中一段对章士钊的指责，说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还有，父亲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5 年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等等。

毛泽东听着章含之数说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她，并说：“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望着张口结舌的章含之，毛泽东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章含之老老实实

地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没有让她太难堪，动情地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于是，毛泽东耐心地向章含之解释了《苏报》案，并说章士钊是因《苏报》案报纸遭清廷查封后流亡日本的。无疑，毛泽东肯定那时的章士钊是个革命派。

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 1915 年，当年蔡元培、吴玉章等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主持此事。全国各地都有青年前往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也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人数多时达 1700 多人。但是，赴法勤工俭学要筹备旅费，这对于“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蔡和森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后来，在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子筹集旅费的毛泽东不得不向章士钊求助。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跟毛泽东是同乡。他早年去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逻辑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辛亥革命后，章士钊曾任《民立报》主笔，南北议和时为南方代表，可以说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章士钊对赴法勤工俭学很支持，他向上海工商业家募捐，得到一笔 20000 元的巨款，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1945 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其间，蒋介石对毛泽东总是心有不甘，常有加害之意。一次由覃理鸣设宴，让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小 12 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为感激。

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便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在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分析形势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了章士钊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见解。他说：“他的这一意见应该引起重视。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他为了挽回战局，特请章士钊等来与毛泽东面谈，以求和谈之路。于是，由章士钊等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同年2月北上，先到北平，然后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后，先接见了章士钊，就有关事项交换了意见，征求了他的看法后，再接见其他二位代表。不久，国共两党和谈再次破裂，章士钊与当时不少知识界人士都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每逢熟知的老朋友，便极道毛泽东之贤，而这时他的家眷尚在上海国统区。

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城刚解放的当天，便有4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站在章士钊家门前值班，保护章先生的家属。同年秋，章士钊在香港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便北上北平。不久，章士钊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便把在上海的家属接往北京定居。

章士钊一生得罪人甚多，其中尤以与鲁迅的关系惹人注目。全国解放后，有人引用鲁迅的话，说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人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也将章视为“三·一八惨案”的罪魁，弄得章的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了解章士钊，也知道此事的真相。尽管他非常推崇鲁迅，但也十分敬重章士钊。对这件事毛泽东知道，如不在一定的场合予以澄清，他不好为章说话，更无从帮助。后来毛泽东想出一个主意，特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七八位高层领导人在他家中聚餐，请章士钊参加，由章在这样的场合说明他与“三·一八惨案”以及与鲁迅的关系。章讲过后，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转告许广平。从此章士钊才顺利得多，并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章士钊究竟与“三·一八”惨案有没有关系呢？事实上，当“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章士钊正在天津，早在三个月前，他已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转而担任执政府的秘书长。惨案发生的当天，《世界晚报》登载了一条消息，说“三·一八惨案”的主谋是章士钊。《世界晚报》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消息呢？这是因为章士钊任司法总长时，段祺瑞之子段宏业与《世界晚报》打过一场官司，结果段的儿子胜诉，《世

界晚报》的一些人认为是章偏袒段之子，曾在报上载文攻击章士钊，后又有这条消息的发表。章看到报纸后，认为这是《世界晚报》的蓄意报复，怒不可遏，第二天就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启事”，指责《世界晚报》凭空捏造，意存煽动，将提起诉讼。此举正中《世界晚报》的下怀，遂登长文进行反击。加上章当教育总长时，主张读经，尤其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中结怨很多，因而此事遭到各方面的群起攻击，酿成轩然大波。本来报纸报道消息，误于传闻是常事。如果章士钊冷静一点，等到国务总理贾德耀及全体阁员为惨案引咎辞职时，事情就会真相大白了。但由于章的性格爽直，当时刚过不惑之年，正处于得意之时，容不得报刊上如此凭空造谣诬陷，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章士钊如不是毛泽东亲自为之正名，后果不堪设想。

1957年，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共产党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岂料，不数日，“反右”斗争接踵而起，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士钊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章士钊在家闷闷不乐。这时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其女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上前劝说。“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毫不听劝，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章士钊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

“逻辑”一词为章士钊首创。在这之前，严复将它译为“名学”，章认为不妥，改为“逻辑”，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从此流传开来。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教授的也是“逻辑”课。其成果《逻辑指要》1943

年在重庆出版。解放后，毛泽东得知章士钊过去有过这方面的著作，一次碰见他时，就问：“行严先生，听说您过去曾有过逻辑方面的著作，是否能够拜读一下？”章士钊一听，便知道是指他过去写的《逻辑指要》，便回答说：“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如果把这本书给您看，岂不是侮辱您了吗？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是学问方面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章士钊只好把《逻辑指要》一书借给了毛泽东。

过了3个月，毛泽东邀章士钊前去聚谈。他到时，只见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他的原著。毛泽东坦然地对他说：“行严先生，我对此书已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过了。这些年来，我阅览的有关逻辑的书也不算少了，但大多数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不足称为专著，独先生吸取中国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可以说是仅见的一种……”

“主席过奖了，还是多提些意见。”章士钊不好意思地说。“根据我的意见，此书足可作为今日的参考资料，宜于印行。”“承蒙主席错爱。”章士钊说，“我的观点比较旧，即使要出版的话，有些地方还需改动。”

“这就全由先生做主了。”毛泽东说，“目前中央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套《逻辑丛书》，先生的大作是否即可作为其中的一种？”“可以。”看到毛泽东如此诚恳，章士钊只好答应。

1961年《逻辑指要》经过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自然赠送给了毛泽东一本。当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援助赴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子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然后，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那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总有一位秘书送两千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一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了，就对身边的勤务人员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一位秘书又送去两千元。这时章士钊已经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收到这笔款的时候，他激

动得双手发颤，对家人说：“主席想得到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

章士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喜欢柳宗元的诗歌文章，几十年来，只要有时间，便认真阅读，并写下一些心得，题名《柳文指要》。毛泽东得知此讯息后，请章士钊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一百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读后，对这部著作兴致很高，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6月26日，毛泽东还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封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舍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兴致极高，读了一遍以后，还想读第二遍。“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对这部巨著的初步评价。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是恰如其分的。

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了一遍。7月18日，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信中的“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信中所说的“高先生评郭文”指的是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指出：“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把其中的错别字改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较而特显其壮大，即不多论。”然而，毛泽东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就文学谈文学的评价。他特意删掉了其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国中将无人焉，不能参与文治光华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相随而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这里，毛泽东把文学评价与政治、经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联系起来。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即“人民大众”和“发展变化”，而这一点正是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缺少的。

对于“跋”中原有的“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所受长者督教”等用语，毛泽东均将它们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友人督教”等。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书稿所下的功夫。

正因为如此，1966年3月，章士钊在为《柳文指要》所写的“跋”中，写下了“上部缮就，经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

并改正其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讥朱竹垞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

对于章士钊在 80 多岁高龄时完成的这部《柳文指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正是指的这一点。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古文运动”的宗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这种认识无疑具有现代民主意识。他在为屈原的《天问》作答的著名《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为“唯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他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以无神论的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做法，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毛泽东是十分赞赏柳宗元的哲学思想的，他说柳子厚出入于佛老，唯物主义。他认为，柳的《天对》自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作了这么一篇。基于此，毛泽东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也称赞文史学家扬柳抑韩的论著。1965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把《柳文指要》书稿批转给康生阅读，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还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并附信给康生：

康生同志：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 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唯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做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从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柳文指要》是赞美有加的，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入胜之处”，“可谓‘解柳全书’”。

但他并不完全赞同章士钊对柳宗元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存在的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甚至体现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论观点。

“文革”开始后，虽然毛泽东早已批准同意出版《柳文指要》，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当《柳文指要》真的要出版了，康生便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的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在信中还嘲讽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章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士钊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正是由于这封措词强烈的信，促使《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90岁高龄的章士钊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始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柳文指要》这种看似“四旧”的书籍能出版，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意外。由于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和“阶级性”，不能不使当时的一些理论家和权威们大惑不解，不过，透过这部书稿的出版，也让人们看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周恩来还将一套《柳文指要》赠送给与尼克松同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做纪念。周

恩来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以此向美国人说明我们并未摒弃文化遗产。

1973年5月，身负祖国统一大业重任的章士钊再次赴港。那天，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他眼圈湿润地握着总理的手，表示这次去港，一定要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一定要有所成就。一个90多岁的世纪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这样起身了。

章士钊到香港后，先见到了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人，故旧见面，颇多感慨，都为50年代那次没有成功的谈判感到惋惜，并表示要继续为祖国统一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但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月下旬便病倒了，且终不见好转。周恩来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三节 毛泽东的学术知音范文澜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着一套《笔记小说大观》。这套书是范文澜在延安时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生前十分珍爱，始终带在身边。30年间，这两位20世纪政治、学术界非凡的人物，围绕着著史、读书所结成的深厚友谊，堪称20世纪学术史上之佳话。

范文澜是个对待学术非常认真的人，他有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1922年，范文澜应张伯苓之邀，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来又登上南开大学的讲坛，主讲“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且教材都是他自编的，他的课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得到梁启超的好评，年轻的范文澜开始在文史界崭露头角。然而对学问有浓厚兴趣的范文澜，从那时起，不断地卷入革命的洪流。1927年5月，因为他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在张伯苓帮助下才得以离开天津。1930年9月，范文澜在北平的几所大学教课，

阎锡山派兵查抄他的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被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营救获释。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到了抗战时期，范文澜又一次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出狱后的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中共中央对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来到延安很重视，不久便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俩人因这样一段前缘，加之他马列学院研究室主任的身份，自然少不了交往。范文澜与毛泽东一样，个子很高，还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两人每次交谈，他都很认真地倾听毛泽东的意见。有一次，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起因。两年后《中国通史简编》终于出版，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

出了科学的著作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高兴的毛泽东还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

对范文澜来说，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的思想理论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研究领域来说，在此之前，范文澜在大学任教期间，开设的仅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尚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适逢时会地转向中国通史新领域。这一转折，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诚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但范文澜通向唯物史观，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自他1925年在南开大学与师生一起参加反帝大游行以来，在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北平，他因接触革命者和进步学生，谈论共产主义而两次被抓进监狱。到开封后，他组织抗战训练班，编辑《游击战术》一书。该书在河南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由此被误认为“游击专家”。他在中原游击区时，对于当地所能找到的革命理论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日寇飞机在不远处扔炸弹都影响不了他，他已完全沉浸于书中。来到延安后，根据地干部群众蓬勃向上、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极大地教育、感染了他，延安精神滋养、造就了他，使他的史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

此外，范文澜对中国的经学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过《群经概论》一书。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便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闻知，也来听讲。连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

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国近代史》（上册）是范文澜的又一代表性著作。学术界评价这部名著造端宏大，材料新颖，前驱先路。并称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新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长达几十年。

范文澜创辟和拓展近代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样是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影响。首先，毛泽东就范文澜作中国经学史的讲演写的信，对范文澜的触动很大。

范文澜在延安工作的马列学院后来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毛泽东曾委托他编选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毛泽东得知此书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兴，亲为此书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后来此书便以《国文读本选注》为名出版。由于范文澜对毛泽东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坏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建国后，范文澜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他的一项重要业绩，便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消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这便是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这是一项大

型的综合工程，共计 60 册，全册 2000 余万字。《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确实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范文澜精通中国古代史，又精通近代史，而他从整个人民事业的利益出发，更强调近现代史是研究工作的重点，强调研究工作应该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下面一件事例突出地说明他和毛泽东对此观点的一致：1958 年 4 月 28 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 10 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范文澜受到毛泽东又一重要影响，是积极地提倡和实行百家争鸣的学风。

“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 1956 年提出来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 1953 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提出了。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形成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派，毛泽东当然熟知这种情况，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最

早向史学界提出，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故 1953 年 9 月 21 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即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当时，范文澜即建议在这个会上考虑把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讨论的底稿。1956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方针，范文澜在《学习》上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结合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1958 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演讲中，他以鲜明的态度，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范文澜不愧是学术研究中奋发独立精神的有力提倡者，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百家争鸣、虚心接受批评以改正错误等，与百家争鸣学风完全是相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追求真理，才能对中国历史获得科学的认识。

范文澜在史学界提倡百家争鸣，本人更模范地执行。他很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自己又勇于提出并坚持对古史分期的见解。他和郭沫若关于古史分期的主张不同，两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讨论，以后在著作中分别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也没有改变基本观点。但他们共同领导史学界的活动，彼此推重，并没有因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存

在丝毫宗派之争、门户之见。范文澜本人在近代维新派大受贬低的情况下，勇于讲出“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话，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形势下，他敢于挺身而出，“保”帝王将相，“保”王朝体系。他自己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对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几次发表文章，主张分为四个时期。当刘大年等几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学者准备写一部近代史，并提出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的时候，他完全赞成照这些学者的看法，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他的身体力行，对于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对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他曾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毛泽东具有渊博而娴熟的历史知识，仍旧赞许范文澜的著作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是极其难得的，他不愧是范文澜学术上的知音。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自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然后举出古今中外的例子：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问、青年列宁的学问、青年黑格尔、青年达尔文、青年牛顿、青年孔夫子、颜渊、贾谊、诸葛亮、王弼、康有为、梁启超等。讲话时他还特别对在座的范文澜说：“范老，你是历史学家，讲错了你可要纠正啊！”毛泽东不愧为评说历史的高明的行家，他的评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祖国悠久的历史有深厚的感情，对于有卓越建树和非凡谋略的人物充分地肯定，他的论说寓含着深刻的哲理。二是着重阐发历史遗产中具有民主性、人民性和智慧过人、具有辩证法的东西，将之特别彰显出来，赋予古代的智慧以新的意义，为今人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借鉴。范文澜的史著在观点、认识上与毛泽东是息息相通的，他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站在人民的立场，指点江山、评论千古，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因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66年当“文革”发生时，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要将他置之死地，范文澜也自感处境很危险。当年国庆游行，范文澜仍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当时，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这对长时间陷于郁闷无奈、无所作为的范文澜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立即兴奋起来，找人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订计划，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续写1919至1949年的现代史部分。遗憾的是，这一切均未能如愿，范文澜于1969年7月29日辞世。

毛泽东和范文澜各自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又同样具有浓厚中国民族的特色，因此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毛泽东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的作品正是代表这种风格的上乘之作。他和毛泽东一样，精熟于古代的名家名作，对古典文学有高深的素养，且擅长于写古文，善于从当代汉语和人民大众活的语言中吸收丰富营养，因而他的著作既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又有厚重、洗练、生动的风格，气势磅礴，文采斐然。范文澜与毛泽东有长达30年的深厚的友谊，这对范文澜的学术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除此外，范文澜还很敬佩毛泽东诗词恢弘的意境、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1946年秋，他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读到毛泽东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为毛泽东抒发的雄伟的意境和词的高度艺术成就而欣喜激动，写了《沁园春译文》发表在《人民日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非凡胸襟和才华的景仰，这篇译文，也表现了范文澜的文学审美情趣和高超的文字功力。

第四节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学术往来

1926年春天，由于瞿秋白、林伯渠的推荐，郭沫若应广东大学之聘，到该校任文科学长。3月23日，抵达广州后的郭沫若到林伯渠家拜访，适逢林不在，但在这里却遇到了一位瘦高身材、两眼炯炯有神的客人。客人主动迎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毛泽东。”郭沫若急忙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是郭沫若。”两位各自对对方都久闻大名，而未曾谋过面的名人在这里偶遇，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首先关切地问了郭沫若在路途上的情况及身体状况。郭沫若在向毛泽东表示谢意后，即介绍了旅途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他到广州是来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毛泽东说此事他早已知道了，很好。郭沫若在毛泽东去世后曾对人说过：他到广东任职，毛泽东可能是推荐人之一。或者瞿秋白、林伯渠事先和他商量过，起码也是在此事决定后，他们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接着向郭沫若谈了广东及全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把广东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向郭沫若做了很详细的介绍。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就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会面的情景。从此他们开始了整整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和交往。对于这次会面，毛泽东给郭沫若的印象，郭沫若在多年后写的《创造十年续编》中这样写道：“人字形的短发分摊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声音低而娓娓。”这一印象许多年后，还长留在郭沫若的脑海中。许多年后，他向人描述起他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形象——瘦高的身材，慈祥的面孔，两眼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说起话来很慢，声音很低时，虽已到晚年，其记忆仍然十分清楚，可见他初次见到的毛泽东曾给他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1926年初夏的时候，毛泽东又到郭沫若在广州东山龟岗的寓所拜访过郭沫若，并邀请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做报告。郭沫若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不久，郭沫若就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了一次题为《革命文学问题》的报告。做报告那天，毛泽东在讲习所门口迎接郭沫若，到休息厅略事休息，他即陪同郭沫若到报告厅去做报告。在郭沫若做报告时毛泽东有时坐在后排听讲，有

时又在报告厅后面走来走去。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向郭沫若表示了感谢，并说报告内容丰富，鼓动性很强。随后，毛泽东还聘请郭沫若担任了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以后，郭沫若参加了北伐。“四·一二”政变后，他由上海回到武汉，与毛泽东又在武昌会面了。经过战争的洗礼，他们的会见倍感亲切。他们除谈论了在分别这段时间内各自的经历和见闻外，毛泽东还特别对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讨蒋檄文大加称赞，并鼓动郭沫若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写出更多更好的鼓舞大家斗争的文章来。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前后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他对中国古代的历史、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写出了一批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同时还写作和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和诗歌。而毛泽东在这十年间则领导工农红军，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但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和郭沫若天各一方，他们之间的交往也随之中断了十多年。

“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冒着生命的危险，别妇抛雏逃离日本，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即和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不久就传来了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的欢迎和指示。他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逆流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的工作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1941年冬至1942年春，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郭沫若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6个历史话剧，形成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上的一个高峰。这些话剧在重庆上演，尤其是《屈原》的上演，轰动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为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对民主进步力量的压迫、围剿和法西斯统治，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这期间，郭沫若曾托人将《虎符》的剧本带到延安赠送给毛泽东，并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在读完剧本后，于1944年1月9日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往重庆：

董老：

请将下电转交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十分有宜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毛泽东

郭沫若收到董必武转来的电报后，深受感动和鼓舞，也更增强了他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也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延安评剧院的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称赞道：“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不过这封信，直到解放后很久郭沫若才见到。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300年前的甲申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了明朝的首都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今景山）。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篇长文，发表于3月19日至22日的《新华日报》上。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国共两党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迫不及待地为此文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攻击，可见此文把他们刺得多么疼痛难忍。还有一批御用文人从旁摇旗呐喊，为他们的围攻助威。

对国民党当局对这篇文章的围攻，郭沫若很气愤，他在4月间写给美国朋友费正清先生的信中说：“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字，不料竟遭应该以革命为生命的某报（指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于3月24日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我们的官方最近答复贵国的舆论时，说我们中国最民主，言论比任何国家都还要自由，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言论自由

真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啊。但我并不畏缩，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5月中旬，林伯渠同志到了重庆，他告诉郭沫若，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特别重视，已决定把它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广为印发。这使郭沫若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6月下旬，郭沫若又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边区印行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他一面回味毛泽东的评语，一面摩挲着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这两本书，感慨万千。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写信，表示衷心感谢，这时他的心已飞向了延安，飞到了那些老朋友、老同志的身边。更使郭沫若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1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亲笔回信，派专人带到重庆交到了郭沫若手中。信是这样写的：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做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1944年11月21日，于延安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亲切、坦率、诚恳、谦逊。既表达了他对分别多年的老朋友的思念之情，并对其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又热切地希望郭沫若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作品。毛泽东说他当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这让人认为他并不是在讲谦虚话，而是敞开自己的心扉向老朋友讲他当时的心情和思想状态。

对于毛泽东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文章这件事，郭沫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放在心里。解放前因资料缺乏、生活动荡，未能动笔，解放初期也因忙于国内外的工作而无暇顾及。1960年春天，他终于决定动手，写一部30万字左右的太平天国史。他让秘书找了几个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协助他的工作，并反复向这些助手说：工作要从史料整理着手，要特别注意史料的考证和辨伪。他对这篇文章的体裁和章节都有了比较全面的考虑。但由于其他事情的冲击，这一计划最后还是没能实现。对此事，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就一直盼望到延安去，那里有他许多的老朋友、老战友，那里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更有毛泽东在。

1938年初，他在广州写给准备去延安的于立群的《陕北谣》中就唱出了这样的心境：

陕北陕北朋友多，请君代问近如何？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在一块。

但郭沫若到重庆后，用他的话说，他是住在一所大的牢狱中，足不能越青木关一步。有一次一位朋友约他去华蓥山旅游，他们动身后，国民党就造谣说郭沫若要逃跑，而加以阻挠，使他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在重庆附近转了一圈就回来了。所以，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这个共同的愿望，长期无法实现。

1945年8月，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郭沫若怀着万分喜悦的心

情到飞机场去迎接这位思念已久的老朋友。当毛泽东出现在机舱门口时，当毛泽东和郭沫若两双手紧握时，郭沫若高兴和激动得两眼都潮湿了。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和郭沫若曾多次会面。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和郭沫若等在红岩村共进晚餐。在餐桌上，大家谈起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郭沫若认为，他还应和以往一样，坚持原则，态度应该明确，应该更强些。毛泽东肯定了郭沫若的意见，认为不要靠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合作。同时也指出：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会是很曲折的，在思想上应有所准备。另一次是在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与郭沫若、周谷城等一批文化界的朋友们在一起聚会。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问毛泽东：“过去你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风趣地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指着身旁的郭沫若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接着，毛泽东和郭沫若谈起了北伐，又谈到辛亥革命时湖南的情况和郭沫若写的当时四川的情况十分相似。当然，毛泽东和大家谈的最多的还是时局问题，以及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及分歧。最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他就将戴在手上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珍视这件礼物。这只手表他戴的时间很长，表带坏了，换个表带还戴；机件出了毛病，经过修理他继续戴，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谈起这件事，说这只手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要叫别人拿去。这件事虽不大，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的深厚情谊。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郭沫若《凤凰涅槃》

1949年3月25日，北平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在一片欢欣的气氛中迎接毛泽东等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到达北平。

那一天，郭沫若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身着翻领军大衣，显得身材更加魁梧。他细细地打量着郭沫若，说：“你瘦了，但精神特别好。”那天，郭沫若等人随同毛泽东阅兵，绕场一周。全副武装的10万大军队列整齐，岿然挺立。郭沫若望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忽地想起了8个月前他在香港做的演讲中，对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赞颂：中共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今天的人民领袖了。他凭着他的卓越的思想。高远而稳健的政见，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救星，我们中国人民有了他，事实上是值得庆幸，值得夸耀的。这评价发自肺腑，出自真心，确非谀词。郭沫若心里清楚，从自己发表这篇演讲到现在，仅仅8个月过去，毛泽东使用他的行动，让中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了，中国有了他的确是值得庆幸的！随后，郭沫若满怀欣喜之情，积极参与建立新中国大厦的伟大工程。为筹备新政协的召开，他一会儿去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住所，一会儿去中南海勤政殿，忙得不亦乐乎。

新时代的列车在疾驰，天降大任于近花甲之年的郭沫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郭沫若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日理万机，依然是精力充沛，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郭沫若在旧中国留下的百业俱废的基础上，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解放前，郭沫若就已写了有关文字改革的书面意见递呈毛泽东，建议：第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第二要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郭沫若竭力倡议，报纸书刊的文字左起横排的提议终于得以在全国推广实行。

由于工作上的缘故，解放后郭沫若与毛泽东时有交往。但是最能体现他们真挚而独特情谊的，还当属同样具有浪漫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和郭沫若以诗歌为纽带，相互赠答的学术往来。1959年，毛泽东作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9月7日，他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读过诗后，于9日和10日两次写信给胡乔木，提出修改意见。9日的信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蹰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说：“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知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1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根据郭沫若等人的意见，毛泽东将《登庐山》中的两句做了修改，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1961年10月，郭沫若观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有感而发，成诗一首，以隐喻当时的国际形势。诗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慨，于是便有了“千刀当剮唐僧肉”的诗句，并将此诗录呈毛泽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无“法”无“天”的“造反”英雄孙悟空，是毛泽东颇为欣赏的人物。他闹天宫、闯地府，敢于跟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其足智多谋而又爱憎分明的性格，给少年时代就酷爱读《西游记》的毛泽东打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可以说，在毛泽东充满无畏、传奇、浪漫色彩的一生中，孙悟空反抗压迫、征服自然的斗争精神，对毛泽

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诗，很感兴趣，读后即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读了和诗，觉得很有味道，细加吟味后，当天依韵又和诗《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看了这首诗，于1962年1月12日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剮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好了。”同时。毛泽东还将他的新作《咏梅》词，送给郭沫若看。

1959年，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其中有“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大家对“黑手”解释不一，有人解释“黑手”指的是反动派，有人释为农民。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黑手到底指谁？”毛泽东说：“指反动派。”于是，郭沫若感慨：毛主席的诗人人爱读，处处传诵，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

1962年筹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他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6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些诠释性的文字，以帮助青年读者阅读，郭沫若欣然同意。5月1日，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写成》，发表在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上。之前，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阅的小样，立即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毛泽东认真阅读了郭沫若送来的小样，他不赞成郭文对《娄山关》一词所作的解释，于是全部删去

郭文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文字，并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写了五六百字的一段文字在小样上：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岸，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这是词作者对这首词所作出的权威解释，这个解释廓清了毛泽东诗词论家中所存在的争论问题。可惜，由于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的原因，郭文没有按毛泽东改过的文字改排付印。但是，从毛泽东认真修改郭沫若文章的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学术情谊是很深的。

1964年后，随着毛泽东诗词的发表，郭沫若又写了不少诠释文章，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等。其实，就是否有必要出一本关于主席诗词的统一解释的书，郭沫若曾讨教过毛泽东。毛泽

东为此回复道：“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但是，郭沫若对于写毛诗的诠释文章仍然乐此不疲。

不管怎么说，作为世所公认的当代伟大诗人之一，毛泽东追求诗词日臻完美，直到金声玉振，字字珠玑，为世人所称道。他与郭沫若这样的诗词界的宗师大家的直接交流，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中国传统国学文化大师的底蕴，而这种底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所必备的。

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书法十分喜爱，推崇备至。他说：“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泽东的书法是‘龙飞凤舞’，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毛泽东创建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参观“黄洋界”，感触颇深。当地的负责同志对郭沫若讲，他们计划在“黄洋界”立一块纪念碑，想把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词的手迹刻在上面。但现在找不到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希望郭老帮助。郭沫若回到北京后，多方查询，始终未能找到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无奈之下，郭沫若只好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希望得到《西江月·井冈山》的手迹。因为郭沫若考虑，如果提出立碑之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的。信发出后，很久没有消息，大家都认为此事没有指望了。然而，在1966年7月中旬的时候，郭沫若到了武汉，等待陪同毛泽东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们。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给郭沫若送来一封信，他打开一看，竟然是《西江月·井冈山》的手书。手书是写在8开大小的宣纸上的，共10多张。这出乎意外的收获让郭沫若高兴极了，他激动地让秘书把毛泽东的诗词手书拼摆在客厅的地毯上，自己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欣赏。随后，他又让摄影记者把题词拍成了照片，洗好后，立即寄给了井冈山管理局。原件送到荣宝斋装裱加框，悬挂在郭沫若办公室正中的墙壁上，直到现在，已成为郭沫若故居珍藏的一件特别珍贵且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预示着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兜头倾下。接着吴晗、邓拓、廖沫沙、田汉、夏衍、翦伯赞……一个接着一个，先后成了批判的靶子。突然而至的政治风暴不免使郭沫若感到眩晕、迷茫与失落，隐隐地，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他担心，这场凶猛无情、吞噬一切的洪涛迟早也会将自己卷进去。

1966年初，大批判进入高潮，郭沫若向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人张劲夫递交了辞呈：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但是，郭沫若没有能够辞去所有职务，也没有祛除无尽的烦恼。“文革”期间，郭沫若也是在劫难逃。1966年6月北京大学首先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亲自下令：要对郭老加以保护。郭沫若幸运地，还算是比较平静地度过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头两年的风风浪浪。但是，从1973年起，险恶的政治风暴还是向他扑来。事情的缘由是因为不久前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郭老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但毛泽东还是认为，郭沫若的历史观点有对有错。他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江青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把郭沫若的著作摘录印发，再由基层单位大量翻印，准备大规模地、公开地对郭沫若进行批判。毛泽东发觉此一情况，及时予以制止，说：“不能批判郭老。”然而，1974年1月25日下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的近2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还是点了郭沫若的名，说郭沫若是尊孔的。并引用了在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的“《十批》不是好文章”这句权威性的话。已经80多岁的郭老颤巍巍地站立在寒风中，被造反派点名、罚站。其羞辱、悲愤的心情无以言状。

但是，最使郭沫若感到悲痛欲绝的是，1976年1月8日曾给他无尽关怀和爱护的周恩来总理竟先他而去了。9月9日，与他有半个多世纪交往的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初听噩耗，郭沫若简直难以置信。顷刻间，他仿佛觉得一根擎天支柱折断了，“天柱初移，天恐坠，殷忧难已。”

“四人帮”被粉碎后，郭沫若怀着无限喜悦，写下了那首举国传颂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在生命复苏的日子里，郭沫若渴望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工作。但毕竟岁数不饶人，加上“文革”中受到的精神上的摧残与身体上的直接迫害，郭沫若的身体越来越弱，终于在1978年6月12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甚至目空天下的学问大家离开了我们，也给世间留下了他和另一个伟人之间经久传诵的佳话。

第七章 炉火纯青的楹联艺术

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形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楹联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卓立于文学大家族之林，是极具生命力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楹联这一文学形式，经过一千多年，长盛不衰。

古往今来的很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要都是楹联高手，诸如金圣叹、李渔、顾炎武、王夫之、蒲松龄、郑板桥、曹雪芹、纪晓岚、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等。著名的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学术造诣博大精深，其对联功力也是炉火纯青，他们各自都有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仅就撰写对联而言，后人仍能从这些情真意切的佳联中一窥大师风采。

四位大师中资历和名望最有分量者当属梁启超，他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的篇章，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因此他对康有为的评价自然也格外为人们关注。

1927年，刚刚过七十大寿的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作为弟子的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其为此而写的一副挽联就颇为人们称道，因为这样的对联要写得得体是不容易的：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康有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幸事，不会看到神州陆沉之悲剧。下联颂康有为之功绩，称其逝世对中国文化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悲伤之中见师生之真情。至于二人后期在政见上的分歧，此时已经完全不重要，只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友谊才是人间最可珍视的记忆。

沈曾植为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与王国维交谊甚厚，王一向引为知己。1922年沈去世，王国维悲痛不已，其所写挽联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除却些许过誉之辞外，应当说是对沈曾植的盖棺定论，充分表现了王国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和兔死狐悲之情，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对时局和对传统文化之命运的担忧，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果然，不出数年，也即1927年，51岁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

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数可以引为知己者。陈寅恪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之现实的抗议。陈寅恪因此以他对师友的理解和深情，写下这样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笺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国学大师罗振玉更是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后来陈寅恪又有长诗挽王国维，充分表现了他的悲伤之情，其对王国维之死原因的评价，也成为诸说中最有说服力的，至今依然为学术界重视。不过，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撒手离开这个社会时，却已没有人为他撰写挽联了，面对上世纪60年代处于疯狂中的中国社会，对于陈寅恪的逝世，除了能像陈寅恪哀王国维那样，黯然神伤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至于赵元任，由于所专长是语言学，不像前三位大师的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因此世人知道的似乎少些，但也恰由于其语言天才，在撰写对联方面赵元任也是常有令人叹为观止之作的，其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他为好友刘半农撰写的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上联中之“双簧”指的是新文学运动之初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一件得意之举：当时《新青年》虽大力提倡白话，却很少有人注意，特别是来自守旧派的反响更是冷漠。为引起争论，钱玄同即化名为王敬轩，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章，《新青年》遂以《王敬轩君来信》之名发表，然后在同一期上由刘半农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对这些攻击言论逐一进行批驳。两篇文章一发，果然有效，旧文人见此纷纷出来对新文学指手画脚，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那位林纾老先生。至于下联中的“数人”指的是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成立的一个“数人会”，成员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多是研究语言的著名学者。所谓“数人会”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即“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因为当时这些专家的主要工作是确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而下联中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则是刘半农所写之最为人们熟悉的白话诗的题目。就整体而言，作为挽联还是很精练地概括了死者之一生功绩的，但下联好于上联是很明显的，其好处在于既自然得体，又巧妙地把刘半农最为人们熟悉的诗句嵌入其中，将怀念老友之情与对

其才气的称赞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据赵元任自己解释，也是先有下联才又想出上联凑成一对的。当然，就整体而言，依然不失为一副绝好妙联。

正因为有着诸如清华国学导师们一般深厚的国学基础，伟人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位独步艺林的对联写作大家。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文思敏捷，出口成章，妙笔生花。毛泽东的对联其内容异常丰富，包罗万象，他的对联就像他的诗词一样，大气磅礴，行云流水，凝聚着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对理想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年少之时，毛泽东便显现出惊人的对联功夫。1907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高等小学读书。他得知同学萧子升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便前去借阅。不料萧子升要他对句，并申明对出下句才能借。毛泽东慨然应允，萧子升即兴出了一联句：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毛泽东听了略加思索，脱口而出：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萧子升根本没想到毛泽东有如此才华，佩服不已，当即取书相借，从此与毛泽东结为莫逆之交。

萧子升的上联显然有取笑毛泽东之意，并且出的拆字联：“目”、“贵”为“瞶”。毛泽东以拆字相对：“门”“才”为“闭”。巧妙作对，对得天衣无缝，可见其才。

毛泽东喜欢楹联，更是写楹联的高手。后来，萧子升与毛泽东一同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俩人曾结伴出游，一天傍晚，俩人散步到宁乡县城东北角的风景区狮固山。他们坐在河边，一边谈天，一边欣赏周围的风景。夕阳西下之时，晚霞绚烂，狮固山上的狮固楼在晚霞中，披着一层绚丽的金沙，眼前突兀而立的狮固楼高耸入云，在薄暮中显现出一幅美丽的景色。萧子升触景生情，于是以晚霞中的狮固楼为题脱口吟出上联：“云封狮固楼。”毛泽东望着远处的玉潭舟，对出下联：“桥锁玉潭舟。”

这副对联，毛泽东和萧子升配合得极妙，无论风格、语言、情感上都犹出一人之手。他们抓住宁乡有特色而又为人们所熟悉的景点来

对答，尤其是用拟人的手法将“云”与“桥”描绘得相得益彰。一个“封”字，写出了彩云的飘动。一个“锁”字，则摹出了玉潭泊舟的宁静。一动一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静止的楼衬出了飘动的云；流淌的水愈显出玉潭泊舟的静，真是相映成趣。

游学期间，俩人还曾拜访湖南安化县饱学先生夏默庵，夏写了“绿树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放在桌上，以测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见后以“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相续，此下联一出，令夏先生对毛泽东刮目相看，立即以礼相待，临别时夏先生还特意赠送毛泽东与萧子升八块银元做盘缠。后来，随着人生历程的改变，尤其是逐渐成为一个革命领袖之后，毛泽东的楹联中除了文思的巧妙和睿智，总有一种革命者，或者说领袖人物的气魄和底蕴透出。这种气魄和底蕴让他的对联总是充满了一种大气和磅礴，一种高屋建瓴的襟怀，一种言简意赅的气势，一种领袖人物的风采，试举几例：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

——毛泽东题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坪军民大会

1928年3月30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桂东县沙田坪，发动沙田地区二十多个村子的贫苦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帮助建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政府。4月在一次军民大会上，毛泽东不仅登台演讲，还为大会写了这副对联，贴在会场前的两根粗大柱子上。这副对联，既表述了工农革命的现实又说明工农革命的目的，为广大工农民众所易理解与接受，起到了动员广大贫苦大众起来参加工农革命的作用。

1934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等人来到离中央政府所在地沙洲坝不远的乌石垅，帮助红军家属犁田翻地。田间休息时，有一老者深知毛泽东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便想讨教讨教革命的道理，于是出了一上联曰：

雾锁高山，哪个尖峰可出

毛泽东听后，眼睛凝视了一下田野，看见插在田头的红旗迎风招展，应声答曰：

火烧原野，这杆红旗敢行

众人听后，齐声喝彩。一位路过的私塾先生被毛泽东的对联吸引，他以路旁的小溪流为题，出了一个上联：

涓涓小溪，岂能作浪

此联所描绘的是山涧溪水细水慢流的情状，以“岂能作浪”反语相问，深含寓意，留给人们以丰富的想象余地。此联一出，大家一时无言以对，热烈的场面顿时肃静下来。有人只好点火抽着旱烟，把目光投向毛泽东，期待他作答。然而，就是那点烟的火柴杆上闪烁的点点星火，触发了毛泽东的创作灵感，他随口对道：

星星火炬，可以燎原

“星星火炬，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开展井冈山斗争期间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当时为红军坚持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回答了一部分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当时的场面又一次触动了毛泽东，使他敏感地想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名篇，它与“涓涓溪流，岂能作浪”正好构成一副妙对。

“星星火炬，可以燎原”这下联既工整、贴切，又饱含革命哲理，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以至私塾先生一听，禁不住伸出大拇指“妙！妙”地高声赞扬起来。

要做人民的先生

先做人民的学生

——毛泽东为湖南第一师范书题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曾在湖南一师与毛泽东同学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请毛泽东为一师写校牌并题词。毛泽东欣然答应，写了校牌“第一师范”四字，并写了这两句题词。表面上看，这两句题词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对联，但由于含意深刻，相反相成，字数一致，节奏对称具有对联艺术形式美的特征，平凡之处见伟大，故广为流传，深得人民喜爱。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书题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号召全国青年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然而，有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在一次会议间隙，时任体育总会秘书长的荣高棠特地向毛泽东请教，问这三好是不是他提出的？毛泽东有些不解地反问荣高棠：“为什么啊？”他说毛主席题词怎么头一条是身体？不是学习和工作啊？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怎么学习啊？你身体不好怎么工作呢？后来，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在政务院会议上讲，为什么身体好要放在第一，因为德智体全面发展，身体是个基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身体好了，生产力才能发展。第三呢，你身体好了才能保卫祖国啊！50年前，新中国的体育工作，就是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方针的指导下而不是金牌意识开始的。

1952年6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前，荣高棠与中华体总的同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恳请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信刚发出，他们突然觉得有点冒失——应该给毛主席提一个词呀，你不提，就说叫他题词，叫他题什么词啊？他怎么题啊？题什么字啊？可是，没过多久，中央办公厅就通知荣高棠去取。取来一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映入他们的眼帘。这12个字，从此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方针，直到今天，仍在指导着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毛泽东题写的这副对联高度概括，恰到好处，短短的12个字把新中国体育事业是干什么的，该怎么干阐述得清清楚楚。虽是一副宽对，却是对联中难得的精品。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题词不单有一般祝贺的用意，更在于指导意义，常常既是指导方针，又是指导思想。新中国建立几十年来，开展体育运动，进行体育工作，都是遵循这副对联的思想的。这副对联的构思非常精妙。首先，说明了发展体育运动的重大意义，

在于增强全国人民的体质，这是强种强族的大事，这是洗刷帝国主义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耻辱的大事。其次，规定了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性的目的和宗旨。第三，揭示了发展体育运动与增强人民体质之间的因果辩证关系。时过境迁的今天来看，现在的竞技体育、金牌追求与毛泽东当年的题词其初衷之间是多么相去甚远呀！

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毛泽东题写的另一对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951年5月苏州市一个叫陈永康的8岁小朋友抓特务的事迹广为流传，后来还被写进了小学教科书。毛泽东获悉陈永康抓特务被打伤的事迹后，亲笔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并派人制成锦旗赠给陈永康小朋友，同时向全国的青少年发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半个世纪以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话，一直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小学生学习、奋发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话同样是个宽对，对联的要素是只要对仗成立。从局部词性看，“天天向上”，“好好学习”不能说很工，但它符合对联的基本原则，注重结构，淡化词性。好联从来就是在夹缝中生存，在对联中，不死抠词性，而是注重大结构，无疑是一种大家风范。毫无疑问，这样的对联只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才写得出。

毛泽东故居数万册藏书中，不乏一些对联方面的书籍，如《楹联丛话》《巧对录》等，还有《楹联墨迹大观》等书法碑帖。这些书籍之中，都留有毛主席阅读后所留下的批注与圈画，表明其阅读之认真、心领神会的欣赏及所作研究。

清代文学家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早在道光年间便有刻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发行，毛泽东阅读并在上面批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书中叙及康熙年间孙髯题昆明大观楼联时流传甚广并颇受推崇的一副长联，此长联至今仍悬挂于大观楼上。长联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帙，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

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此长联文辞工整，音韵铿锵，才雄气猛，气势磅礴，境界博大深远，惊于一时，传颂四方，誉为“天下第一长联”。毛泽东对该联极为喜爱，为此也读得甚为仔细，还细数了字数，指出为“一百八十字”，以纠正梁章钜“一百七十余言”的不准确的说法。达 180 字，上下联一横一纵，囊括了广阔的空间与时间，目极云空，远溯汉唐，包容了深邃的历史感受和现实的慨叹，开启了长联风气。被后人推为“一副长联，一部春秋”。但梁章钜则认为，此联虽有气势，“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不同意梁章钜的这个观点，认为“此评不确”。毛泽东认为该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可谓旗帜鲜明。

与梁章钜同世的著名学者阮元曾给梁章钜写信，认为原联中歌颂了汉、唐、宋、元诸朝，漏掉了清朝是不应该的。阮元便自己动手改了这副长联。梁章钜在书中把阮元的改联也列了出来，毛泽东对阮元的改动持否定态度，在书中批道：“死对，点金成铁。”

此外，毛泽东在一本清版的《楹联丛话》中读到孙髯这副长联时，也加了圈点。他细心地将阮元修改前后的两副楹联做了对照，将阮元改过的几处都用重线标了出来。在另一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载录这副楹联处，毛泽东又批注：“此阮元改笔，非尽原文。”

从以上三本书中毛泽东对这副长联的圈画、批注可以知道，他至少读过三遍，每读必有圈画、批注，足见其认真、仔细。

毛泽东在批注中还写道：“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评价的是康有为晚年卜居杭州，浪迹西湖时作的一副楹联，全文是：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堤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霸业销

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是康有为 1920 年 4 月游湖时撰题，曾悬于西湖三潭印月御亭亭柱上面。毛泽东认为此联“较短，颇可喜”，主要是从艺术上推崇的，亦可见毛泽东对该联印象之深刻。

毛泽东不仅从书本上读楹联，而且对悬挂在各地的名联有着特殊的喜爱，并多有评价。特别是建国后，他常乘巡视各地之便，游览名胜古迹，鉴赏楹联匾额、历代碑刻。

1952 年 10 月，毛泽东游览开封北城古迹铁塔和龙亭。薄暮时分，毛泽东登上龙亭。龙亭东侧石门两侧镌刻着康有为的题联：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

毛泽东长时间地凝视着这副对联，非常高兴地叮嘱秘书抄录下来。

1958 年毛泽东参观了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毛泽东对后人凭吊杜甫草堂的诗句石刻看得十分仔细，盛赞杜诗是“政治诗”。他对大门旁那副清人顾复初的名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蜺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用轻微的声音诵读上联，脱口说道：“是集杜句。”然后走到西头看完下联，赞赏地同周围同行者说：“好！”紧接着，毛泽东来到武侯祠。他先到碑亭详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看了此联，反复吟诵。直到晚年，他还提议让四川省负责同志好好研读此联，以及新都宝光寺何元普一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到湖南长沙视察。一天，两人同乘一辆小轿车浏览长沙市容。车子行至汀江中的橘子洲，目睹江面上白帆点点，百舸争流。毛泽东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与同学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景，不禁豪兴大发，于是提出以对联互娱，他即景咏出上联：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这上联出得巧妙，即景抒情。“舟”与“洲”读音相谐，要对出下联，难度较高，以至素有“才子”之称的周恩来一时也未能对出。直到后来小舟行至市内天心阁，见一群鸽子从阁内飞出，周总理才触发灵感，兴奋地吟出了下联：

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这下联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听了下联，毛泽东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

毛泽东的本性中充满着常人具有的浪漫品质，这点从他的诗歌和楹联创作中便能表现出来。1951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勤政殿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原来，这天正是毛泽东与文友聚会的特别日子。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代精英们正值盛年，他们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文采非凡。

聚会正式开始前，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与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两人谈笑正欢，毛泽东见此，顿生雅趣，于是立即戏出上联，并请众人续对：“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

毛泽东浓浓的湘音刚落，在座的学者们无不为其快捷的反应、丰富的联想和精巧的构思所折服。此出句妙就妙在“二胡”二字不仅与当时的语境相切，而且语带双关。为对出合适的下联，尽管大家纷纷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但最终还是无人能续此妙句。此后，这件事虽经当时上海《大公报》披露，但时至今日，竟一直没有对仗工整、贴切自然的下联出现。而毛泽东即兴出句成绝对的故事也由此传为佳话。

在毛泽东所作的楹联中，挽联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其中犹以两副泣母挽联更是让人过目不忘。其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勤劳俭朴、善良贤惠且乐于助人的劳动妇女。她虽然没有念过书，但其美德却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毛泽东也格外敬重母亲。1919年10月5日文素勤因积劳成疾，年仅53岁就不幸辞世，毛泽东悲痛至极。他当时正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因而不能及时赶回参加葬礼，直到中秋节时，才从长沙赶回韶山，重祭亡灵。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悲痛欲绝，泪水潺潺。他跪在母亲坟前，以泪和墨，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共有414字的《祭母文》，并书写了上述两副泣母亡灵名联。

挽联是楹联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寄托生者哀思之余，以精警的文字概括逝者的品格与业绩，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占有特别的分量。在毛泽东的对联中，很多挽联堪称精品，影响深远。毛泽东的挽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雅切，即在对联创作中体现出雅正宏博和古雅深沉的特色，并且力求与所挽对象的身份以及当时的时代特征相切合。毛泽东的对联创作思想使得雅切成为其挽联创作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能成功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则是其特殊身份、杰出才华乃至整个时代的发展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1939年挽蔡元培联：“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只有短短的八个字，却把蔡元培先生的道德文章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凝练出来，再现了一位德高望重、令人景仰的人物形象。

1947年秋，毛泽东为范续亭将军的不幸病逝亲书挽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联语对仗工整，笔力遒劲，感情真挚。而那句挽刘胡兰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更是传诵千古的佳句。其力度、其气势、其底蕴，非大智大慧的领袖人物不足以题撰。

除此而外，毛泽东还写了其他一些挽联，诸如——

为王尔琢作：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为黄公略作：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为孙中山暨抗日烈士作：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为朱德母亲作：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

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为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作：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
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
争胜利慰英灵。

挽彭雪枫联：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
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
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因校方安排的体育活动较少，其中一年竟死
了七名同学。毛泽东对此十分激愤，在追悼会上写了一幅挽联，予以
辛辣的讽刺：

为何死了七个同学

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毛泽东对楹联的喜爱及其创作，源自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质朴情感，是他深厚文化底蕴的展现和延伸，是他哲思畅想伟人风范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留给我们的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怀抱着敬仰而又客观的心态从另一角度接近、认识、了解这位伟大的领袖，民族的伟人、哲人、诗人，从而让我们眼中的国学大师的风采、形象变得越发的清晰、明亮。

第八章 原创性诗人与诗论家

第一节 伟大的诗论家

诗词歌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语言载体，没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好诗好词。对此，毛泽东不仅是位伟大的诗人，同时还是位伟大的诗论家，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 16 岁之前在家乡读的不少儒家经典著作里，辑录着不少诗学理论及观点，那些观点成了中国几千年诗学理论的源头。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如诗言志，思无邪，观、群、怨、赋、比、兴以及附于《诗经》中朱熹对赋、比、兴所作的阐释等等，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至今仍闪耀着理论的光辉。正是这些诗学观，给了毛泽东以诗学意识的有益启蒙，成了毛泽东诗学理论的原始基石。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他还读了大量的文赋诗词曲，还读了不少古代小说，可以这样说，凡是我国文学史上历朝历代的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他大都阅读了。有些作品如《庄子》《离骚》《史记》《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李白、杜甫的诗，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的词他还反复习读，许多篇章都能倒背如流。那时一师诗风甚浓，同学们以诗会友，相互唱酬，已成风气，这对莘莘学子们来说更是放歌颂怀的好机会。因此，毛泽东常与同学唱和诗词，每有所作总是不同凡响。1915 年春，一位名叫易昌陶的同学不幸病逝家中，学校为他开追悼会，还将全校师生写的 250 多首挽诗挽联编印成册。这期间就有毛泽东为易昌陶写的一首五言古风，被诗评家们交口赞之为具有“可以与汉魏乐府媲美”。

《五言——挽易昌陶》：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踟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漾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这首诗通过悼念学友易昌陶，抒发了对亡友的怀念之情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此诗意境更深远，可谓苍凉彻骨，极似汉魏古诗，曹植风格。于迂回婉转、九曲回肠之中催人奋起，以试长剑。从此诗可见，毛泽东五言古诗的写作已较为圆熟，诗中用典和化用古诗较多，达到了大量化用古诗的意境辞句又踏雪无痕的程度。

五言诗如此，七言诗毛泽东也已经熟练掌握，同年，他为罗章龙东渡日本写的一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七言诗即便是放在唐代同类题材的诗篇中，也是可以称之为优秀之作的。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湖水涨连天，舳舻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从这首诗中已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具备了一位诗人和诗论家所必备的深厚的文学修养了。这期间，毛泽东还相当广泛而深入地学习了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一是通过自我研读，如阅读散见于他所熟读的文史著作中的有关文章与论述，如见之于《昭明文选》中的陆机的《文赋》他就读得很熟，且很赞赏。《韩昌黎全集》中不少关于诗的论述他也都悉心研读过，同时他还阅读了不少诗论专著，如他对王夫之的诗论著述就曾相当下工夫地研读。二是通过国文教师的讲授，丰富和增强自己的鉴识能力。毛泽东的国文教师袁仲谦有着极其深厚的古诗文功底。课堂讲授中他既讲文，也讲诗，还结合着讲文论与诗论。就诗论而言，仅毛泽东在1913年10月到12月的两个月间所做的课堂笔记中的内容，涉及面就非常广，且相当丰富。可以想见，在此后的4年多的国文讲授中，毛泽东在诗与诗学理论方面又会汲取到多大的营养成分。

综合毛泽东在一师的诗词阅读、诗词创作与诗学理论三方面的情况看，毛泽东在结束一师的学生生涯时已经具有了十分深厚的诗学素养，并具有了与诗论家对话的学识与水平，如再加精进，成为一位诗论家是水到渠成的事。

毛泽东从走出一师到进驻延安，20年里诗词阅读始终没有停止过，诗词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写出了一些极负盛名的传世之作。同时在与一些诗友如朱德、陈毅、臧克家、艾青等的交流中，也对诗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相应的，甚至是真知灼见的看法。在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常与陈毅阅读彼此的诗词之作，每有心得便促膝而谈，兴之所至常有一些诗学理论的探讨自是必然的。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似乎很少写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点诗兴也没有”，但他却对诗学理论花了相当的工夫进行研究。当时，延安汇聚了很多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其中还有不少诗人，有的还相当的有名气，如艾青、田间、张光年、萧三、柯仲平、何其芳、贺敬之、李季等，都正处于诗词创作的盛年。延安的诗词创作活动非常普及，毛泽东尽管很忙，也时常参加些诗歌活动，听朗诵、看墙头诗，兴味很浓。他还经常与诗人们谈起诗的写作与欣赏，评说古今诗人与诗作，也讨论诗词创作中的某些现象与问题。加之当时诗歌创作中的确出现过一些不大好的倾向，诗人中也有一些争论，都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能不予以关注。这样，毛泽东就似乎有点不期然而然地研究起诗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和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与地位，毛泽东谈诗，较多的是诗与抗日、诗与生活、诗的大众化民族化等问题。他的论述虽不很多，但见解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

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是仅限于诗论本身而论的一个方面。如果放宽视野，从包括诗在内的文学艺术的总体上看，则可看出毛泽东当时对文学艺术正在作战略性的、根本理论原则意义上的思考，正在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进行着深入的探索。这个探索，约从193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起，至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总结大会上作报告止。近6年时间，作为这一探索过程的辉煌成果，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建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这一思想的完整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虽不能代替但却包括了毛泽东的诗学观。《讲

话》中关于文学艺术创作与生活，与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关系的论述，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方向、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的论述，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论述，都是包容了诗的，甚至不妨说是可以直接用于论述诗的有关基本理论的，它留给诗论家们的是如何使这些基本原理诗论化，它奠定了毛泽东诗学的理论基础，为毛泽东诗学构建起了一个基本的理论体系的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 1957 年至 1965 年这八九年间，毛泽东在《诗刊》创刊号上正式公开发表此前创作的十八首诗词，以诗人的风貌走向了人民。他诗情特别高涨，所创作的诗词仅至目前为止公开面世的就有 31 首，比他在江西苏区和长征路上 10 年间留给人们的诗词数量之和还要多。这期间，毛泽东对诗论的兴趣很浓，他有意地就诗论作了多方面的系统性的探索，并且卓有成效。这种成效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研读我国古代诗话词话

我国古代诗话词话著作卷帙繁多，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诗学理论。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藏书中，有不少古代诗话词话集，他大都阅读过，且有所圈画。而圈画较多研读亦不止一次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馀话》和多种版本的《随园诗话》等。其中《随园诗话》，毛泽东最爱读。

其二，与学者、诗人研讨

毛泽东在北京或在外地，常约见或邀请学者、诗人到自己的住处，与他们研讨诗学理论。如与文学史家刘大杰谈李白、杜甫，谈李商隐，研讨他的无题诗；与词学家冒广生谈词的写作，谈词的声韵格律；与诗人郭沫若、臧克家多次谈诗论词，征求他们对自己诗词的修改意见，等等。

其三，总结自己的诗词创作经验

毛泽东一生，诗词创作不辍。同许多名家、大家一样，他创作诗词也有个习作起步，渐次臻于成熟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他每有所作，虽都是有感而发，缘情绮靡，但也确有诗艺审美的追求。从艺

术方法的角度看，长征前的诗词，纪实性十分鲜明，侧重于现实主义，长征途中的诗词，侧重于浪漫主义。建国后，毛泽东则时常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其中不乏《蝶恋花·答李淑一》《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答友人》《卜算子·咏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传世佳作。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建国后的诗词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除了保持此前所形成的豪放雄浑的风格外，有的则显得飘逸，有的则显得质朴，有的典重，有的幽默，有的明朗晓畅，有的凝炼深婉。这虽与创作的题材多样化有关，但也因为诗人在艺术风格上有了多样化的审美追求。

从诗词修改的情形看，毛泽东每有所作，特别是拟公开发表的作品，总是反复修改，除了自己改，还请人改，甚至开小型座谈会，广泛征求修改意见。就所修改的情形看，有的为了求真——能更准确地反映诗词所表现的对象，有的为了求善——加深和拓展诗词情思意理的内蕴，有的则是为了求美——意境的和谐优美，语言的壮丽明亮。这些修改，也都体现着毛泽东对诗学理论的思考与探究。因之，可以说，毛泽东诗词创作历程，也是毛泽东的诗词审美追求、诗学理论探索的历程。或许也正因如此，毛泽东相当重视对自己诗词创作经验的总结。如他给自己的诗词作注释、解说，他同身边工作的同志、友人，有时甚至同外国来访者谈自己创作诗词的感受，他给友人、诗人写信，谈自己创作的甘苦，等等。他多方面反思看书的创作，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研读古代诗话词话，与同时代学者、诗人研讨，总结诗词创作经验，毛泽东在诗学理论的研究、探索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有了新的开拓，终至创建一套完备的诗学理论，成为一位伟大的诗论家。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着鲜明的毛泽东的诗学个性色彩。它散见在毛泽东与各方人士及在各种场合的有关谈话之中；散见在他读古代诗词时所作的批注之中；散见在他致同志、亲友的书信之中；散见在《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等著述之中。

毛泽东诗论，在我国诗学史上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继承我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精粹，又对我国诗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说到毛泽东诗论的贡献，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诗要形象思维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兴起的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持续了几年，颇为热烈。毛泽东的“诗要形象思维”，是对这一讨论的总结性的论断，廓清了这一讨论中的一些理论上的迷雾，有助于这一讨论的集中与深入。重要的是，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形象思维是唐诗的也实际是诗的普遍规律，宋人多数不懂这个规律，以致宋诗多数“味同嚼蜡”。这就大大加强了形象思维在诗的——实际也是整个文学的创作中的地位，深化了形象思维理论。毛泽东还将赋、比、兴引入形象思维，大大丰富了形象思维理论的内容，增强了这一理论的实践指导地位，有了很强的操作性。“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这就给现代新体诗创作克服多年来存在的标语口号的弊端指明了一条必由之路。毛泽东诗要形象思维的理论，精深，简明，且有系统，是对我国诗论的一大发展。

其二，诗要讲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我国传统诗学理论中，没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但却不乏与现代诗论家们所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相近、相似的论述。且现实主义诗论偏多，浪漫主义的诗论很少。评论诗人诗作，对现实主义的显得看重一些，对浪漫主义的则相对少一些。如李白、杜甫同是唐代诗国天空上两颗耀眼的巨星，但后世注杜者多，所谓“千家注杜”，而注李则偏少。“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诗学理论这种传统仍在延伸。以至现实主义成了诗创作的时代大潮，浪漫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被冷落乃至被误解。1938 年 4 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同时又指出：“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说：“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

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这论述是非常深刻的。同年，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毛泽东给该院的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提并论，同等看待，仅就诗学理论来说，其意义便足可弥补传统诗论之不足，匡正当时诗论之偏颇，还丰富了现代诗论。

毛泽东还在一次讲话中说：“搞文学也要有重点，唐诗人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令人喜欢，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这实际上是在提倡浪漫主义。同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新诗的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至此，毛泽东完成了诗论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理论思考，作出了他最终的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对我国诗词发展史，诗论发展史的一个总结，将我国的诗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里程。

其三，旧体诗词可以写一些

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这一观点，作了多方面的理论阐释，精彩深刻，充满辩证法，在现当代诗论中，堪称独树一帜。“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不少主张写新体诗的学者和写新体诗的诗人，宣称旧体诗词已经“僵死”，是“枷锁”、“镣铐”讽刺写旧体诗词是“骸骨的迷恋”，众多的新文学史家则将现代文人学者写的旧体诗词通通摒弃在他们的著作之外。毛泽东主张旧体诗词可以写一些。他在指出旧体有“束缚思想”的一面的同时，又指出掌握了格律就有了自由，这就打破了那些形而上学的偏见，为新的旧体诗词的产生乃至发展、繁荣创造了一个理论环境。他还说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真是意味深长。旧体诗词是我们民族独特的艺术创造，同时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民族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心理。两千多年的诗史证明，旧体诗词体现了我们

民族的诗艺表达习惯，也积淀着我们民族的诗艺欣赏心理。只要旧体诗词没被历史的岁月彻底尘封，就会有它的新的创造者与读者。它是不会断流的。

毛泽东的诗论，由于其理论的深刻性与重要性，加之毛泽东那样特殊的地位与身份，他那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威，所以一经公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学术讨论热潮，发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诗言志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16日下午，当时在重庆的诗人徐迟和音乐家马思聪应邀前往红岩村见毛泽东。毛泽东与他们谈了文艺作品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并对他们的创作表示关心。

徐迟回去后，想起自己有一本精美的册页，便想得到毛泽东的墨迹。他找到乔冠华说：“麻烦替我请求毛主席在这册页上面为中国诗人，或为大后方诗人题几个字，好吗？”乔冠华说可以试一试，问他希望题什么字？徐迟说：“我希望毛主席能给予诗人以指示，我们这时代的诗人应该怎样来创作？”毛泽东欣然为徐迟题了词。当时，旁边有人说，诗应当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没有做声，随即聚墨挥毫，在徐迟的空白册页上写下三个大字相赠：“诗言志。”

后来，徐迟在《重庆回忆》一文中写道：“只这三个字，然而有着许多丰富的含意。诗言志，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基点。诗言志三个字，现今得到了新的内容：诗人言志，言的是人民之志。这是他给予诗人的最有启示性的指示。从这以来，在诗歌工作上，我们是谨守着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

1957年7月4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等人谈话时，又一次谈到“诗言志”问题。他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一路发挥：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前一句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能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颜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

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在这里，毛泽东再次强调“诗言志”，认为“有此志，乃有此诗”。“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毛泽东的这句话，对“诗言志”的含义作出了准确而通俗的解释。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诗中有“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奉钱”之句，表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毛泽东从中继而读出“古代清官的胸怀”，“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

“诗言志”，是中国诗学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美学观点，其源出于《尚书·尧典》，《尚书·尧典》是记录尧和舜两位古代帝王的事迹的。据此记载，有一次，舜命令乐官夔掌管音乐时说了一段话，其中便谈到了“诗言志”。自此以后，“诗言志”便成了中国古代诗学的讨论中心。可以说，历代各种各样的诗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中心，而毛泽东对“诗言志”的认识，无疑发展了古代诗学的本质精神。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诗言志”的进一步的阐发，“发愤”也是“言志”。《诗经·伐檀》，实际就是对于统治者发出的怨怒，就是老百姓借诗所言之志。它的内涵，一言以蔽之，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思想感情。

作为伟大诗人的毛泽东，在他早期的活动和领导革命的各个时期，都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精美的诗词，表达了他在各个时期里的心志

和感情。可以说，这些诗词都是他有感而发的，都是发愤之所作，不是没有心志的无病呻吟。如果以“诗以情胜”而论，可以说毛泽东的诗词都是情胜之作，堪称“诗言志”的精品。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这一年的年底，中央通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即将离开长沙的时候，毛泽东作了《贺新郎·别友》，抒发了“割断愁丝别恨”踏上革命征程的豪情。

1925年，正当北伐军收复长沙、大革命日趋高潮的时期，毛泽东回首当年感慨万端，写下了充满豪情义气的《沁园春·长沙》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叹，寓托了自己决心干一番大业的壮志。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夕，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党的决定武装反击的紧急会议召开了，从此革命找到了出路，毛泽东“心潮逐浪”，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表达了诗人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展望。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翌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同年8月30日，红四军凭借黄洋界的天险战胜了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兴奋之际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表达了“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革命必胜的情怀。

从1929年至1931年夏毛泽东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畅状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些词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这也就是说，这些词都是有感而发的言志之作。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井冈山的红军向赣南进军，2月在大柏地歼灭国民党刘士毅部两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1933年毛泽东重过大柏地，看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战斗遗迹，喜悦之情不能自己，于是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抒发了“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乐观主义的浪漫情怀。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后，红军经过娄山关北上，准备在庐州和宜宾渡过长江，因为没有成功就再次折回遵义，回师途中在娄山关与军阀王家烈部打了一仗，胜利之后毛泽东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表达了自己由“沉郁”到“豁然开朗”的复杂心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意境，是毛泽东在多年战争中积累下来的多年的景物观察感觉所凝聚而成的。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历经11个省，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追堵截，战胜了自然界和政治上少有的困难，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以胜利者的胸襟写下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描写了长征途中的困难和艰险，反映了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表达了长征胜利后红军官兵的喜悦。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的千里江防上强渡长江，占领了国民党长期盘踞的古都南京，毛泽东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向全军将士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号召，表达了自己乘胜追击的心态。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建国一周年。在国庆观剧的盛典上，诗人柳亚子即席赋了《浣溪沙》词，毛泽东步其韵奉和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表达了自己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的大好形势下的无比兴会。

1954年的夏天，毛泽东望着白浪滔天的北戴河，面对眼前秦皇岛外的打鱼船，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反映了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换了人间”。

1956年6月，毛泽东由武昌横渡长江，仰观长天无比愉悦，一曲《水调歌头·游泳》描写了这次畅游，‘反映了祖国大地所发生的“一

桥飞架南北”、“高峡出平湖”的巨大变化。第二年的2月，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同时寄上了纪念柳直荀的一首词《菩萨蛮》，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抒发了自己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两位烈士的祭悼和无限怀念。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第二天早起，“微风拂照，旭日临窗”，毛泽东“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表达了自己看到江山巨变时的无比欢乐心情……

总之，可以说，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差不多每个阶段都有诗作，每首诗都是有感而发的言志之作，同时，每一首又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遗产，都体现出一个千年一遇的伟人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

第三节 诗要用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作家、诗人、艺术家进行创作时的思维活动，因其思维过程始终离不开事物的具体形象和艺术家的感情，所以被称做形象思维。形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家从选取题材、酝酿主题、艺术构思到创造出艺术形象的整个过程，它体现着艺术创作的规律和特点，因此一直是文艺领域非常关注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的理论界对形象思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是一直未得出统一的结论。

1956年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谈诗外，还提出了对形象思维的看法，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这一问题的明确观点。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谈形象思维的时候，是以中国古代诗歌和中国古代诗学为基点的，这说明中国的诗歌美学里蕴藏着有关形象思维的丰富理论。毛泽东给陈毅的信如下：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

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三次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对艺术创作要用形象思维的理论问题的非常鲜明的肯定。

“诗要用形象思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诗和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

“形象思维”这一概念，在中国已源远流长。古代的《周易》，早有言不尽意而立象以尽意之说，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形象思维的思想之萌芽。而“形象”一词，也早已出现在我国古代文论中，表示形容而象之的意思。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不但肯定了“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且指出了形象思维的表达形式是“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诗学遗产。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强调指出：“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把比、兴手法的作用，提到用形象思维进行诗词创作的突出地位。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那么，要怎样说才对呢？这就涉及形象思维形式或表达形式问题。抽象思维（理论思维）的思维形式是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达到新的论断。那么，形象思维的思维形式是什么呢？这是前人尚未提出探讨的理论难题。但是，要科学地说明、论证形象思维，却必须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必须用比、兴两法，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古代诗论遗产和诗词创作经验，对形象思维的思维形式的探索。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强调诗要用比、兴的同时又指出：“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这里指明了两点：其一，诗的形象思维形式也包括赋的手法，因此诗也可以用赋；其二，诗中用赋时，常兼用比、兴，杜甫之《北征》即是如此。赋、比、兴三种诗歌表现手法，严格地说，赋属于写作，比、兴属于修辞。关于“赋”的解释，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朱熹则释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二者解释是一致的，但朱熹的解释，点明了赋“直言之”的特点，也就是不用比、兴，因此更明确、更浅显。毛泽东采用了朱熹的说法。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是用形象思维的典范。他的诗词大多长于赋、比、兴兼用，其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尤是以赋为主而兼有比、兴。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用兴，“飞将军自

重霄入”、“横扫千军如卷席”两句用比，其余皆用赋。《七律·长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两句用比，其余都用赋。而他的《西江月·井冈山》则是通篇用赋写出的光辉诗史。诗人采用白描手法，仅8句50个字，就完整地描绘了黄洋界保卫战的全过程。语言高度精炼而饱含激情，形象鲜明、生动，使读者如临其境。

毛泽东给陈毅的信还提到韩愈，说“韩愈以文为诗”，说“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这也是说，韩愈的诗不是形象思维之作。“韩愈以文为诗”，是历史上一些人的看法。例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韩愈）以文为诗，子瞻（苏轼）以诗为词”；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议论道理多）；明李东阳《麓堂诗话》说，“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这些说法的意思，无非是说韩愈的诗违背了形象思维的规律，诗中抽象的议论多。有些人说他不懂诗，就是说他不懂得形象思维。对于这些说法，毛泽东认为“未免太过”，他认为韩诗中《山石》《衡岳》和《八月十五酬张功曹》“还是可以的”。这也就是说，这三首诗还基本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山石》是一首抒写自然景观的诗，诗中以形象生动的笔调，描写了山寺里从黄昏到深夜到天明这段时间里景色的变化；《衡岳》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中描写了南岳衡山景色之雄奇险秀，体现了诗人想象之丰富；《八月十五赠张功曹》，写于诗人遇赦归来（此前曾被贬为阳山令）的途中，诗中抒写了自己心中的悲愤，章法曲折，语言古朴。

为了说明形象思维的本质，毛泽东还在信中批评了宋诗。毛泽东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是毛泽东发展了历史上的观点而得出的结论。宋诗“一反唐人规律”，“味同嚼蜡”这一问题，早在宋代当时就有人看了出来。例如，当时的严羽就曾说过：“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非其不工，终非

古人之诗也。”，“事由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里所说的“近代诸公”和“本朝人”，都是指宋代诗人。宋之诗人“尚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在诗里卖弄学问）、“以议论为诗”（在诗里讲道理），所以味同嚼蜡。

明代何景明《汉魏诗序》中说“宋诗言理”，并说“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可见，明人对于宋诗多讲抽象的道理，不能充分抒发感情，不形象的毛病是很清楚的。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了不少宋诗之病，还把宋诗与唐诗作了多处对比：“宋人浅于诗而好作诗话，迹言是争，贻误后世”，“盖人心隐曲处，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发于吟咏。《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诗，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达”，“宋诗率直，失比兴而赋犹存”，“唐诗固有惊人好句，而其至善处在乎澹远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澹远”，“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所说常在字句间”。可见宋诗不如唐诗之毛病多在于宋诗抽象议论多，不形象，少比兴而只有赋，像散文那样直说，不含蓄等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如此可知，在毛泽东的观念里，形象思维既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意识活动，又是指艺术表达阶段艺术反映生活的形式和手法。形象思维作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意识活动，是指艺术家在构思艺术形象时所遵行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思维过程始终离不开具象性的、形象性的生活形象，并且始终伴随着艺术家被生活所激发出来的感情。

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于1978年在《诗刊》1月号发表后，在文坛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理论主张，对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理论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结论，不能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四节 诗的意境之论

1958年3月，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有着毛泽东“半字之师”的梅白随毛泽东视察三峡。毛泽东对梅白写的一首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颇有兴致。梅诗是：

我来高处欲乘风
夜色辉煌一望中
几万银灯流倒影
嘉陵江比水晶宫

毛泽东对梅白说：“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显出夜色之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有含蓄和留有余地。‘几万’应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糊。‘流倒影’则不如‘摇倒影’，这也是为了显示夜影之动态。毛泽东又说，采取对比手法，写嘉陵江不平铺直叙，要写得风翻浪卷，以显示嘉陵江之性格。因此，第四句的‘比’改为‘似’好些。改后，这首诗就这样组合：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

毛泽东和梅白在赋诗作词方面可谓是高山流水的关系，俩人曾多次探讨，并皆为对方巧妙修改。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离别已有32年的故乡韶山，有感而发，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要使人民百万年。当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虚心向梅白征求《到韶山》的意见。梅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应改“哭”为“咒”更好。这样似诗意更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些。最后一句“要使人民百万年”有口号之嫌，不妥。毛泽东欣然接受了梅白的意见，将“哭”改成了“咒”，将“要使人民百万年”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改后，这首诗便成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毛泽东对此连连称妙，并尊称梅白为“半字之师”。

诗，是精炼的艺术。在各文学门类中，诗以精炼见长，较之其他艺术更简洁、凝缩、含蕴、富于概括力，因而也就更能留下启迪读者想象的余地。而含蓄即是使诗达到简洁、精炼，避免琐细平泛的有效途径。毛泽东的诗论，对于诗贵含蓄多有论述。

此前，早在1957年1月同袁水拍、臧克家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强调说过：“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他把“含蓄”和“诗意”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是相关的、一致的。毛泽东认为，能给读者留下想象余地才是含蓄的好诗。他说：“作诗要有重点，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说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做工作要留有余地，又以韩愈作诗不留余地为喻。他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

“含蓄”是中国诗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历代诗论家都有论述。刘勰把含蓄叫做“隐”。强调其特点是意义主要表现于言辞之外，音响秘密地从侧面传来，文采潜伏在暗处发光。袁枚也说，“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可见，含蓄的作用，在于能够使诗的语言简洁、精炼，含滋蓄味，为读者的想象和再创造提供天地，因而能引起读者最大的兴趣和欣赏的热情。毛泽东“诗贵有含蓄和留有余地”的观点，正是继承了古代诗论的精华。

“意境”是诗学的重要美学范畴。诗以有无意境及意境的高下作为品评鉴赏的重要标准，诗人以创造意境为追求的目标。因此，毛泽东说：“诗贵意境高尚。”

诗的意境贵在自然新奇，蕴藉隽永。毛泽东对如何创造诗的意境，有其独到的发现。他认为，诗“尤贵意境之动态”，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从毛泽东改梅白诗的几处看，“苍茫”显然比“辉煌”更能显出夜色的动感；“摇倒影”的“摇”字也显然比“流倒影”的“流”字更有视觉感。这样一改，嘉陵江的风翻浪卷的姿态动起来了，重庆山城万家灯火倒映江中的水晶宫一般美妙的夜色景观也动起来了，因而比原句更能显示

“意境之动态”。毛泽东说：“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这就是说，诗的意境须有“波澜”才是最好的。对此，古代文论多有论述。宋代词人姜夔说：“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说的就是诗的意境的变化和动态形成诗的波澜。

宋代诗人林逋《山园小梅》诗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所以被人称道，历来传诵，诗评家认为，这两句诗写梅花的体态风神，不仅在于“水清浅”、“月黄昏”的背景，衬托了梅花清秀高洁的姿质，而且在于把这种体态风神写得活动跳脱。写梅枝“横斜”，包含着形式的流动感；“暗香浮动”则直接写出了动感，因此写得活动而有精神，很富有感染力。毛泽东说，诗贵意境之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这正是唐诗以来格律诗之优越性”。他强调诗要写出动态之意境，这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和创作规律的深刻总结。

“尤贵意境之动态”，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毛泽东精研古典诗词和诗话词话，对以动造境、以动写静而“境界全出”的奥妙，谙熟于心。其诗尤善于化静为动的景物描写，创造出高尚而幽深的意境。如：“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一山飞峙大江边”、“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等，对山、虹、雪、梅等景物的描绘，用了“锁”、“舞”、“倒”、“翻”、“驰”、“飞”、“峙”、“笑”等动词，使不动的景物显示出各种动态，充满了生机活力，并且渗透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表现了诗人的精神气魄，成为诗意浓郁的名句。

第五节 天章云锦织豪情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即有人以一阕壮丽典雅的《水调歌头》（作者：高亨）来赞颂毛泽东其人其诗。其词曰：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唤醒蛰龙飞起
扫灭魔炎魅火
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世间
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
写鏖战
记长征
天章云锦
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杜
词苑苏辛佳什
未有此奇雄
携卷登山唱
流韵壮东风

伟人毛泽东有两件至宝：一是马，一是诗。马得之于外，诗言之于心。他骑马长驱远征了二万五千里，在马背上度过了成年后三分之一的生命。马背上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更能使他的思绪骏马般地飞腾驰骋。这飞扬的思绪在升华中便凝结成诗。毛泽东常常在马背上吟诗，且更为奇特的是，这些马背上吟成的诗大多美妙绝伦。

假如说，时代没有将毛泽东塑就成一位世之空前的大革命家，也许，他会成为中国不可多得的诗词大家。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因为他是毛泽东，所以他既是位大诗人，又是位大政治家。而他的政治杰作，即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一首传奇般史诗的物态化；而他的诗，则很少不渗透社会政治意识。怪不得有人说，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如若要细细地考察，毛泽东从事诗词活动的时间无疑要比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更长久。正如政治塑造了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一样，诗塑造了另一个风骚独领的毛泽东。如此一想，

具有诗人，甚至诗词大家的底蕴和才华的毛泽东，具有国学大师的风范和功绩，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毛泽东离不开诗。只要一踏入诗的境界，就像鱼儿来到水中，毛泽东便又临驾于自己另一块美妙奇幻的天地。这位生就诗人气质、秉具诗人天赋的政治奇才在这块诗之天地中一切是那么潇洒自如，那么惬意快活。

自幼喜赋、善赋，以至后来发展到赋诗成了毛泽东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或成为毛泽东的生存方式之一。诗本能的冲动，激情的激发，兴之所会，神之所到，毛泽东便要赋诗而不能自己。如果没有诗，毛泽东的生活便会显得乏味无趣。不赋诗，诗人的喜怒悲恹，欢欣快慰的心情、激情便难以宣泄。作为伟人，不仅胸膈如岸，更需激情似海。毛泽东那如海之翻卷的奔腾思绪，超出世外的奇特想象，吞吐天地日月的恢宏意象没有诗之承载，如何能升华到一个不胜其美的审美境界？如何能演化成一首惊世名曲？如何能成一幅绝世名画，带给世人深隽的遐思、美好的享受呢？

毛泽东是一位革命领袖，然而仅仅注意到其革命实践的现实一面，不了解中国是一个诗歌与社会生活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诗词大国，就不能了解毛泽东作为诗词大家，在古典诗词形式濒于没落、新诗渐起的时代所赢得的历史上无人比肩的成就。中国作为诗国，其诗词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往古来今，墨客骚人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正是这无以复计的诗歌，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并形成源远流长的诗文化。而这种诗文化又代复一代地养育出无数的诗词大家。自 2500 年前的《诗经》诞生，中国的诗歌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化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形式。先秦的四言，汉魏的五言、七言，唐的格律诗，宋的长短句，元的散曲，色彩缤纷，各得其妙。这些古代诗词，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歌，无所不咏。在这样一个诗的国度中成长的毛泽东，身上不能不载负着诗的遗传密码，披袭着古典诗风。仅就形式来说，周秦的四言，汉魏的五言、七言古风，唐代的格律诗，宋代的词，诸如此类的格调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诗集中见到。这位诗人直接运用历时数千载

发展起来的诗律词谱赋诗填词，并把中国这种古老的、广为人们青睐的、富有生命力的诗歌形式赋予崭新的现实内容时，便不知不觉地使自己跻身于古体诗词名家的行列。可以说，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诗词大国，没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历史，也就难以产生毛泽东这样一位大诗人。纵观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脉络，毛泽东的诗词，不过这一无涯的诗文化山带中于后崛起的一座高耸的峻峰而已。

毛泽东留下的绝世之作使他在同代诗人中独领风骚。也许，毛泽东在诗词领域的成功，如果不比在军事及政治领域的成功更加令人观止的话，那也至少可以等量齐观。诗词大家柳亚子曾以诗赞毛泽东“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著名作家徐迟则称“诗从毛主席，文崇马克思”。一代诗豪郭沫若，虽“有点目空一切”，但对毛泽东的诗词却“五体投地”佩服之至。性情豪爽、犹喜赋诗的陈毅元帅，更是以“诗词大国推盟主”的句章来认定毛泽东作为诗坛巨星的地位。

毛泽东之成为诗词大家，除其天赋之外，最主要的是，他首先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思想家。他生活在一个东方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正处在天翻地覆的变革时代。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斗争实践给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一推动力。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国革命传奇般的经历，革命胜利后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各个气势非凡的场面，通过这位伟人的奇妙构思，便成为一首首壮丽豪迈、气魄宏大的诗篇，并染上诗人真挚的感情色彩。毛泽东诗词风格的豪迈和气魄的宏大与中国山河的壮丽、中国国土的辽阔有着某种一致性。如果中国地不过百里，没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中国没有地球上最高的山脉，没有地球上少有的大河或浩瀚的海洋，或者毛泽东的生活足迹没有踏遍北国南疆的广泛性，那么他的诗的气魄或许要小得多，其内容或许将会远为逊色。如果毛泽东不是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身份出现，不处于中国社会政治旋流的中心，他的诗就不会如此令人惊心动魄，大气磅礴，充其量只能是吟风弄月、云树黛眉、卿卿我我。正是置身在震撼世界的现代中国革命巨变中，在为着夺取这个革命胜利的多年苦斗中，毛泽东用诗家的慧眼细致入微地去观察沸腾如

蒸的生活，并用诗的色彩去涂写自己丰富的阅历和体验之路。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造就了大诗人毛泽东。

诗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精神生活，构成毛泽东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毛泽东的一种有力斗争武器。1945年《沁园春·雪》公布后，轰动整个山城。一时间，骚人名流，纷纷步韵唱和咏雪词，成为一种时髦。甚至连一些酒店门口也挂出“沁园春”招牌，内壁上更书有“沁园春”百阙。人称《沁园春·雪》“睥睨六合，气雄千古”、“风调独绝”。仅此一词，不仅改变了毛泽东本人在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更是改变了蒋介石在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满身戎装，酷似“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蒋介石，面对衣着朴素，甚而随便的，看似一个农民造反领袖，但却有着“魏征之才”的大政治家的毛泽东，高下之分，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这正是所谓“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当他们为毛泽东“睥睨六合，气雄千古”的“新词”所倾倒，争相握笔唱和时，这种独特的中国文人式的思想对话不已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他们的政治选择意向和价值取向吗？顺便提及的是，蒋介石读到毛泽东的这首诗后，不免为之震颤。急命陈布雷召集属下文胆，恶意围攻、贬损。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在近30首和词和10余篇批判文章中，有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格外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已使毛泽东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分量。不甘罢休的国民党宣传部门还私下组织了一些舞文弄墨的文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的名义发表，可是策划半天，集诗千首，竟无一首能与《沁园春·雪》抗衡。悻悻之余，只得悻然罢手。由此，也可见毛泽东诗词的“气雄千古”、“风调独绝”。

据说，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一首诗，也许仅仅是一首诗，毛泽东就以自己诗词的艺术魅力，撼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使其心理天平朝自己的一方倾斜，从此奠定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选择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心理基础。

毛泽东的诗不仅被直接地用来作为斗争武器，而且也间接鼓舞着人们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某纵队一部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最后剩下的几名战士在准备与敌同归于尽前，打开收音机想听听党中央的声音，恰好此时陕北电台正在播放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当那豪迈的词章通过播音员充满激情的声音传入耳中，战士们无形中仿佛被注入了一股不可摧毁的强大精神力量。他们顿感信心百倍，终于勇猛无畏地胜利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诗词在这里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克敌制胜的有效精神武器。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有着一种潜在的精神威慑力量，还是一座最径直的文化沟通桥梁。他的诗词的艺术语言似乎能使不同思想意识之间的分界和对立变得不那么鲜明，像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维系着不同社会制度下和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们。与中国对立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后，适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 1972 年早春来访北京。在周恩来总理为欢迎美国客人所设的国宴上，尼克松总统在致答词时强调，要与中国找到合作的共同点，以便增加争取世界和平的机会。其答词特地以毛泽东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词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作为结束之时，这种既充满尊敬又不失亲近的方式不仅缩短了中美两国政治家的感情距离，而且深深打动了在场人士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电视观众：尼克松总统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诗句来阐述美国外交政策，这于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来说，也确是闻所未闻。

第六节 气雄万古的诗词

前面对毛泽东的诗词作了概况性的解析，这里我们不妨来品读一下毛泽东的两首代表作，以便对其国学大师的风采有个更透彻的了解。

1935年9月，在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意外地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不禁喜出望外。当天毛泽东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到陕北去。当年10月，中央红军翻过海拔3000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红军一进吴起镇，便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家了。

在经历了一年多漫无目的、且战且走、艰辛备尝的长征后，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毛泽东此时此刻的欣喜之情难以言喻，后来他在为自己的诗作注时说：“过了岷山，豁然开朗。”

毛泽东在吴起镇呆了三天，即前往瓦窑堡。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大发，在一张宣纸上挥毫而就，一气呵成。此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两句是全诗的纲。以简洁的语言揭示了全诗的中心主题，奠定了贯穿全篇的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基调。诗中以“万水千山”表现长征之“难”，面对千难万险，红军等闲视之，更显其豪情壮志。“万水千山只等闲”，承上启下，既是首句的补充，又起引导下文的作用，下面两联正是从山、水两方面概括描写的。

颌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作者紧承上句写山，选择了五岭和乌蒙为代表。明是写山，实是写人。先用“逶迤”、“磅礴”扬之，极言气势雄伟；后以“细浪”、“泥丸”抑之，言其渺小，这抑扬之间，更显出红军的伟大，可谓浩气云天。这抑扬大小的艺术效果是通过飞动之势的描写造成。作者以雄视宇宙、气吞八荒的“动”的视野写山，使静止的山变成了“动”的物相，因而有“腾”与“走”的动感，实际上是人的飞动造成的视觉暂留所构成的一种艺术美感。

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同上文所体现的红军战士的英雄本色是一脉相承的。“暖”字既是这次巧渡金沙江时气候的真实写照，也是胜利喜悦感情的外化。

1935年5月，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皎平渡，依靠七只小船，连续在这里渡了几天几夜，全军终于抵达对岸，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这“暖”字正好表现了红军战士胜利的喜悦和欢腾景象。这里的“寒”字，既是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气候的真实写照，又描绘了天险奇特，铁索高悬，惊心动魄的气氛。

尾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更”字，自然、恰当、有力，把越过大雪山的喜悦心情充分表现了出来。“喜”字描写了红军爬上大雪山时高兴的心情，它既写出了红军战胜了雪山，又使大自然富有艺术美感。“开颜”使红军翻雪山后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尾联艺术地体现了“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一历史性的结论。全诗虽然只有56个字，却高度概括了长征的历史。诗人以个别概括一般、以典型概括全部，把现实与想象有机结合，笔力遒劲，用词精当，塑造了英雄红军的群体雕像。

再说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作于 1936 年。在毛泽东、彭德怀等的指挥下，红军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当时正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既雄伟又壮丽。

这首词的上阕大笔挥洒，写北方雪景；下阕纵横议论，评古今人物，上下浑融一气，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表现出一位伟大革命家非凡的精神世界。

“北国”三句，起笔不凡。“千里冰封”给人以纵深感，“万里雪飘”给人以广阔感。以此来写北国风光，气象宏伟，很是确切。

“长城内外”指从南到北，“大河上下”指从西到东，上、下、内、外，概括了整个北方。以长城、大河写中国北方，不仅展现了北中国的自然景观，也显示了整个中国的人文景观，从而使读者产生纵深的历史感。在此基础上，再来评议中华古今人物，更加顺理成章。这样描写，为下文议论之语铺垫了厚实的基础。莽莽，指大雪覆盖着的北方原野浑然一色，辽阔无际。“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这条难以羁勒的大河，“顿失”滔滔之状，可见雪势之骤、之盛、之威、之猛。北方大雪那种纷纷扬扬从四面八方骤然而下的气势，是很能激动人心的。因此，这些词句不仅是对北方雪景的客观描写，同时也喷发着作者观景时的激情。诗人结合长城、黄河、秦晋高原这些奇伟的景物来写雪，更显得景色奇伟、气象万千，充分地描绘出祖国的壮丽山河。

山，原本无生命，又都是静止的，由于天空大雪纷飞，诗人心情激动，遂呈“驰”、“舞”之势。这也如同前句，既是客观风景的生动再现，又是诗人心境的形象表露，堪称抒情词章中绝妙之笔。“银蛇”“舞”，“蜡象”“驰”，既表现了光感、色感，又准确地表现了质感。雪光闪烁，故谓“银蛇”；积雪凝重，故谓“蜡象”。这些描写，显示了诗人对大自然精细的观察力。“须晴日”三句，是对未来的展望。诗人又从雪后着笔，设想天晴之后阳光照射大地，祖国山河如同穿了红装，又裹了白色丝织品，红白交映，格外艳丽，令人倾倒。此句呼应篇首“北国风光”，又引起下阕。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壮丽的山河，这富饶的土地，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当成自己的猎获物，引起他们爱的不过是个人富贵的欲望，个人权利的欲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帝王，他们曾建立过“奇功伟业”。但就是这些人物，也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这里从字面上看是说他们的文采、才华不足，实际上是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局限性。这也是这首词的主题所在。这些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都销声匿迹了。诗人用“俱往矣”三个字——此三个字具有万钧之力，结束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过去许多人写历史，写着写着就被吓倒了，连自己也被冲下去了。毛泽东却能高瞻远瞩，藐视过去，展望未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里的“风流人物”无疑是指当时的革命者，为了使大好河山免于被人掠夺，为了使人民群众免于被人奴役，他们赴汤蹈火，虽死不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有他们才是具有人类最崇高感情的风流人物。

从古到今，写雪的诗词很多，但有谁写过这等气魄宏伟的雪景？过去词人写的雪景，多半是小家、小院、小景。五代时南唐皇帝李煜写了宫廷的“玉砌银装”，算是大的了。宋朝以豪放著称的吴词人苏轼，写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便被誉为极品。可毛泽东一下写了长江以北半个中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实际上写了整个中国的横断面。用五个皇帝代表 2000 年历史的一个侧面，这种横

括万余里，纵贯数千年的气魄，绝不是坐在小屋里，躲在书斋里的骚人墨客所能写得出来的。

毛泽东对雪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在他的诗篇中曾有多处咏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冰、雪，是纯洁的象征。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对人、对己，都追求高度的纯洁性。他要求人们做一个“纯粹的人”。这些，都表现了他的高洁的精神境界。

从这一诗一词来看，诗人毛泽东大气磅礴的诗词作品的确非他人所能及，“诗词大国推盟主”，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而具有如此之诗词修养和造诣的诗人又如何能不与一个国学大师紧密相连呢？

第七节 以诗词论历史

1964年春，毛泽东写了《贺新郎·读史》。他用这首《贺新郎》词，高度凝炼地表达了自己的读史心得，可以说是他的史论总纲。词的上阕，概括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全部发展史，艺术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词的下阕，对中国史书实即对《二十四史》做了唯物史观的评说。词的语言平易晓畅，以浅寓深，以简藏丰，非常难得。

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这首词1978年发表后曾轰动一时。有人说，此词气压万代，是毛泽东晚年词中的“压卷之作”。不少论者，曾称它为读史词中的“千古一篇”。

所谓“五帝”，在司马迁之前、之后，都有不同的说法，人们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司马迁记载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大圣王。其实，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对传说中的“五帝”乃至更古远的“三皇”事迹，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文不雅驯”。只是后来他跟随汉武帝巡游四方，听到各地“长老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才相信传说中的“五帝”实有其人，而他看到的有关记载“不虚”而“近是”，并决定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书首”加以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结尾专门有一段文字，就是交代他对“五帝”始疑终信的情形的。至于“三皇”，司马迁只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通过君臣议论帝号时提及过，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但他并没有为“三皇”专门立一篇本纪，也没有具体说明他相信不相信“三皇”的文字，大概是有疑问的。而关于“三皇”所指，也有各种传说，到底是哪三“皇”，人各言殊，仍是叫人“难言之”的。

还有更奇特的，司马迁以后人们又编造出一个盘古，说他是开天地的始祖，又出现在“三皇”之前。因此，中国历史就被说成是：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接踵其后，“五帝”相继禅位，然后才出现夏、商、周朝，不断沿袭下来。一句话，历史是神仙圣帝创造的。怎么认识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中国史前史的面目呢？

192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山洞里，发现了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中国猿人的化石，在山顶洞穴里发掘出大约10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这一考古发现震惊中外，以至人们在论及人类起源时，都不得不提及中国猿人的事实。因此，所谓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就显然成了无稽之谈，毫无根据了。同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关于女娲用黄土造人的文字已记载，更属荒诞不经的内容。

1933年前后顾颉刚等人写了大量文章，疑古辨伪。他在清代学者姚际恒、崔述的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很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论点。他指出，周朝时人们只把大禹当成最古的人，到孔子在世时冒出了尧、舜，战国时加上了黄帝、炎帝，秦代增添了“三皇”，汉代以后捅到盘古，这些古史的传说，除了自然演变的因素外，很大

程度上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例如禅让之说、五行之说，后世的篡位者常常利用它，把自己装扮成合法的帝王，总要想方设法将自己算入“三皇五帝”后裔的行列里，以愚弄老百姓。

考古发现和疑古辨伪相先后，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史系统的记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要真正认识中国史前史。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到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中间经过几十万年漫长岁月的演变，期间，劳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劳动的历史又说明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不是神仙皇帝创造的。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已是一种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这次读史填词，就是运用唯物史观，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中国历史的演变情形的。他讲，“人猿相揖别”，即人类是从动物不断演变进化而来的。中国远古时代始开天地的是类人猿这种高级动物，不是盘古。从猿到人的进化是通过劳动实现的，而不是女娲的功劳。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对人类进化史方面的著作特别留意，读过苏联作家写的有关著作——如郭烈夫的《从猿到人》，赖也夫斯基的《唯物的社会学》《社会进化简史》等，曾通俗地表达为“猴子变人”的意思，并热情推荐给刘少奇阅读，说写得“十分精彩”。

人类的历史，即便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在人类发展史上仍不过是“小儿时节”；而接下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几千寒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也只是一瞬间，但生产力发展了，先是青铜器时代，后是铁器时代，因此有“铜铁炉中翻火焰”这一形象化的比喻。这种大写意的笔法，将中国历史演进的轮廓勾勒了出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不能仅仅满足于熟悉那些“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的记载，而必须把握它的特点，掌握它的规律，认识它的真面目。

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一是毛泽东习惯在自己的诗文作品里引用一些典故，涉及到上古的神话传说。例如：他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谈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就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说法；在七律诗《送瘟神》里，有“六亿神州尽舜尧”；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不周山下红旗

乱”；在七律《答友人》里，化用传说中舜帝二妃至苍梧（今湖南宁远县南）寻找舜帝的典故，写下了“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诗句。对此的理解其实很简单：引用神话传说，是出于修辞的需要，是形象思维驱使的产物；否定“五帝三皇神圣事”的存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史前史的科学结论。因此，这是两回事，不应该混为一谈。

二是毛泽东对于古代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先后作过思考，观点也有相应的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赞同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算起的提法，至今“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早于春秋时期的西周社会。这其实是范文澜先生一直坚持的观点。但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分歧很大，有好几种说法，郭沫若就提过三种不同的说法：最早提出在西周、东周之交（公元前770年左右），接着改定到秦、汉之际（公元前206年左右），1952年又“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公元前475年）。郭沫若强调指出，他之所以作出第三次改变，是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基本观点，研究社会形态后，得出的最终结论。1973年，毛泽东在晚年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换句话说，毛泽东原先是采用范文澜的提法，后来又接受郭沫若的意见。而如果按春秋、战国之交计算，则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的时间，就应该相应地改变成两千多年。总之，毛泽东在这首词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他认为：被历代统治阶级捧为“神圣”的“五帝三皇”，不过是欺骗人们的鬼话；被正史记载诬为“盗匪”的奴隶起义领袖、农民起义领袖盗跖、陈涉等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风流人物”。

毛泽东在读史批注中发表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以此为基础，这些重要观点还主要表现在：

- 1、在历史观方面，毛泽东很反感史书中笼统道及“天下善人少，恶人多”的提法，认为这是“古人一贯谬论”，同时，一再申明“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这样的观点。其次，毛泽东高度赞扬

历史上奴隶反抗奴隶主、农民反抗地主的造反起义。他高度赞扬过盗跖、庄屨、陈胜、吴广、张角、张鲁、黄巢、方腊、钟相、杨么、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唐赛儿、徐鸿儒、李自成、洪秀全等。他对总结或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如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吴晗写的《朱元璋传》、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等，不但给予热情的支持鼓励，而且仔细阅读并提出具体意见。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他多次以李自成先成功后失败的例子，提醒全党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2、在政治方面，毛泽东一贯强调：法家比儒家好。他在清人王夫之所著《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节内，旁批道：

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又往卷十七《梁武帝》：竹内有两处批语：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他认为法家讲真话，“儒术伪耳”，而所谓的儒教治国，以儒术御政，或者像梁武帝那样又打出佛教的招牌，其实都是骗人的，行的仍是法家那一套，用的还是申不害、韩非子主张的苛政严刑。这种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在毛泽东的晚年变得更加强烈，竟然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批儒评法的运动。因此，他读史中，对历史上的暴君（如商纣王、秦始皇）并不反感，对竭力主张或实行法家路线的人物（如商鞅、曹操）非常欣赏。他讲，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针对郭沫若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十批判书》中尊儒反法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还写过两首诗，批评、开导郭沫若。二诗如下。

其一：呈郭老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其二：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就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最大的功绩，“焚书坑儒”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唐时柳宗元写过一篇《封建论》，就坚持统一的“郡县制”比割据的“封建制”（即贵族领主制度）要优越得多。这是毛泽东赞成的。他不赞同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吹捧孔夫子、大骂秦始皇的学术观点，认为郭沫若竟不如柳宗元有眼光，劝他不要“从柳退”而“返文王”，最好改变自己的立场，修正自己的旧作为是。应该说，硬要将孔夫子跟秦始皇拉来作比较，并不科学。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也并不客观。毛泽东反感孔夫子而盛赞秦始皇，恐怕与他晚年过激地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地欣赏历史上法家的那一套，完全漠视中国儒学传统的地位及其积极的作用有关。

3、在军事方面，毛泽东一方面说“兵书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多则无益”，主张重视实践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另一方面，他又熟悉兵法，对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战役，都作仔细的研究，发表了相当精辟的见解。例如：

- 反对坑杀降卒、屠杀俘虏的不人道行为（如刘表、王建等）；
- 称赏以少敌众，敢于“以数万敌百万”的大无畏气概（如刘秀、周瑜、韦睿等）；
- 向往那些在战争中创造奇迹的风云人物和特殊事（如梁将陈庆之以七千之众击溃魏数十万大军的纪录，刘宋明帝在孤城无望的困境中各个击破敌军并赢得全国归顺的奇迹等）；
- 评论了帝王将相中用兵打仗的高手（如李世民、朱元璋、周瑜、陆逊、李亚子等）及失策的例子（如刘备在彝陵之战中、诸葛亮在街亭之战中、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南朝宋文帝遥制北伐等）。

4、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毛泽东更是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有的可谓独出机杼。例如：

- 对历史上领导奴隶、农民起义的众多领袖人物，充分肯定，已如前述。

●对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如：汉末李固等党人志士，南朝齐末的袁粲，以及南宋的岳飞、文天祥；顺便提到的近现代史上的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等），竭力赞扬。

●对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大加褒奖，而对儒家人物大加鞭笞。特别是替殷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称道申不害、韩非、商鞅等，痛斥孔子。其中对曹操作重新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

●对历史上昏君与权臣的情形作具体分析。汉末、唐末政在权臣，政局混乱，这不能怪汉献帝、唐昭宗这样的傀儡皇帝；南宋媾和，责任不全在秦桧，主要是宋高宗赵构起决定作用。

●对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人物，如此断定：他们大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不少是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以及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发明创造要占 70% 以上。

他多次举到历史上少年英发的有为人物，例如：贾谊、王弼、王勃、李贺、夏完淳等哲学家文学家，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等军事家谋略家，以及像“大历十才子”、罗隐、蒲松龄、曹雪芹等学历不高或屡试不第的落魄之辈，最有作为。

●对历史上有所凭借（如门第、学历、名望等）的人物，讥讽他们一事无成、徒有虚名而已（例如，毛泽东很瞧不起的刘表、郭象、谢灵运、袁颀等）；反感那些“好为人师”的名流，提出“科举无用”、“书不足信”一类的观点。

5、重视古为今用，从历史上的人和事里，吸取经验教训，以至直接引来，当作指导当前运动或工作的方针政策。比如：《史记·项羽本纪》《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张鲁传》《吕蒙传》，《南史·韦睿传》《触詔说赵太后》《七发》等，都曾印发给一些领导或有关方面，以资参考。至于《张鲁传》引发出 1958 年前后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吃饭不要钱、粮食亩产几万十几万斤的“共产风”、“浮夸风”，明初朱升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的记载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深挖洞”的战备方针，还有批儒评法、评论《水浒传》等等，都声势颇大。

6、大量评论古典文学作品。毛泽东是位诗人，在他身上，诗人的气质很浓。他喜欢文学，阅读了大量作品，也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意见。例如，他对文学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词有婉约、豪放两派的意见，并对屈原、贾谊、曹操、王粲、庾信、王勃、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罗隐、苏轼、范仲淹、辛弃疾、陆游、高启、纳兰性德的作品优劣得失，以及小说如《世说新语》《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永昌演义》等在思想性、艺术性上的成败之处，都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看法。他评论和解析这些作家作品，常常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相联系，以知人论世，并非单纯评点而已，从中常能看出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意见来，因此仍然是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如此众多的评论观点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学术评论，但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另有一部分则是货真价实的独创性的学术观点。根据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及这些在读史中总结出的学术观点来看，毛泽东完全有资格位列历史学家之列。

第九章 臻于化境的语言艺术大师

毛泽东的文章独步天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艺术博大精深，我们能得其一二，就能受用终身。原来流传一种观点，说是毛泽东用其白话文打败了蒋介石的文言文，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的文章是当代白话文的典范，他付诸的文字大都深入浅出，让人一看就明白，且决不是肤浅，而是用大实话讲透精深的道理——《为人民服务》如此；《纪念白求恩》如此；《愚公移山》也如此。小学文化的人都能明白毛泽东是什么意思。这种大道成俗的功力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在这方面蒋某人就差得远了，他的所有训令、文告等均以文言示人，显示其正统，像在拉历史的倒车。也正因为如此，让一般老百姓看不懂，达不到其应有的宣传效果。在这种对比上，蒋已逊毛一筹，走向失败也仿佛是必然的了。

毛泽东并没有学过那种科班化的语言哲学，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并能将语言运用得出神入化，这首先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自少年时开始积累的国学功底。毛泽东年少时便进了私塾，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他虽然相当叛逆，但博览群书。所以精通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深研历史，尤其是中国几千年辉煌的文明史；谙熟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而且对自然科学和佛学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应该说，毛泽东是在厚重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吸取了中国古代汉语言简意丰、强调语法规范、重表现力的特点，并注重实用性，最终形成了言之有物、白话地道、表达清晰、说理透彻而又文质彬彬的语言特色。

毛泽东的语言可说是现代汉语的典范，它体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有主观的、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群众的、个人的多种原因，但究其实质，皆是其提倡的“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生活学习语言”的结果。这不仅仅是一个革命领袖人物平民观的体现，而且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真理。

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吸收”：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养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始终注意以群众生活语言为基础，努力从上述三方面吸收语言营养，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这正是现代汉语的根本和源泉所在。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

但毛泽东绝非一个普通文人或文化领袖可比。在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习之中，他认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所以，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失却自我，充分体现出善于融汇众长的综合能力，吸收群众语言而不失却其典雅高致，吸收古典营养却又戒绝文言痕迹和旧书卷气，吸收优秀外国语言却又不流于繁冗拖沓。这是其超乎常人的语言功力所致，也与毛泽东独立创新的个性相关，是其个性的自然展示。在集农民、学者、政治家、诗人的秉性于一体的毛泽东身上，农民的质朴和率真、学者的渊博和儒雅、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诗人的激情和浪漫想象十分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其个性突出的语言特征。

毛泽东对语言的驾驭确实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了。他总能三言两语，就将道理说得很透。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相当复杂的现象的本质，而且没有一句废话。他的语言一个是准确，站得高，看得远，看问题一针见血，一眼就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一个是鲜明，有自己的立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吞吞吐吐；一个是生动，即使理论性很强的文章，也让人读了有味、起劲。毛泽东的文章一般人写不出来，尤其是那种气势、那种高度。这大约与其所处的地位，所具的身份，所秉承的信念有关。毛泽东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的政坛上都发挥着领导作用。其人、其行、其言几乎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大量成语、典故、俗语的积累和运用

1、成语运用——成语具有极为明显的稳定性的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固定的意义和形式，而毛泽东除了习用性（即常规性）地恰当运用成语以外，他总是切实地根据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与读者和听众的具体需要，胸中自造炉锤，别具匠心地运用成语，因而十分灵活。

毛泽东用成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对牛弹琴”这个成语的运用。

“对牛弹琴”是典故兼成语，原典或传统的用法，都是讥笑“牛”太愚蠢，听不懂弹琴人（古代一个音乐家公明仪）为它所弹奏的“清角之操”，仍然“伏食如故”（典出南朝梁代僧祐编《弘明集》）。就是说，这个成语仅仅用来讽刺听不懂他人道理的愚蠢之人。可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竟是这样运用的——“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毛泽东在运用这个成语时，把讥笑“牛”（“对象”）这个内容“除去”了，而加入了讽刺弹琴者、弹琴者应该“尊重对象”的内容，即讽刺那些写

文章和做演说不看对象、脱离群众、空发议论的人，希望他们尊重读者和听众，这就对这个成语的运用，开创了一个新的侧面。

甚至有些历史久远的成语，其概念已经过时或落后了，对这样的成语，毛泽东常常赋与它们新的意义。例如，“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成语出于《礼记·祭义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普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这个成语说的是，孝道是人世间普遍的共同准则。但是，毛泽东却把反映孝道普遍性准则的成语用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成语如此有效的借用，充分说明毛泽东运用成语的灵活性。

“矫枉过正”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纠正过错超过限度。在《汉书·诸侯王表序》和《后汉书·仲长统传》等史籍中，都是在这个意思的基础上运用这个成语的。可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运用这个成语时，一反其本义。他认为，在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二时期（革命时期），为了“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把一切绅权都打倒”、“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农民们所做出的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因为“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里，毛泽东不但完全否定了“矫枉过正”这个成语的传统用法，而且在新的与其完全相反的意义，具有极强的创造性。

毛泽东反用成语的又一种情况是改变某些成语的感情色彩，使原来具有贬义色彩的变成褒义的，或者相反。例如，“无法无天”，这是一个贬义性的成语，但毛泽东在说共产党不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限制和束缚时，却也说成是“无法无天”（《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时“无法无天”就变成褒义的成语了，这是属于临时性成语的反用；还有些成语，如“明哲保身”，本义是既明且哲之人，善于按察事理，择安去危，善于自处（语出《诗经·大雅·蒸民》）。显

然属于褒义。而一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用它批评只顾个人安危、放弃原则的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之后，它就变成贬义的成语，直到如今人们仍然将其用于贬义。又如“一团和气”，这个成语出于《程子全书》，说一个叫程明道的人对待人的态度和蔼可亲，完全是褒义的，可是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使用过后，就具有了对待熟人抱老好人态度，不讲原则的贬义色彩。

毛泽东用成语的数量很大，而且常常不改变原来成语的结构形式，而仿化出新词，具有明显的创造性。例如，“一触即发”这个成语，本指箭在弦上，手指稍一触动，箭即射出。比喻事态发展到十分紧张的时刻，只要有一点偶然因素，事件就会发生。可是毛泽东却把勇敢但却遇事不够冷静、乱碰乱撞的鲁莽家称为“一触即跳”的人们（《论持久战》）。“一触即跳”就是根据“一触即发”仿化出来的，且用得极其形象、趣味。

又如，毛泽东说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占领了“东四省”，说成是“垂手而得”（《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垂手而得”脱影于成语“唾手可得”。“唾手可得”是说得到某种东西很容易，但也得付出一些“气力”，因为还得“唾”，而“垂手而得”呢，手垂下去不动即可，一点气力都不必用。这是说日寇占领“东四省”容易到了极点。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像这样仅仅通过一两个字词的改动而仿化出新词语的情况很多。其他诸如，根据“前仆后继”而仿化出“前赴后继”（《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声明》），根据“前功尽弃”而仿化出“全功尽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根据“置之不理”而仿化出“置之不答”（《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根据“取而代之”而仿化出“起而代之”（《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根据“忍辱求全”而仿化出“忍让求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根据“赶尽杀绝”而仿化出“剿尽杀绝”（《新民主主义论》），根据“有的放矢”而仿化出“无的放矢”（《整顿党的作风》），根据“一哄而散”而仿化出“一哄而集”（《井冈山的斗争》），等等，

都属于这类情况。这些被仿化出的新词语，较之原来的成语都产生或增加了新的意义。

对有些成语，毛泽东往往作连续性仿用，这种性质的语言仿用也可以称为“连仿”。例如，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着重阐述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不应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内容时说：“（共产党）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成语中有“先斩后奏”，并无“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它们都是根据“先斩后奏”这个成语先后连续仿化出来的。

创新是毛泽东运用成语中的又一特色。有一些完全是属于他本人创造的，有的则是依据以往已有的成语，特别是通过仿用的形式创造出来的。

“下马看花”是毛泽东新创的一个成语（《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它是根据“走马观花”仿化出来的。“走马观花”中的“走”是跑的意思，毛泽东把“走”换成“下”，则造出一个与原来成语相对立的新的成语。而“后发制人”这个成语是凭借“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二语改造而来。“先发”能够主动压制或控制对手，“后发”往往被动，被人所制，亦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之意。这是旧成语的意思，但它不全面。毛泽东根据大量事实，总结出另一方面的经验，即后发者如果有准备地“先让一步”，也能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控制对手，于是翻造出“后发制人”这个新的成语。

2、典故运用

周恩来在1949年5月作的《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中说：“现在毛主席作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

他的伟大。”这里所说的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经验教训”，基本上指的就是他所运用的典故。这段话对毛泽东语言中善于运用典故这个特点作了极准确的说明和概括。连《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也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这话也证明了，善于运用典故，的确在毛泽东语言中格外突出。

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特点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量大——诸如历史典籍，如《史记》《汉书》和诸子等著作。诸如历代诗文、小说、寓言、传说、神话、戏剧等。其中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包括外国科学家、发明家）。其次，体现在被运用得范围广、数量多上面。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纪念性论文，还有报告、演说、决议、调查报告、消息等。他随时运用典故，并且运用的数量很多，有时还同时用多则典故阐述一个事理。在《质问国民党》一文中，他用了“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战国策·燕策》），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苑·正谏》）两则典故，来陈说在抗日战争紧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浪潮、进攻边区的利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战略退却”一节中，为了阐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先讲了《水浒传》（历史小说）中林冲如何运用退却的策略打败洪教头，接着全文引用了《左传》典籍中“曹刿论战”一节文字，说晋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打败了齐国。最后又列举了成皋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淝水之战等6次以弱胜强的历史战役（均属典籍），弱者一方都是运用退却的战略打败了强者一方，前后共用了8则典故。

然而，这还不是最多的。

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为了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讲话的开头就用《西厢记》中惠明挺身突围给白马将军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提倡中国要多出现一些像惠明那样勇敢而又坚定之人；接着就提到《法门寺》中“站惯了，不敢坐”，十足的奴隶主义者贾桂；又讲了中国儒家们对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是一副

奴隶相；其后，则讲了李贺敢于直称汉武帝之名（刘彻），甚至称他为“刘郎”，鼓励人们不要怕名人。讲话的后半部分，当讲到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时，则讲了禹王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当讲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讲究策略时，则提到了明朝反对奸党魏忠贤的东林党那一派人（如杨镇安等），由于策略失误而失败；当讲到敢讲真话时，则提到了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人，并引述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然而，这篇讲话中，用典最多的，还是在讲话的中间部分。这部分阐述了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和发明创造者大多数是青年人的内容。其中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王弼、颜渊、李世民、秦叔宝、罗成、王伯当、梁启超、马丁·路德、达尔文、发明安眠药和盘尼西林的人、富兰克林、高尔基，前后共有 20 多位历史人物。讲话中还涉及一些其他反面历史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袁世凯、段祺瑞等。此外，这篇讲话还涉及诸如斯大林和“联共党史”、康有为及其《大同书》、邹容及其《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的文章，以及刘备挂帅等典故。总之，这篇讲话引用典故之多，实在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我们仅从这篇讲话中，就可以略知毛泽东在其他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典故情况之一斑了。

其次是典型——毛泽东运用的典故，一般都是把典故作为某些观点或事理的论据或根据。由于他所选择的典故，一般都属于典型化的材料，所以使他所阐述的观点或事理都十分生动，有力。例如，1941 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谈话中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强烈谴责和揭露外，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 12 条警告，要求严肃合理地对待和处理此一事件。毛泽东在列举了这 12 条警告之后，又附上了一则典故：如能实行以上 12 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

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一典故是孔子说过的话，出于《论语·季氏篇》。比喻忧虑不在于外，而在于内。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对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提出严重警告。像这样运用典故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是很多的。有时，仅仅是由于他运用的典故十分典型，就使对问题或事理的阐述格外深刻，耐人深思。1949年4月初，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再次重申，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十分强调南京政府必须逮捕南京惨案的主凶蒋介石等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一条，他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据《左传·鲁闵公元年》记载，春秋时鲁庄公死后，立子般为君，鲁庄公之弟庆父杀死子般，另立闵公为君，不久，庆父又杀死闵公。由于庆父先后杀死鲁国两个国君，造成鲁国连年大乱。当时齐国有一位大臣这样评论鲁国：“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人们常把庆父比喻为灾难和战乱的祸首。毛泽东运用这个典故，不但把连续挑起内战、制造灾难的根源归罪于蒋介石等罪魁祸首，而且表达了他要坚决彻底地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毛泽东运用典故，有时灵活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他能用《西游记》中几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去解释抗大的教育方针。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那匹白马，也是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他们两个都能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他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通过大胆联想，把本来与现实事物似乎毫无联系的典故竟然联系起来。

从以上毛泽东运用成语和典故的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国学修养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无疑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实践古为今用文化方针的典范。人们说，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时代巨人，并且说，如果不是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也可以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3、俗语

毛泽东很善于对某些深奥的事理作极为浅近的阐述。这种做法很多，其中包括运用、比喻、引用等。此外，他还善于通过生活中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来阐述复杂的问题。他用鸡蛋能转化为鸡，而石头不能转化为鸡这个事理说明矛盾转化的根据和条件，内因和外因。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议论，有谁还能不理解矛盾转化的道理呢？再如，阐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手段”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这样说：“古代战争，用矛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铜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论持久战》）

这里用来议论的材料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但道理讲得十分透彻。有时，在说明某一问题或道理之前，毛泽东往往也用常事、常理把它们引出来，这样做，十分有利于对该问题或该道理的深入理解。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批评某些同志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现象，但他并不立刻进行批评，而是先说了这样几句话：“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人人都长着眼睛，他还要问；眼睛里的水叫眼泪，他也要作解释，岂非多此二举？不，这是用极浅近的事理引出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问题，这样做，会收到引起读者或听众高度注意、深入思考的效果。

有时，正好相反，他不是先用常事常理引出要阐述的问题或道理，而是在阐述完那个问题或道理之后，再把它引申到某个常事常理上面。有一次讲话中，他要求人们注意片面性问题时，这样说道：“我们有很多经验，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侧面，没有看到那个侧面，常常是因为只听了这一面的话，没听到那一面的话。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然而他又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呢？长一个岂不更好吗？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我看它们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朵听那一面。”（《时局及其他问题》）本来是谈片面性问题，却扯到了人为什么长两只耳朵这个常识上，而且还要人们“研究一下”。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但这样一引申，把片面性问题与这个常识联系起来，确实耐人深思，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片面性问题的理解。

其次，用极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用或尽量少用理论层次较高的术语和概念，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他也都设法使之化难为易。对于那些高难度的术语和概念，如果不作任何说明，势必造成晦涩难懂的语言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12月《致李达》的信中，“建议”李达“在再写文章时”，“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希望别人这样做，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例如，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对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以及造成敌人的“错觉”、“不意”；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对“歼灭”、“歼灭性打击”之类的术语和概念都作了具体的解释。其中对“灵活性”、“歼灭”和“歼灭性打击”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论持久战》）。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关于情况的通报》）。

这些术语和概念，经作者这样一解释，读者对它们自然会有明确的认识，增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对全篇的内容也就不会产生障碍或疑点了。

合理有效地使用文言文

毛泽东很少使用文言词语。他对文言的态度，是既使用，又限制。本来，他是能够很熟练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的，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风”，年轻时也曾在“心理上”“倾向于古文形式”。在延安时，他曾对斯诺说过，“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然而，毛泽东严格地控制使用文言写作，除了他早年写的文章以外，只有以下几种情况，他才偶用文言。一种情况是，给懂文言的人写信时，他常用文言，有时文白相间，有时通篇使用，如《致蔡元培》《致蒋介石》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也收入了不少文言书信；另一种情况是，只有用十分严肃的文体（如通电、布告等）写作时，才偶尔使用文言，有时也可以通篇使用文言，如《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就是通篇使用文言写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一般白话文章和讲话中偶尔片言只语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或文言句式。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可看下面两则例子：

例一：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质问国民党》）！

例二：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例一中只有“沦于敌手”、“可痛也夫”、“可耻也夫”属于文言词语。其中“可痛也夫”和“可耻也夫”属于句尾，也是一个段落的末尾。毛泽东在段尾或句尾生发感慨时使用文言或文言句式的情况，时而可见。比如“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之类，也属于这种情况。例二中的“如欲”、“蒋氏”、

“其”、“及其”、“则”、“语曰”，以及“势将席卷……以去”，都属于文言或文言句式，其数量较多，但这种情况较少。

以上两则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也偶用文言，但都不难懂。他所运用的文言，多属于所谓的“古典白话”，即属于比较通俗的文言，并且，即使读不懂，也不至于影响其整体内容的鲜明性。

毛泽东的语言有时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主，有时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主。例如，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都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主，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辅。而那些讲话，特别是那些讲演、演说等，则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主，而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辅。

其中《致蔡元培》一信，外柔而实刚，辞切而意深，分寸得体，堪称妙文；《致蒋介石》一信，“立马陈词”，分说利害，晓以大义，有如重雷轰顶，可称传世之作；《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持之有据，义正词严，几可与骆宾王《讨武曌檄》媲美。然而，无论在何种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一般性口头语言的使用，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使用的一般性口头语言的比例很大。就是说，他不但在报告、讲话中，而且在专门写的文章中也广泛使用一般性口头语言。所以极广泛地使用一般性口头语言，是毛泽东语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的语言通俗化外在的重要标志之一。

说到语言的通俗化，我们再看一看毛泽东在1940年2月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做的讲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的两段话：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为什么要取消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引者）呢……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

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这两段话中，书面语言极少，基本上都属于一般性口语，特别是第一段话中的“坏蛋”、“后面打枪”、“闹”，第二段话中的“小老婆”、“叫花子”、“吃磨擦饭”、“发国难财”、“不要脸”、“哼一声”等，都是通俗到家的口语。

在毛泽东所运用的特殊性俗语中，对谚语的使用最多。它通过极为简洁的形式，对生活、工作和斗争作了高度的概括，往往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因此它被誉为群众思想智慧的结晶，语言中的明珠。

例一：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寻乌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例二：你（指刘松林——引者）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1961年6月13日致刘松林，刘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之妻，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劝她再婚——引自《毛泽东的儿女们》）。

例三：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例一中的“快学难精”和“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例二中的“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和“高不成低不就”，例三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强盗收心做好人”，都是谚语的连用。还有三个谚语连用的：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指历代统治者反动欲望越来越大无可劝阻的道理；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文中加引号的话，都是谚语。这是三个谚语连用。

毛泽东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个谚语的运用，更为灵活，因而也显得更为典型。他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这样说：“他们（指反动派）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

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

建立在博学基础上的风趣性

毛泽东语言的风趣性十足。所谓风趣性，就是幽默或诙谐。文章和讲话中一旦有了风趣性，生动性便随之而生。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去了中国人民的信任时，毛泽东写道：“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别了·司徒雷登》）

这段话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败、失望、失去信任后不得不离开中国的颓丧神态和行为勾勒得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特别是成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使用，更是神来之笔，令人开心。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应邀对文艺界人士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人问毛泽东：“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没有作长篇宏论，却是借蒋介石和自己的姓氏幽默作答：“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爽朗而豪迈的笑声。“那你的毛……”不等问者说完，毛泽东就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于反掌。”语言揶揄嘲讽，不卑不亢，幽默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充满着必胜的革命信念。

1976年1月1日，毛泽东接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和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此时的毛泽东已进入生命的艰难时刻，甚至连端药的力气都没有了。戴维心酸地凝视着这位曾叱咤风云、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历史伟人。毛泽东见戴

维那样看着自己，有些不解地问：“你在看什么？”戴维说：“我在看你的脸。你的上半部很……很出色。”听了译员的这句翻译后，毛泽东轻轻地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谁能想到，毛泽东在身体状况如此不好的情况下，竟能这样神态自若地自我解嘲，说出如此内涵丰富的语言来！“一副大中华的脸孔！”这是毛泽东全部聪明才智与气度的真实写照，他向客人形象地绘出了一副气吞山河、笑对人生的幽默脸孔。更让戴维和朱莉惊讶的是毛泽东下面说的一段话：“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的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这就是一副彻底的喜剧脸孔了。”

听了毛泽东这段风趣而幽默的自我解嘲，戴维和朱莉都震惊了。若干年后，戴维回忆起毛泽东说这段话的情景时，仍深怀敬意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语言的个性特色。”

在幽默风趣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善于语言的含蓄诙谐，点而不破。就是注意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场合和不同目的而采用不同的语言说服手段。在许多情况下，他并不直截了当地把问题说给对方听，而是将意思隐含在其中，给听话者留下咀嚼体味的机会和体验、想象的空间。一次，卫士长李银桥指挥着几个卫士把一张大沙发从书房搬到另一间房子。沙发很大，但房子的门小，试过几次都没有搬出去，只好又放到原来的地方。毛泽东见此情景，便慢条斯理地问：“银桥，有件事我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房子呢？”说完，毛泽东便微微一笑，走出书房散步去了。

“还愣什么？搬吧。”李银桥一声招呼，大家便又干起来。这次他们听懂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动起了脑筋，不时地变换方式，最后，他们通过先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把沙发搬出了书房。毛泽东一边在院子里散步，一边望着李银桥他们。沙发一出书房，他就走了过去，并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一名

卫士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沙发的。”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从这件事中受到一点启发，有一点感想，那就是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幽默是以朴素平易的外表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幽默是活泼的外表同智慧哲理的精妙结合。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充满着幽默诙谐特点的语句比比皆是。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述创立根据地经济条件时的一段话是这样的：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即都有极大的广泛性）。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

这段话本来是谈建立根据地经济条件的问题，却扯到了在沙漠里有没有“中国人”和“敌人”及能不能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很是风趣。这种风趣是否有必要呢？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但仔细想来，也有必要。它是一种极而言之的夸张说法，是说除了没有人（或中国人，或敌人）的沙漠，即没有经济活动以外的一切地区都应该建立根据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的强调。这种情况的风趣，在其他的某些正式讲话中也出现过。例如，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反对宗派主义，增强党内、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团结问题时，毛泽东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本来是谈广泛团结的问题，却谈起了地球以外的火星和金星上有没有人、何时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容，其目的也是为了作极而言之强调，但又十分风趣。

1959年10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会后，双方在中苏边界的会谈中一直处于僵持局势。于是，毛泽东针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观念，巧妙地借用了清代张英在朝为官的四句词，说的是：其乡下家人与邻居因砌墙发生了纠纷，便捎信去让他摆摆官威，以势压人地摆平这件事。这位官老爷见信后当即提笔复信：“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此语言辞辛辣，是对赫鲁晓夫绝妙而幽默的讽刺。赫听了文字翻译后，顿时语塞，摸摸脑勺，称身体欠佳，提议休会。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仰望天空诵读了四句词：“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二句说林彪的出生地，三、四句说林彪叛逃出北京，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种幽默诙谐的语言艺术，真是巧合无间，妙不可言。辩证思维，哲理折服。毛泽东语言用词准确、圆熟，表达了思想的深刻、细致，表露感情深沉、周到，以及语气的恰当与肯定都令人惊叹、折服。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毛泽东思考问题的深邃辩证，驾驭语言的技巧娴熟。

又如，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拉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这个利用谐音（猪、朱）开的玩笑，如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其用意就十分明显。当时朱德正被当作“大军阀”进行批斗，毛泽东在那样公开的场合开这样的玩笑，不是公开为朱德平反吗？像这样利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重大政治问题，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语言风趣性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还特别喜欢用反义词，从而使反义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思维的深刻及全面，而且能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如在《实践论》中，

他说：“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这里用了四组反义词，全面深刻地指明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正确道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应用借代手法表现的真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说：“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这就是战争的辩证法。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词句一正一反，说出了根本原则。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理论与身体力行的格言。他以引用宋江三打祝家庄为例，指出只有从调查研究入手才能打胜仗。他说，《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前两次对敌情掌握不准，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成功。第三次让军师深入实际，侦察敌情和地势、地利，了解和掌握攻破的缺口，因而取得了最后胜利。“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话越品味越有味道，这话鼓励我们去学习理论，去探求事物的本质。

作为一位曾经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欺辱的国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这样的话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民间广泛的流传和浓厚的兴趣。

关于毛泽东这一言论，许多人做出种种分析，有的认为毛泽东具有浪漫主义气质和豪放性格，确立党的领导地位后，讲话有些随意，口无遮拦地道出了某种所谓的事实；有的认为这种话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说这种话是反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以致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的确对日本人多次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其时间大致在：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又道：“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对以上的言谈，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后便不难明白，所谓“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即诙谐、幽默，带有反讽和奚落、挖苦意味，但话意明确。显然，毛泽东并非肯定日本侵略；并非否认其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也并非口无遮拦地道出了某种所谓的事实。毛泽东上述讲话无非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反面教材，阐述了日本侵略在客观上产生的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反抗，以致最终造就了一个新中国罢了。

毛泽东的语言之所以会具有如此灵活的风趣性及讽刺性，首先是因为毛泽东的胸怀和见地高人一等。一个人的胸怀宽阔与否和见地远大与否，与其语言的风趣性成正比。周谷城曾与毛泽东谈过关于风趣的问题，周说：“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这话带有哲理意味，有一定科学性。古人云：风趣者，见文字之天真；于极庄重之中，有时风趣间出。然亦由见地高，精神完，于文字境界中绰然（状宽裕）有余，故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由此可见，毛泽东胸怀、见地（含智慧）过人，他的语言的风趣性自然也要过人。

其次，毛泽东是位永远自信的人。必胜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引导着他。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前者为主导，后者为基础。为此，他确实能够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尤其是他的“败不馁”的精神更为突出。在抗美援朝期间，对手是从未

打过败仗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第三，毛泽东语言的风趣性，在形式上说，完全是出于自然，并非有意为之。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专门为了风趣而风趣，而都是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不是事前设计好的，因而毫无做作之嫌。也只有这样的风趣性，才能产生生动的效果。

通俗性的特点及其技巧

如果说传统性和风趣性的特点是侧重于内容，那么通俗性则是侧重于形式方面的特点。

1、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基本上都是为了指导革命和工作实际，读者和听众主要是全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当然，也包括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在内，有时也指敌人和外国人。鉴于当时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不高，要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就要求文章和讲话以通俗易懂为原则。因此，毛泽东主张写文章和讲话要“大众化”，反对“小众化”。他既反对旧八股、洋八股，也反对“老鸦声调”式的“党八股”，反对“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反对“尽量简古”。有时，他还特意指点人们如何才能使某个具体问题解说得通俗易懂。比如，他在一次报告中告诉人们，怎样解释“机会主义”这个概念，他极通俗化地说道：“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毛泽东不仅主张语言风格的通俗化，而且始终不渝地实践自己的这一主张。

几乎所有他的文章和讲话，都可以说是通俗性语言风格的典范。只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没有人读不懂听不懂的。即使是那些高深的马列主义哲学道理，即使是那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只要在毛泽东的笔下写出和口中说出，都会显得格外明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谈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毛泽东讲话，总是用“苏格拉底式”的，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看起来很随便”。

白危在延安时写的《毛泽东印象》中说，“当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他像是一个最慈蔼的教师或保姆”，他还举例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演中如何解释和对待民主：朱德管八路军，他的马伕管他的马，一个管整个八路军，一个只管一匹马！朱德还有马骑，可是他的马伕，就只管了这匹马，岂不是一点也不民主吗？其实不然，朱德不但要骑马，而且要骑一匹好马才算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指挥官，骑了蹩脚马跑不动，误了大事，岂不糟糕？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语言，有谁还能不理解什么是民主，不明确应该怎样对待民主这样的问题呢？可见基辛格和白危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

应当格外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实践活动指导性越强的文章和讲话，其通俗性程度也越强。例如，他写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都属于哲学论文，内容也都是写实践第一、思想认识对实践依赖关系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很通俗的，一般人都能读懂。但后者比前者更通俗。这是因为，首先，后者比前者设问句用得更多，后者的标题和开头都是设问句。前者的标题比较文雅，而后者的标题比较浅近。后者开头使用设问设答引出中心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开宗明义，而前者仅提出一个问题（人们没有解决正确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的问题），不如后者提出的观点更为明确。其次，后者哲学术语比前者用得少。前者包括标题和引文在内，用的术语有：“实践论”、“社会性”、“变革实践”、“自在的阶级”、“自为的阶级”、“抽象”、“科学的抽象”、“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知行统一观”，等等。虽然这些术语都属于最基本的概念，但仍然使其内容显得理论色彩较浓；而后者这一类术语极少出现，本来可以使用术语的地方也都改换成了口语。如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代替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用“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代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等等。二者在通俗性上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前者是为了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而后者原是为了直接指导实践活动，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为了武装全中国的农民和到农村去开展社教运动的各级干部（农村

工作队员)们的头脑,以便顺利开展社教运动。而这些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是很高,这就不能不写得更通俗一些。

2、毛泽东语言风格的通俗性主要表现在:

- 用浅近的道理阐述深奥的概念或道理,即深入浅出。
- 尽量多地运用设问形式,有问必答。
- 尽量选用人民群众常用的语言。

毛泽东因为饱读诗书,加之广泛地参与和组织过学生、农民、工人等运动,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实践基础,日常言谈也是丰富多彩。这种多彩性无论是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的和平日子里,都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如果说,毛泽东的文化修养让他能绰绰有余地成为一个国学大师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包括那种所谓的粗话的语言,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素中精彩的一页。今天,当我们重新品味这种语言时,仍不免为毛泽东这位伟人具有的丰富的文化修养和语言词汇的帐务与运用拍案叫绝。

毛泽东通俗性语言欣赏

●毛泽东嘴里的“辩证法”：“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泽东嘴里的“左”和“右”：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毛泽东论字：1921年12月，毛泽东在安源煤矿工人子弟学校作报告。为了说明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了一个“工”字，然后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脚踩着地，头顶着天，这就叫“顶

天立地”。然后，毛泽东又写了一个“天”字，他微笑着告诉大家为什么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就构成“天”字，他启发大家：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破天。

●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毛泽东谈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泽东谈群众来信：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

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毛泽东谈自己：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
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毛泽东谈中国的前途：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泽东眼里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毛泽东语言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者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虽然会促进其文章的影响力，却并不能决定其文章一定能载誉天下。乾隆一生虽爱好舞文弄墨，其诗文创作可谓三等其身，但却并没有被认定为文学大家。毛泽东文章在现代汉语写作中的地位，其语体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意义，关键还在于其品格、文采和魅力，在于其表率作用。这可从下述两方面略见一斑。

其一，朴实生动、规范纯正，少有文言印记及欧化倾向

“五四”后的一定时期内，现代汉语仍处于过渡和转型阶段。此时，现代汉语语法、句式尚不成熟、规范，也没有多少被公认的典范的现代文可作楷模。不少文人学者，包括一些文章大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摆脱文言痕迹，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等人的语言也存在过重的旧书卷气。邹韬奋作为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也没有避免这种局限。另有一部分文人由于长期受西方语言熏染，也由于专业领域的原因，欧化倾向较重，影响了读者的接受。瞿秋白、胡风、朱光潜等人的语言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这一倾向。而毛泽东的语言则避免了上述两种倾向。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便做到了畅达、规范。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可以说，同代文人的语言如此自然、流畅的是极少数。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做一比较：二者同为文艺性论文，毛泽东的语言简明、畅达，可为现代汉语的典范；而瞿秋白的语言欧化特点明显，比较拖沓冗长，以至于一般读者读起来很吃力。倘若将毛泽东的哲学论著《实践论》《矛盾论》与同代哲学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人的哲学论著从语言上略作比较，便会进一步看到毛泽东语体的特点。

其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宝库

合乎语法规范，能够准确简明地把意思表达出来，是语言的基本要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并非少数。但是，简陋的词句，刻板的文法和章法，只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读者。显然，毛泽东语体的主要特色绝不仅在于简明规范和通畅，而在于鲜明的个性风格。毛泽东从不满足于把话写得清楚明白，而是力求富有表现力，力求鲜明的个性和魅力。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时，说他们“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重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描摹人物，可谓穷形尽相。在《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形容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再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形容中国革命的高潮时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这类不仅优美而且脍炙人口的语句，早已为几代人所熟诵。

毛泽东极具推陈出新、化平凡为神奇的语言才能。他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从群众生活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眼睛向下”、“纸老虎”、“小脚女人”等等。经过毛泽东点石成金的引用、化用，许多古代词语、民间熟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

其三，个性鲜明而又丰富多彩，诙谐灵性，句句珠玑

红军时代，我军战士基本上是由穿军装但不识字的农民组成，根据这一特点，毛泽东在向战士做说服教育工作时，特别注意语言的深入浅出，简单明了。一次，他在给战士作演说时，就是用简单、通俗、明白的语言，讲清了深奥的革命道理。他说：“同志们，我们是革命队伍，必须懂得革命道理，懂得为谁打仗。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写了很多书，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掌握那么多，我今天就讲‘二、三、四’三个字，这三个字的道理，请大家一定用心记住。我说的‘二’字，就是讲两种战争。古今中外发生了许多战争，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战争，一种是非正义的战争。现在我们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我说的‘三’字，就是我们在红

军队伍里必须遵守三大纪律。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要有革命的纪律，否则便是一盘散沙，不能统一行动，这样就不能打胜仗，革命的纪律要求我们不能侵犯工农的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和红薯都不能拿。我说的‘四’字，就是说红军要做好四件事：一件是打土豪分田地；二是建立工农武装；三是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建立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四是建立地方党组织，领导大家和地主老财斗，与反动派斗。”毛泽东就只用了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加起来还不到 500 字，却把大道理讲清楚了，真正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

毛泽东语体之所以成为现代汉语写作的典范，并体现了鲜明的个性风格，其成因是复杂的，决非本文可以厘清。这里仅从两个角度略作观照。

其一，正确处理“三个吸收”的关系。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在写作实践中，毛泽东正是努力从上述三方面吸收语言营养的。毛泽东始终注意以群众生活语言为基础，“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须知，这个基础至关重要，这恰恰是现代汉语的根本所在，源泉所在。“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吸收群众语言而没有失却典雅高致，吸收古典营养而戒绝文言痕迹和旧书卷气，吸收外国语言而不流于繁冗拖沓。他始终做到了“独立自主”不失却自我，充分体现了善于融汇众长的综合能力。

其二，个性秉赋的自然显现。作者的语言风格往往是其个性的自然展示。毛泽东集农民、学者、政治家、诗人的秉性于一身。农民的质朴和率真、学者的渊博和儒雅、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诗人的激情和浪漫想象，这一切在他身上十分融洽自然。

杰出的语言大师往往开辟一代文风，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无疑，毛泽东便属于这种产生深远影响的语言大师。这比某些“显学”，如“钱

学”之类狭小的文化圈内的自恋与把玩或许更有意义——其原因在于，它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一种巨大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

第十章 经天纬地的哲学伟人

第一节 开拓哲学新天地

哲学和国学相互交融，彼此辉映，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任何的国学大师必须具备丰富的哲学功底，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功底的国学大师是没有的。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哲学理论家。

毛泽东的哲学理论系统，是由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毛泽东的立场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毛泽东之所以能说别人所不能说，能做别人所不能做，这与他自身具备的良好的哲学修养是分不开的。说到毛泽东的哲学修养，其生涯仍旧必须追溯于其中国传统国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在青年时代，毛泽东曾深入钻研过许多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从孔孟老庄及其他先秦诸子，到汉唐儒学、宋明理学乃至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他都精读有加。这样，他不但具备了广博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在思想上也受到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其中以朱熹思想的影响尤为明

显。在毛泽东当时的圣贤英雄史观、寻找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主张、哲学救国的观念中，均可发现这种影响。

早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和同学们便组织过哲学小组，并请杨昌济先生担任指导。在这里，他或请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解疑难问题，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所学，必多裨益。那时，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他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如饥似渴地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从1920年接触到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井冈山时期从敌占区搞到的《反杜林论》，到延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著作的系统研究，使毛泽东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毛泽东就成为既深入了解中国哲学传统，又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哲学理论家。这为他批判、改造和利用、借鉴中国传统哲学，创立中国现代哲学的新形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虽然篇幅不长，且主要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盲动主义而作出的批评，但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这

些口号包含着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日后发展成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路线。延安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创立的标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写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新的阶段。

《实践论》对中国乃至人类哲学体系的贡献

《实践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综合了国内外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成果，总结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系统地、通俗而又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乃至人类哲学都是一种贡献。

1、完整地论述了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实践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说明。但他们都未能对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作出专门的、系统的说明。为了反对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实践论》的一开头就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人的社会实践除了生产活动之外，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首次把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活动规定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这有助于人们掌握社会实践的基本内容，把实践观点、群众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同唯心主义的和旧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划清界限。在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社会实践三项内容之一，无疑是一种灼见。

2、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著作中分别谈论过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毛泽东综合了

前人的成果对此作了集中的系统的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因此，他强调的、反复阐述的则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他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又指出，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些事物的现象，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3、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的很明确，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具体地阐明这一途径。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际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实践活动日益密切的结合，必然要求对认识过程作出具体的说明。《实践论》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首先它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指出人们在实践中开始获得的是感性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社会实践的继续便在人们的脑子里产生认识过程的飞跃，通过概念、判断、推理，通过科学的抽象达到对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即理性认识。针对党内轻视实践、拒绝中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和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的经验主义，《实践论》反复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批判了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它指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其次，它指出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和基础。它认为，要使感性认识正确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条件是，一要所得的“感觉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二

要将所得的材料，经过“思考”，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两者缺一不可。

再次，它阐明了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意义。《实践论》强调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这是因为：第一，认识的目的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因此，“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第二，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过程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因此，这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实践论》还说明，由于人们常常受着许多条件的限制，因此，人们不能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的一次过程就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而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获得。

4、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践论》的副标题表明，它的主题、中心内容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反对它们之间的任何割裂和脱离。它说：“唯心论和机械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它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论》的这一结论补充和发展了经典作家们关于真理是具体的思想，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对克服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5、科学地概括了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

在上世纪 30 年代，国内外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不能明晰地揭示出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实践论》打破了这种流行的认识论体系，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来阐述认识过程，对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作了如下的概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概括是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科学抽象，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矛盾论》对中国乃至人类哲学体系的贡献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还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本人对此未能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发挥。列宁逝世之后，苏联哲学工作者在马、列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命题，但他们未能将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组成一个严密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完成“说明和发挥”的任务。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作了最初的尝试和准备。毛泽东的《矛盾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系统而深刻地论证了对立统一学说，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

1、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

《矛盾论》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看成是贯穿整个人类认识过程的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对立在于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它指出：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其根本缺陷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切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

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它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有力地批驳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它依据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2、明确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两种含义，详尽阐明了矛盾特殊性原理

《矛盾论》把矛盾的普遍性概括为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它特别说明了矛盾普遍性第二方面的含义，指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差异就是矛盾，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它又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原理作了详尽的、创造性的论述。它详细地研究了矛盾特殊性的各种情形，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3、系统地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矛盾论》根据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复杂的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次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两种特别的情形提出来加以专门的、系统的论述。

首先，它说明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原理的哲学根据和研究它们的意义。指出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

其次，它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

个以上矛盾的复杂的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进一步论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矛盾论》吸取了中国哲学史上“相反相成”的思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的经验，用较多的篇幅，大量的例子来说明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互相转化的原理。

《矛盾论》发挥了列宁关于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论点。指出：客观事物中的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因此，否认同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把它看成是绝对的，那就把对立的事物当做死的、凝固的东西，否定了事物的发展，陷入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矛盾论》强调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相联结，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这既反对了只讲同一，不讲斗争的右的错误倾向，又反对了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左”的错误倾向，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5、对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做出新的概括

《矛盾论》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贯串于矛盾学说的各个方面，只有真正掌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道理，才能真正把握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才算真正懂得辩证法。如果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者片面强调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忽视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或者片面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忽视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那就没有辩证法，就陷入形而上学。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结合的原则。如果片面强调普遍性，否认特殊性，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片面强调特殊性，强调本民族的特点或新时代的特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那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

《实践论》《矛盾论》是人类思想史上两篇不朽的光辉文献，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伟大的指导作用。它们的基本思想已深入到中国人民思想意识中，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第二节 评价与扬弃中国传统哲学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孔夫子

在近代，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伴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而走上下坡路，创立新的哲学形态的基本前提就是对它的深入批判。

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毛泽东在“五四”之前已经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怀疑与最初的批判。“五四”时期，他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中所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与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然而在理论上系统地评论批判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是在延安时期进行的，并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同时，一些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也积极进行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并为使之成为一门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的新学科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哲学。其要点有：指出了传统哲学的阶级性质，肯定了其中虽然也存在某些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在根本性质上却是从属于封建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哲学理论；论述了对待传统哲学的科学方针，那就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指明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传统哲学，既不应割断历史，也不应宣传封建毒素，评价传统哲学的立足点在于引导人民向前看。

对于中国哲学中的具体内容，包括人物、观点、命题、流派，毛泽东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评论。在《红旗》杂志 1958 年发表的社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毛泽东写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

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提到他们。”这段话可以看作毛泽东对古代哲学家和有关哲学思想中值得肯定的思想的一个总括性表述。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他所实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原则、教学方法，对于后来社会的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有些制度、原则和方法，还一直被今天的教育沿用着。虽然这种沿用形式上是有变化的，但实际上是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精神的。毛泽东认识到了当今教育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性，所以在谈到当今教育的时候，常常以孔子的教育说明问题。以此说明，今天的教育是历史上教育的继承，今天的教育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就是孔夫子的文化。比如送先生一块猪肉才能上学，这是孔夫子说的，这块猪肉究竟有几斤几十斤，不得而知……总之，这件事是从孔夫子开始的，这是孔夫子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教育掌握在巫神手里，老百姓没有自由送子弟进学的情形。老百姓自己送学生进学，还是从孔夫子开始的。我看孔夫子的这种办法是民办学校，他的学生有三千，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有，程度不齐。大学部有72个，所谓七十二贤人，其他都是小学中学。当然这三千弟子也是多少年学生的总数，但程度不同也是事实。”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送先生一块肉”，就是《论语》中说的“自动拿上一束肉干”。一束肉干，也就是十条肉干。有人说，送一束肉干，是进学的见面礼；但是作为一种制度，也可以说就是学费。拿学费来上学，就是民办的学校。

毛泽东认为，民办学校在孔子那时候就有了，而且还培养出了七十二贤人。也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了孔子的教学方法。毛泽东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

据学生要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现在学校形成一个工厂，将来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我看又要回复到孔老夫子的方法了。孔老夫子的方法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同样一个的性质的问题，他用不同方法和不同的人讲，比如他和子路讲是一个方法，和另外一个人讲又是另外一个方法，子路这个人急得很，他就用适合子路的心情来教授。”

毛泽东说的“孔老夫子的方法”，有点像今天所说的因材施教。孔老夫子施行的对不同学生用不同方法讲授，《论语》里是多有记载的。例如《论语·先进》里记载的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子路问孔子：“听到就马上干起来吗？”孔子回答说：“爸爸和哥哥都还活着，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呢？”冉有也问孔子：“听到就马上干起来吗？”孔子却回答说：“听到就马上干起来。（看到孔子回答的不一样），公西华问孔子：“子路问‘听到就马上干起来吗？’你说‘爸爸和哥哥都还活着（不能马上就干起来）’，冉有问‘听到就马上干起来吗？’你回答说‘听到就马上干起来，（两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你的回答却完全相反），我听的有些糊涂了，所以大胆请问老师。”孔子回答说：“冉有平时做事退缩（胆小），我那样说给他壮壮胆；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那么大，我那样说是要压压他。”

毛泽东说的同样性质的一个问题而用不同的方法来讲，指的就是这件事。子路和冉有，两个人脾气不一样，所以孔子对两个人的回答就不一样，这就是因材施教。对此，毛泽东是极为肯定的。毛泽东肯定了孔子教育的许多积极的地方，同时也批判了孔子教育的缺点。他说：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见他对孔子忽视劳动的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还说：“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

樊迟‘小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一分为二地分析的。

二，对传统的民本思想给予科学的扬弃

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严格地讲，传统意义上的民本主义的政治主体并不是人民，而是王权。它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维护王权秩序的良苦用心，而不是一种对政治现实的批判与反抗。在民本主义的政治构图中，黎民始终只是被同情、怜悯的对象，被拯救的对象，他们是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永远都只有等待圣贤君子“清官明君”去为他们作主的份。换句话说，民本主义哪怕在价值理念上把“民”的地位吹到天上去，最终落实于现实，“民”的地位，充其量依然不过是做“子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民本主义，始终不过是一种主观精神上的价值理想，它没有，也不可能落实为现实的政治制度规范。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它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毛泽东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毛泽东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毛泽东以“爱民论”为

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 and 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和虚伪性。

第三节 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

在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哲学问题并建立自己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大量地改造利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材料，这使其哲学理论无论是在外在形式上，还是在理论内容上，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传统。具体讲，毛泽东在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方面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毛泽东变换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某些命题的主题，改变了其旧有意义，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之中。

如“实事求是”，在古人那里主要是一种治学态度和入世态度，毛泽东把它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并制定出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二，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使其在新的理论前提下，重新表现出其理论价值。

中国传统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固然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然而缺乏科学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论证。含糊而神秘的“天”、“道”、“气”、“阴阳”等观念术语极大地掩盖了其真理性的光芒。如有关矛盾的思想，毛泽东把它置于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使“一分为二”、“相反相成”等中国古代关于矛盾关系的精辟论断成为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象化语言。

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法的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深刻，绵延数千余年，并逐渐形成了以阐述对立关系为致思趋势的辩证法传统。

殷周之际的《易经》表现出对世界上对立现象的初步认识，甚至还提出了“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辩证观念。到《易传》中，这种直观的辩证观念演变成以阴阳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术比附解释各类社会现象，表明当时人们已充分认识到对立现象的普遍性。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他认为一切事物中均存在着阴阳两种成份，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具有守静消极的倾向，然而却广泛揭示了各类对立的现象及其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这些都表达了深刻的哲理。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著作也充满了对战争中各类对立关系的揭示，形成了中国辩证法思想的另一源流。敌我、攻守存亡、险易等成对范畴在《孙子兵法》和被毛泽东称道的《老子》中俯拾皆是。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哲学家关于对立关系的本质的专门研究虽然不多，但融于各种问题中的辩证法思想却是异常丰富，如在古今、有无、心性、理事、天人、理气、道器等许多问题中都包含着从不同角度对对立、转化、发展等辩证关系的阐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明理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唯心主义的理学虽然其社会作用是保守的，但作为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高峰，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却是非常深刻的。二程的“物皆有对”，“物极必反”；朱熹的“一中有二”，及在理念、道器关系中对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论述，都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思想的精华。

毛泽东在辩证法方面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和利用与其青年时代打下的传统文化基础密不可分。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他接受辩证法早于接受唯物主义。当他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时，就已经是一个辩证论者了。在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辩证法的立场，甚至在他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在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就已经能够对社会问题作出有科学预见的分析了。毛泽东那时的辩证法观念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如《易经》《老子》《孙子》、王夫之及朱熹的著作，他都十分熟悉。

延安时期毛泽东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其辩证法思想，就是以矛盾为中心建构起的。从理论内容上看，这首先是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列宁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述了列宁的主张，然后进行了发挥，并建立了矛盾范畴的体系。从理论形态上看，这同时也是对中国辩证法传统的继承。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生动而直观，虽然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对事物辩证发展的理解却集中在其中的矛盾关系上，对矛盾关系的阐述又集中在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关系上，这是中国辩证法理论的鲜明特色。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继承了这一传统，虽然在理论内容是列宁思想的再现，但在致思趋势上却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这与列宁想以对立统一规律来构建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设想，在理论阐述的角度上有一定差异。

这样，毛泽东虽然没有集中精力来建构一个唯物辩证法的全面理论体系，但却把对立统一规律大大地深化了，把其内容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分析，创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这不能不归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影响。

在矛盾理论当中，毛泽东最独特最醒目的贡献在于，他把个性、共性作为矛盾法则的精髓提出来“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个性共性的关系问题，其实践基础无疑在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一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深刻的经验和教毛泽东在探索,鼠革命的道路和与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实践中，对普遍原贝和具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这一实践问题的哲学升华便体现在“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论断之中。这个论断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列宁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等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剖析了这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和认识论意义。列宁指出，在一般与个别

的关系中，包含着“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并由此引申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结论，而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毛泽东熟知并继承了这一思想。这个论断，就其表述形态和理论特征来看，明显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三，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某些问题的阐述角度，扩充了其理论意义，用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

知行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既占有重要位置，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长期以来，在知行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十分明显，然而双方又都存在着严重缺陷。唯心主义的错误立场自不待言，即使持唯物主义立场的观点，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他们的观点没有科学的论证，没有解释清楚知与行的内在关系，更没有讲清认识的机制，至多是一种朴素自发的合理性倾向，且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其结论也只是一种直观的意向性结论。

毛泽东深入批判了知行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这是对主张知先行后的各种主客观唯心主义的直接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揭示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论证了认识如何由感性向理性，再从理性回到实践的辩证过程，科学地阐述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使千百年来古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

毛泽东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其要点为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因为知行之间存在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关系，毛泽东又把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概括为知行统一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首次提出，是毛泽东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贡献。

这一结论从命题的提法上，无疑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论的启示，从内容上则是对知行合一论的有力批判。知行合一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代表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知行观。如禅宗提出“定慧等学”，具

有知行合一的倾向。朱熹倡导的是知先行后，不过他也主张“知行相须”。王阳明则提出了完善的唯心主义知行合一论，即在人的主观中知行合为一体。与这种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论相反，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之上的，以实践作为知行统一的基础。它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利用而实现的。

第四节 从治学态度到思想路线

在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利用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实事求是”，被毛泽东赋予了新的含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例子，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出来单独说明。虽然“实事求是”直接来源于《汉书》，但其广阔的背景则是中国传统的“实学”，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对“实事求是”作出科学合理的改造，正在于他受包括实学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实践理性的思想性格。

提到“实学”，人们便会想起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颜习斋。

颜氏之学括而言之，曰“实”曰“习”。在治学上特重经世致用，反对空疏清谈；在生存风格上，推崇习行践履，反对枯坐静思。颜氏在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受到宋明道学精神浸淫的时代，苦心孤诣，力排众议，对道学遗毒进行了惊世骇俗的抨击，极力鼓噪经世实学，身体力行地实践习行人生，在清初儒学中别立门宗，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特别是民初以来，颜学在沉寂了几百年之后，被一大批迫切想从历史传统中寻找出可同西学相衔接的思想资源的思想家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重新大发异彩。从梁启超、章太炎到周作人，都曾热情地张扬过颜学的现代意义。在一大批执思想界之牛耳的思想巨人的推动下，“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曾掀起过一场声势不小的颜学热。青年毛泽东对颜学及颜氏之为人推崇备至，无疑正是时代思潮洗礼的结果。

颜习斋开两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两千年不敢下之笔对程朱理学的批判，锋芒主要集中在其“离事离物而为心口悬空之道，纸墨虚华之

学”。他倡导“习行经济”的实事实用之学，强调为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致用。“学须一件做成有用，便是圣贤一流。”为此，他还身体力行，“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

与崇尚经世致用相适应，颜习斋在致知方法和生存风格上突出一个“习”字。他将自己的书斋改名为“习斋”，并以“习斋”自号，还曾广泛地习礼、习琴、习射、习拳法、习医、习农事，堪称一位习行大儒。颜习斋甚至还把“动”、“习行”视为圣人的人格本体，“……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这一切同毛泽东以“动”为“人格本源”，以“动”“养身乐心”的思想意识是直接相通的。梁启超曾因颜习斋主动斥静而称“中国二千年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除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这一概括的确入木三分地归纳出了颜学的根本精神，而这一精神同毛泽东关于干就是学，而且是更重要的学的思想同样也是极为相近的。

毛泽东一生深得颜学之精髓。在中国历史上，从思想性格到生存风格；从思想的长处之处到弊病所在，同毛泽东如此接近的，恐怕在颜氏之外没有第二个。颜习斋、毛泽东均出身社会中下阶层，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农家文化的熏陶，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疾苦有很深的了解。相近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思想性格的相通提供了基础。有了这一层思想基础，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其思想的诸多方面，承继、光大颜学传统，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毛泽东改造“实事求是”的主体文化与性格倾向不能不说受到颜习斋及其开创的实学思潮的影响。但这只是他能够改造利用“实事求是”的外在因素。所以我们还要对“实事求是”本身进行考察。

“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古代代表的传统，与唯心主义的倾向相对立，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在中国古代表征了这样几种主张与传统：

一、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也是实事求是一词的最初含义。班固在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时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知足也。”这种严谨的学风，在中国古代具有历史性传统：从孔子的“学而不厌”，“不耻下问”，乃至顾炎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都体现了这种良好的学风。这种学风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古代文化由于缺乏科学理论形态和严格逻辑论证所造成的主观意向性弊端，特别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面对现实的人生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理论传统

在儒家学派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理论传统。一派是专事训诂注经，空谈心性的传统，汉儒朴学、宋明理学及乾嘉学派即是如此。他们严重脱离现实，或者寻章摘句，或者空谈义理。另一派则是主张将“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不但要求道德修养，还要求能兼济天下，担负起社会历史使命。从儒家修齐平治的人生理想，到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的主张，都代表了这一传统。

三、求实、求变，反迷信的思想传统

与那些墨守陈规、繁文缛节的科条律例相对立，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正视社会现实，反对迷信古人，要求变革现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先秦墨家所主张的“取实予名”，“有本”、“有原”、“有用”的“三表”，子产的“天道远，人道弥”，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使画不法古”，韩非的“参验”等思想，都具有求实求变的唯物主义倾向。王充的评判圣人，王安石的“巧祖宗不足法”都体现了鲜明的反迷信精神。

毛泽东继承和改造了以实事求是精神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路线。这表现在：首先，毛泽东继承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录有曾国藩的话，“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并一再表示佩服曾的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和学以致用的精神。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贯重视实际考察，强调调查研究，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尤为突出。王明等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抓住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是领略它的精神实质，严重脱离中国具体实践。这种教条主义的立场与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历史上落后传统在现时代的再现。毛泽东则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把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其次，毛泽东突破了实事求是作为学风和思想作风的原有含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重新赋予其中每个字以新的含义，极大地扩充其内涵，并由此创立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语作了新的哲学意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毛泽东就赋予这一命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把它纳入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来。藉此，以实事求是观念为核心，毛泽东创立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毛泽东所制定的这条思想路线不仅是一个政治伟人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伟人的结晶。它不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方面的意义。

其一，这条思想路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物主义传统的集大成。它集中继承了中国古人关于优良学风、深入实际、注重现实反对迷信、提倡进步等思想作风。

其二，这条路线融汇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两大唯物主义传统于一体，使中国古代优秀思想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再现其真理性的光辉。

其三，这条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异常鲜明的中国特色表现出来。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语言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深邃哲理，为西方文化扎根中国大地做出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第五节 超凡脱俗的思想大师

毛泽东对墨子及墨家思想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及阐述，这种了解和阐述的深刻与细致，尤其是其中处处显示出来的伟大的思想性决非一个专业学者能企及，公正、客观地说，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也只能望其项背。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约生于公元前480至400年前后。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一位兼具军事色彩的杰出工匠。早年曾受到周礼与儒学的强烈影响，尔后毅然反叛其说，自创门派，收徒授学、传技，并奔波于诸侯列国之间从事“兼爱”、“非攻”的宣传工作。墨子与一般工匠的区别在于，他不仅是一名劳动者，而且是一位立足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创立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派别的人。与一般的思想派别不同，墨家是一个劳动——技术型的战斗团体。

中国古代的墨家学说是农家文化最集中的理论表达。汉代随着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与儒学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上有着重大分歧，反映社会下层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学便遭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贬斥，被摒除于正统价值秩序之外。墨学的思想精神由此而流向了民间，并构成民间非主流文化的重要思想源头。历代的农民起义，从意识形态（包括口号、政策、社会、理想、道德观念等）到组织和戒律，都相当广泛地体现出了墨家思想的色彩。清末民初以来，儒学的独尊地位岌岌可危，并逐步走向了瓦解，墨学的思想价值则逐渐为具有叛逆精神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一些来自社会底层，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与墨学更是一拍即合，成了墨学现代意义的热情鼓吹者。为历史尘埃所埋没的墨学在现代中国重新特放异彩，成为取代儒学的新显学。

“五四”时期，墨学复兴运动与国人对西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汇为一流，千古墨学遂成为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者理解和阐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他们以墨子的“赖其力以生”来比拟社会主义的“人人劳动”，以“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解释“财产公有”，以“谩差等”来注解“消灭阶级差别”。譬如，孙中山就曾把墨子“兼爱”说误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梁启超也认为，“兼爱”“这种信条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相符合的”。“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1921年写的《墨子的劳农主义》一文中，完全将墨子学说等同为列宁的“劳农主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还数毛泽东的挚友、中共第一代理论家蔡和森，他径直将列宁说成是墨学的实践者。1918年7月21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对于毛泽东来说，接受墨学的影响，还有另一条精神途径，那就是湘学的思想传统。湘学历来有崇尚禹墨勤俭苦拙之风的传统。作为近代湘学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一代大儒曾国藩治学的特色即是对诸子百家之学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通常不为儒者所重的墨学亦不例外。

曾氏曾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并说：“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可师矣，不可弃也。”曾国藩还认为，墨学的诸多方面，如“豪侠”、薄利重义、忘己济人、轻死重节皆“与圣人之道”一致。他的这种思想特色，常受到正统理学家的讥议，其学曾被后人概括为“以老庄为体，禹墨为学”、“混合儒墨”。对曾国藩、谭嗣同均极为崇敬的杨昌济受湘学传统及时风的影响，对墨学亦颇为推重。他的《达化斋日记》就有许多关于他“看墨子”的记载。从他的读书笔记来看其对墨家的许多道德价值观念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诸如“仁”、“俭”、“勤”等。

青年毛泽东在曾国藩、谭嗣同这些精神偶像，特别是在老师杨昌济的思想引导下，直接间接地受到墨学思想传统的熏陶，是毋庸置疑的。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毛泽东不仅肯定墨翟学说的精神旨意亦在于“达其个人之正鹄”，而且对墨子的兼爱之说作了积极的评价：

“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受正统儒学排斥的墨学思想往往又在一些更多反映小生产劳动者思想情感的儒学“异端”身上得到体现。颜学的例子就非常典型。颜学的根本特色是推重“习行”，特别是体力劳动，并以此来救治理学的空疏之弊。此外，颜学崇尚“豪爽倜傥”的豪杰人格，提倡“动”的人生，以及清苦节俭的生活，这些均与墨学有相通之处。颜元自己说过：“使杨、墨行世，犹利七而害三。”无怪乎梁启超说：“元道太刻苦，类墨氏。”颜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墨学的一种翻版。

毕生与农家文化保持精神联系，始终没有离弃自己下层劳动者价值立场的毛泽东，与墨学思想有一种天然的共鸣感。相近的小生产者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情感，很容易使毛泽东把墨学理解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思想学说，甚至认为是中国下层劳动者的早期社会主义理想。墨学精神传统的染濡，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同农民文化的精神联系，为沟通毛泽东同千古以来的社会底层非主流文化传统（包括农民造反传统）的联系，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中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相融合的问题，并积极尝试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可以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材料时，他重新认真地研究了墨子的思想，从他1939年2月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墨子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其对墨子思想评价之高，更是非同寻常。他称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对墨子“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等命题的现代哲学意义作了发挥。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如下：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看中国看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进去，仅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①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②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泼伺荷别及厥的地方。③“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

（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④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此处可见，毛泽东对陈伯达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认为他的一大功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也藉此把墨子看成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代表，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均已失传，现在看到的只是他的“著作残篇”。从“著作残篇”来看他的哲学思想，可以看出他确实不愧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他把世界看成是永恒变化的，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更新的。他提出了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河流的命题，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你曾经走进过的河流时，那条河流已经不是你第一次走进时的河流了，原来的那条河流已经变化了。这与恩格斯所认为的一个事物在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的思想，是一致的。与世上事物都是变化的观念相联系，是事物的相对性。赫拉克利特认为，世上事物都是有相对性的，例如他说“最美的猴子同人类相比也是丑的”、“海

水最干净，又最脏：鱼能喝，有营养；人不能喝，有毒”、“驴爱草料，不要黄金”、“猪在污泥中洗澡，鸟在灰土中洗澡”，这些都是极富辩证法的观念。

墨子哲学思想中关于名实、同异、义利、半端等的讨论，也是极寓辩证法的。其所认为的宇宙事物是变动不居的观念，也是极其深刻的思想。由此可知，墨子不愧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毛泽东对《墨子》一书显然是下工夫读了的，所以对陈伯达的文章能提出中肯而独到的看法。毛泽东对墨子其人一向推崇。1939年4月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便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除了肯定墨子是辩证唯物论大家以外，还提出了几条可供修改的参考意见——事物的质与属性问题，是陈伯达文章中谈到名实时提出来的。毛泽东觉得陈伯达这种论述还不够，所以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就此说，“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在毛泽东看来，质与属性的区别，就在于质是根本的、属性是非根本的。认为属性是非根本的，是因为“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陈伯达的文章，没有把质与属性真正区别开。就陈伯达文中所说的“实：其志气之见”的观点，毛泽东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志气”并不是一个东西，“志似指事物的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这种进一步的解释，意在说明，不能把质与属性混为一谈。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文章中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所谓必然性，就是“物之所以然”，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形态”。毛泽东说，“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陈伯达文章所表达的“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是对的，因为它说明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有了这个必然性，即使没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也会发生别的什么起义，因为

必然性一定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毛泽东说：“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陈伯达在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指十月十日）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是对的，可又补充说：“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毛泽东的补充，意在说明，必然性一定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是不行的。这就是“必然性”之所以称为必然性的原因。

关于中庸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墨家的说法虽然与儒家的说法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毛泽东说：“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犹不及。”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墨子的“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的“中”（不偏之谓中）同。墨子的“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同。“欲”之“正”是“利”（欲的质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恶的质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在毛泽东看来，欲的质不偏离开利（欲正权利），恶的质不偏离开害（恶正权害），这样善恶的质就算是没有动摇（正而不可摇），这就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一样了。

陈伯达的文章中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个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对此，毛泽东认为甚是不妥，认为这是“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毛泽东说：“一个质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在这里，毛泽东把中庸与折衷主义进行了区别。在毛泽东看来，中庸不等于不偏

不倚，中庸是指在一个过程中既有所偏又没有离开质。追求绝对的不偏不倚，就是折衷主义了，而墨子并不是折衷主义者。毛泽东说：“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关于“半，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其所讨论的是“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事实上，墨子提出的有关“半，端”的一些论点，是针对庄子的事物无限可分理论的，具体地说，是针对庄子所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命题的。

第六节 客观深入地解析孔夫子

毛泽东从私塾学堂开始，读的就是“五经”、“四书”，以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等蒙书。这些书宣传的多是儒家思想，抑或孔子的思想。换言之，毛泽东早年读得最多的是孔子的书，接触最多的是孔子的思想，最熟悉的也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都是要批判地继承孔学这份宝贵的遗产。这只要看看毛泽东在一些场合对孔子的充分肯定，就可以完全清楚了。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报告，谈到学习的时候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劳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批示上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好，采取肯定的态度也好，毛泽东都是经常评用孔子的思想的，用这种评用来说明他当时要说明的问题，从而指导当前的运动。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评用，具体地可归纳为引用孔子的部分真理说明所要说明的问题、批判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义解孔子的名实论、发展“过犹不及”的辩证法、诠释“知仁勇”等几个部分。

首先来看毛泽东如何解析孔子的正名思想的：

孔子临终前自认为是哲人。据《礼记·檀弓上》记载：一天早晨，孔子拄着手杖，逍遥于门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毕入门，当户而坐，长叹曰：“予殆将死也！”从此卧床不起。“七日而没”。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代，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感到天下无道久矣，痛心疾首，矢志于救世。他的哲学是救世哲学，政治哲学。为了救世，恢复周礼，变“无道”为“有道”，他四处奔走，栖栖惶惶，提出“正名”的主张。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卫国的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

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把“正名”看成是为政的第一要务。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的论文后致信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陈伯达的上级领导，是他请毛泽东给陈文提意见的）。在信中，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前提下，提出了7点商榷之处。其中第一点就是关于孔子的“正名”问题。孔子的“正名”是企图用过时的、已崩坏了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的制度。孔子把名（周礼）看成是不变的根本，而不是把事“社会现实”看成根本。他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而是要社会倒退回去符合“名”。所以孔子的“正名”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毛泽东赞成陈伯达对孔子“正名”的分析说：“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毛泽东不满足于这一点，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孔子是唯心论的错误。在他看来，孔子的“正名”中有着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可为我们吸取利用。

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受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实践，做，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即是把观念、理论、方案、图样等“名”，经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为“事”的过程，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所以，“正名”作为实践论来讲是对的，它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毛泽东还认为，孔子的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它强调了“主观能动性”。正因为孔子的观念论哲学里强调了“主观能动性”，所以才引起了人的注意，才得到了人的拥护。毛泽东说，“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

总之，毛泽东看到了孔子的观念论哲学里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了其中的片面真理。毛泽东认为，除了名与实的关系里有辩证法外，孔子所说的“文与质”、“言与行”等关系，也包含着辩证法。毛泽东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如《论语·雍也》中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则包含着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辩证法。“质”可以看作是内容的范畴，“文”可以看作是形式的范畴；内容充分了而形式不能很好表现它，就会流于粗野，形式很华美而内容乏匮，那就不免流于虚浮。只有文与质两者兼备，才会造成内容形式统一的“文质彬彬”状态。关于言与行，《论语·公冶长》中所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子路》中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宪问》中所说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都是强调“言”与“行”的统一，都是强调言行一致的，都是包含着辩证统一思想的。这都可以说是孔子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

其次，毛泽东深入全面地剖析了儒家的“中庸”概念。

“中庸”是由孔子提出的儒家学说的基本范畴之一，它要求“允执其中”，反对“过”和“不及”。从政治作用上看无疑是保守的，然而在客观上却触及到辩证法的某些方面。毛泽东对中庸的评价首先就是从辩证法的角度进行的。在给陈伯达、张闻天的信中和在此数月之后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毛泽东都深入剖析了“中庸”

这一范畴的各种含义，但他对中庸的基本评价前后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信中，毛泽东对“中庸”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认为中庸就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并认为《中庸》一书中对中庸的解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

虽然毛泽东也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发展的思想，且有“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但却肯定其“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

数月之后，毛泽东对中庸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中庸“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在政治上，“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并确认“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与前面肯定中庸“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不同，认为其“畏惧”质变，是“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并认为中庸由于坚持质的不变因而是“死硬派”，又因为畏首畏尾于正反之间因而是“折衷派”。

什么原因使得毛泽东思想发生变化暂且不论。无疑，后来的评论更接近中庸在儒家学说中的本来意义，或者可以认为，后来的评论是毛泽东从本来意义上对中庸的评价，是从总体上对中庸的全面评价，侧重点在政治方面，在此之前是对中庸，特别是对中庸解释中的合理因素的评价，是仅从思想方法角度的评价。

那么，毛泽东的评价是什么意思呢？

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解释了孔子的“过犹不及”。陈伯达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中庸’。”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对“过犹不及”的解释是对的，但是又认为他说的不够，所以便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辨析。毛泽东认为，“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说法虽然是对的，但是不如说成“一

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过”和“不及”，都是因为它们没有合于一定的质。反对“过”和“不及”，是在反对两个极端，是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毛泽东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毛泽东还说：“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这也就是说，反对“过”与“不及”的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符合事物一定“质”的“量”的界限。找到了符合事物一定“质”的“量”的界限，就算是合于“中庸”了。

毛泽东在谈这个道理的同时，还举了两个例子，即舜和大禹的两个例子。两个例子都见于《中庸》。

有一次孔子说：“舜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喜欢询问，又喜欢考察平凡的言论，他能够隐瞒人们的坏处，能够宣扬人们的好处，能掌握住两端（做到既不“过”又不“不及”）。他用中庸于人民之间。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孔子也认为颜回是掌握了中庸的人，他说：“颜回之为人处事，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了好的道理，就牢记在心上，永远不忘。”毛泽东认为，舜和大禹的事才“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舜其大知”的注释，是对“中庸”的正确解释。朱熹的解释是：“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地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毛泽东说：“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

在辨析“过犹不及”的含义的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毛泽东认为，“过”就是人们常说的“左”的东西，“不及”就是人们常说的：“右”的东西。他说：“依照现在的观点来说，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

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

“剥削阶级当它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这句话是 1943 年 6 月，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的批语。纵观孔子的思想，有其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也有其落后的消极的一面。孔子虽然代表封建制度，但是较之奴隶制度，他还是有很大进步性的。任何制度都有其进步的时期，也都有其落后的时期。这也应了马克思的论断：“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第十一章 书起千年之落

第一节 孕育书法大家的时代

毛泽东在书法上的苦心研习，铸成的独特风格，对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展示了这位人民领袖、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热爱，在书法艺术上那种精湛的技艺、深厚的功力，以及他那雄奇豪放、气势磅礴、飞动多变、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也正如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辉映千古的历史功绩一样，成为名垂后世的传世之珍。

学书是要讲师承的，同时更要讲创新、讲发展，即是讲求新、求变、求进的。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真、草、隶、篆、行各体皆备，流派纷呈，风格各异。如果回顾三千年的中国书法史，从文字的产生到形体结构的完成（即从古文字发展到隶书阶段），虽然还谈不上书法艺术之求变，但文字发展的每一阶段、每一进步，可以说无不是在求变中得来的。这种“求变”，人们还是停留在文字的使用上，而非人为地从艺术上去追求变化。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那时的中国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瓜分，新与旧、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正在东方大地上剧烈地搏斗着。此间，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处于一种求新求变的过程中，而艺术领域包括书法艺术在内求变创新的要求也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求变创新的条件在客观上为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其主要根源为：

第一，书法艺术在清代晚期由“帖学”的极盛时期转入衰落，结束了书法的守成时期。也即是书法艺术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期，不变就不能发展，不变就没有生路。

第二，清朝，金石考据学大兴，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心致力于研究文字的学者，他们为书法艺术的求变提供了理论基础，进行了鸣锣开道，铺设了一条通向求新求变的畅通道路。

第三，在清代大量的地下碑铭出土，特别是魏碑、隋碑的大量出土，不仅为书法艺术以楷书为突破口的求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为书法的理论研究也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包世臣、康有为为代表的书法新派，他们提倡“碑学”，承变“帖学”，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包世臣著有《艺舟双楫》，康有为著有《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在求变的思想影响下，清代出现了如何绍基、赵之谦、吴大澂、翁同和、吴让之、杨沂孙、莫友芝、曾熙、李瑞清、吴昌硕等，还包括扬州八大家等一大批书法家，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求变求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提倡“碑学”承变“帖学”的求变浪潮必然会影响到毛泽东，影响到毛泽东书法的师承和书法艺术的发展。

事实也正是这样，毛泽东书法艺术正是在这种求变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毛泽东所进行的整个书法艺术实践活动，都是处在这一伟大的变革时期。他的书法艺术就是这个大变革时期的优秀产物和优秀代表，他用自己的实践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毛体”书法，成为世人又一称颂和仿效的楷模。

第二节 渊博的学识与书法艺术

清代学者杨守敬在《学书述言》中说：“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于行间。”讲的是知识渊博的道理。但这一精辟的论断对书法艺术的创作同样适用。历代书法大家无不是学问家，无不用丰富的知识来扩大自己的艺术欣赏面，增加自己的字外功。知识多见于综合，从来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往往是相互交错、相互参差、相互联系而存在。

毛泽东才华过人，知识渊博，50余年的革命实践中，他始终坚持读书，广收博览。在知识渊博、知识富有方面，毛泽东不仅同历代书家是相同的，而且，他知识之富，读书之广，著作之多，也是历代书家难以相匹的。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艺术修养。

毛泽东在艺术上有很深的修养，也恰是这种修养直接促成了他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的艺术成就，这表现在多个方面。

1、美学、哲学

毛泽东对美学的研究是很精深的。他不仅研究了我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以至近代的哲学家，而且也研究了外国的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对他们的美学、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正像斯诺所说，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学者，是一个无所不读的读书家，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员”，“他并不只读马克思派哲学家的书，而且读些古希腊的东西，至于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的著作，当然也是读的，并且遍读其他哲学家著作。”

2、书法理论

对于书法艺术之美，毛泽东贡献了他充满哲学性的见解：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

毛泽东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

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

毛泽东说：“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毛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无疑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不仅对碑帖有研究，而且很有鉴赏力。1965年，书法界对王羲之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不仅极为关注，还积极参与，并于当年7月写信给郭沫若，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他断言“草书不会书碑”，这种结论显然是来自对碑刻的充分研究和鉴赏得出的。

3、研究鉴赏

各种碑帖毛泽东都作过精深的研究。孙过庭的《书谱》，他悉心研读多年。唐人编辑的《草诀要领》《草诀学韵歌》，以及近代人于右任编的《标准草书千字文》，他终生带在身边翻阅。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文物遗产，解放初有一位叫姚虞琴的老先生，托陈叔通转赠毛泽东一件王船山的手书真迹，毛泽东非常喜欢，但随后他便致书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此种手迹甚为稀有”，并将手迹送国家文物单位收藏。1958年，我国著名的文物收藏和鉴赏家张伯驹先生将李白

手卷《上阳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国宝甚为重视，观赏之后即着人移送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4、诗词文学

毛泽东一生几乎读遍了中国古典文学，仅诗词歌赋他就读了《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骈体文，唐、宋、元、明、清的诗别裁集，《词综》《曲选》等都常读不厌。毛泽东本人就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雄壮处惊天地，哀婉处泣鬼神，艳丽处如画卷，哲理处贯古今。这些艺术上的深厚修养，无不表现在他奔腾飞动，意境超然的笔墨艺术之中。

5、音乐戏剧

毛泽东的书法飞动感强，极富变化，音乐感节奏感极强。这同他对音乐戏剧的研究不能说没有关系。毛泽东对音乐戏剧都有很大的兴趣，他会跳舞，也会唱歌，还会吹笛子。他对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百听不厌。他会哼戏，曾经从曲牌、板式、表演、唱腔等各方面为京剧《沙家浜》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看李和曾演戏，此前，他曾问周恩来：“有什么名角？”

“听说主角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高派弟子，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

毛泽东说：“哦，那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高派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演员唱戏是非常不容易了。”

第一出戏是《坐楼杀惜》，高庆奎的得意弟子李和曾演宋江。看戏不一会儿，毛泽东便夸赞起李和曾来：“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演唱的京剧了呢！”

毛泽东不但对剧情、唱词、唱腔很注意，对服装道具也看得很仔细。一次，他看完谭富英演的《失空斩》，问起他在扮演诸葛亮时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谭富英向毛泽东介绍，他的祖父谭鑫培进宫演戏，扮演诸葛亮，由于天气炎热，额头沁出了汗珠。慈禧把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了他，说炎热季节闻到檀香木香气，能消暑辟邪。从此谭鑫

培每饰演诸葛亮必戴朝珠。别的艺人也纷纷仿效，朝珠便成了扮演诸葛亮的必有饰物。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说：“朝珠是清代的叫法，明朝称佛珠。明朝皇帝信佛，拜佛时多把佛珠垂挂胸前。到了清朝，皇帝常把佛珠赏给有功之臣。因为是皇帝所赐，获赏的大臣都把佛珠佩在胸前，所以又称为朝珠。”毛泽东讲完后，又以商讨的口吻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大丞相，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他怎么能戴佛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表示对慈禧的感念，并不是剧中人物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谭富英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演诸葛亮他便不再佩戴佛珠了。

这样的事，梅兰芳也赶上一回。

195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看得很仔细，说：“梅先生很会扮演，你看通身是白，惟上额头一个红缨，银装素裹一点红，美极了！”梅闻讯很感动，对家人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毛泽东是非常懂京剧艺术的，他曾说：“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

毛泽东的艺术修养除以上所谈，还包括他对历史的精通，对传统文化典籍和知识的掌握，使他的艺术修养更加深厚、广博。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学术领域内的深厚功力，是他一生呕心沥血、勤奋刻苦的结晶，这些对他的书法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始终贯穿于他的书法艺术创作实践之中。此外，在半个世纪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也必然影响和指导着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两者的形成有着一种相成相似的特点。比如，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独创性”，即“把普遍

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周恩来语）。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科学地坚持和运用了这个重要原理，而同时，这一“独创性”特点，也表现在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里。

毛泽东在延安时，经常同他的秘书师哲谈论书法艺术。他问师哲学哪一家字帖，师哲回答：“我在学生时代学的是欧体（欧阳询）。”毛泽东说：“欧体字间架结构太规矩了。”他认为字要写得活泼，要像生龙活虎一样，他不喜欢按部就班去写，更不喜欢把字写得死板。他说：“我不喜欢赵体（赵孟頫），也不喜欢颜体（颜真卿）的胖劲。”师哲问毛主席喜欢哪一家，喜欢什么体？毛泽东回答说：“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

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书法艺术的研究，首先是能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又能不断创造，写出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到延安以后，他对书法已有了相当的研究，也有了深厚的功力，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毛泽东在学习书法上不迷信任何人，他敢于创新，他的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独创性，不断追求，不断出新，在攀登书法艺术高峰的道路上永不停息。

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实践性。

少年时代，毛泽东从正楷入手，字写得端端正正，相当规整，极见功力，为他以后的行书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喜欢读书，但“不动笔墨不看书”，他重视书法艺术实践，笔墨不离手。毛泽东并不专力于书法，而是将写字作为工作的手段，革命斗争的艺术，使他把书法作为一种高尚的情趣，将书法同革命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造诣精深，同他重视书法艺术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他留下的大量珍贵题词、题字和文稿、公文、手札，也正是毛泽东重视书法艺术实践的最好证明。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是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吸收了许多人智慧的结果。毛泽东书法艺术也是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讲：“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可见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有百家之容，而无一家之貌。毛泽东不仅从书法艺术的体系以外去求新求变，同时也在书法艺术的

体系内部进行异性同化，所以才使他的书法面貌一新、一片神行、独树一帜、妙趣无穷。

毛泽东书法艺术就像毛泽东思想一样，其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是它的实践性和独创性，表现在书法艺术上的独创性，就是求新求变。求新求变不能离开实践和博采众长，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毛泽东书法艺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形成的，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章法结构中表现尤为突出。这是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哲学、艺术思想在其书法艺术实践中的具体化。

第三节 当代书法之新体——毛体

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时，他常临摹王羲之《十七帖》和学院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字字写得很有功力。

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现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中还保存着的一张毛泽东还其表兄文运昌的借书便条——“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是他16岁时写的，用笔严谨，而又有开拓，可知那时他已有相当功底。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作过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国文教师谭咏春阅卷时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全字，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这个年轻人确似有“仙骨”，文章固然可取，又用楷书写就，工整秀丽，故当时师生们誉他的文和字为同学中之“两绝”。另有一篇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求学时代写的著名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用的也是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笔笔遒劲。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写下的《伦理学原理》批语，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喜欢书法，爱用毛笔起草文件、撰写书稿、批发指示和题词、赋诗、写信时，便经常帮助他购买笔墨纸砚。当她和毛泽东结婚时，她的惟一嫁妆就是送给毛泽东的一个自己亲手缝制的多用挎包。这个挎包是多层口袋的，它不但可以装文件，还可以装“文房四宝”。毛泽东为此高兴地说：“好，我的家宝——‘文房四宝’这下就有东西可装了。”

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走到哪里，这个挎包就带到哪里。有次，他对警卫员陈昌奉说：“我无论走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笔墨摆好，以便随时可以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尽管战争环境十分恶劣，革命工作异常繁忙，毛泽东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练习书法。他说：“字要写得好，就须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锤。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还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帖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作为一个书法家，还应该懂得碑版、金石篆刻方面的知识，包括对它的鉴别、欣赏和创作。要达到这个水平，并不是很容易的。毛泽东对碑的研究功夫也很深。红军长征时，部队来到江西与广东的交界处——梅岭关。毛泽东见这“梅岭关”石碑的碑文书法很美，就和随身工作人员一块观看、欣赏。行军作战来到武夷关，那里有座庙，庙内有不少的书法碑刻，毛泽东知道后，抽暇去那里观赏研究。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的书法碑刻，堪称书法艺术宝库，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学习。”一次，红军转战到贵州遵义的娄山关，毛泽东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他便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还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走势，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这碑又修建于何代。”

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并且经常阅览法帖。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喜欢写毛笔字，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送给毛泽东。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主要是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郭化若曾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也是诗人和书法家。井冈山时期开始就同毛泽东在一起，又同毛泽东有着喜欢诗书的共同爱好，所以他对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甚为了解。在谈到“毛”字的奇趣变化时，郭化若说：“我们长期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写‘毛’字，前两笔写成‘二’，由于天天写‘毛’字，我们都晓得他的字，他在电报上签名，像阿拉伯的‘6’字。1945年到重庆，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来往，人家不认识，后来又写成了行书便认的‘毛’字，一般人就都认识了。”

“毛泽东从不苟且，工作很忙，晚上很晚，还要写字，有时很疲劳了才告诉我他睡觉了。”

我们从现存的一张毛泽东寄给恩师黎锦熙的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严谨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异常繁忙，毛泽东仍时常阅览法帖。而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也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他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20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泽东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

毛泽东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宝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泽东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泽东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就浇灌滋润出毛泽东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麦华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毕生从事书法理论研究和教育，他从毛泽东一张写字照片谈起，论述了毛泽东的执笔、用笔。他说：毛主席的诗词，我很喜欢读；毛主席的书法，我同样的欣赏。我住在广州，恨不能多见些主席的墨宝。因此，看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主席题字都搜集研究。

“我认为，毛主席执笔写字的姿势，是全国青年执毛笔的模范，是王羲之以来一千六百多年优良传统的习承。毛主席写字时，是身正、纸正、笔正的。他左手按纸，右手执笔，这可称为翼如之势，正确而自然。毛主席执笔，圆畅有力：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紧密靠拢累层而下如螺之旋，指背显得又圆又密，而虎口成凤眼形。从这外方情况，可以推出内方是掌心空虚的。毛主席精神饱满而态度轻松，身体的力量，很自然地通过臂、肘、腕、指而传到笔端画入纸内，如锥画沙，力透纸背，这就是南唐李煜所述的‘拨镫执笔法’擗、压、钩、揭、抵、拒、导、送八个字的体现。”

“就我从报纸杂志上搜集到的题字看，我最感兴趣的是主席给日本朋友写鲁迅诗的横幅。唐代大书家张旭告诉颜真卿说，写字要‘执笔圆畅、变通适怀’。钻研毛主席这张横幅，对领会这八个字有很大的启示。由于毛主席书法有湛深的修养，能够把手眼脑的活动结合起来。一点一画，每字每行，都充满了思想感情，好处是说不出的。举些字来讲，‘访华’二字，何等雍容？点画之间，顾盼有情，笔虽短而意远，势若断而还连。这是运笔达到精熟，规矩谙于胸襟，才能够达到这高度的艺术造诣。又如‘朋友们’三字，更是笔歌墨舞、翰逸神超。

从前我曾见过苏东坡的《寒食诗帖》和米南宫的《珊瑚帖》，行草飞舞，用笔恣肆，但尚嫌其过于偏侧取姿；今观毛主席这幅书法作品，兼有苏、米的长处，而雍容大方。在布局来讲：大大细细的字结合在一起，互相顾盼，感情息息相关，整幅调和，笔意奔腾，真是神融笔畅，挥洒如意。”

就书法艺术而言，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功力，至少需要几十年的积累和练就。而没有毕生的勤奋的书写，广泛的观摩；没有对书法理论和书法史的深入的钻研；没有对其他艺术的触类旁通的思考——不打下这样的功夫，成为书法艺术家，尤其是成为毛泽东那样的伟大的书法艺术大家，无疑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功夫”有三层含义。一层是掌握汉字的书写规律，掌握它的章法、笔法、技巧等，即掌握书法基本功，再一层含义是要提高自己的整个审美水平，不是只写那么几个字。好比唱歌、唱戏，光有声带是不够的，还要有中气，有意境，唱出来才有韵味。此外还有更带根本性的一层含义——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三者兼具。

他的书法基本功自不待言，重要的是，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性格，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的中气，娴熟的书法基本功，三者都是毕生之功。三者兼具，融为一体，这才造就了伟大的书法艺术家。

作为书法家，毛泽东对书法艺术的特殊的兴趣和爱好，是建立在饱览碑帖和收集字帖的书法兴致基础之上的。

在延安时，发生过一则朱光与毛泽东争抢书帖的故事：

美国女作家威尔斯曾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朱光原名朱光琛，能诗能画能演剧，很早就被誉为苏区红军中的才子。他反对张国焘，险些成为枪下鬼，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他与毛泽东、朱德等诸多领袖人物有着君子之交。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册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如获至宝。他到了延安，经朱光的引荐，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虽然与他萍水相逢，但却似故人邂逅，又是表示欢迎，又是盛情款待。

青年作家为毛泽东的欢迎所感动，便将挎包内的名著、字帖一股脑儿掏了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连连称好，谁料一旁的朱光眼疾手快，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四册名著夺了过来。“岂有此理！”毛泽东发怒了。

“见面分一半！”朱光强词夺理，振振有词地说，“字帖先不说，剧本应该归我。”

“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喜欢读他的书，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徒，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

两人互不相让，青年作家急得手足无措，赶忙调停，结果平分。朱光拿了《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这样分配合理吧？”朱光问。

毛泽东看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多岁的朋友，无奈地点点头。

12年之后，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时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路过北京时，他应邀来到毛泽东住所，二人侃侃而谈。毛泽东挥毫为朱光手书《长征》诗“附赠征人”。并题辞：“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的工作做好，这是我希望。”朱光亦回赠一首，并在落款署上：“朱光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泽东行罢，提笔将落款处的“书法家之府”中的“家”改为“癖”，“府”改为“家”。如此一改，不仅趣味十足、妙趣横生，毛泽东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也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示为他搜集或借阅历代书法碑帖。

1958年10月16日，他给秘书田家英写信：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这封短信既表明毛泽东已藏有各种草书字帖，但仍感不够；又表明他公私分明、毫无特殊之难能可贵的精神。结果，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来20件字帖，其中八件是明代书家的书法，包括解缙、张弼、董其昌、文徵明、傅山。

1961年10月，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要工作人员把怀素的所有字帖都放在他那里。于是，工作人员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都放在他的会客室里，摆满三四个书架，连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也放有书帖，以便他随时欣赏。

1964年12月，毛泽东还要看各家用各种字体书写的《千字文》，工作人员又很快为他搜集了三十余种。行书草篆，无所不有，而又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来历代书家王羲之、智永、张旭、怀素、欧阳询、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直到近人于右任的作品。据统计，毛泽东书房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的碑帖约有六百多种，他看过四百多种。他观赏揣摩，兴致盎然，而看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等作品，他更是反复临写、反复品味、反复琢磨，时而凝目视其神韵，时而掩卷摹其法度。

观赏和临摹，毛泽东有独特的讲究。他曾对保健医生徐涛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

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

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毛泽东欣赏的是王羲之书法的秀美和郑板桥书法的力度。他从王、郑两人的书法里各取其长，刚柔相济，刻意创新，练出了自家的风格。毛泽东在这次谈话里，还特别强调“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的道理，教导他人练习写字时“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显然也是毛泽东自己的经验之谈。

毛泽东对历代碑帖书法“不止目观、心摹、手追，尤其爱好耽读”。因为酷爱书法，亦极喜与书法家交往。而对于在书法方面有成就者，如郭沫若、章士钊、于右任、马一浮、沈君默、谢无量、舒同等，他十分尊敬。他与书法家交谈时，“品评今古，驰思翰墨”，极为投契。一次东游济南，他还对乾隆的字发表自己的看法说：“乾隆的字，到处都有，但是有筋无骨，我不怎样喜欢。”

毛泽东自己的书法既深得张旭、怀素狂草之神韵，又独具豪情奔放之个性。他留下的许多题词、信札和他手书自己的诗词、古代诗词都已成为人们珍藏的墨宝，足堪当代书法之新体——毛体。

第四节 力的风骨美

毛泽东的书法别开生面，独具一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因此，许多人都对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作过美学上的探讨。

秦罅生先生是我国著名书法家，秦派书法创始人。他曾撰文《章法茂密，意态纵横》盛谈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文中说：毛主席的书法艺术，是在传统基础上自出机杼，有继承、有创造，别具风格的。如《词六首》的序记和《送瘟神二首》的手稿，笔意虽以颜鲁公的《争座位帖》而浑穆敦厚，又另有韵味。主席的书法，不论横书、直书，

都是章法茂密，意态纵横。颜真卿行笔圆熟沉酣，而主席却于迟涩中有闲适之感，每于字画转折接笔之处，若断若续，笔笔藏锋，最使人寻味。主席为《中国青年》所作题签，俊爽中有传统的金石剥蚀之美。1961年8月2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艰苦朴素”四个字，非颜非苏，直是上追羲献，下逮杨凝式。“艰苦”二字，有“韭花帖”笔意，“朴”字似怀素书杜甫《秋兴八首》，于坚韧处有欲放故收之意，“素”字则秀润优美，很难于前人中取得比拟。而四个字从整体来看，又十分和谐统一。

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造，是个大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以自己的独特风格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写字讲究对象。自书草稿，闲适随意，有如信笔所之，而在字的大小疏密、揖让趋避之间，更有情致。《送瘟神》中最后一个“烧”字，放笔大书，真是兴足神完，诗情书意跃然纸上。对褒忠励节，如为刘胡兰烈士题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庄严端正。对儿童、青年，如所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则端凝厚重，并示楷法。毛泽东这种视对象不同而作字的精神，是值得书法家及研习者好好学习的。

著名的书画家卢子枢先生曾认为，中国的书法，约分为篆、隶、草、真、行五类，而以行草应用最便，作者最多。毛泽东的书法多属行草，但独创性很强，融会篆分，包罗隶楷，吸收历代各家所长，而有所发展，生动活泼，千变万化。如所见为柳亚子先生书写的《沁园春·雪》，笔势劲利，有欹有正，章法谨严，修短合度，自成风格，并非专学郑板桥。《清平乐·六盘山》横幅，又与前书有所不同。气魄愈大，刚中带柔，吸收唐僧怀素自叙笔意，参以明人陈洪绶行书结佩字中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四五字一行，有二三字一行，参差错落，变化多端，而归于自然。此种魄力，实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作为诗人兼书画家的朱庸斋先生则说，前人论书法，有所谓先师古而后变古的说法。也就是要求既掌握古代书法家的长处，又要使之为我所用，超出古人，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要建立自己的风格，就需要在笔墨之间表现出时代的精神，自己的情感。

毛泽东的书法，有人认为部分与宋代书法家米芾的相似，其转折间的锋棱，结体的变化，有共通之处。但米芾以苍劲浑朴见长，毛泽东的书法则蓬勃锋利。他们或许在聚结和开展之间，有所暗合。但米芾只求沉着，毛主席则代以生动。这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有善于师古和变古的高度艺术修养。

毛泽东的书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沁园春·雪》用笔的矫健，气体的伸张，锋芒的锐利，有一种不可遏抑的战斗气势。解放后，毛泽东手书《水调歌头·游泳》则笔力重厚，结构紧凑，精神饱满，笔底流露出内心的喜悦。这种因时代不同而在书法上引起某些相应的变化，我们在研究古代大书法家的作品时，也可以发现到。

毛泽东的书法，在字体行间，每有大小伸蓄，参差错落，占让配搭，极富变化。这是因为书法艺术要讲究气韵，尤其是行草，必须生动。而过于整齐，就会平板呆滞。布局上的疏或密、聚或散，是依照书写的内容，临纸作书时的心神转注而定的。所谓“挥洒如意”就是指此。欣赏毛泽东的书法，不能离开书写内容而孤立地去谈书法形象。尤其是毛泽东的诗词手稿，字体的伸纵收蓄，行笔之轻重疾徐，往往与词句本身的抑扬顿挫的情韵，极其和谐统一。诗词内容与书法的巧妙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在艺术上可以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沁园春·雪》的手稿，是最明显的，其中凡属到了叶韵之处，莫不把句中的字体写成由小而大，笔势也由轻而重，使词意和段落，表现得更为分明。而从毛泽东的书法渊源来看，其艺术风格究竟是怎样的呢？羲、献——旭、素——毛，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脉络看，毛泽东的行草艺术的确是渊源于此的。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是自觉地提出并确定这一正确方针的第一人。他并且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部门都是这样实行着的，他在书法艺术遗产问题上也是这样遵行的。

书法界一致公认，毛泽东有分析地继承了羲、献和旭、素的优良传统，那么，他从这些古人那里继承了哪些东西呢？现在已趋于共识的看法为：他从羲、献那里继承了舒，从旭、素那里继承了纵。

何谓舒？舒就是“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乱云飞渡仍从容”。

何谓纵？纵就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就是“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环球同此凉热”。

书之舒者，恣之舒也。书之纵者，思之纵也。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去观察宇宙，观察人间，观察文学艺术，观察书法艺术，是不可能这样舒，这样纵的。毛泽东的舒不是羲、献的舒的原样，他的纵也不是旭、素的纵的原样。他只是从古人那里吸取了某种神韵再融合到自己的风骨中。这风骨便是力之美。

毛泽东的力之美，当然包括创作进行中的肘之力，腕之力，还包括技法和技巧，否定这一面就否定了书法创作的特殊性。然而更重要的力是他的胸臆中的人民之力。他不是单纯的书法家，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战略家，他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通过书法艺术的力之美体现了民族之力，阶级之力。立足于力之美驾驭着舒之美、纵之美，构成了毛泽东风格。这种风格依其精神实质而言完全符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要求。

毛泽东的风格是统一的，又是多样化的。如：“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可谓浓墨饱蘸，方笔疾书，笔笔字字，千钧万钧，力之美的风骨充盈其间。这件题词是很多学习毛泽东书法艺术，特别是那些欣赏力之美、风之骨的研习者们总要首先研习的第一件作品。很多研习者在欣赏这一书法时，往往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就像一位研习者所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在毛主席面前站立过，可我一见到这件题词的时候，我就站在自己的领袖和导师的面前了。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满江红》一词中即以这两句的写法为例就可以清楚看出力与纵的交融。书法艺术中的磅礴气势反映了当时客观世界的真实形势。

与《满江红》基本相同的有《西江月·井冈山》。请看其中“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两句，依然是力与纵的交融，又融进了舒的神态，体现了“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

《忆秦娥·娄山关》写法中的纵最容易被首先认识，又因为是以羊毫书写，提笔为主，且多飞白，以至于被认为最似怀素。其实，只以《娄山关》中的三行同怀素的《自叙》帖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恰恰是风骨的有无。《清平乐·六盘山》的写法与《娄山关》也是同属于相近的风格。

以上各例都有数字连书。这种写法最突出的是1965年6月致章士钊书中的“晒纳为盼”四字。一气呵成，连绵萦绕，而又字字独立清楚，这种情况是张旭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寄信人一气呵成的气，所给予收信人的精神感染力岂止“桃杏各五斤”而已哉！再看《沁园春·长沙》一词的很不相同的两种写法。一种用中锋，与《娄山关》《六盘山》相近。再一种以偏锋为主，不作连字书写，舒若王羲之，但力之美为书圣所不能相比。这篇的写法似属仅见。

还有两件题词的写法也很不相同。为《人民文学》杂志所题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力中透秀，而“联系群众”四字力中蕴厚，都充满了谆谆之情。

第五节 空前绝后的题词泰斗

毛泽东的题词，是毛泽东书法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题词书法多半是在建国以后书写的，这个时期从政治上说，建立了新中国，对于书家毛泽东从此结束了马背书法家的境况，有了较好的环境和条件，也有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系统研究书法了，是毛泽东书法历程中最辉煌最具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在日理万机的同时潜心研究历代书法碑帖，以领袖的风范纵情挥洒，精品叠出，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达到了至尊之上的无上境界。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延安人民的致贺函电。在10月26日那天，他复电延安人民，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此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就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见，那时的毛泽东对此是很清醒的。

1951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随后开始的中央人民政府赴老根据地访问团中，这一题词被广泛使用于各地。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毛泽东的著名题词墨迹。1943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拍摄电影纪录片《生产、战斗结合起来》（后改名为《南泥湾》）。在电影即将拍完时，当时任摄影队长的吴印咸到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枣园请求毛泽东主席为电影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因窑洞内太暗，毛泽东就到窑洞外写。他在两张白色的凸版纸上分别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每幅题词长210毫米、宽160毫米。在题写过程中，毛泽东边写，吴印咸边拍摄，最后拍成了电影。1959年，吴印咸将收藏了16年的两幅毛泽东的题词，捐给了军事博物馆。现陈列在抗日战争馆里。

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家喻户晓，但是，知道毛泽东题词由来的人并不多。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0年经毛泽东提议校址迁到延安东门外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将毕业的军医十四期也就成为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在将要毕业的前夕，同学们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当时的十四期的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王斌作了汇报。王斌很快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请他在百忙中给十四期毕业同学题词，毛泽东立即答应了王斌的请求。不久，毛泽东就指派工作人员送来了题词。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用毛笔写在一张白纸上。得知毛主席为十四期题词的消息后，全体同学无不欢欣鼓舞。1941年7月15日十四期的61名毕业同学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毕业证书，因为毕业证书上用鲜红的字体印上了毛主席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江山如此多娇”是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巨幅国画的题款。

由毛泽东亲笔题款的国画很少见。毛泽东虽然也比较喜欢欣赏一些古董字画，每每看完这些字画，就有人提议毛泽东在字画上提拔，可都遭到拒绝。毛泽东主席告诉身边的人，对这些国宝级的古董字画，要保留其本来的面目，不能象古代的帝王那样暴殄天物。由此原因，一些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也很难被毛泽东亲笔题款。

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系关山月、傅抱石绘画，毛泽东题字，集体创作的成果。现在悬挂在人民大会堂。2008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两人就在这幅画下握手。其历史和象征意义巨大。

1959年初，著名山水画家关山月和傅抱石先生接受了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的任務。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创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画基本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尽管很忙，还是两次抽空来看画。创作即将完成时，关老他们专们请总理来提意见。总理看到将完成的巨幅国画，高兴地和两位画家握手道谢，然后笑着说，“画面上这个太阳小了点儿，是不是可以再画大些？”关老他们画的红太阳原来只有排球那么大，确实是小了一点，听了周总理的意见后，他们立刻改进，把巨画上端的红太阳画得比篮球还要大些。后来周总理看后，高兴地说：“好嘛，这才表现出伟大的气魄嘛！”

巨幅山水国画创作完成了，只是未题款。周总理说，要请毛主席亲自题字。两位画家异常激动。完成创作的第三天，周总理陪伴毛泽东来到在故宫的创作厅。毛泽东刚走到门口，两位画家急忙迎出去，与毛泽东握手。周总理分别向毛泽东介绍他们，毛泽东说：“早就听说两位画家的大名了。”傅抱石向毛泽东介绍国画的创作意图，毛泽

东听后微笑地点头，说：“独具匠心啊！”关山月又指着红太阳，补充说明其象征意义，并且郑重表明这个红太阳是遵照总理的建议画这么大的。毛泽东听后，看了一眼周总理，说了一声“好！”关山月又接着说：“今天将请毛泽东您老人家来挥毫落款。”毛泽东高兴地笑着又说：“好好！”周总理在旁插话说：“主席呀，这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毛泽东站起身，傅老忙把蘸饱浓墨的笔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稍一沉思，便挥毫题上“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具有十七贴体又是毛泽东自己风格的行草大字。

“毛体”书法艺术最常见、国人最熟悉、受众最多的是各种报刊题字、大学校名题名及毛泽东诗词书法，如《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等，所题大学校名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等。另“向雷锋同志学习”、“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经典题词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其中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的报刊刊头题字是一种传统艺术与现代传媒载体天人合一的有效结合，其恰到好处的互动，巧夺天工的配置，天衣无缝的交融可谓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有句话叫“一切好诗都在唐朝做完了”，借言之，一切报刊刊头的好题字都被毛泽东写完了，此话，似并不为过。

“人民日报”四字雄放大气、挥洒自如、潇洒险峻、大小有致、高低错落、跌宕起伏、笔势飞动。随意挥洒却又韵律极佳，字字精美，自由抒情，充满音乐的旋律。无论是字的结构、章法、用笔，尽显领袖风采，真乃至尊至极，精品中的精品，无一字又不精雕细刻的千古绝笔。让人看了赏心悦目，凝聚着、振奋着亿万中华民族的心。

古人云“字无定形”，“会通于意态之际”。字随布局需要，时而高耸挺拔，时而大小相间跳荡险绝，疏密有致；显著个性特征的章法，画面的布局谋篇；毛泽东运用得到了极致。现代草书大家沈鹏先生评价毛泽东书法语：“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总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地之得失，都是足以垂注后世的珍品。”

《光明日报》的报头源于 1949 年 6 月，毛泽东为其创刊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1966 年报社将毛泽东题词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并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认为无甚不妥，于是，1967 年元旦，《光明日报》正式启用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这四个字言简意赅、灵秀奇巧。此外，像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湖南日报、山西日报、河南日报、河北日报、内蒙古日报……个个雄健俊美、遒劲有力、潇洒流畅、巧夺天工，让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

绝不夸张的说，毛泽东的题词几乎每一幅字都如诗、如画、如诉、如歌，毛泽东的字之所以如此，归结到一点，“字若其人”。这句至理名言在毛泽东其人、其字体现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说得何其深刻！人如此，字以如此，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字。静观毛泽东的字与他那伟岸的风姿、风采，伟人的风范、气质一样，两者何其相似？均大气磅礴，让人敬畏三分；不怒自威，极具震撼力。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崛起的世界伟人，他具有过人的大智慧，远见卓识的大视野，所向披靡的大英雄气概，善于驾驭历史进程的雄才大略。尽显在他那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之中。所以我们欣赏毛泽东的字时，首先要联系到他本人，结合起来，才能深刻体会到毛体书法那气势宏恢、神韵盎然、跌宕起伏、如行云流水的外在形态以及极其丰富的内涵。

毛泽东虽然没上过大学，但他对于中国大学的影响力，似乎没有哪个人可以相比。据统计，全国有几百所高校的校名都出自毛的手笔，当然，这其中多数为集字。由此也说明人们对毛泽东以及毛体的热爱。

“北京大学”题词于 1950 年。当年北大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处。信中邀请毛主席在北大 51 周年校庆纪念日（十二月十七日，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之际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以备制作新的校徽之用。信中附寄了一张纸，纸上有校文书

刘椿年画的一个长 11 厘米、宽 3.1 厘米的长方形框，框下标注“北京大学”四个字，供毛主席写校名时作尺寸参考。

1950 年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毛主席为北大校徽的题字放在一信封内送给北大，并附言：“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北京大学”四个字饱满生动、一气呵成，仿佛能表达一个伟人气吞山河的气势。

“清华大学”的校名亦为毛所题。校名题写得气定神闲、清秀飘逸，也是毛字中的精品。1950 年 6 月，毛泽东应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欣然挥毫，一连写了 6 个力透纸背的“清华大学”。作为一代书法大家的他，还在旁边谦虚地注明：“右下草书似较好些”。从此，由毛泽东题写的校徽就一直伴随着清华师生。

“北京师范大学”几个字是毛泽东所题校名中最有个性，最富于情趣的一个。人说字如其人，毛泽东写的这几个字气韵生动、霸气毕现，很能反映一代伟人的气势和抱负。这种毛体与毛泽东盛年时候的书风很是吻合。

1950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应李达校长之请，为湖南大学题写校牌并复函李达。原件于 1977 年 12 月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室，此为复制件。

湘潭大学是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和心愿创办的，创办时间为 1958 年 6 月。同年 8 月，毛禹居（毛泽东读私塾时的老师）赴北京向毛泽东报喜。毛泽东在住所亲切接见了毛禹居，并满面春风地称毛禹居为禹居兄。毛禹居把湘潭大学办学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湘潭大学的校址、学生、教师、经费等有关情况。毛禹居请毛泽东为湘潭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同意，并再三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

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给毛禹居送来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和题字。信的内容是：“禹居兄：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缄，亦烦请转致。毛泽东，九月十日。”9 月中旬，当毛禹居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回到湘潭时，湘潭大学全体师生敲锣打鼓地迎接毛泽东题写的校名，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为

了纪念毛泽东题写校名的日子，决定将9月10日定为湘潭大学的校庆日。无巧不成书，1985年，国家将每年9月10日确定为教师节。

1951年秋，贵州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教授陈述元先生，作为民主人士进中央革命大学学习。陈先生在学习中结识了一位和毛泽东私交甚笃的湖南同学。陈述元向这位同学提出请毛泽东为贵州大学题字的想法。这位同学向毛泽东转告了陈述元的请求。毛主席欣然接受，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用笺写了“贵州大学”四个字。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系调整，贵州大学校名取消，部分系并入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昆明工学院等。陈述元在调往昆明工学院前夕，在毛主席题字原件上附写了注释，内容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主席为贵大题字，望同志珍藏，原乞书者留言。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并将原件保存于贵州农学院。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周林向毛主席汇报了贵州情况，对院系调整撤销贵州大学的意见一并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当即指示，每个省都应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已调整的可以恢复。根据成都会议精神，9月，贵州大学复校，并从贵州农学院取回了毛泽东题字的原件，挂出校牌。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贵大题字送交中央，保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影印件保存在贵州大学。它是毛主席为贵州高校的唯一亲笔题字。

此外，毛泽东题名的大学还主要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安徽大学、广西大学、华南农学院等。

第六节 行草书圣毛泽东

毛泽东书法艺术影响之广、价值之高、威力之大前无古人，后难来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如日本、东南亚等，都对毛泽东的书法赞誉有加。

1968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发行的《日中文化交流》月报8月1日号曾登载过日本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日本书法文化联合会理事长

西川宁写的文章，题为《毛主席的书法》。西川宁是日本书坛上的巨匠，为中日友好、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在文章中说，毛主席的手书复制品和照片他看到很多，“每当我看到这些复制品和照片，总是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感到很激动，或者得到启发。”

“我试着谈谈我所看到的这些书法的特色。首先是运笔神速，令人感到他手里的笔迎面跃动。字的一点一画就在这样的韵调带动下表现出来。笔就偕着这个韵调力量均衡地跳跃着。借着这种力量，字形取得了平衡。从这里产生出高扬的豁达的气质和每个字布局的优美姿态。没有停滞，也没有隔阂，心情的起伏在这里以字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这种书法的流畅豁达的格调是谁都能立即看出来的，但是每个字的布局也很美，这一点也许容易忽略过去。举例来说，《清平乐·蒋桂战争》的书法，以中间的‘红旗跃过汀江’为例，在前句的句点之后，气氛稍有休息。下句的‘红’字很安然地开始，接着第二个‘旗’字又复轻快地飞舞起来。乘着‘方’字（指‘旗’字的左偏‘方’）的四笔有力地展开，右偏旁一耸而上，立即又唰唰地撒开笔锋，轻轻地倾泻下来。这几笔的布局是最鲜明的，勾画出了这个字的舒展的气质。‘跃’字的一点一画的展开也是出色的。尤其是‘佳’的笔锋，不期而现的妙笔使我很受启发……‘龙岩’两个大字简直是一面停笔吟味，同时又很有趣地落在下行‘上杭……’这几个字上，笔锋犀利，不留间隙，这是这一篇中最鲜明的地方，很巧妙地隔开了空间，构成美丽的布局，气势高昂。而且，‘分田分地真忙’放开笔，悠然自得地写了下去，用来修饰一篇的末尾是很适宜的。一点一画的布局处理得很妙，这是不能忽略的。

“再举《菩萨蛮·黄鹤楼》为例，豁达的气质和美丽的姿态是同样的，但原本快速的笔调却适当地平缓下来，显出简洁而古色古香的色彩。这便同前面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形成最好的对照。

“我曾经看见过毛主席壮年时代写的字。那是写信的细体字，虽然不能说是小楷，却也是非常有力的。毛主席的诗词太有名了，但不能认为因此就不关心书法。

“很多日本书法界的有识人士都有这样一种认为，将来中国的新书法可能从毛主席开创。”

.....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客观、公正地认识、评价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呢？近些年以来，随着毛泽东热，研究毛泽东书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本名曰《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一书，曾这样认为：毛泽东的草书不仅已大大超越唐朝的张旭和怀素，而且在当代的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是目前“中国书法的巅峰”。该书还说：“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久为人仰。他的书法流布中外，高可居摩天大楼，低可进茅屋陋舍.....他的书法，流传在人们的手上，流传在人们的口头，更流传在人们的心间。我们不仅可以说，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知名度，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比拟的，而且我们还要说，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高度，也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比肩的。”

“他确实确实是一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是中国现代书法艺术的主将和旗手。”所以，该书的结论是：“故曰：毛泽东是天下第一人，毛泽东的书法是天下第一书。信然哉！”

书法专家王鹤滨写过一本长达 20 万字的书法专著《行草书圣毛泽东》。在这本书的前言和概述中，他写道：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书法艺术大师，其最高的书法艺术成就，是他的“行草”，“即其取狂草气势的行草以及取小草气势的行草，艺术造诣之高，可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颗最大、最亮、最光辉灿烂的明珠”。又说：他在行草方面的书法艺术成就，右抑王羲之的行楷，左逾张旭的狂草，如将毛泽东的行草、王羲之的行楷、张旭的狂草，并列为中国书法艺术上的三绝，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历史事实，之所以未被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重视，这是由于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哲学上的成就太大了，威望太高了，以致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罢了。

也许正因此，王鹤滨奉献给毛泽东一顶“行草书圣”的桂冠，并说“这顶桂冠早就该给毛泽东戴上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在行楷方面形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第三座“高峰”。这三座“高峰”并列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三绝”，即“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行草书圣”毛泽东。

其实，把毛泽东书法视为书法艺术的第三个高峰不无道理。

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最重要成就是进入 50 岁以后的行书和草书，这是他在青年时代奠定的雄厚的楷书基础的发展。楷——行——草，这是合乎规律的发展。

行、草的基础是楷书，不掌握楷书八种笔法的要领，不把楷书写到家，不打下深厚并且牢固的基础，不可能使行、草成为艺术。以草书著称的张旭，楷书亦极佳，他的学生、以楷书著称的颜真卿极予推赞。毛泽东的行、草超绝前人，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在楷书上所下的苦功得出的硕果。想使行、草成为艺术而不想苦练楷书基本功，是违反规律的，不会有成就的；一味求怪，更是歧途。然而楷书有它的局限性。字字笔笔完全按照楷书的要求来书写，无法快捷，不合实用。

楷书的这些局限性在行书中就被打破。最早最高的成就便是王羲之的作品。怀仁集王羲之的字而刻碑的《圣教序》虽然不是他的手迹，碑刻也有蚀损，今传拓本并不是分毫不差的碑刻原样，即令如此，也可以看出这位书圣在创作中字字都是依形而尽态，从容自若，了无拘谨呆滞之神。他又在楷书笔法的基础上，创造了笔画省略、数笔连写、笔顺改变等行书特有的书写原则，还创造了不少的部首偏旁乃至整字的省捷而又优美的写法。行书从结体、体态到笔法都从楷体中独立出来后，王羲之、王献之又在行书的基础上发展为行草，可以数字连写，仅从王献之的“群鹅”帖（摹本）即可看出它更有利于艺术性的发挥。

4 世纪的王羲之、王献之之后 300 余年，七八世纪的张旭用狂草开拓了书法艺术的新局面。他的草书笔势横壮，跌宕欹斜，萦绕连绵，不可止遏。紧接着张旭的怀素以瘦健简洁之笔，传飞动跳荡之神。这两位草书大师继承了羲、献而突破了羲、献。张旭的草书又打破了从

东晋到唐初的楷书格局，从而启发、带动了颜真卿创造了崭新的楷书风格去代替了旧格局，接着有柳公权的楷书加强了这种新格局。由张旭草书带动的这场书法艺术革命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用我国杰出的史学家范文澜的话说，是一个“高原”。

楷书是根基。行书是楷书的解放。草书是楷书的更大的解放。也包含着对行书的解放。楷、行、草——立、步、舞，大体上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不能立固然谈不上步，更谈不上舞，但只有立而不步、不舞，也很难成为艺术。相对于行、草而言，楷书是静止的，行、草则可以充分地体现这种艺术所特有的形式美，十分有利于体现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与敦煌绘画中的飞天存在着道理上的相通之处。

唐人以后到毛泽东以前，历代皆有名家高手，但没有一个是超过了唐人的。宋代苏东坡的书法艺术我们给予高评，但他并没有超过唐人。宋以后更不待言。清代 200 多年对书法艺术的发展甚至起了不好的作用。康熙帝自己喜欢董其昌的字就片面倡导董其昌，乾隆帝自己喜欢赵孟頫的字就片面倡导赵孟頫，这两种中下水平的字于是遍行天下。清代还出现了“台阁体”、“馆阁体”这样的俗物。嘉庆以后又片面强调北朝的碑刻。这些风气都是阻遏书法艺术，尤其是阻遏行、草艺术的发展的，并且直至民国而基本未动。唐以后一千余年书法艺术的确是低落了。

好在，后世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第三个伟大高峰。

伟哉，毛泽东！

壮哉，毛泽东！

书法千年之圣——毛泽东！

第十二章 国学伟人之修性

每一个国学伟人都是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品质的贤者。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除了有其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外，还具有一个学者、文化人的别具一格的端庄、严谨、率性、浪漫的一面。

不错，毛泽东是个很率性、很散淡、很性情，充满了文化个性与艺术气质的人。

这种个性化的品质正如大师本身一样，是一种另类的学术符号。伴随着他们的才智、成就，为后人所品味，同时也让他伟大的风姿更增添了人性化的魅力。透过这样一些人性化的元素，我们更感到这样一个大师的可爱。他不再那么端庄，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他像我们身边的人和一個可亲可敬的长者，一个充满睿智的思想的哲人一样，被我们崇敬的同时，也被我们所热爱。

了解了这一面的毛泽东，也许更便于我们透视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本质，让我们在看到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的同时看到他在人世间更朴质的，更贴近的一面。

第一节 典型的浪漫文人气质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具有鲜明的浪漫文化性格的毛泽东，受屈原的影响很大。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毛泽东读师范时曾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 47 页、94 面，前一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21 年农历端午节，毛泽东的好友易白沙只身赴京刺杀北洋政府首脑未果，旋即南下组织军队北伐亦未果，于是他选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杀，以唤起民众。毛泽东为其写的挽联中有“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之句。对联中的陈公系指陈天华，陈天华也是学习屈原，为救国唤起民众而在日本跳海自杀的。由此足见毛泽东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受屈原影响程度之深之大。

屈原对毛泽东艺术的影响，使其诗词浪漫奔放瑰丽诡秘。除屈原的思想和人格给毛泽东巨大影响外，《楚辞》本身的艺术魅力也给毛泽东的诗词以巨大影响。第一，毛泽东诗词对《楚辞》有明显继承和发展的痕迹。第二，《楚辞》中出现频率最高，且极具“楚音楚语”特色的字词，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频率也很高。第三，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与屈原词赋一脉相承，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四，屈原与毛泽东都以凤（即大鹏）自喻。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 年 7 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 年 12 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 50 余种。1958 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

1958年中央在广西召开会议，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书看得正津津有味，毛泽东让卫士长李银桥把蜡烛给他点着，继续看书。当时他看的就是《楚辞》。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那期间，他给江青写信，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作为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2000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

受屈原的影响，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毛泽东无疑具有天然的浪漫情怀。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很具有超前性。纵观他的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他一生厌烦的就是陈词滥调，墨守成规，而对新生事物不但乐于叫好而且乐于接受。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描绘者。

第二节 伟人的率性是一种伟大

正是由于年轻时代受屈原的影响，毛泽东身上自始至终印着这种浪漫情怀的烙印。这种烙印甚至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仍旧表露无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毛泽东名闻遐迩的名言！

这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不出来，曾作为社会主义抗衡帝国主义阵营旗手的斯大林也说不出来，只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才说的出来。

骨子里的诗人气魄

出兵朝鲜曾是毛泽东毕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然而做出这等重大战略决策的毛泽东又浪漫得那么腹有良谋，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藐视天下。

1950年9月下旬，朝鲜半岛的战火向北燃烧。唇亡齿寒的危急使新中国面临着是否出兵参战的重大选择。从10月1日起直至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跨过鸭绿江，毛泽东经历了被史学研究者称为艰难决策的“18个日日夜夜”。为了最后下定决心，毛泽东因焦虑很多天一直是日夜不眠，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开会的那些天，他的屋子里坐了一屋子人……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有的中央领导人后来回忆说，在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时，毛主席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会使大家意见统一了，才刮了胡子。如此反复思考，焦虑到了一个星期不刮胡子的状况，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这的确是个艰难的抉择。敌我双方国力的差别，力量的悬殊，让每一个决策者都难以决断。

在 1950 年国庆节后十几天内，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论，面对多数人列举的种种困难以及苏联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一再退缩，毛泽东经许多天不眠不休的思考，甚至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的情况下，经最后权衡，他还是确定：“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中国出兵朝鲜，在政治上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在经济上保障了国家恢复建设，在军事上也打出了国威军威。

然而就是在那些惊世决策的艰难日子里，毛泽东竟然在日夜苦心思索决心难下的时候，参加了为欢庆国庆一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盛大歌舞晚会。当天参加晚会时，毛泽东虽因不断开会并苦苦考虑出兵的决策而数天未眠，但依然谈笑风生。当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族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献旗、献礼致敬时，毛泽东竟对坐在前排的民主人士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毛泽东这么一说，柳亚子即席填成一首《浣溪沙》，并马上呈给毛泽东。接到柳词后，毛泽东当场步其韵奉和，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在冒着极大风险确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之际，毛泽东仍有诗情与柳亚子唱和，充分体现了他“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宏大气魄。普天之下，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巨人，能在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如此从容豁达，如此情怀浪漫。

从 1950 年 10 月 19 日志愿军正式入朝至 12 月间取得第二次战役大捷，这两个月内是毛泽东集中精力于朝鲜半岛的紧张时刻。在那段日子里，毛泽东常常就在床上看文件、起草文电，实在太累了便倒下休息一会儿。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在此期间他有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基本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办公和吃饭，睡眠极少。

伟人毛泽东在 1950 年秋日，在最终决策出兵同世界头号强敌美国较量时，就是如此体现他战略家非凡的胆略和诗人的浪漫品质的，这样的胆识、品质和气度，古今中外，独此一家，唯此唯大。

率性不失的睿语哲人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时，两人之间曾发生一则有关“三五”牌香烟与诗词《水调歌头》的有趣故事。

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蒙哥马利并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疼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当时他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谈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随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的上帝。”

蒙哥马利趁机向毛泽东打听：“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很清楚，是刘少奇。”毛泽东很干脆地回答。蒙哥马利又继续追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知道这是在套他的话，因此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人总是要死的，我随时准备着死亡。我会怎么死呢？”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这次谈话，从下午 2 时 30 分一直到下午 5 时，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乘船，看毛在长江游泳。毛泽东那天游了近一个小时，上船穿好衣服后，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两人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分别时，毛泽东把事先写好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上阙的手迹，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作为对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谢。蒙哥马利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盒“三五”牌香烟居然能换来一幅毛泽东珍贵的诗词墨迹……

情怀浪漫的战略大师

1969 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55 个步兵师、12 个战役火箭师、10 个坦克师、4 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 100 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6 月 13 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 9 月 13 日，开始边界谈判。7 月 26 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 月 27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这时，临近中国国庆 20 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

会是否举行？毛泽东镇静自若，笑着对周恩来说：“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苏联知道中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说到底，大政治家、大革命家、大军事家的毛泽东，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诗人，不折不扣的一介文人。

第三节 一个在路上的理想主义者

毛泽东有过一段“不修边幅”的时期，那就是1927年到1936年即他当“山大王”和到陕北之后的近10年时间里。他那时头发长时间不理，可谓“满头长发”，只从中间分一条缝，这真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此时的周恩来也一样，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一副“美髯公”的形象。毛泽东到陕北后的头几年，头发依然较长，爱德加·斯诺这样描绘他：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毛泽东的头发从解放战争开始基本定型，即向后梳，露出宽阔的前额。这种发式一直到晚年始终不变，只是愈往后，头发量愈少，额头愈宽。

毛泽东之长发飘飘……

伟人乎？

文人乎？

大师乎？

……

据说，战争年代，毛泽东喜欢让卫士给他慢慢地从前往后梳头。他坐在椅子上，微闭双目，以疏通血脉，提神醒脑。

真乃高人韵士也！

讲伟人形象，毛泽东独步天下。

讲领袖之风采，毛泽东别具一格。

讲政治家之大略，讲艺术家之气质，讲端正认真，讲随意和潇洒，讲风度和情调，有几人能敌毛泽东？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瘦骨伶仃一头长发，歪戴着帽子，乜着个眼睛，叼着个烟，却在指挥千军万马。

典型的一副放荡不羁的模样，然而就是这个人却是中国的未来，世界的领袖，谁信？

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军事家上战场连枝枪都不佩；有哪一个战略大师一袭长袍布衣打天下？

用今天的话来说，毛泽东——中国第一帅哥并不过分！

上帝造人，造化弄人，伟人，就是如此。

天下谁有这等风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亘古未有，空前绝后，

唯有毛泽东！

据说，红军长征在与张国焘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中央领导人个个都不是他想象中的派头，毛泽东面黄肌瘦，长发披肩，衣衫褴褛，哪像个红军最高统帅？朱德满脸皱纹，活脱脱一个田间老农……

想想青年毛泽东在安源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身着蓝色长袍、臂夹红雨伞，从崇山峻岭间走来……”这是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对历史瞬间的精彩描绘。

然而，就是那个看似英姿的年轻人，形仍透着几分单薄。1927年的这一天，身材颀长，喜穿长袍的毛泽东亲自率领江西铜鼓、修水、萍乡三路起义部队围扑长沙。此前，毛泽东已然是名闻遐迩的政治家，但从这天起，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又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也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里面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书生，若干年后却成为统领全国的领袖，成为人类世界的领袖，成为千古一遇的伟人？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平凡。

男人的气质，女人的面相，威严中有一种和善；领袖的风采，伟人的身躯，魅力中有一种伟岸。

毛泽东是千古一遇的伟人，但他最喜欢吃的不过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便饭——红烧肉，据说这玩意“补脑”。

毛泽东有举世为之倾倒的魅力，他一挥手，世界为之震撼。

毛泽东为了一个充满幸福美好、人人平等的世界揭竿造反，失去了夫人、孩子、亲人……包括他前途无量，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命运的儿子——毛岸英。他打下了一座江山，可作为中国以至世界的领袖人物，他穿的睡衣却补着好几处补丁。

毛泽东一言九鼎，眼里不揉沙子。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发生后，毛泽东对此事极为关注，决心予以严惩。并亲自过问和批准了对二人的处理决定。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

险和严重”。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立下了对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在毛泽东时代，贪污腐败像黄赌毒一样，销声匿迹。

.....

外国人在辞书中关于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毛泽东是影响 20 世纪历史进程的领导人，诗人。

词典解释说：诗人，写诗的作家。

红学家说：浪漫任性、多情善感是诗人。

诗人有一种独特的性格、经历、气质。

毛泽东是诗人，这种诗人的性格、经历、气质也影响到一些重大决策。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让准备打长春的林彪先打锦州，林彪不愿，毛泽东一再要求。国民党一位将军回忆说：你们把锦州一拿下来，我们就乱了套。仿佛鬼使神差，仿佛有一种预感。

领导人的脾气、秉性、特质直接影响着重大决策。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见到人民群众热情高涨，于是大受感动，兴奋之余，决心大干一场，迅速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于是有了大跃进，有了人民公社.....一种理想。

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

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关于毛泽东本人的真实事迹被公开，笼罩在他头顶的光环正在逐渐散去，让人更容易了解这个曾经被神化的人。从这些事迹中，你会发现毛泽东作为一个成功政治家的特质：坚忍加率性、理想加实用、沉湎加浪漫。

他的政治上的敌人很难取胜，甚至没有人能够掌握毛泽东的真正想法，摸清他的脉。他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建立一套逻辑上合理的理论，这是无人企及的能力。

抛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斗争，你会意外于毛泽东的浪漫情怀：他的诗词慷慨激昂又情意绵绵，他的书法笔走游龙，自成一派。他在晚年带头畅游长江，又重上井冈山。你很难把这些事情和一个来

自农村的革命领袖联系起来，这些豪迈的气概和温情与那些非凡的政治权谋统一在一个万人景仰的领袖身上，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1972年，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毛泽东对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他生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大概是对毛泽东一生最精炼的概括。但这样的行为同时衍生于一位当代伟人的身上又让人甚为不解，因为这两件事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是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后者是破坏它。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的毛泽东像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充满了长者的睿智和淡定。不过，当时的毛泽东却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两种描述其实都能反映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大开大阖不拘小节、追求理想大真大至。

仅仅把毛泽东看作一位成功的政治家，这种看法平庸且缺乏历史感，更重要的是很难诠释他那种多重的、复合的、有时甚至又是自相矛盾的政治举动，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权位的追求者，更是一种不公平的贬低。我们更愿意把毛泽东看成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不顾一切。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质并非独有，其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具有这种特质，毛泽东强化了这种特质。这种特质使他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国领袖；这种特质使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最终击败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

可以说，毛泽东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他的理想主义特质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和道德力量，这是他致胜的法宝。但建国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探索，从大炼钢铁到超英赶美，从人民公社到大食堂，这些探索缺乏科学的论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后果自然是可悲的。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一度集中主要精力攻读马列原著以及苏联30年代的一批哲学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

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进入古都北京以后，毛泽东似乎更喜欢读中国古籍，《四库备要》《二十四史》以及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演义小说等等，他对这些东西兴趣越发浓厚，内心和行为上和这种东西难免不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

从另一种角度看，毛泽东的确可以被看成一个不拘小节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以人民的名义行事，但毛泽东把他个人的理想追求有意无意地容纳了进来，以致一个理想主义者有意无意地把中国大地当作一张画纸，描绘着他的充满善意的梦想和探索。

“文革”作为毛泽东的一种政治选择，首先是一种权力斗争，不过这种权力斗争也是为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服务的。因此，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动乱，不如说是毛泽东的另外一次理想化的探索，只是这次探索造成了几千万人的灾难。

第四节 意境高玄的人格魅力

说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中国现代、当代史上，最伟大，最权威、最富于魅力，又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非毛泽东莫属。

远自长征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被拥戴为全党的领袖，这一地位是何等的不可动摇，乃至没有哪个人会怀疑它的合法性和必然性。

按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说法，权威的合法性不外乎三种类型：即传统型、法理型和个人魅力型。我认为，作为造反者的毛泽东，他不可能在旧的社会体系中获得传统的、世袭的合法的权威性基础，他的领袖地位，虽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认可并在党章上予以确认，但其权威运作的实际内涵，却远非党章或党的系统所能框限的。很显然，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既不是传统型的，也并非法理型的，而只能是源自于他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老百姓朴素的个人感情。

个人魅力型的权威，往往孕育于历史的大变革时代。当一个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或精神危机，当原有的政治权威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现存的价值信仰体系和社会规范不再能震撼人心、维系社会人际关系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期待这样一种权威人物的出现——他，应具有先知般的智慧，能够为大众描绘出未来世界的

理想蓝图，重新构建新的社会价值信仰系统；他，应散发出救星般的光晕，为民众指明一条摆脱厄运、走向光明的复兴之路；他，应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吸附、凝聚千百万松散游离状态的民众，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的、有坚定信仰热忱的团体……或者，他本身就代表着、甚至等同于民族的未来和理想，足以感召所有赤诚的信徒为之奋斗、为之献身。

大凡稍微明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清楚，长期的外族蹂躏、战乱、分裂与割据状态下的近代中国，正急需一个个人魅力型的权威。对阵触目惊心的国耻，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民族文化和生存的深刻危机，社会道德的沦丧败坏……当议会民主制（法理型）和袁世凯、张勋复辟（传统型）等各种权威组织被事实证明不能拯救这一切时，那种崛起于社会底层的、源于民间的人格魅力型的权威便应运而生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首曾在某个时期为民众自发的一度替代了国歌的陕北民歌更能透露出中国社会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接受毛泽东的内在信息了。确实，作为全党、全民族的“救星”，毛泽东个人素质上具备了其他竞争者所不曾具备的人格魅力和人格力量。他通晓中国的历史文化，深谙这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规则，因此，他能够将源于异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将之转化为连村野百姓都喜闻乐见的民族的思维方法、语言形式，这是言必称希腊、莫斯科而显得理论过于深奥、晦涩的王明之辈远远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和驾驭一切的手腕，善于处理、调动权力系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以“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刚柔相济的原则，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又是书生气十足、只知一味意气用事的陈独秀等人所匮乏的。更为重要的

是，毛泽东具有一般党内实干家所不具备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尽管他出生于韶山冲这一偏僻山村，但在那块土地上，却有着楚汉的浪漫主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天生的诗人气质与后天得来的广博知识相结合，这就必然地形成了他独特的、充满个性的理想。这理想气势之磅礴、目标之宏伟、意蕴之瑰丽，使得每个有志于革命的爱国志士不能不为之感染、为之动情而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这样，毛泽东便体现出了作为一个个人人格魅力型权威的全部魅力。大凡稍微了解毛泽东的人都清楚，他平易近人而又令人不由而生敬畏，他用浅显易懂的通俗语言，解释着中国革命的道理，却又令人无法猜度他内心那充满神秘感的理想憧憬。他比谁都热衷于现实功利，能够实实在在地设计一条民族解放的道路。同时，他又比谁都浪漫洒脱，无时不以哲人般的热忱关切着人类的、自然的、宇宙的等形而上的问题……这种种可望而不可即，似乎易懂而又难以彻悟的气质、意蕴，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人间神”的效应。

毛泽东的这种个人人格魅力及其权威，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人会指出，它具有现代迷信的色彩。然而，在当时的战争环境和社会氛围中，却是极端科学，极端合理的。作为一种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人格魅力首先扮演的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组织者角色。革命固然需要理智的自觉认识，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宗教信仰般的热忱。尤其是当革命形势异常紧迫、民族总体素质极为低下的时候尤为如此。在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可能像西欧共产主义运动那样，从容地进行各种理论的答辩，通过诉诸理性的手段以达到全党，甚而全社会的共识，为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不得不尽可能迅速地找到一个正确的领袖，在其基本共识的基础上，以他的是非为全党的是非。唯有如此，革命队伍才能形成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力量而众志成城。也只有树立了领袖绝对的、崇高的威望，革命者对事业的忠诚，才有了实际可行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在几经挫折、分裂之后，终于认同了毛泽东为全党的最高权威。实践证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的确是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关键性因素。

另一方面，个人魅力对旧的社会制度与价值取向，也起着摧枯拉朽的非常作用。原有的价值信仰体系或行政权力系统之所以失去合法性，除了已经衰败，更是由于新的充满生机的新权威的挑战。中国老百姓已习惯于几千年的人治统治传统，当他们欲表达自己内心对新制度的拥护时，往往直接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人格代表的个人崇拜。这样，正如蒋介石成为黑暗旧中国的化身一样，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光明的新中国，就是思想界之先驱、精英，亦多作如此观。正如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赴渝谈判时，在国民心目中，中国的前途命运，到底由“谁主沉浮”，不仅取决于当时两党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对比，同时也体现于两党最高领导人个人的人格魅力的对比。当时一个多少含有偶然因素的事件，竟使蒋介石在毛泽东面前败下阵来。即：著名的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人索句于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录下《沁园春·雪》相赠。词章在报上一发表，竟然顷刻轰动了山城整个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化界。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对久居于山区的毛泽东本来知之甚少，然《沁园春·雪》中所蕴含的胸襟、气魄，所体现的才思、文采，再辅之以毛泽东闻名遐迩的声望及个人魅力，难免不令他们大为震惊：这不就是集圣贤与王者于一身的当世“风流人物”么？这不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民族大救星么？相形之下，身着戎装、不苟言笑、神情刻板的“蒋委员长”，不也就成了那“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了吗？当知识分子们为毛词所倾倒，纷纷唱和时，这种中国文人式的对话，实际上已不自觉地为他们日后他们在各方面全方位地接受共产党取而代之国民党奠定了文化的、心理的基础了。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从权威的组织机构来说，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毛泽东在气质上是一个独行特立的创造性奇才，他从不满足于现状，从不满足于既定的一切，总是以其深邃的、富于独创性幻想的头脑，以其深邃的哲理的理性视角，在不断地思索、判断，不懈地追求一个更加完美的境界。这样，社会的客观需要，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的这种难以颖悟、难以言表的具有神秘乃至神圣色彩的绝对权威地位，当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者给中国带来独立、统一、和平的

生活时，人民也怀着由衷的拥戴、信赖之情，继续将民族、国家未来的命运托付于他，由衷地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事业定能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更何况新中国的建设、超越世界发达国家即超英赶美，也是一场不亚于民主革命的和平式战争，同样需要全民族的宗教般的热忱与信仰，大家庭式的团结和无私的个人奉献、个人牺牲精神。

随着年岁的增长、经验的积累、思想体系的日臻完善，毛泽东的智慧也日臻成熟，其个人的人格魅力也与日俱增，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时时以神谕般的片言只语，传递着其中的底蕴，致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都油然而生一种身不由己的敬畏。即使极少数清醒深刻者在理智上稍有相左，但在情感上依然保持着往日的忠诚与坚贞。正如远在海外的一位学者所说，他虽然对“文革”感到绝望，但是“对毛泽东依然怀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心”，他从毛泽东的诗词中，体味到毛泽东对人生、对世界、对宇宙的深刻感受，压根儿无法抵御这位圣哲意境高玄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个人的人格魅力，还充分体现在，他与中国古今的许多名人不同，并且时时反其道而行之，他有声有色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反传统忠孝之道的人，他屡屡抨击大人物压制小人物、老年人压制青年人的传统规范，反复论证了青年人和小人物身上有着无穷的创造力的观点，一贯将希望的目光投射到富有创造灵气的青年人身上，视之为“八九点钟的太阳”，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充分展示他们的创造灵气。

毛泽东的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民主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他个人的人格魅力逐渐发展到了极致，达到了巅峰。他个人的权威，别人对他的由衷崇拜，也随之登峰造极。如此一来，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就维系于他作为一个伟大领袖的个人的喜怒哀乐。如同历史上的其他伟人一样，他的一生，演出了两出人格魅力的戏剧，尽管扮演的是同一角色，但令人遗憾的，却是以悲剧告终。

毛泽东诞生于有着几千年专制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民主法治的地位，更没有实践的机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因而最容易滋生神圣帝王，难以萌生科学、民主、法治。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被解放区军民甚至相当数量的国统区民众奉为“救星”，批评毛泽东逐渐成为党内大忌。毛泽东后来率领中国共产党及革命群众，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奇迹般地推翻了国民党统治。他在万众的山呼万岁声中步入紫禁城，以开国元首的身份执掌了最高权力。这其中不乏他本人自我膨胀，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能容忍对毛泽东丝毫不敬。检讨这种悲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除了毛泽东本人的原因外，跟整个执政党当时的体制机制，权利制约因素都不无关联。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是一种真理性的箴言。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驱张运动”当事人张干，1952年曾被毛泽东邀请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还登上了天安门，游览了中南海。临别之际，他曾深情厚谊地复述了这句话给自己当年的学生——如今的领袖的毛泽东。这句话不仅包含着国内方面的阶级斗争性质的因素，国外的外部势力侵略因素，还包含着执政党的科学实践能力等诸多因素。

新中国建立已经逾60年了，改革开放也已过30年，虽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的幸福社会还距离遥远。很多不稳定因素也在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现在的人们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开始怀念毛泽东，一方面出于人们一种朴素善良的人性本能，更主要的还在于很多人的一种愿望和现实间的矛盾造成的离悖，由此，人们对毛泽东越发地怀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在其一生伟大的革命实践中，既是个成功者，又不是一个完全的成功者。一代伟人已溘然长逝了，但他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深入探索，对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对传统与现代规范的奋力抗争，对理想境界，包括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对共产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其伟大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成败之论，即便是失误，乃至是较大的失误，也给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的探

索者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正如一切文化遗产一样，毛泽东，毛泽东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他遗留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包括传统文化领域国学大师级的贡献，时刻意味着一笔永恒的、弥足珍贵的、富可敌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笔遗产不仅属于他个人或某个团体，更属于哺育他成长的华夏文明，他为之浴血奋战过的神州大地；属于他倾心相爱的黎民百姓，以及……全人类、全世界。

对此，又有谁能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今天这个国家具有的国际地位，今天中国人民享受到的幸福生活，不是沐浴着毛泽东这笔遗产的恩泽呢？

1960年12月26是毛泽东67岁生日，这天起床后，他不吃不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一会儿，他对值班卫士说：“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从来不允许为他过生日的，7位人员到齐后，果然发现桌上没有酒，也没有肉，只是多了些油和盐。人们就座后，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那天晚上，毛泽东流着泪对卫士封耀松说：“小封啊，我不放心呐！他们许多事情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这就是毛泽东！

这才是毛泽东！

这就是，也才是最真实的毛泽东！

……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咳呀

……